價格戰爭

評估地球價值的新方式

今日世人知道每一件事物的價格，卻無法瞭解任何事物的價值。

——王爾德

The Value of Nothing :

How to Reshape Market Society and Redefine Democracy

《糧食戰爭》作者

拉吉・帕特爾 Raj Patel 著

閭紀宇 譯

《糧食戰爭》作者帕特爾，全面檢視價格機制的虛妄與危險

長久以來，我們透過「市場」這道扭曲的三稜鏡來觀照世界與衡量價值，繪製出萬事萬物的價格地圖。然而價格是一個靠不住的嚮導，它的運作機制導致了金融危機、糧食危機，以及氣候與生態危機。

一份售價四美元的漢堡，背後的生態成本與社會成本可能高達二百美元。因此為價格的功用與其說是傳達事實，不如說是隱瞞藏匿；我們付出了慘痛的代價卻毫不自知，甚至滿心歡喜。即使在危機當頭的此刻，我們竟然想倚靠導致危機的市場與價格機制，來解決臨頭大難。碳交易和各種排汙權交易就是一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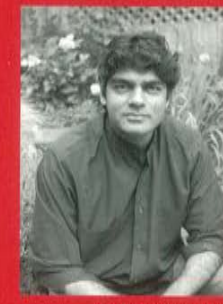
要免於大崩壞，地球需要民主與資源共有的經濟學

作者認為，正確的方向應該是重新調整市場社會的平衡，改變價值的衡量方式。他從世界各地爭取糧食主權的民眾組織身上看到，爭取糧食主權，就是要收回民主政治與經濟的主權，伸張人民界定價值的能力。他們的目標不是完全廢除市場或貿易，而是消除其中的宰制關係，使價格機制擁有民主與資源共有，以及正義的精神。

ISBN 978-957-13-5236-7（551.19）00260
時報出版
DK0004 NT$ 260

作者簡介

拉吉・帕特爾　Raj Patel



© by Andrea Ismert

先後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倫敦政經學院、美國康乃爾大學，目前同時在南非夸祖魯—納塔爾大學（University of KwaZulu-Natal）與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任教。帕特爾曾在世界銀行工作，在世界貿易組織（WTO）實習，為聯合國提供諮詢，後來投身於抗議這些國際組織的運動。他的第一本著作《糧食戰爭》已在十一個國家出版。帕特爾的個人網站：www.rajpatel.org

譯者簡介

閻紀宇

資深譯者。中國時報國際新聞中心副主任。主要譯作有《超級菁英》、《SQ：I-You 共融的社會智能》、《別對我撒謊》、《非理性的魅惑》、《強國論》、《決斷2秒間》、《未來在發酵》、《當知識份子遇到政治》、《魔鬼詩篇》、《遮蔽的伊斯蘭》、《中國即將崩潰》、《紙醉金迷哈瓦那》等。

「反共」兩個字竟能夠代表臺灣過去三十多年我所觀察到的主流意識形態。原本「反共」是指反對共產主義、共產黨、共匪等等，但從一九八〇年代「國共大合諧」開始，「反共」的真正意涵也開始慢慢滲透我們社會，慢慢顛覆我們的經濟活動並推翻了我們固有的價值。「反共」在臺灣已經不再代表反對共產主義，「反共」成為當代社會經濟「反共有共享」（anti-commons）的主要意識力量。

這本書似乎是提倡透過恢復或重建「共有共享」來處理地球社會、經濟及政治問題。臺灣當代的社會生態能夠吸引這種論述嗎？還是我們要堅持以我們的激進資本主義來繼續「反共」下去？這是個很有趣的課題，而對這個課題本書有相當多可以參考的內容。

——文魯彬／臺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創辦人

學生時代我們學會了「物質不滅定律」，進入社會我們體會到「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但是在經濟全球化競爭之下的今天，我們已經不知道東西從哪裡來，將會到哪裡去，這本「價格戰爭」以各種深入淺出的實例讓我們瞭解世界的真貌，我們才有機會擺脫價格的左右，探知事物的真正價值。

——李偉文／荒野保護協會榮譽理事長

這幾年臺灣接連發生因工業用地的開發而強制徵收農地與民地，有權勢的人可以自我設定並提升生存條件，促使企業財團如此狂妄自大。然而他們追求財富與利潤的同時，卻隱藏且不願承認那不被看見的社會成本。自然生態的毀壞、環境汙染健康傷害、農漁牧業損失、底層百姓流離失所、糧食安全與農業未來的恐慌、教育與價值觀的扭曲，難道財團都不必承擔嗎？這本書不僅道出市場社會的迷思，更是身在風險社會的我們追尋永續生存的未來之路。

——阿達／東海和平咖啡館店長、農村武裝青年樂團創作主唱

在這個資本主義發生危機的時刻，沒有比本書原文副標題更迫切的工作：「重塑我們的市場社會和重新定義民主」。本書生動地揭露自由市場教條主義在理論上與實踐上的虛偽，並且提出了許多另類實踐的可能，讓我們反思民主和市場如何可能建立新的平衡。

——張鐵志／作家、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

價格戰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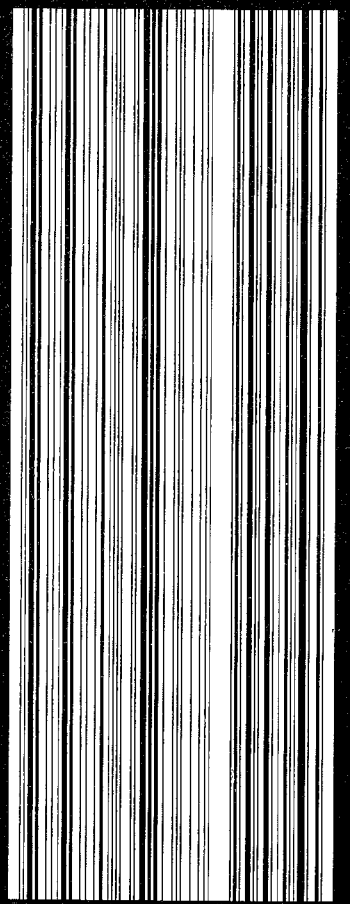
拉吉・帕特爾 Raj Patel 著

閻紀宇 譯

評估地球價值的新方式

The Value of Nothing :

How to Reshape Market Society and Redefine Democracy



目次

導讀：人類不能「市場說了算」！／南方朔 005
推薦序：重新認識民主與自由／徐文彥 010
推薦序：農業的另一種價值／楊儒門 017

第一部
1. 缺陷 022
2. 成為經濟人 047
3. 企業 064
4. 鑽石與水 086
5. 反經濟人 101
6. 人人都是共有財的共享者 119

第二部
7. 反制運動與擁有權利的權利 138
8. 城市民主 161
9. 重探糧食主權 186
10. 安氏盲 202

致謝 226
注釋 254
書目 270

導讀

人類不能「市場說了算」！

南方朔

一九九九年，芝加哥大學法學院為《一九八四》出版五十週年舉辦了一場重要的論文發表討論會，那次會議真是當代各學科重量級學者華集，好一場學術盛會，各家所學的論文二〇〇〇年由普林斯頓大學出版。

在那次會上，賓夕凡尼亞大學華頓商學院金融教授赫曼（Edward S. Herman），從語言及意識形態支配的角度著眼，他指出在歐威爾寫作那個時刻，政治支配當道，因而遂有了小說裡的「雙重言說」（Double speaking），那是一種藉著控制媒體的灌輸而造成的結果。赫曼教授認為這是「新聞說了算」（Newspeak）的時代，但到了後來，這種「新聞說了算」卻讓位給了「市場說了算」（Marketspeak），藉著控制市場而主宰價值和選擇，已成了意識形態操縱的最大手段。研究經濟、商學及管理的都知道賓大華頓商學院長期皆為美國商學院排名第一，而赫曼教授專研金融及公司權力，更對政治及思想控制成一家之言。他與反抗大師杭士基

（Noam Chomsky）曾合著《製造同意》（*Manufacturing Consent*）一書，已成研究思想宰制的經典之作。他在那次會議裡所提出的「市場說了算」這個概念，在二〇〇八年次貸風暴和金融海嘯後，已愈來愈得到人們的共感。因為一九三〇年代之後的這次危機已使得人們警惕到，這次危機絕非意外，而是整個體制的積弊所致，而其源頭則是當代經濟思維與實踐已走到一條奇怪的單向道，富人及公司假借自由市場之名而綁架國家，遂行其「利潤歸私，成本歸公」的圖謀，於是實質上是「不自由」的所謂「自由市場」遂成了二十世紀後半段起最大的「政治正確」。這也是「重新思考經濟學」的主張日益茁壯的原因。人們已察覺到一種倒果為因的「市場製造意見」（Markets make opinions），「意見製造經濟學」（Opinions make economics）早已形成，當原本應該經世濟時、增加人類福祉的學科，已墮落為替私利背書，為少數人所製造出來的社會災害及生態災難做合理化的工具，人們又豈能不對經濟的整個思維邏輯與其實踐痛切反省呢？這也是最近一年多來，歐美許多經濟及商學院會開始反省並強調批判反思的原因！到了這時，赫曼教授所謂的「市場說了算」的警告，甚或最早的前代經濟思想家高伯瑞（J. K. Galbraith）認為當代經濟思維裡充滿了「看起來無辜的詐騙」，他們這些說法裡的先見之明才被人體會。

目前整個經濟學領域，誠可謂「反省當道」。各家批判之聲崛起茁壯。在新興批判人物裡，拉吉．帕特爾（Raj Patel）可說有著相當的代表性，他出身牛津大學，讀哲學、政治與經濟，而後進倫敦政經學院，最後在美國康乃爾大學獲得發展社會學博士學位。他先後在世銀、世界貿易組織工作，也參加過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在地人民運動，這種理論與實務兼具，又有第一線抗爭的經驗，遂使他稍早前寫出相當受人重視的《糧食戰爭》一書，將當今世界整個糧食發展如何被塑造，它的被扭曲以及不公義做了揭發與探討；而他接著所寫的現在這本書，除了延續《糧食戰爭》的主軸外，更企圖將他的論點拉高到經濟哲學和當代理論經濟學的某些方向，這也使得本書有了更多知識思辨的空間。

在這本《價格戰爭》新書裡，拉吉．帕特爾一開始就由引發當前危機的金融衍生性商品切入。今天我們已普遍知道，在金融衍生性商品形成之初，此案曾在美國參院被討論質疑，當時的聯準會理事主席葛林斯潘曾前往作證，他當時即明言「市場有效論」，將自動掌控它可能產生的風險，而不必由聯邦政府介入調控監督。政府的徹底放任，業者的無限貪婪，信評公司的協同詐欺，以及接下來各大投資銀行和投顧公司廣泛聘用數學系所碩士畢業生擔任所謂的「量化設計師」（Quarts），設計出複雜無比，縱使專案人員也不懂的投資商品，於是龐鉅無比的集體詐欺結構遂告形成，這乃是當今危機的主因。從全球金融海嘯迄今，八大工業國多次高峰會，好幾位歐洲大國元首都明言這是必須國際究辦的詐欺案，因而提案要求調查，但我們也知道這個詐欺案若被確定，必會引發天文數字的求償訴訟與究責，將成為美國政府不可能承擔之重，於是所有這方面的提案皆陸續遭到封鎖，以至於演變成後來所謂的「放火

的擔任救火員」這種新的爭論，以及全球靠著「量化寬鬆」（quantitative easing, QE）印鈔票，用國家預算的無限增加企圖吸收那些私人公司所製造出的危機，這也就是所謂的「利潤歸私，成本則歸社會與國家」的道理。目前全球的各國債務危機日增，其因果歷歷，人們都已耳熟能詳，無庸再多做表述。

而《價格戰爭》此書，即由這點出發，而論及整個「市場」的知識缺陷及制度性集體詐欺，帕特爾由衍生性金融商品而論及葛林斯潘，再由葛林斯潘而回溯到主張極端放任的教母安蘭德（Ann Rand），而後再將重心轉到九二年諾貝爾經濟獎得主蓋瑞．貝克（Gary Backer）。由於我曾對安蘭德以及蓋瑞．貝克的中文版譯著都寫過長篇討論，對他（她）們並非不熟悉，安蘭德徹底非法化了國家的調控角色，也徹底美化了公司富人這種保守主義所謂的「私人」，這乃是一切問題的終極原因。至於貝克，當今另一主要經濟學家巴洛（Robert J. Barro）在《沒有什麼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新千禧年的經濟理念》文集裡即已指出，貝克乃是「經濟學帝國主義」，因為他將經濟的「效用」理念無限放大，企圖把「市場」觀念用到解釋幾乎一切人類行動上，包括移民、監獄吸毒、女性問題上，這是種方法學上的帝國主義，產生了許多言之成理，其實卻極荒誕的觀點。

接續上述的有關理論上的探討，帕特爾進一步深入到當間的世界經濟現象上，一切的貧富不均、現代奴隸、對自然的剝削，將來可能的資源危機和糧食危機等，都有了更清楚的思考架構。而可能最值得注意的，乃是帕特爾雖然不排除某些人所強調的，「將國家職能重新找回帶進來」（Bring the states back in），但做為一個經濟民主及環境問題的運動者，帕特爾其實更關心糧食主權、土地權利等新型人民運動，也只有更加注重公共福祉和公共擁有，人類或許才有可能為當今問題找到更好的另類選擇！本書的後面兩部分，乃是我們並不熟悉的新概念和新做法，也是本書最值得省思的部分。而他所想的許多問題，我認為因臺灣最近所出現的土地及生態抗爭，我們對許多問題似乎也該重新思考了！

推薦序

重新認識民主與自由

徐文彥／公平貿易倡議者、生態綠創辦人

這兩年我跑了上百場以「公平貿易」為主題的演講，每次開場我總會先問聽眾一個問題：「臺灣人到咖啡館很愛喝曼特寧，甚至罐裝咖啡、即溶咖啡都有曼特寧風味，就算不喝咖啡的人都聽過曼特寧，到底曼特寧這三個字是咖啡風味的形容詞，還是咖啡產地的名稱？如果是形容詞，它是形容口感還是香氣？如果曼特寧是地名，它又在哪裡？」

經過上百次的經驗、問過數千名聽眾，能夠正確解答的聽眾還真是寥寥無幾，所以這個題目變得非常具有暖場的娛樂效果。究竟曼特寧是什麼？或許各位讀者下一次可以問一下賣咖啡給您的店家，他們應該要跟您說的。只是從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發現咖啡產業一個有趣的現象，那些在咖啡市場中具有主導能力、行銷能力的大型咖啡商，經常以塞納河左岸或米蘭咖啡館來形塑他們所賣的飲料具有歐洲浪漫風情的幸福想像，但他們永遠不告訴我們咖啡產業背後的真實。

炫目的價格遊戲

觀察臺灣近年來的咖啡產業變化，咖啡外帶吧開始流行之後，咖啡產業進入低價競爭的時代，便利超商也進場賣咖啡，連吧臺手的高超技術、烘焙師的獨門手藝、店老闆的用心陳設似乎也不重要了，更別說咖啡產地貧窮問題與消費者的關係似乎更遙遠了。價格主宰了市場，兩倍以上的價格差距徹底顛覆了臺灣的咖啡市場。

有消費者以為一杯一百多元的咖啡店是賺取暴利，一杯咖啡的價格不應該這麼貴；殊不知外帶吧的型態是用騎樓的公共空間做為自己的營業空間使用，而且沒有冷氣與昂貴的裝潢，與傳統咖啡店的經營成本完全不同。連鎖超商賣的咖啡價位鎖定跟咖啡外帶吧一樣，可是外帶吧至少還要支付租金與人事成本，超商咖啡只是擺了臺全自動咖啡機，沒有額外的租金與人事成本，工讀生隨手按個鈕，就可以收跟外帶吧一樣的價錢。超商咖啡的營業成本應該比外帶吧還要低，價格不是應該可以再低一點？

本書作者在第一章就開宗明義解釋了「價格」與「價值」的差異，以《全民估價王》這個老少咸宜的電視節目為例，消遣了這個時代「價格」與「價值」的錯亂，這個節目的樂趣就是在於參與猜價格遊戲的來賓，必須要察覺願意支付的價格，而非商品的效用或成本（價值）。這也就可以解釋，儘管超商咖啡的經營成本比外帶吧的型態還低，卻沒有反應在價格上；因

為消費者既然已經覺得一杯四十元的咖啡已經夠便宜且願意支付了，又何必照營業成本的差異來照比例降價。所以，在競爭市場中，價格是由利潤決定的，而不是成本、效用或價值。當利潤不符合預期時，店家就會把商品降價求售；當生意好時，價格就會穩定鎖定在一個很好的毛利。

所以，到底一杯咖啡合理的價格是多少？在這個價格市場混亂的情況下，消費者對於價值與價格的關係是愈來愈模糊了。無論如何，一杯咖啡的末端售價與咖啡豆的原料成本關聯性很低，跟最末端的加工成本與經營型態有高度關係。同樣的咖啡烘焙廠將咖啡豆賣到咖啡店、外帶吧、便利超商，末端價格卻截然不同。既然原料成本與末端售價的關聯性不高，給予原料的生產者一個合理的報酬又有何妨？因為我們這裡多付一塊，對於原料生產者來講，收入可能是增加一倍。來一杯喝的人享受芬芳、種的人也感到芬芳的咖啡不是很美好！

商品背後的真實成本

要消費者多付一塊錢，這不是損害消費者權益？我想，自從兩年前的三聚氰胺事件後，許多消費者已經開始知道，天底下沒有便宜又好的東西。如果消費者只在意價格，商人就會進行削價競爭，削價競爭的結果，不是生產者倒楣、就是土地倒楣，也有可能是消費者自己

倒楣。消費者的權益如果只是以價格來衡量，躲在價格背後那些看不見的外部成本，將讓全體社會於日後付出更龐大的代價。

我們在咖啡店喝到一杯好咖啡，通常會稱讚吧臺手的技術好，在餐廳吃到一盤好菜，也會稱讚廚師的手藝好，鮮少人會說農民種的好。如果農民的勞動價值不被肯定，農產品的交易價格肯定好不起來。農產品集中交易市場依據供給需求量來判斷交易的價格（如：咖啡期貨市場），但市場中的供給需求量，是看不見商品背後生產者的勞動成本與種植過程中所造成的環境損耗成本。當農產品的價格不是農民能夠決定而且沒有實現合理的成本，農民唯一能夠增加收入的方式就只有增加產量；而擴大耕地面積、或是多下點農藥及化學肥料，就是一般農民要增加產量的最普遍耕作方式。儘管沒有消費者會希望農民是砍伐雨林或過量使用農藥來耕作，可是我們當前的商業體系最終卻會把農民推向剝削土地或剝削自己的方向走。

本書作者拉吉・帕特爾（Raj Patel）在其成名作《糧食戰爭》中舉了一個案例，市售二十七種即時麥片，有二十六種含糖量過高。也就是說，當那些包裝上寫著幫助腦部發育、促進骨骼強壯等等功效都是次要的，商品的真正目的是讓我們的小孩吃了會上癮。Discovery有發行一部紀錄片《巧克力大戰》，內容提到全世界八〇%的巧克力盡歸兩間公司所有（Mars和Hershey's），市面上許多巧克力品牌，其實大部分都是他們的子公司。巧克力的原料是可可豆，而全世界六〇%的可可豆來自於迦納，可是採集與運送可可豆卻大量使用身手矯健的童

工。所以，我們很難在市場上買到沒有童工參與的巧克力。

在這看起來自由的市場中，消費者看似擁有充分的選擇權，有人偏好價格、有人偏好品牌、有人選擇包裝……其實，我們都只是在商人設計好的選項裡面做選擇而已。特別是廣大的一般性商品中，我們有限的自由能夠展現消費者權力的機會只是在比價與殺價的過程，如果消費者與商品的關係只是展現在價格上，那我們會整天不斷地被《全民估價王》的遊戲所愚弄。我們迎接整個城市都是咖啡館的同時，每天也有二十個足球場大面積的雨林因為咖啡不見了，而且未來我們會在愈來愈熱的城市裡面喝咖啡。

駭掉私有才是真自由

如何掙脫這種有可能把人類玩殘的價格遊戲？作者延續前一本書《糧食戰爭》的立場，消費者必須要更積極介入這些遊戲背後的權力關係，改變不合理的商業市場與公權力之間千絲萬縷的勾結。

作者引述博蘭尼（Karl Polanyi）在《鉅變》一書的觀點，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發展的因素，就是它把土地與勞動力給商品化了，當金錢成為衡量價值的依據時，資本家與國家在累積金錢的共同目標下，把人從耕地上趕到工廠做工，把土地變成私人資產來謀取財富。金融危機

發生後，那些口口聲聲要捍衛自由的銀行或企業，卻依賴政府與納稅人的資產來紓困。所以，經濟從來不是獨自且自由地發展，而是靠不斷扭曲社會關係來累積財富，現在甚至連水、二氧化碳都可以被量化計價。那些關乎公共資產移轉成私有財產的過程，那些靠傷害公共資產來累積私人財富的過程，是必須要靠人民更積極的介入來扭轉，我們必須要重新審視現在的民主形式。

我們時常聽到一些冠以「自由」的名詞，例如：自由競爭、自由貿易、自由市場、自由經濟。這些冠以自由的名詞都是以自利為假設，私有財產為基礎所設想的社會型態。這些名詞只要加上自由兩字，就好像天經地義、理所當然變成一個普世價值，好像每個人在這個市場中都擁有權利、機會與自由追逐自己的最大利益。作者以哈定於一九六八年提出「共有財的悲劇」為例說明，過分強調私有財產的觀念是導致共有財被破壞殆盡的因素，我們的海洋資源、森林資源、水資源就是如此被耗盡。

難道人類文明就一定要建立在這種自我毀滅的遊戲上？還是我們有其他的選擇？

本書提到幾個不是奠基在私有財產為基礎的機制，還是可以創造出一個持續進步且滿足公眾利益的偉大社群，例如：南非的棚戶居民組織、巴西阿雷格港的參與式預算、自由軟體運動、維基百科、創用CC運動等等，可見私有制不見得是人類文明邁向進步的必要條件。開放參與、鼓勵分享都是那些社群的基本運作方式。享用不一定需要擁有，如此才能永遠享

用上天賦予的公共資產、人類數千年累積的無窮智慧。

奪回人民的權力

在這商品化的世界裡，我們太習慣把每樣東西都標上價格，私有資產貼上價格後就是財富積累的成果，就算水、空氣等公共財也可以當作未來的財富。這種標價而後交換的規則，發展出炫目的價格遊戲，滿足了我們自以為擁有的掌控權；其實價格的背後潛藏著太多看不到的價值正在流失，遊戲的背後也隱藏著早已設計好的劇本。我們以為冠以自由為名的遊戲是公平的，其實它從來都是以權力做為基礎的金錢遊戲，有錢的人可以跟有權的人一起點石成金，把公共財變到自己的口袋。

自由，不是為少數人累積個人財富，而後推卸社會責任的藉口。

民主，不是為少數人掌握個人權力，而後拒絕人民參與的遊戲。

民主與自由，那些少數人時常掛在嘴上的，我們必須重新認識，奪回屬於人民的權力！

（這篇推薦文與本書作者一樣，完全使用自由軟體書寫）

推薦序

農業的另一種價值

楊儒門／248農學市集發起人

農產品的價格應該來自於：農民、中盤商、消費者、環境的決定，任何單一方面的取決，都會為其他三者帶來嚴重的傷害。

應該要有一個「合理」的價格，不要再像咖啡的生產與消費模式，十年來咖啡產地生豆的價格下跌了九成，但是末端的價格卻上漲了一倍。問自己一個問題，那中間的價差去了哪？而咖啡農的人權是否受到重視與保障，請大家看一下「血咖啡」、「圖佛之死」就會明瞭的。

價格對我來說，有一個最鮮明的時候。二〇〇五年的某一天下午，看著報紙，吃著火龍果，身旁收著一碗泡麵，而報紙上的一則新聞吸引了我的目光：印度北部爆發嚴重的日本腦炎，許多孩童因得不到藥物治療而失去了生命，令我震撼的新聞附圖，是一位父親抱著他的小孩，站在醫院門口，圖說注明這位父親付不起預防日本腦炎的疫苗，價格是一美元，在孩子感染日本腦炎之後，無助地站在醫院門口，等待著他的孩子，在他懷中死去。

合理的價格來自於各方有一個平等的對價關係，現今很多人在討論「公平貿易」，對我來說，什麼叫公平貿易？其實很簡單，就是農友種植的作物，在出售之後：一、可以養得活家人，二、小孩子可以上學受教育，三、生病了可以看醫生。這是一個基本的要求，但是社會有給予到這一點嗎？請大家記得一件事，世上最嚴重的疾病和奪走最多人生命的疾病是「飢荒」。每五秒鐘就有一個不滿五歲的小孩，因「餓」而失去生命。在二〇〇八年世界糧食危機發生的同時，中南美洲的國家，還源源不絕地輸出經濟作物「花卉與咖啡」，就為了滿足先進國家對於「低價」的需求。那是何等的殘忍！

農業的價值在現在被社會大眾所低估！以稻田的種植為例，收成對農民是實質的收入，但是在種植的過程裡，農民在稻田裡放水，連帶的好處是：一、田裡的水會下滲，所以具有補充地下水的功能。二、水會蒸發，過程中會帶走熱量，進而會調整地區的微型氣候。白話來說，就是大家會覺得住在田邊比城市要來得「氣候怡人」。據研究報告指出，一甲的水田，夏天等於六百臺家用冷氣，一年可以省下約二萬度的電。三、由於氣候愈來愈不穩定，聖嬰或是恩索現象造成「一次性大雨或豪雨」出現的機會與頻率增加。就水田或是耕地來說，每一區的間隔都有田埂，形成獨立的區塊，就某種程度上，有「滯洪」的功能。四、有水就有生物，農友使用正確的種植方式，會為「生物多樣性」帶來可能。

除此之外，農業的價值還包括：五、來自於糧食安全的考量，一個國家沒有穩定的糧食

供應，就容易發生動盪。所謂「飢寒起盜心」，從古至今，政權的變革最大的因素來自於「農民起義」。六、鄉村在工業化與城市化的社會中，成為社會安定的來源，一旦經濟走向疲弱時，「農村會成為城市失業的海綿」，適時吸納許多暫時失去工作的人，有一個回歸的地方。如書中提到的，巴基斯坦有句諺語：「當你走投無路，大海總有生路。」簡單來說，農業的結構，在沒有金錢交易時，人還是可以依靠土地與農村社群結構而存活下來！七、來自於景觀，大家要記得農村景觀不是天生的，而是源自於農民的維護。在歐盟的話，在WTO的架構下，會使用「綠色補助」來感謝農民對於景觀的維護。而我的記憶有跡可尋，也要謝謝農民的維護。如果我們失去了農村，那黃土水先生的水牛、賴和先生的詩、鍾理和先生描述的農村景象……我們的下一代誰會懂？這豈是價格可以衡量的！

第一部

今日世人知道每一件事物的價格，卻無法瞭解任何事物的價值。

——王爾德 Oscar Wilde《葛雷的畫像》

The Value of Nothing

How to Reshape Market Society and Redefine Democracy

1. 缺陷

如今我擁有四重的靈視，
四重的靈視降臨在我身上，
四重靈視在我至高無上的喜悅，
三重靈視在美好的碧烏拉（Beulah）夜晚，
兩重靈視永遠展現，願上帝讓吾人
擺脫一重靈視與牛頓的睡夢！

——布雷克（William Blake），〈書信詩〉（Poems from Letters）

如果上帝是藉由戰爭讓美國民眾認識世界地理，那麼經濟衰退就是祂為芸芸眾生上了一堂經濟學入門課。

全球金融體系的大崩壞昭告世人：這個由一群數學天才在大資本家支持之下打造的體系，看似一部能夠帶動無止境繁榮的火車頭，其實卻只是一輛由交易、交換與對賭拼裝成的小丑道具車，最終命運是四分五裂、七零八落。這場經濟衰退的起因並不是經濟學知識的匱乏，而是特定經濟學知識的氾濫成災，資本主義精神的過度發揮。自由市場的五光十色遮蔽了我們的視野，使我們無法以其他方式來看待這個世界。一百多年前英國作家王爾德一語道破：「今日世人知道每一件事物的價格，卻無法瞭解任何事物的價值。」價格是一個靠不住的嚮導：二〇〇八年不但金融海嘯撲天蓋地，也爆發了糧食與原油價格危機。儘管如此，我們至今似乎仍然只能透過「市場」這道扭曲的三稜鏡，來觀照整個世界或衡量其價值。

一件事非常清楚：當初導致我們陷入困境的思維觀念，如今不可能解救我們擺脫困境。或許差堪告慰的是，幾個過去備受推崇的人物，已經被迫開始省思自己的錯誤觀念。其中最難堪的案例可能就是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在美國聯邦眾議院監督暨政府改革委員會（Committee on Oversight and Government Reform）一場座無虛席的聽證會上，葛林斯潘自白他的世界觀如何畫下錯誤句點。

葛林斯潘曾擔任聯邦準備理事會（Federal Reserve Board）主席將近二十年，被公認為當代世界經濟的「立法者」之一。葛林斯潘也是自由市場陣營的旗手，曾拜在思想家蘭德（Ayn Rand）門下。蘭德過世於一九八二年，儘管她在美國之外的地區默默無聞，然而影響力始終

居高不下。她的小說《阿特拉斯聳聳肩》(*Atlas Shrugged*)出版於一九五七年，最近又登上暢銷書排行榜，書中將企業大亨塑造成英雄，描述他們如何對抗官員和工會人士的迫害壓制。蘭德認為利他主義(altruism)猶如一種「道德上的同類相食」，因此全力倡導極端的自由市場放任主義，稱之為「客觀主義」(Objectivism)。葛林斯潘就是受到這種天花亂墜的思想吸引，成為蘭德學派的一員，還因為有趣的舉止和衣著風格，被取了一個綽號「葬儀社老闆」(The Undertaker)。後來葛林斯潘從事公職，感覺就像反戰嬉皮加入陸戰隊，他早年的朋友一直無法原諒他的墮落。儘管如此，葛林斯潘大體上還是秉持蘭德的思想，深信個人主義能夠造就最理想的世界，任何形式的限制都會導致災難。

二〇〇八年將近尾聲，美國國會傳喚葛林斯潘出席一場探討金融危機的聽證會。他的聯準會主席任期如此漫長、聲望如此崇高，國會想知道到底出了什麼問題。葛林斯潘開始唸證詞的時候，整個人看起來沒精打采，皮膚鬆垂，彷彿原本讓他容光煥發的活力已經消失殆盡。不過葛林斯潘還是大言不慚，第一回合，他將重點放在自己依據的資訊：只要輸入適當的資訊，他的經濟模式還是可以運作，做出更準確的預測。葛林斯潘如是說：

> 衍生性金融商品(derivatives)市場的發展基礎是一套價格模式，提出它的學者曾經獲得諾貝爾獎肯定(譯注：指一九九七年獲獎的斯科爾斯〔Myron Scholes〕與默頓〔Robert Merton〕)。這個現代風險管理典範數十年來一直居於主流地位，然而去年夏天，整個理論體系土崩瓦解，原因在於輸入風險管理模式的資料，基本上只涵蓋過去二十年的經濟繁榮時期。如果這套模式能夠……更適切地考量歷史上的經濟困頓時期，那麼它對資本額的要求會提高許多，今日金融業的情況也會改善許多；這是我的看法。[1]

葛林斯潘的說法等於是「垃圾進、垃圾出」(garbage-in-garbage-out)：模式本身並沒有問題，但是對風險與資料有錯誤的認知，只局限於經濟繁榮時期，最後導致錯誤的結果。葛林斯潘在委員會的死對頭魏克斯曼(Henry Waxman)眾議員不肯罷休，迫使他做出更深刻的結論。兩人之間有一段精采的對話：

> 魏克斯曼：「我要問你的問題是，你有一種意識形態，自由與競爭是你的信仰。你自己在證詞中也這麼說：『我有一種意識形態。我認為自由、競爭的市場是組織經濟活動的不二法門。我們曾經嘗試進行監督管制，然而結果乏善可陳。』這是你自己的話。對於引發次級房貸風暴的浮濫借貸，當年你擁有權力可以防患未然，許多人也曾建議你這麼做。然而時至今日，整個經濟要為你的無所作為付出代價。你是否認為，當時你的意識形態導致你做出如今悔不當初的決定？」

葛林斯潘：「嗯，我們應該先釐清意識形態的本質。它是一種觀念架構，讓人們藉以面對現實世界。每個人都有一套意識形態，閣下也不例外。人只要活著就需要意識形態，因此真正的問題在於意識形態是否正確。現在我想表達的是，的確，我發現自己的意識形態有缺陷，雖然還不確定它的嚴重程度，是否根深柢固，但這樣的事實令我非常困擾。」

魏克斯曼：「你發現一個缺陷？」

葛林斯潘：「可以這麼說，我認為世界的運作必須倚賴一個非常重要的架構模式，後來卻發現這個模式有缺陷。」

魏克斯曼：「換句話說，你發現你的世界觀，你的意識形態，其實並不正確，無法運作。」

葛林斯潘：「的確如此，這也是令我大感震驚的原因；過去四十年甚至更長期以來，我一直認為有相當充分的證據顯示，這個模式的運作非常順暢，可圈可點。」

老實說，葛林斯潘的缺陷並不是資料有瑕疵的小問題，也不是塔雷伯（Nassim Taleb）等作家討論的「黑天鵝」（Black Swan）問題：無法解釋某些可能性非常低、但是一旦發生就會後果不可收拾的事件。葛林斯潘的缺陷涉及更基礎的層面，扭曲了他關於世界組織方式、市

場社會生態的觀點。而且葛林斯潘並不是獨行俠，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的首席經濟顧問桑默斯（Larry Summers）也必須面對類似的錯誤：他關於市場在本質上能夠自我穩定的觀念已經「遭遇致命打擊」。[2]美國前任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的財政部長鮑爾森（Hank Paulson）也有類似的反應，對自己的錯誤表示無可奈何。連ＣＮＢＣ電視臺《瘋錢》（*Mad Money*）節目主持人克瑞莫（Jim Cramer）都以認輸的口氣說：「對於今天的經濟情勢，只有馬克思（Karl Marx）未卜先知。」[3]用市場的術語來說，這些自由市場的標竿人物一個接一個恍然大悟，自己的觀念必須「修正」。

世人對葛林斯潘認錯已經耳熟能詳。打開財經媒體的讀者投書版，觸目所及盡是和葛林斯潘如出一轍的專家分析，大談風險的價格如何被錯估（的確錯得離譜），監管措施的欠缺如何導致金融體系恐慌（的確是一片恐慌），誘因架構如何鼓勵交易者將財務風險轉嫁到遙遠的未來（他們的確是這麼做），自由市場的信徒如何廢除原本有助於改善今日局勢的防範措施（他們也的確這麼做了）。然而這類反應背後隱含的思維都是「如果我們做好規畫，問題就能迎刃而解」。我不確定人們是否能夠真正理解葛林斯潘認錯的意義。人們無法承受這樣的震撼：政府與經濟體系的基本政策已經誤入歧途，而且至今找不到別的出路。

打個比方，這種情形就像有天早晨你一覺醒來，發現自己變成一隻蟑螂。[4]這是卡夫卡（Franz Kafka）中篇小說《蛻變》（*The Metamorphosis*）的基本情節。小說開場描述一整晚噩夢連

連的年輕推銷員薩姆沙（Gregor Samsa），早晨醒來時發現自己變成一隻巨大的蟲。薩姆沙的反應發人深省，可以促使我們坦然面對自身的真面目。由人變蟲之後，薩姆沙做了哪些舉動？他並沒有尖叫著逃出房間，或者思索這一切是如何發生，這樣的蛻變有什麼意義，明天自己還會變成什麼模樣。一言以蔽之，薩姆沙的反應是：「我慘了！我的工作怎麼辦？」

面對當前這場經濟危機，我們的反應正是如此。

雖然你我並沒有一覺醒來變成蟲，但的確發現這個世界已經翻天覆地。過去大家都認為對我們有利的事物，如今原形畢露。葛林斯潘的「缺陷」意義深遠，要想透徹理解，就必須全面檢討我們的生活方式。我們不僅要以新的方式來設定對社會和經濟的期望，涵蓋更豐富的人性要素；而且我們還需要另一套意識形態，來主導商品與服務的交易過程。

在葛林斯潘的世界，價格對意識形態的影響既深且廣。價格提供一種角度，讓我們掌握這個小小星球上的集體需求與資源。海耶克（Friedrich Hayek）的經濟學思想正是如此，價格猶如一種卷鬚（tendril），讓需求和需要得以互通聲息。科幻小說與電影迷其實已經很熟悉這樣的場景，《駭客任務》（*The Matrix*）中得到解放的人類（以及追殺他們的電腦程式）能夠看出世界的原始面貌：由無數符號與訊號組成的「數位雨」。這既是科幻情節，也是經濟宰制的事實。螢幕上川流不息的資料，是全球金融交易鉅子的關注焦點，他們的目光在螢幕之間穿梭，試圖參透玄機、獲取利潤。《駭客任務》中的螢幕訊息是真實世界的模擬，但與其說是傳播事

實，不如說是隱瞞藏匿。當代商業活動的問題在於，這種不可靠的數位訊息運作，已經成為不可或缺的舞臺道具。

我們以歐洲汽車業鉅子福斯集團（Volkswagen）為例。二〇〇八年十月，福斯一部車都不必賣，就登上全球市值最高公司的寶座。當時的經濟情勢仍然一洩千里，股市投資人對福斯的前景也並不看好。他們盯著螢幕上的資料，認定福斯和汽車業其他難兄難弟一樣，日子只會愈來愈難過。想像你是一個股市投資人，雖然深信福斯的股價將一路走跌，但你還是可以靠它賺錢，方法就是先賣掉持股，等到股價下挫之後再買回。如果你手中沒有福斯的股票，不妨求助持有這檔股票的人，例如法人投資者。你以一定價格向他們借股票來操作，並承諾很快就會償還。法人投資者樂意配合，因為出借股票可以賺錢，而且保有股票的所有權。你也樂此不疲，因為你可以先賣股票，等股價下跌再買回，償還出借的法人之後仍然有利可圖，支付摩納哥遊艇的分期付款綽綽有餘。這種買賣手法就叫做「放空」（shorting）。

問題來了，福斯的對手保時捷（Porsche）當時正在暗中收購福斯的股票，企圖掌握七五%的股權。保時捷的大舉買進行動曝光之後，大家很快就發現市場上的福斯股票奇貨可居，幾乎快被保時捷一掃而空，於是福斯的股價不跌反漲。放空投資人賣出的福斯股票都由保時捷收購，等到保時捷表明入主福斯的意圖，放空投資人開始驚慌，引發所謂的「軋空」（short squeeze），也就是投資人發現操作方向錯誤，試圖以買進股票來彌補損失。他們原本

預期福斯的股價會和其他同業一樣，受到經濟衰退拖累而下跌，後來卻發現儘管福斯在汽車市場表現欠佳，在股市卻一路長紅，空頭炒手為了彌補損失，只能爭先恐後買進。

各方大買特買，福斯的股價一發不可收拾，躍升為德國法蘭克福指數DAX 30成分股之中市值最高的公司。然後這樁消息又引發一波搶進潮，但主角不是投機的股市炒手，而是與它們遙遙相對、平日作風保守的法人投資者。以退休基金為例，它們的投資著眼於長期收益，寧可慢工出細活累積財富，不願冒太大風險。它們保持投資組合均衡的方法之一，就是非藍籌股（blue chip）不買。屬於藍籌股的公司最能夠承受股市無可避免的劇烈震盪，它們的市值在公開市場名列前茅，被各種指數納為成分股。當福斯被列入法蘭克福指數成分股，法人投資者也自動自發，下海尋寶，價錢再高都買得下手。結果如何？短短一個星期之內，福斯從一股二百歐元狂飆到一千歐元，等於市值膨脹到三千億歐元（三千八百六十億美元），一時間竟超越市值「只有」三千四百三十億美元的艾克森美孚（Exxon-Mobil）。福斯不費吹灰之力，榮登全球市值最高公司的寶座。

後來法蘭克福指數修改規則，福斯股價塵埃落定，二〇〇九年時反而將保時捷併吞。人們很容易從幾個觀點來詮釋這個故事：法人投資者偷雞不著蝕把米、市場規模的相關資訊不夠完整、短期與長期投資的遊戲規則糾纏不清。然而如果我們更加深入檢視，就會發現故事背後有一個觀念架構，而且是每一個樓起樓塌、盛極而衰的故事共有的架構。人們對於經濟

泡沫化的理解帶有一個前提：當泡泡破滅，一切都會回歸常態，讓價格更準確地反映價值。從一七二〇年的南海泡沫（South Sea Bubble）*到二〇〇八年的房地產市場崩盤，每一個景氣泡沫化的故事都如出一轍。人們普遍認為，劫後餘生的世界經濟終將再度踏上正軌。然而這種共同觀念的基礎，都是把泡沫化視為例外情況，違背市場衡量價值的標準（與成功）程序。然而如果就像葛林斯潘所云，這種市場程序是有缺陷的，那麼我們對於墜落之後平安著陸的信心就成了幻想，因為我們腳下根本沒有堅實的陸地。

價格並不等於價值，經濟學家一直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因為它與利潤決定價格的概念密不可分。價格與價值的落差讓我們坐立不安。價格的不確定性正是萬事達卡（MasterCard）系列廣告趣味的來源，大家一定耳熟能詳：「果嶺費：二四〇美元；課程：五〇美元；球桿：一一〇美元；樂趣：無價。」然而更深層的笑話卻是：我們完全無法從事物的價格來衡量它的價值。這種不安的直覺已經轉化為一種娛樂。今天如果有個外星人光臨地球，一件事情會讓他百思莫解：一個利用事物價值錯亂大做文章的電視節目《全民估價王》（*The Price Is Right*），居然會風靡地球上數十個國家。參加節目的觀眾面對各式各樣的消費性耐久財，一件一件猜測它們的零售價。最重要的一點是，輸贏的關鍵不在於能否猜對商品的效用或成本，而在於能否覺察廠商認為你願意支付的價格。

在基金管理這個行業，價值與價格的系統性錯亂能夠帶來可觀的財富。基金經理人的

薪酬決定於他們能否干冒風險，賺取高於市場期望的收益，也就是他們為客戶帶來的「超額收益」（alpha）。假設我幫客戶賭擲銅板，賠率是二比一，我押注人頭，因此我每擲出一次人頭就可以贏兩塊錢。長時間來看，因為人頭出現的機率大約是一半，所以我的每一塊錢賭注可以贏一塊錢。然而如果我能夠為客戶贏到一塊五毛錢，那就太神奇了，而且這筆神奇的收益會透過獎金與加薪，轉化為我的個人收入。然而要變出這種神奇戲法談何容易，就基金管理而言，能夠創造附加價值的方法屈指可數：買進原先受到低估、後來大放異彩的股票；投資足以改變市場遊戲規則的創新產品或服務；創造出新的資產，吸引法人投資者下注。換句話說，超額收益應該是難能可貴，事實也的確如此。但是在薰心利欲的驅使之下，許多人創造出虛假的超額收益，他們設下的賭局看似可以長期帶來漂亮收益，其實潛藏可能造成巨大損失的小型風險。而且如果將這筆損失計算進去，所謂的超額收益就會煙消雲散，因此基金經理人會刻意忽略風險，以免影響滾滾而來的獎金。金融業鉅子彼此稱兄道弟，主宰經濟體系，利用監管法規薄弱之便大發利市，賺進以十億美元為單位的身價。他們利用一套名為「依模型計價」（mark to model）的會計手法，今天的收入來自根據他們預測、明天才會發生的結果。[5]他們的做法總是可以自圓其說，一言以蔽之：市場萬能（markets know best）。

市場萬能是一個比較新近的觀念，拜意識形態的大力宣揚與政治的大力操作之賜，成為各國政府的傳統信條。一九六〇年代的「效率市場假說」（Efficient Markets Hypothesis）已經

將市場萬能觀念發揮得淋漓盡致，假說提出者法瑪（Eugene Fama）當時還是芝加哥大學商學院博士班研究生。就意識形態的基礎而言，效率市場假說是金融業的強心針，我們不妨把它視為另一個版本的《阿特拉斯聳聳肩》，只是多加了幾條經濟學的方程式。

效率市場假說認為，金融資產的價格反映了市場對於現況和前景的所有訊息。但所謂的「價格」反映的並不是資產未來的表現，而是現在市場對於資產未來表現的預測。價格總是帶有賭注成分，我們也知道市場的預測能力非常短視，然而效率市場假說解釋了為什麼經濟學家會覺得一個笑話好笑：

問題：更換一個燈泡需要幾個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

答案：一個都不需要。因為如果燈泡必須更換，市場早就換好了。

效率市場假說的問題在於它站不住腳。如果它能夠成立，那麼我們根本沒有必要花經費進行研究，因為市場已經以某種神奇的方式先馳得點。格羅斯曼（Sanford Grossman）與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兩位經濟學家在一九八〇年就已指出這一點，數百項後續研究也顯示效率市場假說如何悖離現實，其中幾篇最重要的論文正是出自法瑪本人。[6]市場可能會以非理性的方式運作，投資人可能會盲目追逐某一檔股票，以完全與股票本身無關的方式推升股

價。[7]

儘管眾多經濟學證據顯示效率市場假說是一個假象，然而相關概念仍然大受各國政府歡迎。[8]除了葛林斯潘之外，還有許多人也發現這個假說雖然虛假，但是很好利用。市場人士促使管制機構弄假成真，依循效率市場假說行事，好讓他們進行天文數字的豪賭。一時間，錢潮果然風生水起。一九九〇年代中期，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每月發行一份名為《消費指南》(*How to Spend It*)的增刊，幫荷包爆滿的讀者減輕負擔。過去十年經濟景氣的魔力，也讓中產階級受惠。房屋從單純的住所演變成金融資產、金融磨坊的糧草，於是將中產階級吸入經濟泡沫。不過和金融業者相比，一般的房屋擁有者是小巫見大巫：政府承諾會幫金融業者收拾爛攤子，因此對他們的豪賭推波助瀾。而且政府信守承諾，當業者的賭局拖垮整個體系，他們先前贏取的賭資仍然分文不減。換言之，利潤私有化，風險社會化。金融家的大發利市讓全世界付出高昂的代價，但是二〇〇九年頂尖對沖基金(hedge fund)經理人的獲利，卻創下史上第三高紀錄：索羅斯(George Soros)就形容自己「在這場危機中過得非常愜意」，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的員工也笑納公司創業一百四十年來最優渥的獎金。[9]

這種情形告訴我們，「自由市場」的說法主張其實是一種偽裝，掩飾了許多根本與市場不相干的行為。高盛的員工之所以進帳豐厚，是因為公司祭出許多非關市場的伎倆。《滾石》(*Rolling Stone*)雜誌記者泰比(Matt Taibbi)以他慣有的熱切筆調揭露，高盛已經「買下」美國政府。歐巴馬政府的財經團隊與金融業水乳交融，讓華爾街備感欣慰。財政部長蓋特納(Timothy Geithner)二〇〇八年擔任紐約聯邦準備銀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董事長期間，曾經為摩根大通銀行(JPMorgan Chase)安排歷史性的二百九十億美元貸款，協助它併吞瀕臨破產的投資銀行貝爾斯登(Bear Stearns)。歐巴馬的首席經濟顧問桑默斯曾在華爾街大型對沖基金蕭氏公司(D. E. Shaw & Co.)任職，每星期只需上班一天，兩年下來至少進帳五百二十萬美元。蓋特納和桑默斯在歐巴馬政府的新職，使兩人成為美國經濟叢林中的泰山，而華爾街也的確有理由樂觀其成。高盛曾經大手筆投資美國國際集團(AIG)，然而這家創業九十年的保險業鉅子，二〇〇八年差一點被自家的金融產品部門拖垮，所幸美國政府及時伸出援手，讓高盛投資的一百三十億美元完璧歸趙。相較之下，克萊斯勒汽車(Chrysler)公司的投資人只能拿回二九%的本錢。[10]

華爾街與美國政府的合作天衣無縫，任何一個關心民主政治的人都應該擔憂。至少我們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可以懷疑，當初造成這場金融危機的體制，恐怕無法收拾殘局。塔雷伯指出其中的荒謬性：「一個校車司機如果矇著眼駕駛並且撞毀車子，就不能再給他一輛新校車。」[11]不過問題來了，我們的經濟並沒有真正受到民主機制監控，政治更是如此，因此校車司機永遠來自同一家駕訓班。[12]

儘管華爾街繼續挾持政府，不過有個消聲匿跡近一個世代的字眼，近來再度從政治人物

的嘴巴冒出來：監管（regulation）。的確，高盛等業者在金融崩盤中大發國難財，但是政治人物也警覺到，市場已經有如脫韁野馬。克萊恩（Naomi Klein）的《震撼主義》（*The Shock Doctrine*）一針見血，揭示災難如何化身為極度自由市場政策的溫床，書中的分析頭頭是道，解釋了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到今日，從加州、華爾街到倫敦西堤區（City of London）的金融掠奪是如何進行。不過現在公眾與部分政治人物已經形成共識，當前的經濟危機代表自由市場的思維已經失敗，而不是必須更加發揚光大。在民意與民怨的壓力之下，世界各地的政治人物似乎已準備就緒，開始討論如何對市場祭出監管與限制。問題在於他們做得到嗎？而且就算做到了，新出爐的監管機制到底對誰有利？

自由市場從誕生伊始就曾引發不滿，然而今日的情勢仍屬歷來罕見：社會各階層同仇敵愾，廣大群眾認定自由市場政策是災難的罪魁禍首，因此要求變革。美國的「新政」（New Deal）與二戰之後歐洲的福利國家，都有一部分肇因於各種社會力量結合起來，要求對市場設定新的限制，並且重新安排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今日危機情勢與以往不同之處在於，它在全球各地野火燎原，[13] 而且時機就在人類設法避免全球氣候災難的關鍵時刻。氣候與金融這兩場危機的廣度與深度，正反映了自由市場文化在人類社會的根深柢固。為了瞭解這個問題在二十一世紀的影響，我們必須先掌握它的根源，探究今日市場為什麼會變成這種形態。

東西的故事

小時候每逢週末假日，我就會到家裡開的便利商店幫忙。我特別喜歡到儲藏室搬東西補貨，因為可以在紙箱和貨架排成的迷宮中找尋糖果點心，然後用標價槍給它們貼上標價。標價槍是塑膠材質，大小和各位眼前這本書差不多，只要一扣扳機，它就會頓一下，吐出一張小小的標籤，上面的數字由槍上的轉盤決定。這把槍讓我玩得好不開心，就像個少年資本家揮舞著一把格洛克（Glock）手槍，隨心所欲標定價格；而且我經常惡作劇，在瑪氏（Mars）巧克力棒貼上九九九九．九九英鎊的標價。不過最好玩的還是另一種遊戲：我把價錢訂為〇．〇一辨士，拿槍追我弟弟，要幫他貼標價。

對於年僅十歲的我，這種遊戲的好玩之處和「喬伊為了足球賽門票，連自己的媽媽都可以賣」這類話有異曲同工之妙。也許喬伊真的很想看球賽，而媽媽也是他生命中最珍貴的人，但是他不可能拿兩者來交易。我弟弟的價值也不只〇．〇一辨士，但我可以為他貼上這個價碼、拿他來交易，這個想法成就了我的遊戲。萬事萬物都可以標定價碼，這樣的想法讓政治與企業菁英愛不釋手，也導致公眾陷入悲劇境遇。

一九二〇年，兩名德國教授賓丁（Karl Binding）與霍赫（Alfred Hoche）出版了一本專著《不值得活的生命應予摧毀》（*Permission for the Destruction of Life Unworthy of Life*），引發極大爭議。

他們主張殺害「無藥可治的白癡、腦袋空空的行屍走肉、浪費糧食的廢物」；卸下這些沉重的包袱，國家才能夠蒸蒸日上。賓丁與霍赫振振有辭，詳細計算照顧這些人的成本，結論是他們會耗費「龐大的成本，包括食物、衣服與能源，等於是將國家的一部分生產力浪費在完全不具生產力的用途上」。[14] 兩名學者的計算完全正確，結論卻令人作嘔。

對於這套說法最直接的反駁就是，為人類生命標定價格的做法駭人聽聞。然而對政府與企業而言，這卻是家常便飯。英國政府和美國的醫療業在計算醫療成本時，都會斤斤計較一項治療能夠延長多少年的生命。這是因為醫療資源有限，政府與業者希望盡可能增加受惠人數。根據美國政府與保險業精算師的標準，一個美國人的生命約值七百二十萬美元，史迪格里茲與畢爾姆絲（Linda Bilmes）計算美國侵略伊拉克的成本時也用了這個數據，結果是超過三兆美元。如果以同樣標準來計算伊拉克人民的損失，結果是八兆六千億美元。儘管他們並不是真的拿七百二十萬美元來兌換一條人命，這些計算還是會讓人坐立難安。[15] 賓丁與霍赫的做法更進一步，主張生命的價值並非人人平等，殺害心智障礙者可以幫社會節省開銷。兩人還建議政府採行他們的構想，並且全力落實。的確，這都是國家社會主義（Nazism）的理論基礎，然而將人類生命當成商品、依據利潤高低來交易或銷毀，這類觀念並不是國家社會主義獨有，美國與大部分歐洲國家都曾經藉奴隸交易謀利。

隨著時代改變，雖然人口走私在二十一世紀依然猖獗，二〇〇六年估計規模達四百二十億美元，但是仍然認同「人命有價」觀念的地方已經不多，合法的人口市場已經絕跡，而且世人普遍同意這是良性發展。法律甚至禁止人們在市場上販賣自己，例如我們對自己的器官只能捐贈，不能出賣。

奴隸制度的歷史告訴我們，在市場上，不僅容許買賣的商品可能改變，界定市場內涵的觀念也會被推翻。過去人類容許奴隸制度，如今則否。換言之，買賣商品以獲取利潤，並且讓市場決定其價值，這些行為絕不是天經地義。商品在成為買賣標的之前，必須先在人們的觀念中設定為可以買賣的對象。

今日我們買賣的大部分事物，在過去並不具備商品意義，從土地、音樂、勞力、照護、人口到糧食，都曾經處於比較曖昧的狀態，後來藉由複雜、層遞的過程而成為商品，送進市場，依據特定條件來買賣。一九四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戰事方殷，一位匈牙利異議分子在英國振筆疾書，針對這類過程發表歷來最精闢的著作。

博蘭尼（Karl Polanyi）的《鉅變：當代政治、經濟的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解析十八世紀與十九世紀的英國歷史，深入討論一個頗有十八世紀奧祕的歷史現象：史賓翰連法（Speenhamland laws）。史賓翰連法是英國的「濟貧法」（poor law），立法宗旨在於藉由提供與麵包價格連動的福利措施，來濟助英國鄉村的赤貧民眾。不過博蘭尼的論述遠超出前維多利亞時期（pre-Victorian）的社會安全網，而是藉此指出市場與其周遭的社會緊密相連。博蘭尼

的觀點和葛林斯潘正好相反，他認為資本主義以一種非常特殊的方式在仰賴社會體制。為了讓市場能夠運作，社會必須授權將事物轉化為能夠在經濟體系內買賣的商品。博蘭尼的書名也是由此而來。「鉅變」描述的是社會上最有權勢的團體如何試圖將土地與勞力轉化為「虛構商品」，但原則上又和那些已經在市場上交易的商品大相逕庭。

現代人工作的核心就是在薪水與房租之間打轉，以「虛構」的角度來看待土地或勞力或許很奇怪，不過這正顯示博蘭尼探討的變化有多巨大，它讓社會安排（social arrangement）徹底改頭換面，使人再也無法以其他角度來看待它們。換言之，這場鉅變不僅改變了社會，也改變了我們，改變我們看待這個世界、看待我們在其中之地位的方式。

鉅變必然伴隨劇烈的社會變遷。為了讓土地能夠交易，原本使用土地的人必須驅離。這種圈地（enclosure）過程有時會訴諸暴力，農民被迫離開公有土地，移居城市，出賣勞力來換取收入，變成消費者來製造需求。換句話說，鉅變徹底改寫了土地與勞動的社會規則，並且衍生出新的事物讓人們擁有、定價。這個過程沒完沒了，來到二十一世紀，打造新型金融產品的工程師繼續推動這場鉅變。設計二氧化碳總量管制與交易（cap-and-trade）政策來對治全球氣候變遷的人士也是如此，因為他們將汙染的權利變成商品。

博蘭尼的論點不僅有助於理解為什麼經濟與社會是殊途同歸，也可以解釋我們為什麼會誤以為市場與社會可以截然二分。在博蘭尼眼中，全心追求利潤的市場文化是一種「市場自

我調節迷思」，它倚賴社會的程度，其實遠超過表面現象。然而自我調節的市場如果想發揚光大，就必須大力鼓吹經濟與社會截然二分的迷思。我們通常不認為一對連體雙胞胎可以為彼此動手術，然而市場的迷思讓人們相信，不僅這對連體雙胞胎可以分割，而且一個是醫生，一個是病人。

這個迷思在危機時期比較容易被世人看穿。畢竟每當銀行業爆發嚴重問題，如果沒有政府支撐大局，經濟危機將一發不可收拾。資本主義既不能自立自強，也無法靠自身的力量擺脫困境。市場永遠倚賴社會，因此所謂的「大到不能倒」其實就等於「規模太大，所以一旦出問題，社會一定會收爛攤子」。自由放任的理念總是需要一個社會基礎，因此博蘭尼並沒有將我們的生活區分為「政府與自由市場」，在他看來，我們完全生活在「市場社會」（market society）之中。

同樣的道理，市場社會內嵌在自然界之中；市場自我調節迷思對這一點一視同仁，也試圖加以否認。人類文明倚賴地球的生態，雖然我們壓榨地球生態無所不用其極；有學者估計，人類將物種滅絕的速度提高了一千倍。[16]我們毫不留情地圈占自然資源，摧殘地球環境，而且如果許多氣候學家的竊竊私語不幸而言中，想要挽救已經為時太晚。[17]對於經濟成長永無止境的追求，導致維繫地球生機的生態系統服務（ecosystemic service）受到忽視，將人類變成滅絕其他事物的工具。生態經濟學先驅戴利（Herman Daly）[18]指出：「當前的經濟成長已經和

整個世界脫鉤，因此不再具有正面意義；更糟的是，經濟成長變成一個盲目的嚮導。」[19]簡而言之，人類的經濟將許多事物視為理所當然，免費取用，而且無法償付這種做法的代價。

安氏盲

改以市場的角度來看世界，反而讓我們陷入五里霧中。這場鉅變的影響是如此深遠，因此當我們要衡量事物價值並加以管理時，除了標定事物價格、放任市場自由運作之外，幾乎想不到其他的方法。儘管市場自我調節的迷思問題叢生，我們還是緊抓不放，生怕沒有這些迷思就會迷失。在衡量事物價值的時候，我們只有一具指北針可用，它雖然很少指出正確的方向，卻讓我們以為自己知道何去何從。

這情形就好比我們集體罹患「安氏盲」（Anton's blindness）。這是一種罕見的疾病，名稱來自奧地利神經科學家安東（Gabriel Anton），通常是在腦中風或腦部受傷之後發生，患者其實已經失明，但卻堅信自己仍然看得到，又名「安巴二氏症候群」（Anton-Babinski syndrome）。醫生在治療這種病症的時候，病患總是堅持自己沒病，只不過偶爾會產生一些奇怪的幻覺，看到無法解釋的影像。一位病患說她看到窗外出現一座新村莊，卻想不起來是什麼時候建造的；另一回則是看到屋子裡有個飢腸轆轆的陌生女孩。[20]安氏盲患者經常跌跌

撞撞受傷，但辯稱原因是手腳笨拙或者心不在焉，而不是視力喪失。他們用扭曲的言論在診斷一個疾病，連受傷都可以合理化。所以堅持自由市場是照亮人世的明燈，並且為它們的一敗塗地百般辯解，就和失明的人辯稱自己看得見一樣，也是一種扭曲之言。

安氏盲在臨床上被歸類為「病覺缺失」（anosognosia），這個術語最早是由法國神經科學家巴賓斯基（Joseph Babinski）提出，字源出自古希臘文，意為「對疾病沒有知覺」，不僅會讓盲人對視覺產生錯覺，也會影響其他身體機能。一項研究找來三位左半邊身體癱瘓的病覺缺失患者，請他們站在鏡子前面，然後要他們舉起手臂，結果三位患者雖然手臂紋風不動，卻堅稱自己有舉手回應。接下來，一位沒有癱瘓的研究助理坐在患者旁邊，接受舉手、放下的指令，但是不做任何動作，結果三位患者中有兩人堅稱看到助理舉手之後放下。[21]安氏盲之類的病覺缺失不僅影響個人，也影響社會；不僅改變我們看待自身的方式，也改變我們看清他人真實面貌的可能性。透過市場來觀看整個世界，不僅扭曲我們對自身的觀感，也將我們自身的障蔽投射到所有人身上。

安氏盲可以視為一個隱喻，有助於我們明白當前的經濟為何如此難以理解。我們落入一個文化與政治的陷阱，其信條堅持自由市場是衡量事物價值的不二法門，供應與需求的無限制運作能夠讓世界愈來愈美好。這不僅是一種錯誤認知，也扭曲了我們看待世人的方式。只把人看成消費者會遮蔽人我之間更深層的連結，扭曲我們的政治選擇。身為糧食的消費者，

你只能表達抗議或者拒絕購買，[22]但是無法重新談判、讓每個人都得到供應，也不可能成為糧食的共同生產者。唯一的選擇就是呼籲改變，或者一走了之。不久前我在倫敦的伊朗大使館外面，聽到一位年輕示威者正是使用這種貧乏的消費主義政治語彙。當時伊朗剛爆發總統選舉舞弊疑雲，這位小姐說他們的示威目的在於要求伊朗政府「改正做法」，就好像這個政府的客戶服務做得不好，消費者只要向某某人的上司投訴一番，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

我並不主張要市場從這個世界消失。做為一個讓不同需求的人交易商品的地方，市場的概念見於人類的每一個文明。今日市場最主要的特質在於，驅動交易行為的力量不是需求，而是利潤。[23]認為社會運作的不二法門就是讓市場追逐利潤，而市場運作的不二法門則是盡可能減少干預，這是一種純粹的意識形態。市場的運作規則是由有權有勢者設定，我們坐視這種情況發生，因此釀成悲劇。這也是一種盲目，一種病覺缺失，我們全然信賴一種經常失靈的機能，以為由利潤驅動的市場可以帶領我們找到真正的價值，其實大錯特錯。

因此接下來的問題就是：我們如何才能夠治癒自己？歷史告訴我們，治療方法不能全靠政府，必須促成市場社會內部的變化。博蘭尼說得很清楚，自由市場誕生的前提是大量的暴力，但他也觀察到另一個現象：人們會反抗。英國政府施行史賓翰連法，就是為了平息鄉村民眾對於圈地行為猖獗的憤怒。濟貧法不是在證明自我調節市場如何將新事物變成可供交易的商品，反而是在自我調節市場年代一種對社會需求的回應。博蘭尼闡述著人們

如何反抗不斷擴張的市場。在這樣一來一往之中，史賓翰連法代表博蘭尼所謂的「雙重運動」（double movement）：將土地與勞力轉化為可以交易的商品，需要進行大規模的權利剝奪（disenfranchisement），這是第一運動；第二運動則是社會的反應，要療癒自我調節市場造成的傷害。兩種運動都是發生在市場社會的架構之中。

第二運動是第一運動的反制運動（countermovement），其相對強度變化不定，然而我們不應該將第一運動視為市場將社會帶向未來，第二運動則是將社會帶回過去的反制運動，這不是一場拉鋸戰。反制運動是以人們現有的政治運作為基礎，並且從這些政治運作與相關的機構出發，建立起全新的社會體制，例如美國的新政（New Deal）與歐洲的福利國家。依據博蘭尼的模式，社會變革並不是進一步、退一步的過程，有如一場集體進行的查爾斯登舞（Charleston），在一連串動作之後回到原點。社會變革比較像是一首永無休止的交響曲，從這一個樂章衍生出下一個樂章。

今日的反制運動會利用推特與部落格，除了像舊日一樣直接採取行動，也援引最新穎的理念與科技，全力奮鬥爭取一個與以往不同、可以永續存在的世界。人類的未來決定於我們是否願意設想一個不一樣的市場社會，以及新的、不需要自由市場的衡量價值方式。本書第二部分將勾勒二十一世紀反制運動的輪廓，探討全球社會運動與社會組織如何遏制市場的力量、抗衡市場最強有力的代言人，從而重新定義民主政治的運作方式。不過我們在治癒自身

的盲目之前，必須先進一步釐清自由市場文化如何影響我們，萬事萬物如何變成可以買賣交易的商品，人類如何集體淪為現代市場社會的盲目觀眾：消費者。

*編注：南海泡沫事件發生在十八世紀的英國，英國政府因戰爭發行大量公債，於是由大臣羅伯．哈利（Rober Harley）在一七一一年成立南海公司買下大量公債，並因此獲得在南美貿易的特權。南海公司的股票大幅上漲，當時也帶動其他公司大炒股價，以致英國國會祭出泡沫法遏止炒股歪風，後來南海經營不善股票暴跌，連科學家牛頓都慘賠。南海泡沫也是泡沫經濟一詞的來源。

2. 成為經濟人

由瘋子帶領瞎子，這是時代的劫難。

——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李爾王》（*King Lear*）

彌爾的怪物

市場社會並不僅是將事物變成商品，它對於人類本性和社會秩序自有一套文化與概念。這種文化的化身是一個沒有人真正見過的人物，由十九世紀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要角之一彌爾（John Stuart Mill）所創造。彌爾期望他創造的人物能夠清除人性變化無常的迷霧，發現更深層的人性真實。

彌爾尋求以新的科學方法來觀照這個世界，相信只需幾個簡化的假設，就能夠深刻呈現世人互動與行為的真實面貌。彌爾指出，幾何學給予線條一個獨斷的定義，只有長度沒有寬度；社會科學也可以如法炮製，利用抽象的模式做出關於人類的假設：

> 政治經濟學可以仿照幾何學的做法，對人類做出獨斷的定義：人類是一種存有，永遠會設法得到最多的必需品、便利與奢侈享受，而且就他們現有的知識範圍，只付出最少的勞力和欲望克制。[1]

彌爾言之成理的假設是：人們不願浪費資源，而會盡可能善用資源來達到目標。但是彌爾創造的人物後來發展出自己的生命歷程，「經濟人」（Homo economicus）從此問世，想盡辦法要善用自身的資源來達到目的。彌爾承認簡化的假設有其缺陷，並提醒世人，運用這套方法得出的結果，只在「抽象層面」成立。不過他的論文〈政治經濟學要義〉（On the Defini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卻似乎自相矛盾，認為自己的方法「在社會科學任何一個領域都是獲致真理的不二法門」。[2]二十世紀的經濟學思想巨擘貝克（Gary Becker）顯然對這段話銘記在心。

貝克是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的門徒，長期任教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一九七六年出版重要作品《人類行為的經濟學分析》（*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聲稱：「經濟學分析能夠提供一個有效的架構，來理解人類所有的行為。」[3]從傳統經濟學、移民、監獄、種族歧視、棒球、家庭、時間到民主政治，貝克討論的主題無所不包，將經濟學思維工具運用到整個世界，我們不妨將他視為「蘋果橘子經濟學」（Freakonomics）的鼻祖。貝克在一九九二年拿下諾貝爾經濟學獎，二〇〇七年從美國總統小布希手中接下總統自由勳章（Presidential Medal of Freedom），是美國政府對平民頒贈的最高榮譽。貝克曾經說他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大學部就讀時，一度對經濟學感到厭倦，原因是「經濟學似乎無法處理重要的社會問題，當時我考慮轉行攻讀社會學，但是發現這門學科太困難」。[4]然而時至今日，貝克的思維卻觸及社會科學的每一個領域；一九八〇年代早期，他在芝加哥大學的教職就是由經濟學系與社會學系合聘。

貝克的經濟學方法包含三個概念。首先，每一個人與每一件事都追求最大化；人群、政府與企業都可以視為利用自身現有資源、盡可能追求特定目標的經濟人。其次，經濟人的一切行為都發生在某種形態的市場之中。第三，無論是哪一種社會與環境，經濟人都有一樣的偏好。[5]貝克早年曾運用這套方法分析民主政治的運作，他認為在一個完美的民主體制中，「想擔任公職的人要在完全自由的競爭中，向一群背景廣泛的選民爭取其選票。」[6]換言之，完美的民主體制就像一個完美的市場，只不過選民取代了消費者，選票取代了鈔票。本書第二部對這種想法會做更強而有力的批判，這裡要先指出的是，貝克將公民事務轉化為一種強

迫性的選擇，民主的運作猶如從兩種汽水品牌挑選一種，不再深入探究現況的來龍去脈。

貝克將這套經濟學工具運用到家庭議題時，他的保守派分析更加引人爭議。由於結婚是自願行為，因此可以假定結婚的人會追求比單身時期更大的效用（utility），並將效用最大化。另一方面，由於走進婚姻的人非常多，因此我們可以假定有一個「婚姻市場」。貝克並指出，婚姻的存在理由超越任何特定的人類文化，無論在什麼地方，「戀愛的人都可以藉由組成家庭，來減少雙方頻繁見面、交換資源耗費的成本。」[7]貝克的三項經濟法則環環相扣，讓他大顯身手。他指出，對於戀愛中的人們，除了金錢財富之外，美貌、才智與教育都可以產生效用，因此「外貌較差或者才智較遜的人，結婚的可能性也比較低」。[8]貝克還補充說，他關於外貌美醜的論述，並沒有統計學資料可資佐證。不過他後來在另一篇論文中說道：「我們的分析是否足以證實一個普遍的觀念：美麗、魅力與才華高人一等的女性，比較容易嫁給有錢、成功的男性？答案是肯定的。」[9]

貝克也對多偶婚制（polygamy）做了一番分析，與一夫一妻制（monogamy）比較，並以供需對照圖來說明，容許一夫多妻的社會對女性較為有利：那些條件較差、不夠格當男性元配的女性，還有機會成為二房或三房妻妾。[10]對於這樣的結論，如果要從最善意的角度解釋，那就是貝克實在太喜歡根據基本原則來大發議論。另一位經濟學家柏格曼（Barbara Bergmann）指出，貝克草率處理權力、傳統與認同等問題，無心探究為何女性在一夫多妻關

係中的境遇往往不如一夫一妻關係，因此他終究只是一個「芝加哥學派的忠實門徒，深信政府對交易（就婚姻而言則是重婚）的管制只會損害社會的福祉」。[11]

政府對交易的管制近來再度成為貝克的攻擊目標，兩條導火線分別是器官移植與移民問題。他呼籲建立「器官市場」，認為讓富人花錢購買移植所需器官，有助於增進公眾福祉；他也倡議歐洲與北美洲國家應該公開拍賣居留權，一方面提升移民素質，一方面充實國庫收入。

貝克的論點怵目驚心，自不待言；然而從他屈指可數的幾個假定來看，卻又顯得順理成章。依據貝克的推想，只要放手讓經濟人為所欲為，賦予蘭德式的自由，讓市場當家做主，社會福祉就會與日俱增。然而這種想法有幾個問題。公平正義與政治的問題暫且不論，雖然貝克的想法在這兩個層面都是搖搖欲墜。行為經濟學家會非常樂意指出，貝克認為經濟人的行為會追求最大化，這種說法基礎薄弱，至少實際運用在人們身上時是如此。艾瑞利（Dan Ariely）的《誰說人是理性的！》（*Predictably Irrational*）就列舉實例，顯示真實世界中的人們在許多方面，與貝克世界中的經濟人迥然不同。

除了人類的非理性之外，貝克認定各種社會形態的人都有相同的偏好，這種假定也一樣站不住腳。例如在許多北美洲原住民文化，對於整個社會與經濟體系，慷慨大方是一種非常重要的行為。一項實驗分別針對白種人男孩與拉科塔人（Lakota）男孩進行，給每個人兩根棒棒糖，兩群男孩都把第一根棒棒糖塞進自己嘴裡，但是白種人男孩將第二根棒棒糖放進口袋，

拉科塔男孩卻把第二根棒棒糖送給離他最近、沒有棒棒糖的男孩。[12]文化會影響人們如何累積與分配資源，決定儲存或分享的社會優先性，這並不足為奇；然而上述實驗也提醒我們，消耗花費的反面未必是省吃儉用，也可以是慷慨大方。

還有幾項實驗藉由所謂的「公共財賽局」（Public Goods Game），進一步探究北美洲白種人社會對於慷慨大方的文化態度。賽局如此進行：我給一群人一把代幣，要對方在兩種投資方式中選擇一種。你可以將一部分或所有代幣存進我的銀行，一枚代幣能拿到一分錢利息。你也可以將一部分或所有代幣存進一家公共銀行，它會付利息給每一個人，無論對方有沒有投資。銀行收到的存款愈多，支付的利息也愈高，而且很容易就會超出一分錢。對群體而言，合理的選擇是每一個人都把所有代幣存進公共銀行；然而對個人而言，合理的選擇卻是希望其他人都把所有代幣存進公共銀行，只有自己把代幣存進個人銀行，如此就可以同時向兩家銀行收取利息，這也是經濟人的選擇。美國威斯康辛州的中學生玩公共財賽局時，他們並沒有像經濟人那樣一毛不拔，而是將四二%的代幣存進公共銀行。公共財賽局實驗做過許多變化，從利息支付時程到參與人數都可以調整，但人們存進公共銀行的代幣比例沒有多大變動，對大學生進行的實驗結果也大致相同。實驗者嘗試過各種條件的排列組合，但只有一次存進公共銀行的比例低到二〇%，那次實驗的受試者是經濟學研究所一年級的學生。[13]

行為經濟學有另一套稍做變化的「最後通牒賽局」（Ultimatum Game）。你將一百美元鈔

票分成兩疊，A疊歸你，B疊歸我。我可以選擇收下B疊，讓你保有A疊，也可以拒絕接受，這樣兩個人都拿不到錢。最後通牒賽局雖然不會喚起什麼美好的童年回憶，不過卻可以呈現社會脈絡的一絲半縷。這一百美元鈔票應該怎麼分才恰當？理性而言，你保留給自己的錢多多益善，分給我的錢愈少愈好；我就算只拿到一分錢也聊勝於無，因此會讓你如願以償。

然而參與最後通牒賽局的玩家，大部分都不是這麼做，他們會各拿一半或者六四分帳，而且有些文化的分配邏輯與眾不同。印尼東部一座島嶼上有個捕鯨維生的村莊拉美拉若（Lamalera），村民為了避免賭博嫌疑，以香菸代替金錢來進行最後通牒賽局，他們平均分給對手五七%，自己只留四三%。研究人員認為實驗結果反映了拉美拉若社會的分享與公平模式，因為捕鯨需要整個村莊通力合作。[14]村民捕到鯨之後，會一絲不苟地進行公平分配儀式。

在不同文化的最後通牒賽局實驗中，沒有一個文化的賽局參與者會百分之百自私，但合作程度有很大差異。祕魯東南部叢林裡半遊牧、粗耕的馬奇根加族（Machiguenga）合作程度就相當低，大部分參與者只願意分給他人二五%或一五%，這種行為同樣是受到社會結構影響，馬奇根加人的社會對於合作的獎勵相當有限。[15]

大體而言，這些賽局的不同結果反映了一個社會如何獎勵合作關係，最顯著的指標之一是人們是否參與市場交易，是否會與家族、村莊之外的人進行買賣。換句話說，要預測賽局中會不會出現良好的合作關係，可以觀察參與者是否進行其他類型的交易與金錢往來。這個

線索相當重要，探討當前的經濟危機，交易未必是罪魁禍首，真正的問題在於環繞交易行為的系統。

人類很難勝任經濟人的角色還有另一個原因：演化。近年幾項神經科學與靈長目動物學（primatology）的實驗顯示，人類的天性並不是全然自私，我們演化出的複雜行為既帶有自私與貪婪，也包含利他與公平。其中一項實驗運用腦部掃描，雖然仍有某些爭議，但是初步結果耐人尋味：[16]受試者要做一連串與金錢有關的選擇，決定自己要收下一筆錢，還是忍痛捐出來做慈善工作，研究人員則觀察他們大腦的活動狀況。結果顯示將錢據為己有的受試者，大腦與食物和性慾相關的部位蠢蠢欲動；至於把錢捐出去的人，則是與依附（attachment）和聯結（bonding）相關的部位特別活躍。[17]

這項研究推翻了一個觀念：利他其實是自私的另一種偽裝形式。兩種行為涉及不同的大腦活動部位，因此至少在生理上有其差異。人類的演化過程顯示，利他和許多不自私行為有獨立的效用，雙向發揮利他精神的社會關係有助於維繫人類生存。一項針對土狼進行的研究顯示，不願加入社會群體的土狼比較容易離群索居，五五%的死亡率也遠高於群體成員的二〇%。[18]在演化上與人類關係最接近的其他靈長類，也提供了更多證據，證明我們並不是與生俱來的個人主義者。這方面研究的先驅德瓦爾（Frans de Waal）觀察黑猩猩的互動時發現，牠們會以多種「貨幣」進行交易，並以理毛（grooming）換取食物或其他好處。黑猩猩對於成

員之間的互動記得一清二楚，施與受力求公平。德瓦爾說：「這種心理機制在人類身上叫做『感恩圖報』（gratitude），我們沒有理由認為黑猩猩不懂得感恩圖報。」[19]感恩圖報就不是經濟人的特質。

其他靈長類和人類的共同特徵，並不僅限於感恩圖報。牠們也具備一種與生俱來的公平感。研究人員對僧帽猴（capuchin monkey）與黑猩猩進行兩隻一組的代幣實驗。第一隻僧帽猴與黑猩猩可以拿代幣換取高價值的獎品——葡萄；第二隻是實驗的主要對象，研究人員先讓牠在一旁觀看，再讓牠以代幣換取價值較低的獎品——黃瓜。實驗結果顯示，如果獎品相同，第二隻僧帽猴與黑猩猩都會追求效用最大化，願意交易代幣；然而如果獎品不同，牠們多半會覺得不公平，因此拒絕其實仍然有利可圖的交易。

更有甚者，如果第一隻僧帽猴可以「無條件」得到獎品，那麼第二隻僧帽猴（但黑猩猩不會，這一點很有意思）拒絕交易的比例也隨之升高。這代表什麼意義？僧帽猴樂於合作，但是獎品（葡萄或黃瓜）與行為（無條件得到或代幣換取）的不公平會激怒牠們。對黑猩猩的實驗則顯示，共同生活時間愈長的群體，行為的合作程度也就愈高。就個別黑猩猩而言，牠們愈是慢條斯理、深思熟慮，對公平與否的反應也就愈顯著。[20]換言之，兒童遊樂場最常聽到的抗議「不公平！」是我們與靈長類近親的共同特質，研究人員稱之為「不公平厭惡」（inequity aversion），甚至會表現在狗身上。[21]此外黑猩猩還會處罰違反誠信的成員，輕則不給食物，

重則當頭棒喝。以處罰來對付欠缺合作精神的行為，既是建立公平性的基礎，也是黑猩猩社會的管理方法。

人類比黑猩猩略勝一籌的地方在於，我們不僅可以處罰同類，也可以發揮憐憫。有一套實驗格外發人深省，受試者A先將一些錢存入B的帳戶，然後由B決定退回多少錢給A；如果B不願意合作，A可以用罰款來威脅他。實驗結果顯示，在沒有罰款威脅的情況下，B願意退回給A的錢反而多於威脅存在的情況。[22]由此可見，擁有處罰的能力但是不使用，能夠提升人際的合作與信賴。

這些實驗告訴我們，人類的基因雖然可能傾向於自私，但是演化之路讓我們轉向合作、社會化、建立與維繫群體、相愛、分享。真實的人類不像經濟人，他們重視憐憫、公平、信賴、利他與互惠這些行為本身的價值，經濟人對這些行為只有工具層面的興趣。近來的研究顯示，體認慷慨大方、分享、無私的內在價值，是我們追求人類最大福祉不可或缺的能力。

追求幸福的經濟人

貝克將他的理論運用到真實人類身上時，強調我們是藉由一種很特別的方式成為經濟人：每一個人都是自身幸福的生產者。依照貝克的說法，人們是藉由「結合市場購買的商品

服務與一些家庭時光而來的生產性活動」得到自己的效用。[23]換言之，當我們購買商品與服務，並且花時間使用，幸福就會油然而生。然而如果追求幸福是我們唯一的目標，而且經濟活動的基本假設是我們對這種追求貪得無厭，那麼我們要問：市場真的能夠帶來幸福嗎？[24]

大部分樂透彩券得主在贏得大筆橫財之後，感覺反而不如中獎之前幸福，這已經是老生常談。但是我們也知道，金錢的匱乏會剝奪幸福感。美國最優秀的廣播節目《美國生活》（*This American Life*）曾經報導，牙醫發現經濟衰退導致牙齒碎裂的病例大幅增加，因為人們擔心無力支付賬單，因此睡覺時容易磨牙。不過嚴格而言，這類事證只能算是軼事趣聞。最近關於幸福的研究有如雨後春筍，其中有許多出自經濟學系的手筆，探討的焦點正是如何增進金錢無法提供的幸福感。

經濟學這門「沉悶的科學」一直在服用「幸福丸」，而且發現一個幾乎放諸四海皆準的文化準則：追求財富無法創造幸福。儘管消費者社會定義的幸福之道就是有房子、有車子，然而愈來愈多研究顯示，貪得無厭會造成心理傷害。舊金山灣區一位心理醫師觀察到，他的病人「開的是BMW豪華轎車，住的是密爾維利（Mill Valley）的三百萬美元豪宅，然而每天早晨醒來時還是會說：『我並不覺得自己幸福。』」[25]這並不是加州馬林郡（Marin County）資產階級特有的困擾，一九七六年，美國二十一所大學的一萬二千名新鮮人參與一項縱貫性研究（longitudinal study），接受問卷調查，回答他們對財富的追求目標以及對各方面生活的滿意

度，然後在一九九五年再度接受調查。結果發現，在第一次調查中表示比較重視金錢的受訪者，在第二次調查中對生活的滿意度比較低。[26]另一項針對兩百六十六名商學院學生進行的調查，也得到同樣的結果：一個人愈是看重金錢，幸福感也就愈低。[27]受訪者如果是想藉由賺大錢來克服自我懷疑，受到的負面影響最大。

對於金錢與幸福關係最重要的國際性研究，就是所謂的伊斯特林悖論（Easterlin paradox）。美國南加州大學經濟學家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在一九七四年的一篇論文中指出，收入超過平均值的人，幸福感高於收入比較低的人，這一點不足為奇，然而伊斯特林也發現，一個國家發展到國民平均收入能夠負擔住宅、糧食、用水與能源等基本需求之後，進一步的經濟發展並不會提升國民的幸福感。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項悖論告訴我們，金錢提升幸福感的能力是有限的，到達一定程度之後就無以為繼。更多的錢只會把我們推上享樂跑步機，幸福感的來源變成與同儕比較消費水平的高下，如果發現自己被對方比下去，幸福感就會大打折扣，儘管我們的財富淨值確實增加。

更新近的研究資料顯示，國家雖然有辦法持續提升國民的幸福感，但是成本非常高昂。國民平均收入足以應付基本需求之後，幸福感與收入的關係將變成幾何級數。將幸福感從一單位提升到兩單位，平均收入只需增加十美元，但是在基本需求已經滿足之後，要把幸福感從兩單位提升到三單位將需要增加一百美元收入，從三單位提升到四單位需要增加一千美

元，依此類推。[28]

當然，一個經濟體內部人們的幸福感，決定於兩個因素的差距：相對收入的期望值與達到期望值的能力。許多開ＢＭＷ轎車、住三百萬美元豪宅的人，確實認為自己相當幸福；正因如此，擁有這等財富的人如果還缺乏幸福感，就會覺得自己心態不正常，需要心理治療。康乃爾大學（Cornell University）經濟學家法蘭克（Robert Frank）認為，藉由擁有遊艇與勞力士手錶獲致的幸福感，對社會有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在不公平問題愈來愈嚴重的時候。在美國，最富裕和最貧窮民眾的差距一直在擴大，從一九七九年到二〇〇五年，最富裕的前一％民眾稅後收入激增近二〇〇％，但是最貧窮的二〇％民眾收入只上升六％。[29]愈來愈多財富彙集到少數人手中，媒體將他們的生活報導得光鮮亮麗，導致大多數人對財富產生超出自身能力範圍的期望。[30]原本為我們帶來歡愉的商品，現在卻使我們愈來愈不快樂。想想你家裡的舊電視機，當初它剛進門時可能曾讓你歡天喜地，幾年下來，喜悅感早已褪色。其實它沒有什麼改變，然而在你看過那麼多厚度更薄、尺寸更大、色彩更鮮艷的電視機廣告之後，突然間，它顯得如此老舊過時。

愈來愈嚴重的不公平問題，導致大多數人的幸福感愈來愈低，原因在於地位財（positional goods）的價值膨脹，這種財貨讓你自己與社會都清楚你的社會地位。更糟的是，不公平問題在許多國家都有日益惡化的趨勢；[31]不丹（Bhutan）近來犯罪率節節升高，可能就與這個現象

有關。根據一項衡量國民生活品質、但是與收入無關的指標「國民幸福毛額」(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GNH)，不丹曾經是全世界幸福感最高的國家，而在英國牛津大學畢業的新任國王即位之後，決定引進衛星電視供民眾收看，此時不丹的國民幸福毛額也開始直線下滑。電視螢幕中的生活方式、身體曲線與衣著裝飾，都讓不丹民眾只能望梅止渴，於是不僅引發怨恨憤懣，也導致犯罪率一發不可收拾，年輕人為了要買梅鐸(Rupert Murdoch)星空傳媒(Star TV)販賣的小東西不惜偷竊。[32]無論是在不丹還是在美國，電視呈現的世界都讓大多數民眾可望而不可及，而青年世代為了恢復自己的幸福感，於是走上偷竊之路。

就國家層面而言，這些現象意味金錢與它的老大哥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並不適合用來衡量人們生活幸福與否。[33]其他關於社會健全程度與幸福感的指標不僅存在，而且更能夠揭露真實情況。聯合國開發計畫署發布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將國民收入與健康、教育的資料整合。同樣出自聯合國的性別權力測度(Gender Empowerment Measure)顯示各國女性權益受尊重的程度，以及女性對政治、社會與經濟生活的參與情形。英國的新經濟基金會(The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發布一系列以「國民福祉」(national well-being)為名的豐富資料，從個人的幸福感、生命力到社會支援關係，內容無所不包。以歐洲地區二十二個國家的排名而言，丹麥幾乎每年都高居榜首，英國排名第十三，只比法國略高一籌。[34]

這些指標試圖捕捉一個捉摸不定的概念：「美好生活」，古希臘人稱之為「幸福」(eudaimonia)，但重點在於豐富美好的生活，而不是金錢。心理學有一個學派主張，我們應該把幸福視為某種更深層事物——心理福祉——的副產品。我們擁有愈多心理福祉，就能營造出愈多的幸福感。慷慨大方與利他行為都是累積心理福祉的方式，同時也可以在短時間內創造幸福感。這項理論有助於解釋目前幸福研究領域的一個問題：如何解釋並非來自接受金錢、而是給予金錢的幸福感？[35]有一項考慮各種控制條件的實驗，顯示了四個結果：

一、慷慨大方並不會直接引發幸福感。
二、幸福感不會促成慷慨大方。
三、擁有財富並不會促成慷慨大方或幸福感。
四、心理福祉是慷慨大方與幸福感的泉源。

這裡有一個弔詭，彌爾知之甚深：幸福的前提就是不再刻意追求幸福。

> 我認為唯一算得上幸福的人，都將心思專注在自身幸福之外的事物，也就是其他人的幸福、整體人類的裨益，甚至某種藝術或者嗜好。對他們而言，這些事物並不是手段方

法，而是理想目標。他們藉由追求幸福之外的事物，發現真正的幸福。[36]

彌爾瞭解但貝克不瞭解，如果我們讓自己變成經濟人，將會摧毀更為豐富的人性經驗，那些不應該被當成市場商品與最大化工具的聯結，也將因此斷絕失落。貝克的分析與政策主張只會導致「安氏盲」，但是卻影響廣泛，而且原因並不只是他的理論分析乾淨俐落。貝克方法的實際應用並不單純，他的簡明扼要帶有政治目的，永遠支持有利於權勢階級的政策，將長期經濟壟斷、父權體制與人體器官交易合理化。如果貝克只是對某一套經濟分析過度熱中，那麼我們或許可以將他看成象牙塔裡異想天開的學究，以為自己的經濟學工具可以解決全世界的問題。然而貝克的方法深入社會科學的每一個角落，在美國尤其受到歡迎，這顯示我們絕不能對他等閒視之。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間在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的講座，就對貝克嚴陣以待，認為他代表當今市場社會惡劣、反動的趨勢。[37]

貝克絕不是一個單純的學究，對於市場社會而言，他既是症狀，也是病因。貝克代表的是徹頭徹尾的放任主義文化，讓我們把市場特質當成金科玉律，把自己當成經營自身「幸福」的企業家，挪移市場的資源並加上時間要素以創造效用，然後藉由不斷消費來追求幸福。雖然貝克關於家庭、移民、醫療的見解顯得荒謬絕倫，代表當今的市場社會還沒有跟上他的理

論。但是時間會改變許多事，社會對於市場定位的觀念會變化。今日人壽保險業的全球市場規模超過二兆美元，[38]然而這個產業過去在歐洲許多國家都遭到禁止，在美國也是一八四〇年代之後才擺脫「靠死亡賺錢」的惡名。[39]

貝克大力倡導一個由市場與經濟人組成的世界，因此助長了為特定團體利益服務的市場社會文化。文化並不是空中樓閣，而是真實具體的事物，關係到有血有肉的芸芸眾生。貝克的觀點造福另一種「生物」，與我們相比，它們和經濟人的血緣更近，在市場社會更加如魚得水，它們就是企業。

3. 企業

> 與怪物搏鬥的人必須小心，不要讓自己也變成怪物。如果你一直注視地獄，地獄也會注視你。
>
>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善惡的彼岸》（*Beyond Good and Evil*）

每一個文明都有交易者與市場，然而企業是現代市場社會的產物，是人類為了追求利益而創造出來的新事物，發展歷史雖然短暫，如今卻主宰我們的世界。大多數國家都將企業界定為「法人」（legal people），權利和義務與正常人並無二致，雖然它們並不是血肉之軀。一部由阿克巴（Mark Achbar）、阿伯特（Jennifer Abbott）與巴肯（Joel Bakan）製作的精采紀錄片《企業人格診斷書》（*The Corporation*）根據現代法律對企業的定義，提出一個問題：「如果企業真的是一個人，那麼它會是什麼樣的人？」他們根據美國心理學會編製的《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第四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IV*），從企業的行為來診斷其症狀，發現企業表現出多種精神病患的人格特質。[1] 美國心理學會將精神疾病與社會病態歸類為「反社會型人格異常」，病患會出現以下七種症狀中的至少三種：

一、無法遵循法律要求的社會規範。表現為不斷做出可能遭到逮捕的行為。
二、欺詐虛偽。表現為反覆說謊、使用假身分、為了個人利益或樂趣而欺騙他人。
三、容易衝動，或者從來不事先計畫。
四、欠缺理性，具攻擊性。表現為經常鬥毆、攻擊他人。
五、魯莽輕率，不顧自身或他人安全。
六、不負責任。表現為無法維持穩定工作，對財務問題不負責任。
七、欠缺悔意。表現為在傷害、虧待別人或偷竊別人財物之後毫不在意，或者將行為合理化。

根據三位製作人的診斷，這七種症狀在企業身上一應俱全。企業一有機會就想走法律後門，對自家的行為遮遮掩掩，為短期利益犧牲長期福祉，喜歡打官司，經常違反衛生與安全法規，剋扣供應商貨款與員工薪水，而且就算作惡多端也毫無悔意。農業生物科技公司孟山

都（Monsanto）就是前科累累，它嚴重汙染美國阿拉巴馬州一整個城鎮，而且一直隱瞞事實，根據該公司內部一份機密備忘錄，它這麼做的原因是它「一塊錢的生意都輸不起」。《華盛頓郵報》二〇〇二年的一篇報導揭發了駭人聽聞的詳情：數十年來，孟山都的員工明知故犯，將阿拉巴馬州安尼斯敦（Anniston）工廠的有毒廢料倒進當地溪流，毒性之強會讓溪流中的魚兒在十秒鐘內吐血、掉鱗、死亡。孟山都一家分公司首諾公司（Solutia）的代表辯稱，用現今的標準來衡量該公司一九七〇年代的環保表現，其實並不公平，他說：「我們當時是不是做了一些今天不會做的事情，當然是。然而我們不能見樹不見林，我相信整體看來，我們問心無愧。」[2]孟山都的故事雖然讓人難以接受，但是一家企業會做出這種振振有辭的病態行為，其實不難置信。

另一方面，企業不必違反法律也能夠幹盡壞事。市場社會的運作常軌告訴我們，企業界的「問心無愧」已經是家常便飯，其根源在於利潤導向市場界定事物價值的方式。當企業決定要生產何種商品、賣多少價錢時，它們其實已經化身為經濟人，在一個可以透過市場買賣生產要素的世界裡，冷靜而理智地行事，跟著利潤亦步亦趨。

利潤多多益善，因此企業要盡可能壓低員工、原物料、資本設備（capital equipment）與租金的成本。我們先來看一個假設的麥當勞案例，追蹤計算它的各項成本。麥當勞是一家以營利為目標的機構，使命在於唯利是圖，因此它要全力壓低生產漢堡的成本，從牛肉、勞工、

租金到安全測試各項要素，成本與競爭對手的差距愈大，利潤愈是豐厚可觀。如果麥當勞能夠在排放二氧化碳等汙染物的時候不必付出任何代價，它的成本與廣義的社會成本將不會一致。現代經濟學稱這類的社會成本為「外部性」（externalities），也就是不包含在價格淨值之內的成本。二十世紀初葉英國經濟學家庇古（Arthur C. Pigou）提出一個觀念：市場經常忽略其行為有更廣大的意義，原因在於市場的本質有其缺陷，影響了價格的內部與外部因素。

為了瞭解外部性的實際作用，我們要回頭來看麥香堡（Big Mac）。麥香堡生產過程會對環境帶來許多衝擊，其中之一就是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麥當勞在美國一年賣出五億五千萬個麥香堡，能源成本約為兩億九千七百萬美元，製造的溫室氣體約為一百二十萬噸二氧化碳當量（CO_2 equivalent）。[3]從更廣的層面來看，除了碳足跡之外，麥香堡還會造成水資源耗竭、土壤劣化（soil degradation）等環境衝擊，以及看不見的醫療公衛成本，來自治療糖尿病、心臟病等與飲食相關的疾病。

這些成本完全不會反映在麥當勞得來速窗口的麥香堡價格上，然而還是要有人支付。只不過掏錢的人並不是麥當勞公司，而是整個社會：我們必須支付環境災難、氣候變遷導致人口遷徙、醫療支出升高的成本。根據印度科學與環境中心（Centre for Science and the Environment in India）一份報告的估計，一個漢堡的牛肉如果是來自經由森林伐除而開闢的牧場，真正的成本應該是二百美元。[4]

這個數字乍看之下超乎想像，然而如果我們從更宏觀的角度來檢視，一個只賣四美元的麥香堡，真正的成本恐怕還不只二百美元，因為企業除了不必支付外部成本，它們還接受各式各樣的政府補助。美國消費者直接以自己繳納的稅款來補貼便宜的漢堡。麥當勞漢堡中的牛肉，是以玉米餵養長成的，而玉米則是全美國受補貼額度最高的作物。塔夫斯大學（Tufts University）的報告指出，拜玉米補貼之賜，美國牛肉產業每年少支出五億六千二百萬美元。[5]二〇〇六年美國對玉米的補助高達四十六億美元。[6]

另一個問題是壓低薪資成本，納稅人在這方面也透過「社會補助」（social subsidy），對美國最受歡迎的餐點出錢出力。美國速食店員工的平均年薪只有一萬五千美元，[7]雖然只有貧窮線的水準，但是受到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食物券（food stamp）、兒童營養補助、政府直接補助以及各種政府服務的支持。以漢堡王為例，聯邦與州政府為了照顧這家公司的員工，每年支出超過二億七千三百萬美元。[8]整體統計全國各主要速食業者，美國政府一年要花十多億美元，來補助業者低於貧窮線的薪資。華府勞工組織「好工作優先」（Good Jobs First）的馬泰拉（Phil Mattera）指出：「有些大型零售業與速食業公司，就是不願為員工提供足夠的醫療福利，因此員工得自求多福，他們如果資格符合規定，就會申請州政府出資的福利計畫。我們看到許多能夠負擔員工醫療福利的大型公司向這類計畫求助……沃爾瑪（Wal-Mart）等業者會鼓勵員工申請由納稅人出錢的計畫。」[9]

低價格食物的社會成本，除了納稅人補貼之外，還有其他來源。一項一九九五年的公共衛生成本研究顯示，美國人為了治療食用肉類過量導致的疾病，一年要花三百億到六百億美元。[10]這問題也不是美國的專利；在中國，肥胖與飲食相關疾病導致的公衛成本，已經遠遠超過營養不良。[11]

不過在食物價格沒有反映的成本中，這些直接與間接社會成本也只占一小部分。其中抗生素由於被畜牧業廣泛拿來預防疾病，對人類的療效每況愈下。此外像是殺蟲劑汙染、養分徑流流失（nutrient runoff）與溫室氣體排放，都是工業化農業（industrialized agriculture）對環境造成的負擔。想要抵消麥香堡生產過程每年排放的一百二十萬噸二氧化碳當量，需要七百三十萬至三千五百六十萬美元。[12]中國學者有一項研究估計，業者每花一塊錢使用殺蟲劑，公眾就必須花八毛錢清理善後。[13]墨西哥灣主要由農業養分徑流流失（氮化物、含磷肥料與牲畜排泄物）導致的「死海區」（dead zone），是環境成本的另一個例證。水中營養過剩或者優養化（eutrophication）會導致植物過度繁殖，阻塞原本可通航的水道。而且這些植物死亡之後會腐爛，大量消耗水中的氧氣，造成魚類死亡。一項研究估計，英國每年要為優養化付出一億零五百萬到一億六千萬美元的代價，光是政府出資的清除養分徑流流失計畫就耗資七千七百萬美元。[14]

二百美元的麥香堡只是一個近似值。精確計算實質環境成本並不容易，因為我們難以掌

握長期環境效應，也無法評估今日汙染留待未來世代清除的成本。[15]愛荷華大學（University of Iowa）一項研究檢視多項關於美國農業實質成本的研究，將自然資源、野生生物、生態系統生物多樣性、人類健康等間接成本納入考量之後，估計美國農業的隱藏價格一年約在五十七億至一百六十九億美元之間。農作物生產的間接成本比消費者支付的價格多出四十九億至一百六十一億美元，畜牧產品的落差則在七億一千四百萬至七億三千九百萬美元之間。[16]另一項研究估算英國農業的外部成本為一年三十七億英鎊。[17]這些研究都有很大的詮釋空間，然而無庸置疑的是，市場無法讓人們在結帳櫃檯支付的價格，完整反映一項商品的實質成本。

生態負債（ecological debt）並不只是紙上談兵。世界銀行估計中國的環境成本總合約占其國內生產毛額八%，[18]農業仍然是最顯著的案例。中國的小麥有九五%種植在華北地區，當地農民的耕種技術需要大量水資源，高度倚賴化學物質。水資源的過度使用以及因此導致的地下水位降低（再加上畜牧業無限制地使用草地、森林伐除、氣候變遷等因素），導致中國許多地區的沙漠化日益嚴重，大約一八．一%的可耕地已經淪陷為沙漠或流沙。[19]沙塵暴每隔一段時間就從北方出發，橫掃中國的工業地帶，挾帶汙染物質，籠罩從中國到日本的許多城市。二〇〇一年，來自中國的沙塵暴一路吹到美國，直達科羅拉多州首府丹佛，遮蔽了落磯山脈的景觀。中國國務院研究室工交貿易研究司估計，沙漠化造成的直接損失每年高達七十八億九千萬美元，主要是沙塵暴與水資源枯竭對民眾健康、經濟與環境的衝擊。[20]世界銀行的估計更可觀：每年三百一十億美元。[21]

二〇〇八年冬天，中國乾旱的北方特別難熬，四三%的冬麥收成岌岌可危。[22]雖然原因並不全然是農業用水供應出問題，但是就如北京中國農業大學水資源專家李光永所說：「水資源就是供不應求，如果哪天到了水庫見底、水井枯竭的地步，罪魁禍首將是中國農民不知珍惜的用水方式。」[23]過去數十年來，集約化農業（intensified agriculture）大行其道，中國與其他國家小麥的低廉成本，意味我們正在寅吃卯糧，讓未來的農民付出代價。除了小麥之外，許多大宗商品都是如此，都是在日漸枯竭的資源中過度生產。事實上，水資源短缺和其他諸多因素，也促使中國等國家鎖定雨量與地下水豐富的拉丁美洲與非洲國家，進行土地掠奪。

絕大多數國家都無法體認自然資源對市場商品製造過程的價值，中國的水資源問題只是一個例證。然而像植物授粉、水資源淨化、土壤侵蝕控制、土壤肥沃度維持、水資源與氣候系統調節這些生態系統服務（ecosystem services）是很有價值的，而且我們可以嘗試計算出具體價格。[24]再以糧食為例，紐西蘭一項研究估計該國生態系統服務的整體經濟價值，在有機農業是每公頃每年一千六百一十美元到一萬九千四百二十美元，傳統農業則是一千二百七十美元到一萬四千五百七十美元。[25]換言之，與使用傳統產業化技術的農業體系相比，重視永續發展的農業體系更能夠回饋大自然，然而後者並沒有因此得到獎勵補貼。相較之下，傳統

工業化農業的產品雖然傷害生態環境，但是不必支付全部成本，因此可以壓低銷售價格。[26]從林林總總的隱藏成本來看，這類糧食的低廉價格其實有如騙局。其他消費性商品與服務也有類似的現象。永續生產的商品與服務表面上價格偏高，但其價格低廉的競爭對手雖然讓我們省下短期開支，卻會造成長期負擔的成本。

價值衡量之所以遭到全面扭曲，罪魁禍首就是利潤導向的市場。企業一心一意要降低成本，因此千方百計逃避社會與環境成本。這並不是說為企業工作的人都很邪惡、殘酷或無情。我最近和聯合利華（Unilever）的永續農業計畫負責人維斯（Jan Kees Vis）進行一場辯論，他從各種角度來看，都稱得上是人品正直、專注認真、深思熟慮、充滿愛心，而且努力造福環境。維斯督導的多項計畫能夠兼顧環境與聯合利華的利益，例如節省水資源、減少化石燃料等等。不過他也承認，如果他推動的某項計畫雖然對環境有利，但是會讓公司虧錢，那麼他就得立刻捲鋪蓋走路。

企業就是一群經濟人，為了提升利潤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必要時干犯法律也在所不惜，而且態度非常理性，不會張牙舞爪。不願遵從這套叢林法則的企業，終將關門大吉。也就是說，無論一家企業賣的是什麼，它都會製造外部成本。[27]

造成破壞的人必須負責善後，這是理所當然。如果市場價格包含環境與社會的成本，那麼它就能真的傳遞出東西是相對豐富或稀有。如果某項商品能夠造福社會與環境，例如生態農業（agroecological farming），而且其價格呈現了這些利益，那麼市場就能夠藉由價格來分配資源，追求物盡其用。這種機制不應該以所謂的「道德消費者」（ethical consumer）取代，冀望他們選購不會汙染地球環境的產品。商品造成的代價與產生的利益都必須反映在價格上，才能夠讓市場的經濟邏輯正常運作，否則企業一定是受惠於大規模的補貼，自由市場的信徒再怎麼辯解都無法自圓其說。自由市場的「自由」也可以解釋為「免費」，正說明了私人企業對環境與社會從不間斷地予取予求。儘管企業資本主義振振有辭為自己辯護，但是迄今無法證明它可以不必倚賴環境與社會的補貼。

當企業造成外部成本卻不願支付，因此而受益的人等於是在偷竊，由其他人為其行為付出代價。有偷竊就有受害者，整體來看，每個人都是這種外部成本的受害者。臭氧層破壞對人類健康的傷害、漁業資源的耗竭、森林生態系統服務的減少、工業化農業對水資源的汙染、日益頻繁的水災與旱災，將這些因素加總起來換算一番，結果非常可觀。根據最近出爐的一項研究，人類如果自掏腰包來支付生態系統遭破壞的代價，金額將高達四十七兆美元。而且這筆帳並不是由大家平均分擔，另一項研究估計富裕國家在貧窮國家留下的環境足跡（environmental footprint），也就是因為消費與生產方式的選擇，在臭氧層破壞、過漁（overfishing）、森林伐除（deforestation）、氣候變遷、紅樹林死亡與集約化農業等六個領域造成的隱藏成本。結果不難想見：中等收入與高收入國家不但汙染自己，也將汙染委外

（outsource）到窮國，造成窮國五兆美元以上的生態損失，但是窮國在富國留下的環境足跡只有六千八百億美元。整個第三世界窮國積欠富國的債務也不過一兆八千億美元，與富國積欠窮國的五兆美元生態負債相較，只能說是小巫見大巫。[28]

這種嚴重的不公平，這種窮國遠高於富國、無依無靠者遠高於有權有勢者的成本失衡現象，可以解釋外部成本為什麼能夠歷久不衰：因為經濟狀況較佳的消費者可以分享偷竊所得的利益。當我買一個定價只有真實價格五十分之一的漢堡，我就有利可圖，至少有短期的利益。人為扭曲的偏低價格，是這個巧取豪奪的體系給予消費者的好處，讓我們買衣服比送洗衣服便宜，換新手機比修理舊手機便宜。這類「便宜買賣」將我們納入現代消費者資本主義。當然，購買行為的背景相當重要。有些消費者或許願意購買品質較好、較為健康、較為美味、而且價格能夠反映真正成本的食品，然而今日許多家庭的收入連維持生計都有困難，因此找尋便宜貨儼然成了一種社會政策。[29]

我們不能把所有過錯都歸咎消費者，而應該先正本清源，思考我們是如何變成消費者。那些琳琅滿目、部分真實成本延後支付或者由他人支付的便宜商品，或許無比誘人，然而無法解釋我們為什麼需要這些商品。這其間牽涉一種微妙的運作過程，一種社會建構，讓我們學習如何消費，如何決定時間、幸福與他人的價值。企業是現代市場社會的產物，為了讓利潤源源不絕，它們必須徵召消費者進入市場，價格就是誘因之一。為了進一步釐清消費者與生產者權力的楚河漢界，也就是供應和需求的交互作用，我們不妨先探討特定條件的案例，也就是當價格為零時的情況。

免費午餐的真正代價

有誰不喜歡免費的事物？免費的試用品、免費的遊戲、免費的午餐、免費的電話、免費的電視，這些事物多多少少都能帶給我們一些滿足感，怎麼可能會有壞處呢？借用兩個陳腔濫調的說法，誰說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又何必在雞蛋裡挑骨頭？我們對這樣的質疑有一個全面的答案：當精打細算的企業遇上欠缺理智的人們，透過超市、商場、電視、網路等管道發送免費商品，對人們的不理智心態火上澆油，企業總是會得到想要的結果。它們的策略萬變不離其宗，運用一種帶有賭博色彩的商業模式：以免費事物讓身為消費者的你嚐一點甜頭，期待你日後再回來消費；另一方面，當你拿到免費事物時，你會比較願意購買貴一點的商品，將花費的上限提高一點，對那些給你甜頭的品牌產生好感。

這種模式似乎沒有什麼不對勁。你拿到更多商品，企業賺到更多現金，儼然是雙贏局面。然而深入檢視之後你會發現，這種免費的交換其實別有所圖，企業想藉此改變你的購買決策與好惡。經濟學向來刻意避免碰觸人們的喜好問題，圈內人經常掛在嘴邊的一句拉丁文

就是：「品味無可爭辯」（De gustibus non est disputandum），然而企業不斷嘗試改變人們的品味，忽視這一點對我們有害無益。如果有人免費送給你海洛英試用品，想藉此改變你對海洛英的好惡，你應該會敬謝不敏，因為你很清楚毒癮會對你造成什麼變化，而且不希望自己發生那種變化。拿海洛英做比方或許並不全然恰當，免費事物的交換未必會讓人上癮，然而我們還是可以得到啟示：我們做出的選擇與其說是理性思考的結果，不如說是企業操控支配的對象，而且程度之嚴重讓人難以置信。

二〇〇九年二月三日，美國連鎖餐廳業者丹尼餐廳（Denny's）決定，免費供應顧客一道平日收費五．九九美元的早餐：兩個煎餅、兩顆蛋、兩條香腸、兩片培根。[30]公司相信這項為期一天的活動將攻占各主要報紙的版面，有助於開發顧客層，因此放手一搏。結果這項活動招徠了二百萬名食客，有些人排隊等候超過一個小時。丹尼餐廳花了大約五百萬美元，包括美式足球超級盃的廣告費、免費早餐的材料費與烹調的勞力。[31]有人問執行長這麼做是否值得，他花了一點時間計算汽水等高利潤產品的收益，然後說道：「我們不只是打平開銷而已。」[32]

天下既沒有免費的早餐，也沒有免費的午餐。吉卜林（Rudyard Kipling）在《美國隨筆》（*American Notes*）如此描述十九世紀舊金山的免費午餐：

> 在這個白人為主的大城市，我無比孤獨。憑著直覺，一心想休息的我走進一家酒吧，裡面掛滿低俗的畫像，櫃檯前面幾個帽子搭在背後的男人正狼吞虎嚥。這就是我找到的「免費午餐」供應站，顧客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只需付飲料錢，一天花不到一個盧比就可以酒足飯飽，連窮光蛋也負擔得起。如果你到舊金山，一定要記住有這個地方。[33]

十九世紀的免費午餐和丹尼餐廳的免費早餐沒有多大差別，策略幾乎一模一樣：以免費餐點吸引顧客上門、誘使他們消費利潤極高的飲料。「免費」其實是一場賭局，我們對於免費事物的見獵心喜，成為企業獲利的泉源。

如果我們以理智的態度來從事免費交易，會有什麼結果？經濟學家麥肯齊（Richard McKenzie）在《電影院的爆米花為什麼特別貴》（*Why Popcorn Costs So Much at the Movies*）一書中描述他如何選購電腦，當時廠商建議他搭配一部免費的印表機，他接受了，也知道廠商日後會從昂貴的墨水匣賺回利潤。因此等到墨水匣用完之後，麥肯齊做了一個理智的選擇：把整部印表機丟掉。[34]太誇張了嗎？如果我們承認丟掉印表機是理智做法，但還是覺得這麼做太過浪費，我們應該抓住這種感覺。麥肯齊化身為經濟人，和電腦廠商鬥智，並擊敗對方。然而大多數人之所以容易上鉤，是因為我們會捨不得丟棄免費贈品，意識到所謂的「免費」一

定還是有其代價，而且已經有人幫我們支付。

再舉另一個例子。行動通訊業者免費送我一支功能五花八門的手機，讓我成為定期合約或預付卡的用戶。我心滿意足，因為從此到任何地方都不怕迷路，還有最新潮的手機可以把玩。為了不要辜負這支手機的功能，我會多花一點錢來買應用程式或者行動上網。顯然很多人都認為這種消費物超所值。事實上手機業者正在進行軍備競賽，讓酷炫的手機成為社交場合的必備配件。伴隨新手機而來的新應用程式或新功能，也會變成不可或缺，為業者帶來源源不絕的收益。二〇〇七年，美國每一位手機使用者的平均花費高達六百美元（首度超越固網電話使用者），這筆金額非同小可，而且分配方式很不均衡。

二〇〇九年，手機大廠諾基亞（Nokia）獲利四億九千萬歐元，營收一百二十七億歐元，股利較前一年高出二〇%。和全球各地的電子公司一樣，諾基亞的製程會使用來自剛果民主共和國的礦物。這個長期陷入血腥衝突的非洲國家，擁有全球七〇%的鈳鉭鐵礦（coltan），從其中提煉的鈮（niobium）與鉭（tantalum）用於製造電容器，是大部分可攜式電子裝置的核心元件。剛果的軍隊一邊保護珍貴的鈳鉭鐵礦資源，一邊姦淫擄掠無所不為。在艱苦環境中努力養兒育女的剛果婦女，平均壽命只有四十七歲，生活在大規模強姦罪行的陰影下，收入只有男性的一半多一點，平均一年一百九十一美元。[35]就算鈳鉭鐵礦價格上漲，剛果人民的處境也不會有多大改善；更何況近來鈳鉭鐵礦價格低迷，他們在礦坑必須加倍努力工作，才

能夠維持和價格上漲時期同樣水平的收入。鈳鉭鐵礦現象正是電子業血淋淋的外部成本，如果我們還天真地相信自己可以拿到「免費」的手機，這種外部成本將更顯得面目猙獰。

新形態的免費交易

與免費事物相關的外部成本，未必都是如此顯而易見。科技改變了免費事物交易的規模，衍生出一系列新穎的商品與服務，每一種都帶有隱而不顯、難以捉摸的成本。《紐約時報》網站讓人們免費閱讀新聞，吸引的讀者比真正花二塊錢美金買報紙的人多上數百萬，導致報社的收益節節滑落。規模較小的報社情況更不樂觀，分類廣告的收入已經被「Craigslist」等網站鯨吞，地方報紙的市場岌岌可危。這些現象都有外部成本。

隨著營收疲弱不振，報社主管密切注意經濟情勢，縮小新聞報導範圍，大舉解僱新聞記者。發動調查採訪、為公眾利益把關的成本太高，不如利用現成的新聞資料和評論來加工。在這種趨勢下，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報紙提供的地方公民參與，沒有自由媒體扮演監督者的社會，等於是被剝奪了公共空間。

這是一個免費商品的美麗新世界，未來的美好生活遙遙在望，今日的犧牲必不可免。在一篇免費供人閱覽、頗具影響力的網路文章中，《連線》（*Wired*）雜誌共同創辦人凱利（Kevin

Kelly）指出，儘管今日的網際網路猶如一部超級複製機器，但還是可以發掘商機，提供個人化（歌曲免費提供，但在歌詞中加入孩子的名字要收四十美元）、即時（到圖書館借免費，但是要等一個星期；上網下載要錢，但是立刻可以看到）、真實（下載單曲免費，歌手簽名CD要價五十美元）、真人（閱讀網站內容免費，請部落客捉刀代筆就得花錢）、容易取得（與其在圖書館尋尋覓覓，不如由我們提供，幫你節省時間），而且無法複製的商品。

這些都是未來數位化免費事物交易的策略，如果真如專家預測，數位化免費事物將會滿坑滿谷，那麼我們從過去的經驗將可以預知會發生什麼情況，畢竟免費贈送並不是什麼新鮮的做法。首先來看日常生活中除了工作、睡眠之外，最花時間的活動：看電視。英國民眾平均每天看兩個小時電視，美國人則接近四個小時。某些國家的電視觀眾可能要付費給公營或民間的電視公司，某些業者則是針對特定節目收費。不過大體而言，坐下來看電視應該不必花錢，也不會附帶什麼成本。

然而我們深入檢視就會發現，電視節目的價格與成本可以完全脫節。以世界盃足球賽這個全球規模最大的電視節目為例，二〇一〇年的冠亞軍決賽預計將吸引十五億觀眾。南非政府為了籌辦世界盃，已經斥資二十億美元。為了讓自家城市以美好面貌迎接成千上萬的球迷，南非政府正在進行所謂的「貧民窟清理」，將窮苦民眾驅趕出城，情景猶如回到種族隔離時代。貧民窟居民被迫遷往「替代性住所」，但是那些地方沒有工作機會、沒有學校、沒有醫療機構，

民眾落腳之後只能自求多福。當然，全球各地的世界盃決賽觀眾不必負擔這些社會成本，只需忍受中場休息時間萬事達卡或者可口可樂的廣告轟炸。

每一個廣告都有成本，世界盃電視廣告代表的產品，若不是將製程的環境與社會成本外部化（索尼〔Sony〕的電子廢棄物）、鼓勵民眾舉債（威士卡〔Visa〕）、倚賴破壞地球環境的化石燃料（阿酋航空〔Emirates〕、起亞汽車〔Kia〕），就是賣一堆化學物質混合成的飲料（可口可樂）。最後一個例子尤其發人深省。公共衛生學家貝珂（Anne Becker）曾經觀察到斐濟（Fiji）引進美國電視廣告對青少年的可怕影響：飲食失調的罹病比例在短短三年之間，從聞所未聞竄升到一二%。[36]鄰近幾個島嶼的少女開始談論身材要像可口可樂瓶一樣凹凸有致，不要像芬達汽水瓶那樣臃腫福態。快速引進現代消費文化對青年男女產生嚴重衝擊，這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只不過斐濟的情況惡化特別快。美國近來有一項研究顯示，如果能禁止垃圾食物廣告播出，三歲到十一歲兒童體重過重的比例可望降低五分之一，青少年的比例則會降低一四%。[37]

外部成本與企業的規模有關。像Google、蘋果（Apple）、可口可樂、沃爾瑪這些獨占（monopoly）與寡占（oligopoly）的企業，雖然在經濟學課堂上被視為例外情形，然而在消費性商品的世界中，它們卻是金科玉律。對於競爭性的市場，獨占企業與小企業的差別在於，競爭型的企業必須依據市場情況來調整價格，但獨占企業因為過於強大，因此掌握了選擇權，

可以自主決定銷售的價格或者數量。而且長遠來看，它們除了決定價格，還能夠決定消費者願意花多少錢來買它們的產品。

非洲南部某些地區的人口與電腦數量比例，在全球排名墊底，幾個非政府組織在當地發送免費的Linux電腦作業系統。微軟擔心這項行動會威脅視窗作業系統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的獨占地位，於是針對該地區幾個貧窮國家，將視窗系統的價格調降到象徵性的三美元，並「賣出」幾千份。在非洲西南部的納米比亞（Namibia），微軟甚至免費贈送視窗系統與電腦，讓贈送Linux系統的非政府組織無力招架。[38]納米比亞一些學校的校長與老師雖然也懷疑微軟別有居心，等到免費的Linux系統被逐出市場，就會開始收取讓客戶別無選擇的費用；但是學校預算拮据，使他們不得不只顧眼前利益，接受微軟的優惠措施。當然，這種情況非常諷刺，真正免費的軟體被看似免費的軟體封殺。一旦視窗系統封殺競爭對手，取得訂定、詮釋與修改市場法則的主導權，它的價格就會開始上漲，而消費者的選擇權也會受到重重限制。

聽起來似乎沒有多嚴重，然而當這種策略蔓延到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其他地區，運用在另一種截然不同的產品上，其結果還是令人憂心。全天下沒有什麼事物比起母乳更稱得上「免費」，然而儘管有汙牛充棟的研究顯示，餵哺母乳遠比其他養育嬰兒方式優越，嬰兒食品公司仍然全面、長期地散布錯誤資訊，誘使母親以嬰兒奶粉取代母乳。其中一種手法就是

分送免費的嬰兒奶粉，哺乳的母親一旦開始餵嬰兒喝奶粉，就會停止分泌乳汁，必須倚賴營養價值較差的奶粉。透過這種大量分送試用品的行銷手法，嬰兒食品公司每年造成一百三十萬嬰兒死亡，賺進數百萬美元利潤。[39]

這又是同樣的模式，哺乳的母親，尤其是收入偏低的母親，受到雙重的誘惑，「免費」的短期金錢利益與嬰兒奶粉公司的不實宣傳雙管齊下。這些公司營運的出發點是利潤，不是公眾健康。免費變成製造新消費者的利器，就嬰兒奶粉而言，免費更是廠商開拓產品市場、培養顧客忠誠度的法寶。嬰兒奶粉廠商的行為完全理性，而且顯然它們實力雄厚，可以為所欲為。一九八〇年代歐洲與北美洲社會曾掀起一陣抗議聲浪，促使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擬定《國際母乳代用品銷售守則》（International Code of Marketing of Breast-Milk Substitutes），然而並無法有效解決問題，艾蘭（Annelies Allain）與楊如金（Yeong Joo Kean）最近在一份研究報告中，列舉了多如牛毛的違反守則案例，甚至還有販售遭汙染產品的犯罪行為，而且全球各主要廠商全都上榜。[40]

嬰兒奶粉的案例固然極端，然而代表一個更廣泛的現象：「免費」是一種趕鴨子上架的手法，強迫我們做出如果我們事先認清「免費」的真正成本，就不會去做的事情。當我們手頭拮据，「免費」的誘惑格外難以抗拒，這也戳破了我們自以為是理性經濟行為人（economic agent）的假象，並且將我們局限於消費者的角色。「免費」或許會讓我們得到自己喜歡甚至需

要的東西，我寫作本書就是利用開放原始碼（open-source）軟體（本書稍後將討論這種軟體的「免費」有何不同）。「免費」也可以開啟新的可能性，然而當非理性的人們遇上唯利是圖的企業，特別是有能力主導市場的企業，「免費」必然帶有隱藏的成本。其中弔詭在於，「免費」贈品正是企業綁住我們的鎖鏈。

當然，除了企業促銷手法之外，免費交易還有其他運作管道。法國社會學家牟斯（Marcel Mauss）在《禮物：舊社會中交換的形式與功能》（*The Gift: Forms and Functions of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一書中探討環繞「給予」和「接受」的複雜社會關係，他的結論是完全不伴隨互惠與尊重期待的事物少之又少，在社會學與經濟學都一樣。在市場社會中，交易的社會聯結就是利潤。以免費的嬰兒奶粉為例，交易的規則與文化是由企業訂定。對於這些為了謀利而無所不用其極的虛構「法人」，免費交易猶如一場賭博，帶有風險與些微的不確定性，然而有一點是確定的：無論一樣事物的價格是免費還是一億美金，它都會具備從市場衍生的特質；這種以追求利潤為目標的市場，是商品得以存在的基礎。手機中的「血腥元件」提醒我們，現代消費者資本主義的日常運作，存在更廣泛的外部成本。市場社會衡量事物價值的方式，透過它的日常運作，產生了這些成本。

對於這些血腥的謊言，強化企業倫理似乎是治本之道。近來一個熱門話題就是市場的道德議題，例如哈佛大學桑德爾（Michael Sandel）精采的芮斯講座（Reith Lectures），[41] 以及二〇〇九年七月八大工業國組織（Group of Eight）支持背書、但是顯然作用不大的萊切架構（Lecce Framework），亦即「正當、誠信、透明的共同原則與標準」。在官方的討論中，違背倫理通常意味某種行為雖然很不應該，但事實上並沒有違反法律。呼籲資本主義修正自家違背倫理的行為，就像一九九〇年代各方呼籲企業界善盡社會責任，當時幾家大企業的領導人承諾不會摧毀地球環境，但是如果真的非摧毀不可，他們會盡量做得漂亮一點。

為了更深入瞭解衡量事物價值涉及的倫理議題，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幾位攸關自由市場發展的原創思想家，他們對於價格、價值與整體經濟如何運作有著敏銳的覺察。在「經濟學家」這個行業出現之前，研究市場社會的人士被稱為「道德哲學家」，當他們省思市場的議題時，關注焦點並不在於高層金融（high finance）的行為是否正當，也不是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互動，而是價值如何與權力體系中根深柢固的不平等相互結合。當代經濟學已經渾然忘卻這些哲學家對於價值的論述。資本主義以嫉妒為基本精神，蓬勃發展的代價就是扼殺了觀照世界、衡量事物價值的其他方法。然而如果我們要反制當今唯利是圖的思維模式，而且不希望這種反制流於表面工夫、花拳繡腿，我們就必須重新回顧市場的道德哲學。

4. 鑽石與水

資本主義異想天開，相信最邪惡的人會做出最邪惡的事情，為了眾人的最大福祉。

——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1]

美國各中學多年來收到超過一百四十萬冊的蘭德著作，都是來自安蘭德協會（Ayn Rand Institute）的捐贈。任何一位老師只要想用這些書來折磨學生，都可以免費取得。在教育體系中，蘭德的著作被視為亞當斯密（Adam Smith）著作的簡化版，提供入門的自由市場理論；亞當斯密這位偉大的蘇格蘭思想家則為自由市場提供了條分縷析、鞭辟入裡的論述。其實這樣的看法對亞當斯密並不公平。

雖然蘭德煞費苦心將自私自利的行為合理化，但是亞當斯密並沒有頌揚鼓吹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場。人們談起他時最常提到的「看不見的手」（the invisible hand），在《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中只出現過一次，而且根本不是描述自由市場的正面效益。「看不見的手」其實是引導蘇格蘭投資人的一股力量，促使他們將資金投入本地的經濟體系，而非外國市場。投資人不僅得到利潤，也因為自身所處社會獲益而雨露均霑。投資人出於自私動機的行為，無心插柳帶來正面的結果，關鍵因素在於本地投資優先於外國投資。今日引述「看不見的手」的各方人士，恐怕並無意鼓吹這樣的政策。[2]

亞當斯密經常被簡化為自由市場法則的代表人物，然而他的思想要比這種刻板印象細微複雜得多，對於今日經濟學家殫精竭慮的諸多議題，他都有耐人尋味的觀點見解。例如對於金錢是否能夠買到幸福，亞當斯密的答案是不能：「就身體的舒適與心靈的平靜而言，社會各階層的人幾乎都處於同一水平。」[3]亞當斯密也認為，經濟活動背後最重要的原則是虛榮，人們工作是為了得到能夠換取同儕重視的事物，這種「人家有我也要有」的心態，促使一個人努力工作以維持自身的社會地位，可以說與今日的「享樂跑步機」異曲同工。另一方面，亞當斯密與其門徒對今日世人最大的啟發，卻是他對價值議題的見解。

在當代的經濟學課程中，常常以一個經典的比喻來展開關於價值機制的討論：為什麼鑽石並非必需卻如此昂貴，水無比重要卻如此廉價？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寫道：

價值一詞……有兩層不同的意義，可以代表特定事物的效用，也可以代表藉由擁有特

定事物而具備的購買其他商品能力。前者可稱為「使用價值」（value in use），後者則是「交換價值」（value in exchange）。使用價值非常高的事物，往往只具有很低的交換價值，甚或沒有交換價值；反之，交換價值非常高的事物，往往具有很低的使用價值，甚或沒有使用價值。水的用途之廣無與倫比，但我們不能以水購買任何事物，也不會拿任何事物與水交換。反之，鑽石雖然幾乎毫無使用價值可言，但必須擁有大量其他商品才能與之交換。[4]

在今日各大學的經濟學課堂中，教授們會告訴大學生，亞當斯密區分「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是自找麻煩，後患無窮，無助於決定事物的價值，也沒有什麼人會討論高使用價值、低交換價值的事物。

大學生還會學到，他們不必擔心自己陷入價值的五里霧中，這要感謝另一批後起的思想家：十九世紀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包括英國的傑方茲（William Stanley Jevons）、奧地利的門格爾（Carl Menger）、瑞士的瓦爾拉（Leon Walras）。他們運用當時最先進的物理學與數學工具，從價格的角度來理解價值，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們將焦點放在邊際效用，也就是將額外一單位的事物加進市場產生的影響。他們能夠說明事物價格的如何與為何；以水與鑽石的比較為例，問題關鍵在於相對而言，水很豐富而鑽石很稀少。

在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看來，鑽石或其他任何事物的價值，代表人們為了得到它們而願意放棄的事物。事物的價值只能在交換的過程中透顯，單純考量其本身特質、製作生產成本或者對擁有者帶來的利益，都無法估定其價值。根據新古典主義，發現價值的前提是交易，唯有如此，才能將個人的好惡轉化為公眾化的商業模式。

新古典主義如此解釋鑽石與水的悖論：為什麼不可或缺的事物會價格低廉，可有可無的事物卻價格昂貴。然而有一件事它略而不提：在十九世紀晚期之前，根本沒有人把這個悖論當成一回事。真正讓鑽石與水難題廣為人知的功臣，是經濟學家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寫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一本教科書。自由市場的文化需要一部聖經，薩繆爾森的《經濟學》（*Economics*）在一九四八年適時降臨，提供恰到好處的修正主義史觀，[5]一筆抹煞亞當斯密對於鑽石為什麼比水昂貴的充分理解。亞當斯密在一七六二年的《論法理學》（*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寫道：

> 充裕和廉價在某個層面上是同義詞，廉價是充裕的必然結果。因此我們看到，維繫人類生存絕對必需的水，因為取之不盡，所以一文不值；但是鑽石與其他寶石雖然沒有什麼實際用處，價格卻無比昂貴。[6]

亞當斯密從相對的稀有性來闡釋價格，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也是如此。但兩者差別在於如何闡釋效用，傑方茲之流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從抽象、量化的角度著眼，亞當斯密則重視使用價值的本質。用王爾德的話來說就是：今日人們知道每一件事物的交換價值，卻不知道任何事物的使用價值。亞當斯密的使用價值概念，與其視為他發展邊際效用（marginal utility）理論的徒勞嘗試，不如視為一種工具，可以幫助我們深入事物表相，從更基礎的層面來理解經濟活動。為了將表相的世界與更深層的真實世界區隔開來，亞當斯密指出，一件事物除了購買者支付的價格之外，還具有一層「真實的價格」。從市場價格到真實價格，其間的差異在於時間和勞力：

> 對於想要得到某種事物的人，事物的真實價格是得到它必須付出的辛苦與麻煩。對於已經得到某種事物、但想要將它賣掉或交換其他事物的人，真實價格是它為此人省下並轉嫁給別人的辛苦與麻煩。[7]

亞當斯密探討價值、勞力與工資三者之間的關連，他認為衡量事物真實價格的標竿，在於製造生產所花費的工夫：

> 唯有本身價值絕不會變化的勞動，才是隨時隨地可用以估量比較各種商品價值的終極和真實標準。勞動是商品的真實價格，貨幣只是商品名義上的價格。[8]

亞當斯密還認為，有些職業之所以工資較高，是因為從業者願意犧牲非金錢的好處。股票經紀人的收入高於公園管理員，是因為前者無法每天都在樹林中漫步遨遊。長遠來看，工資會漸趨平等，不同職業的些微差異決定於人們有多少時間可以用來度假，補償工作的辛勤。依照亞當斯密的理論，晚間清理下水道的勞動者應該都是億萬富豪，然而實際情況並非如此，亞當斯密認為原因在於經濟體系出了全面性的問題，扭曲了不同職業的工資水平。

一般人提及亞當斯密，很少會想到這些觀點。到了美國總統雷根的時代，他更淪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資本主義的看板人物，為他們的大膽實驗背書。不過和馬克思相比，亞當斯密的處境還算差堪告慰。馬克思受到的待遇遠比亞當斯密惡劣，與新古典主義的純粹思維相比，他的理論被視為離經叛道，因此早已被正統經濟學逐出門牆。今日人們會以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在學院已無立足之地，然而他們確實存在，而且根據一些跡象來看，他們落腳的地方不是死氣沉沉的經濟學系，而是商學院。這是事出有因，儘管當代經濟學理論幾乎已無馬克思主義容身之處，但他對當代經濟活動仍然可以提供許多重要見解。

馬克思同意亞當斯密的看法，時間與勞力是商品生產過程的核心要素。然而馬克思更勝

一籌，藉由「勞動價值理論」來析論時間與勞力如何作用。假設你是一位頂尖的快餐廚師，一個小時能做出兩百個漢堡；我是一個雖然不信印度教、但是本身不吃牛肉的印度人，一個小時只能做出二十個漢堡。這是不是意味我做的漢堡的價值是你的十倍？依據簡單的勞動價值理論，答案應該是肯定的，但馬克思告訴我們為什麼並非如此。簡而言之，你做漢堡的方式符合業界正常的生產力標準，而我則是遙遙落後。馬克思透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socially necessary labor time）來討論這個問題，我做漢堡的時間遠超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也就是業界正常的時間。這裡的「社會」意味絕非「自然」形成，而是大量人為干預、政治與權力運作的結果。[9]

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個概念，揭示了亞當斯密與馬克思對工資觀點的核心歧異。亞當斯密認為，如果先不管人為扭曲，工資代表一個人的工作量。但是在馬克思看來，工資決定於如何讓自己的勞動力對資本家產生效用。勞動者每天只需花一部分時間工作，就能賺取足夠的金錢來維持一家人的食衣住行。但勞動者還是必須整天工作，因為這是僱主僱用他的目的。這是馬克思價值理論的關鍵點，因為勞動力是一種神奇的要素，能夠以無可取代的方式，為資本家的原物料添加使用價值。勞動者創造的價值除了維持補充本身勞動力，剩餘部分全都歸於僱主，馬克思稱之為「剩餘價值」（surplus value），也就是資本家利潤最重要的來源。[10]

工作換取金錢、金錢換取商品，馬克思透過這些作用來描述資本主義。資本並不能以金錢來概括，滿滿一箱鈔票未必是資本。資本是一種**過程**：將金錢轉化為商品，並以高於工資、機器與原料等成本的價格賣出，來賺取利潤。[11]這個過程產生的資本自成一格，也就是所謂的金融資本（financial capital）。[12]

從資本的定義來看，它似乎並不是什麼壞事。它點出維繫資本主義不可或缺的持續性成長與擴張，點出為什麼經濟人永遠是那麼貪得無厭，也點出一種權力不平等的核心現象：一方是資本的掌握者，另一方是只有勞力可以出賣的民眾。換言之，資本的定義結合了權力、所有權、工作，以及最關鍵的利潤。這些概念不僅可用於釐清價值的難題，也有助於我們設想如何遏制只知追求利潤的市場，從而解除自身的桎梏。

除了勞動之外，價值還有其他的來源。壓低工資也是擴大利潤的方法，勞工維持生存與傳宗接代所需的費用愈低，利潤提升的空間也就愈大。個別的資本家雖然不可能壓低勞動力價格，但他們聯手起來卻是大有可為，本書後面還會詳述。想要繁殖更多勞工，除了讓他們生孩子，還涉及漫長的過程，包含養育、餵哺、穿衣、居住、教育、社會化與訓練等，這些成本可能也代表一種最基本、舉世皆然的價值錯估：市場如何看待女性的家庭工作。女性要養兒育女、打理家務，還要參與公民事務，也就是女性主義者所謂的「身為女人的三重負擔」，這些沉重的工作沒有工資可領，也從來沒有被訂出價格。在一九九五年，全球無工資工作的

產值總額約為十六兆美元，其中十一兆美元來自女性，[13]換算成二〇〇七年的幣值，相當於十五兆美元；在一九九五年，這是全球勞動力產值的半數以上。更糟的是，這種價值錯估並非無心之過，真正原因在於這些和生育相關的工作，都被天經地義地視為女性專屬。而且正因為女性做了這麼多沒有薪資的工作，龐大的有酬經濟（paid economy）才得以維繫。[14]既然女性的工作「不算數」，因此她們似乎擁有「自由」的時間，發展機構藉此解釋為什麼女性能夠「分攤負擔」，在公共服務事業未臻完善的地方挑起重擔。這種性別歧視也蔓延到薪資經濟（wage economy），根據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的調查，大部分國家的女性與男性同工不同酬，薪資只有男性的七〇%到九〇%，亞洲地區的情況更低於平均值。[15]

利潤還有最後一個來源，但是並不涉及勞動：圈占（enclosure）。博蘭尼對於市場社會起源的觀察，並不只是出於歷史的好奇。地理學家哈維（David Harvey）曾經描述，資本家尋求新資源並將其私有化，是如何造就出一幅幅的危機地圖。當一座國有森林的木材被賣進市場、生物多樣性被申請專利、採礦權被拍賣，這就是一種圈占，將資源私有化，讓特定人士獲取利益，廣大民眾卻得付出代價。

馬克思追問價值起源，從而探討經濟現象。他將價值上溯到勞動，然後解析市場社會中追求利潤行為的動態運作。以這種思考方式來觀照市場社會，具有非常強大的詮釋能力，揭示了資本主義的興起過程以及市場社會的社會力運作如何導致外部成本。它也解釋了企業為何總是遊走於倫理與法律邊緣：對利潤的需求造成企業貪婪成性，不顧倫理。然而馬克思也預言，汲汲營營的利潤追求終將導致資本主義走上滅亡之路。

儘管今日的經濟危機情勢嚴峻，不過馬克思的預言尚未應驗。[16]當前經濟亂象紛陳，起因在於人們對資本的投資方式，以及做為金融資本而非產業資本（industrial capital）的資金日益壯大。[17]雖然馬克思比古典主義與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學家更瞭解金融的重要性，但是與他分析相關的政治理念，卻與今日市場社會的意識形態格格不入。面對當前的危機，我們可以歸咎於金融監管失調與華爾街害群之馬胡作非為，也可以看成是源自一個將我們層層包圍的社會體系；前者遠比後者容易。或許正因如此，在解釋眼前的經濟衰退時，另一位經濟學家的理論成為目光焦點，他的年代比馬克思更接近我們，在金融業的運作機制中成長，對當時盛行的市場社會概念只做了溫和的修正，他就是二十世紀英國經濟學家凱因斯。

金融資本的祕密生命

凱因斯的經濟學生涯剛起步時，他還是個新古典主義的狂熱信徒，在一九二〇年代大力宣揚這個學派的優點。然而後來的大蕭條卻使他成為最能切中要害的新古典主義批評者。《就

業、利息與貨幣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中最常被人引用的一段話，對象既是他的同儕，也是他自己：

> 那些自認講求實際、不受任何學理影響的人，往往是某個已故經濟學家的徒子徒孫。那些大權在握、聽到天外傳來聲音的狂人，其實是從幾年前某個學者率爾成章的作品，得到自己的瘋狂想法。[18]

凱因斯探討為什麼像二〇〇八年或一九二九年如此嚴重的危機，其實是經過多年的醞釀。他指出大蕭條期間的失業問題，並不能訴諸新古典主義理論的解釋，歸咎於勞工冥頑不靈，拒絕接受較低的薪資；[19]這種看法更完全不是新古典主義的供應和需求概念所能理解。為了分析失業問題，凱因斯將傳統經濟學乾坤挪移，將焦點從個別企業的行為，轉移到企業家對於風險和不確定性的感受，以及他們如何駕馭資本的流動。

凱因斯之前的經濟學主流，著重研究企業的行為模式，以及價格、利潤與薪資如何產生，主要工具則是邊際效用分析。這些工具雖然能夠解釋個別商品與部門的供應和需求現象，但是碰到比較宏觀的經濟趨勢卻無能為力。凱因斯主張，要理解經濟現象，就必須縱觀不同的分析層面。他與新古典主義分道揚鑣，指出個人在孤立狀態中的合情合理行為，對整體人群

而言卻可能有害無益。一個例子就是「節儉悖論」：經濟衰退時期，個人的合理做法應該是省吃儉用，然而如果每個人都減少消費，經濟的總需求就會下滑，導致衰退更加嚴重，於是我們會更加節儉，形成惡性循環。

凱因斯的觀察與本書對經濟人的討論都顯示，認為世界的運作可以預測、人們會以理性來承擔風險，這樣的假設並不正確。人們並不理性，天有不測風雲。如果未來的情況能夠預知，我們就可以透過慎思明辨來控制自己的非理性。如果我們百分之百理性，規畫經濟時就可以全盤掌握各種可能狀況。只是我們既不先知先覺，也不完全理性，因此面對未來時總是會有盲點，衝動行事也在所難免。在凱因斯看來，這並不是壞事。他以讚許的口氣談到企業家往往憑藉「動物精神」（animal spirits）來做決策，因為「具有正面效益的行為一大部分是出於自發的樂觀，而不是精心算計的期待……可以這麼說，如果我們的決定能夠促成正面的行為，其結果要很長一段時間才會全盤呈現，這種決定大部分都是拜動物精神之賜」。[20]凱因斯認為動物精神是創新的源頭，如果再加上對於未來的樂觀展望，其成就將不可限量。樂觀的動物精神是企業精神的點金石，能夠將鉛塊變成黃金。

然而正因為我們展望未來時會依賴直覺本能，未來的金融運作也會隨著動物精神起起落落，也因此凱因斯才會說「利率是一種高度心理化的現象」，[21]利率是資金的價碼，資金的需求則決定於企業家的心理狀態。當企業家考慮如何投資時，不僅要檢討自己對於最佳收益的

看法，更要評估其他企業家的看法。凱因斯如此描述：

> 專業投資可以比擬為一場由報社舉辦的照片選美比賽，參賽者要從一百張照片中選出六張最漂亮的臉孔，選擇結果最符合全體參賽者平均喜好的人贏得大獎。因此參賽者要選擇的不是自己覺得最漂亮的臉孔，而是最有可能吸引其他參賽者的臉孔，每個參賽者都從同樣角度來看問題。這種選擇既不是發揮個人最佳判斷力的結果，也並不代表真正的一般人看法。[22]

在這方面，凱因斯發現有個國家特別值得一提：

> 就連在金融之外的領域，美國人都會過度關注一般人對於「一般人看法」的看法，這個民族性弱點在股票市場尤其是致命傷。[23]

凱因斯可說是一位市場的社會學家，他對集體心理的瞭解衍生出另一項洞見：在經濟蕭條時期，個人的節儉美德可能是引發通貨緊縮的禍根。凱因斯認為解決之道是由政府出面，扮演私人企業的角色，刺激整體經濟的需求，直到企業恢復生機。

這套觀念最微妙的地方在於，無論政府怎麼做，只要它肯花錢，經濟就會被拉起來。凱因斯打一個比方，如果政府實在缺乏創意，變不出花樣，那就把一桶一桶鈔票深深埋進垃圾堆，這種做法對經濟也有幫助。聽起來或許怪異，不過如此做會招徠想發橫財的淘金客，而挖掘鈔票需要工人，工人需要工資來支付食衣住行，於是供應食物的商人、出租房屋的房東都會有錢可賺，用來購買其他商品。這就是所謂的「乘數效應」(multiplier effect)，政府撒錢救經濟，最後將回收層層累計的收益。就受惠的程度而言，低收入族群高於高收入族群，因為讓很有錢的人更有錢，並不會刺激他們消費；反之，給缺錢的人一些現金，他們會立刻花掉。這也就是為什麼對富人減稅在理念上根本說不通（根據一位經濟學家的估算，美國前總統布希的減稅措施如果法制化，乘數效應只有〇．二三），而美國政府收效最大的振興經濟措施之一，其實是發放食物券（food stamp），乘數效應達一．七三。[24]

凱因斯對於動物精神和公共支出可行性的分析，使他成為當前最受矚目的經濟學家。他告訴我們為什麼自由市場仍然需要政府來振興經濟，因為經濟之中有一種事物無法以金錢換取，卻能夠由政府提供：信心。此外凱因斯也提出一個先前被政治經濟學家忽略的要素：人們不但會被謀取利潤的動機驅策，而且會表現為非理性的行為，而金融資本則會助紂為虐。

為了對治這個現象，凱因斯主張政府要在經濟管理上扮演特殊角色，修正彌補任何個體都無法單獨應付的集體錯誤。正是在這個前提之下，世界各國政府為金融體系提供天文數字

的資金，並且承諾它們會「振興」經濟，讓市場資金恢復流動，就業情況再度好轉。

本書討論到這裡，政府這個角色一直躲在幕後。前面在探討市場社會中的價值問題時，我們主要的焦點是消費者與企業。企業的力量固然強大，在全球前一百五十大經濟體之中占了三分之二；然而企業的運作環境卻是由政府來營造，因此接下來我們就要探究政府與市場社會如何結合。

5. 反經濟人

> 吾等在此立下堅定誓願，這些死者絕非輕如鴻毛，這個國家在上帝庇佑之下，將擁有新生的自由，而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將永世長存。
>
> ——林肯（Abraham Lincoln），《蓋茨堡演說》（*Gettysburg Address*）

儘管領導的國家是奠基於革命性的政府形式之上，然而近代幾位美國總統卻似乎不遺餘力表達對自家政府的蔑視。雷根認為英文中最可怕的幾個字是「政府一定會幫助你們」。柯林頓（Bill Clinton）在一九九六年的國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演講中宣稱：「大政府的時代已經結束。」葛林斯潘從意識形態上排斥政府，不在話下。已經失去多數黨地位的共和黨，近來又將反對大政府的口號推陳出新，提起金融紓困計畫就高喊「社會主義！」談到醫療健保改革就大罵：「納粹思想！」

在美國的通俗文化中，許多人認為從大政府、禁錮商業自由到極權主義之間，有一脈相承的發展關係。然而只有最狂熱的放任主義者才會主張，政府根本不應扮演任何角色。全球金融危機爆發期間，連葛林斯潘都承認政府應該要扮演**某些**角色，他總算跟上其他國家的潮流：一項又一項民意調查顯示，民眾希望政府不僅要解決經濟問題，更要在幾乎每一個領域都有積極作為。

二〇〇八年有一項調查涵蓋全球六〇%地區，五萬名受訪者之中有八一%認為政府應該致力於消除女性受到的歧視，八七%主張政府應該為貧民提供食物（比例最低的兩個國家分別是七〇%的印度與七四%的美國），九二%希望政府提供健保（印度與美國又是墊底），九一%要求政府興辦公共教育（印度六四%、埃及七七%、美國八三%）。[1]

人們認為政府應該負責提供健保和教育，這種想法不足為奇。至少從理論上來看，市場如果完全照自身的機制來運作，健保與教育的價格將會使許多人負擔不起；而且幾乎每一個地區的文化都無法接受，讓人民因為貧窮而無法享有醫療照護與教育。因此政府責無旁貸，必須矯正這種供應體系的缺陷，監督相關的交易行為，並界定交易雙方是公民與國家，而不是消費者與生產者。這種區別非常重要，因為我們期待政府扮演行為動機與經濟人截然不同的「反企業」（anticorporation），透過非市場方法來矯治市場缺陷，體認私人企業視而不見的價值。那麼我們的期望實現了嗎？首先來探討一個醫療照護的實例。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

計，瘧疾每年在非洲奪走的性命超過一百萬人，非洲的年輕人死亡有四分之一是由瘧疾造成。這種疾病是靠一種寄生蟲散播，牠在人類與瘧蚊之間穿梭。由於感染者大部分都是貧民，因此自由市場提供的研究經費少得可憐。

瘧疾的防治工作相當基本，就算缺乏有效藥物，還是可以藉由避免蚊子叮咬來預防。一種不必花多少錢的做法就是以殺蟲劑處理蚊帳，藥效持續三到七年，每一頂成本約三到六美元，可以防止七〇%的蚊子叮咬。世衛組織建議對母親與兒童免費發放，為什麼？因為對於某些全世界最貧窮、醫療經費嚴重不足經費的地方，這是救人性命最省錢的方法之一；另一個原因則是它會帶來「正外部成本」（positive externality）。我們前面已經討論過負面的外部成本，觀察過各種經濟活動對生態與人類造成的衝擊。市場體制對於社會傷害涉及的價值往往視若無睹，對於「正外部成本」這種社會利益的價值同樣也是難以掌握。抗瘧蚊帳的價值遠遠超出其價格，如果交給市場處理，只會減少它能拯救的性命。為了確保有需要的人都能夠得到這種蚊帳，政府應該免費發放。從我們對於免費贈送營利性商品策略的討論可以得知，免費贈送會促使更多人使用抗瘧蚊帳；就算只是收取象徵性的費用，也將使效益大打折扣。

我們對於其他類型的政府行動，也很容易做出類似的論證，尤其是當社會利益遠高於個體利益的時候。今日世界各國政府只要負擔得起經費，就會全面施打兒童疫苗，原因之一在於能夠讓國民免於小兒麻痺之類疾病的威脅，其公眾利益遠遠超過坐視疾病橫行、選擇性接

種疫苗或付費接種疫苗的社會成本。

教育也有類似的情形。提高國民教育程度帶來的公眾利益，遠超過為兒童提供免費教育的商業成本。顯而易見，免學費是確保每一位兒童都能上學的不二法門，而且也有助於降低犯罪率、提高生產力，並培育出更健康、更關心社會事務的公民。根據英國政府國際發展部（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的報告，非洲盧安達當年的動亂造成約一百二十萬兒童淪為孤兒，但是政府致力於全面提供免費的初等教育，讓盧安達的兒童就學率在東非地區名列前茅，從七三．三%大幅成長至九四%，等於增加了五十萬名兒童。[2]

有時候光是免費還不夠。有幾項成效卓著的消除文盲計畫，都是以金錢獎勵送孩子上學的家庭。巴西與孟加拉的計畫則是以現金或食物等誘因，鼓勵家庭讓孩子留在學校。其成果是提升了赤貧民眾的家戶收入與熱量攝取，就學率顯著上升，輟學率直線滑落。[3]在許多國家，免費教育甚至不是選擇性的：初等教育對於社會、對於兒童未來的福祉是如此可貴，因此也是義務教育。

變質的公共財

如此看來，政府及其機構似乎的確能夠矯治市場的缺失，追求國民福祉而非商業利潤的最大化，並將價值受社會重視的事物去商品化（decommodifying）。政府能夠制定經濟的遊戲規則，運用天文數字的預算，為國民提供各種服務。

然而政府的存在並無法與現代資本主義隔離。將企業視為**經濟人**、政府則是**反經濟人**，兩者關係猶如物質與反物質，這種觀念已經淪為一個拙劣的比喻。當企業遇上政府，發生的並不是能量爆炸，而是相互適應。

我們前面討論過，教育和醫療做為商品，其社會福祉高於受惠者個人的利益。在經濟學上，有一類商品不僅其社會福祉高於個人利益，而且在本質上需要透過非市場方式來提供，也就是所謂的「公共財」（public good）。國防是最典型的公共財：如果你為國防出錢，而我一毛不拔，你無法禁止我享有同等的國防保護，你的安全感並不會排除我的安全感。[4]

能夠讓自由市場主義者同意政府應扮演某種角色的領域少之又少，國防是其中之一。然而在政府與企業聯手導致的貪汙腐化中，軍事支出仍然是惡名昭彰的例證。軍人出身的美國前總統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任內最後一次公開演講時特別警告人民提防「軍事—工業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遭濫用的權力一發不可收拾，這樣的風險不僅確實存在，而且是長期威脅。我們絕不能讓這種複合體坐大，危及我們的自由與民主體制運作。」

艾森豪的確有充分理由擔心。他看到資本主義如何挾持政府，挪移公共經費來中飽私囊，

利用民主體制來掩飾罪行。美國在伊拉克與阿富汗兩場不得人心的戰爭，以及全球進行中的數十場鎮壓叛亂行動與數百場「訓練」計畫，在在都顯示軍事—工業複合體不受公眾掌控。軍事承包商在伊拉克的種種惡行，直到最近才被拿出來檢討，而且其策劃者與獲利者大概都不必扛起責任；雖然這個行業與政府關係密切，因此在名義上也必須符合民主規範。惡名昭彰的黑水（Blackwater）保全公司在二〇〇九年二月改名「Xe」，它和同業不僅迂迴前進伊拉克與阿富汗，[5]甚至在卡崔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侵襲過後，受僱巡邏災區街頭。[6]

將安全事務交由民間業者負責的惡質理念，在全球北方（Global North）與全球南方都造成傷害。近年來雖然經濟衰退，但國防支出仍然持續成長，二〇〇八年全球各國總額逼近一兆五千億美元。[7]借用評論家蘭徹斯特（John Lanchester）的比方：如果你每一秒數一塊錢，數到一百萬元要花十二天，數到十億元要花三十一年，數到一兆元要花三萬一千年，相當於人類有文字紀錄歷史的六倍。另一位評論家特斯（Nick Turse）則指出，各國國防部公布的數據，往往低於政府各部門軍事經費的加總：光是美國政府各部門軍事經費的總額，就已超過一兆美元。[8]無論民主程度高於或低於美國，許多國家的國防支出都水漲船高（只不過與美國占全球近半數的規模相比，仍是小巫見大巫）。法國二〇〇九年的國內武器採購，預估將比前一年翻一番；中國的軍事預算上升一五%，印度更擴張三四%。[9]當前世界面臨諸多嚴峻危機，需要的是教育、訓練、醫療，以及對永續發展能源與農業的投資，結果各國政府投

注的破紀錄經費買的不是奶油，而是槍炮。

私人企業與政府在國防領域的利益結合，是否代表一種更廣泛的現象？果真如此，我們將很難期望政府有效控制一心追逐利潤的市場，或者監管想把全世界變成一座利潤競技場的勢力。凱因斯將政府看成一種工具，如果明智運用，可以幫助市場回歸正軌。因此對市場社會法則而言，他的理念與其說是改寫，不如說是補充。然而如果政府這種工具遭到濫用，該怎麼辦？第一代政治經濟學研究者對這個問題憂心忡忡，為了更深入瞭解今日的困境，且讓我們再次向過去求助。

經濟力與政府

古典經濟學理論認為，企業力量最惡劣的展現就是獨占（monopoly）：一家公司完全掌控市場，足以宰制價格變化。但是如果企業本身就是問題呢？亞當斯密注意到某些形態的公司，有本質上的結構問題：

> 然而這類公司（股份公司）的董事是管理他人而非自身的錢財，因此很難期待他們會像私人合夥公司的合夥人那樣盡心盡力……如此一來，疏忽和浪費就成為這類公司在經

營管理上難以避免的弊端。[10]

儘管亞當斯密時代的股份公司，是王室特許成立的獨占性貿易公司，與今日的企業形態非常不一樣，但是他的批評仍然值得參考。當投資人管理的資金並非自身所有，往往比較容易從事投機交易（亞當斯密曾對南海騙局大加撻伐），也更容易熱中於非理性的賭博性投資。經濟學家稱這種現象為「代理問題」（agency problem），資金提供者與管理者會面對不一樣的誘因。

然而，企業力量的問題還要更深一層，不只是股東與執行長的利益分歧而已。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將經濟世界畫分為勞工、地主與商人。勞工的收入來自勞力，地主來自租金，商人來自利潤。在某些方面，勞工與地主的利益和社會利益一致，因為當經濟表現出色，工資與租金都會上漲，兩者各蒙其利。儘管如此，亞當斯密指出，地主通常和真實世界有點脫節，不瞭解自身的利益符合社會利益；勞工也有類似問題，但原因是他們要辛苦工作，沒有時間也沒有受教育的機會。相較之下，商人的情形有所不同：

> 商人的利益在某些方面往往和公眾利益不同，有時甚或相反。擴張市場與縮小競爭，都符合商人的利益。可是前者雖然通常對公眾有利，後者卻必然損害公眾利益。縮小競爭讓交易者得到超乎正常水平的利潤，卻讓廣大民眾承受極不合理的負擔。因此只要是商人階級建議的新法律或商業法規，我們都應當慎思明辨，以一絲不苟、滿懷疑竇的態度來進行審慎的長期檢查，否則絕不採用。商人的利益從來不會和公眾利益完全一致；大體而言，他們的利益在於欺騙公眾，甚至壓迫公眾。而且事實上，公眾也經常為他們所欺騙與壓迫。[11]

亞當斯密點出一個結構性的原因，解釋為何經濟體制的正常運作會養虎貽患，製造出一群人來劫持體制本身。一旦這些「交易者」掌控了經濟的命脈，公眾就不能信任他們。正因如此，亞當斯密認為政府在這方面應該扮演強而有力的角色，從懲罰欺詐、監管金融、提供相關教育到維持運作秩序，都是政府的職責。

然而我們也有理由相信，企業會汙染政府。馬克思與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認為政府已經被商人階級牢牢把持，以至於行政部門淪為「處理資產階級一般事務的委員會」[12]。這樣的觀點出自《共產黨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或許不足為奇，但馬克思與恩格斯其道不孤，二十世紀阿爾及利亞哲學家與精神病學家法農（Frantz Fanon）也看出來，這是新近獨立國家政府的共同命運，宰制它們的「國族資產階級」（national bourgeoisie）帶著促進民主與國家發展的承諾上臺，然而實際推行的政策卻與前朝殖民主子大同小異。

富裕階層的利益會成為世界各國的施政方針，並不是歷史發展的意外轉折。其實我們的政府在設計上，就是秉持這個概念。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漢彌爾頓（Alexander Hamilton）在《聯邦論》（*The Federalist Papers*）第三十五章寫道：

> 除了少數例外，工匠和製造商總是傾向於選舉商人來代表他們，而不願推選自己的同業……他們知道商人在本質上是他們的保護者與盟友，也知道無論他們對自己的明智多有信心，由商人來增進他們的利益還是比較有效率……因此我們必須認定，對這些社會階層而言，商人是理所當然的代表。[13]

認為政府最好交給企業界人士掌管，並不是漢彌爾頓獨有的想法。人們普遍相信某個特定階層可以代表全體社會的利益，法國十九世紀哲學家孔德（Auguste Comte）就主張將社會托付給銀行家。縱觀全球各國兩院制國會的上議院，可以看出權力運作的重心：從美國的聯邦參議院到英國的上議院，工人階層出身的議員少之又少。各國的上議院通常被視為一股較為平和、明智的力量，參與政府決策工作。然而哪些條件可以造就明智的上議院？答案似乎是：議員的資產多多益善。

這也連帶解釋了為什麼國會上議院經常被人稱為「富豪俱樂部」，這類機構讓富裕階層得以監控較低階層的要求，必要時加以否決。不過所謂的「較低」階層其實也沒有多低，以美國為例，參、眾兩院的差距正逐漸縮小，目前大約有半數參議員是百萬富豪，眾議員的比例則是四分之一。這種現象對政策制定的影響顯而易見。

想像一下，如果政府最重要的部門被企業界與金融界接管，會是什麼光景。首先賦稅結構會受到影響，窮人的邊際稅率（marginal rates of tax）將高於富人，企業要比一般人更能逃稅。在美國，這種情況已經發生：企業法人繳納的聯邦所得稅占總稅額的比例還不到四分之一（其餘七六%由有血有肉的自然人負擔），國稅局稽核百萬富豪的頻率現在只有二〇〇七年的一半。[14]巴菲特（Warren Buffett）對自家公司進行內部稽核之後發現，他繳納所得稅的稅率遠低於公司的祕書與接待員。巴菲特說：「我承認這是一場階級戰爭，發動戰爭的一方是我這個階級，而且我們旗開得勝。」[15]對富裕階層而言，類似的優惠不勝枚舉，隨處可見，從壓制勞工的就業法規，到碳總量管制與交易體系（carbon cap-and-trade system）；從讓私人企業管理公共資源的環境法規，到政府對金融機構的紓困。[16]

偉大的法國歷史學家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曾經分析政府如何被企業與富人接管，並以三層蛋糕圖來說明經濟與政府其實是共同運作。最底層的民眾是為了生存而不眠不休工作，每天都得努力維持生計。再上一層是「市場經濟的樂園，不同市場進行頻繁的橫向溝通：某種程度的自動協調將供應、需求與價格連結在一起。與這一層平行——或者應該說更

高——的一層是反市場（anti-market），大型掠食者在這裡橫行霸道，叢林法則主宰一切。從古至今，從工業革命之前到工業革命之後，這一層都是資本主義真正的歸宿」。[17]換言之，企業資本主義與真正的自由交易水火不容。如果你支持分權式市場（decentralized market）以及由需求決定的交易，那麼當代資本主義不會是你的選擇。既然如此，你還有哪些選擇呢？

反制運動從何而來？

對市場社會而言，政府並不是高高在上，而是內嵌其中；近年來的經濟危機已經充分證明這一點。一項跨國調查顯示，六三%受訪者認為政府是為「大型利益集團」服務，相信政府是為民眾服務的人只有三〇%。在幾乎每一個國家，[18]受訪者都希望政府的施政能夠強化對民眾要求的回應。英國廣播公司（BBC）一項涵蓋兩萬九千多人的跨國調查顯示，三分之二受訪者表示國際與國內的經濟體系必須轉型。[19]改變的時刻已經到了。

不過我們也不能忽略比較黑暗的一面。在各國政府統治之下的人們，也就是你和我，也同時隸屬於市場社會。我們不可能前往一個不受周遭世界影響的烏托邦，找到某種恆久不變的真理，讓它帶領我們邁向更光明的未來。博蘭尼筆下的第二運動，並不單純只是要逆轉市場勢力的擴張，史賓翰連法也並不主張回歸封建體制。其實第二運動是源自人們現有的政治

資源，也因此才會有所謂的**反制**運動理念。博蘭尼的《鉅變》成書於反法西斯主義鬥爭期間、大蕭條經濟崩潰之後。他非常清楚社會如何因應經濟崩潰：排除異己與沙文主義。不假思索地追求改變，只會讓我們重蹈歷史覆轍。

市場會出現「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社會也可能發生「社群失靈」（community failure），導致少數族群受到迫害，甚至陷入更惡劣的待遇。從印度、歐洲到美國，近年來世界各地極右派政黨的崛起，也可以視為另一種雙重運動的第二階段。美國白人權益促進機構全國政策中心（National Policy Institute）主席安德魯斯（Louis R. Andrews）期望看到「共和黨先毀滅再重生，成為一個代表白人利益而非企業菁英利益的政黨」，[20]並表示這就是他在二〇〇八年總統大選時投票給歐巴馬的原因。

如果你希望社會變革不要重回排除異己的政治形態，而是讓理應民主運作的政府不再被企業界利益挾持，那麼你就應該做一番深入的探討。我們並沒有一個阿基米德支點可以讓價格精確反映周遭的世界，同樣的道理，我們也沒有一個自然的前社會（presocial）狀態來讓政治運作。近來有個日益受到歡迎的理念，認為我們不應該繼續把自己視為消費者，而應該選擇成為公民。這樣的主張值得讚許，但是深入檢視就會發現，「公民」的概念無所不包，和「變革」、「希望」一樣空洞。人類歷史上有幾個最倒行逆施的政權，其基礎正是特定的公民權理念。當然，我們不必因為獨裁者會拿它來當幌子，就認為公民權理念已經不具價值；但是如

果有人以公民為名呼籲你採取行動，恰當的回應是反問：「哪一種公民？」

有人認為，進步政治的基礎在於讓人類得以形成物種的要素：人性。這種看法雖然帶有重要的平等精神，但是本身並不足以推衍出明確的政治原則。對於我們同為人類的觀照，是生物事實而非政治事實。為了從共通的人性汲取出政治形態，我們首先必須釐清人性的意義。兩位西方政治學思想的奠基者曾經深入研究這個領域：霍布斯（Thomas Hobbes）與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人造人的問題

霍布斯的《利維坦》（*Leviathan*）在前面幾章詳細列舉了人性特質，最重要的是競爭性、驕傲以及對榮耀的渴望。霍布斯將這三項特質當成基本假設，像幾何學家一樣建立他的人類與社會理論模式，但結果並不樂觀。他擔心的問題之一是資源衝突：「如果有兩個人欲求同樣的事物，而且無法共享，他們就會變成敵人。」然而欲求和欲求激發的敵意都有可能受到控制，前提是要有一股「令人們敬畏的力量」，也就是某種比任何個人的自然傾向更高明、更強大的力量。如果欠缺這股力量：

> 產業將不復存在，因為其成果並不穩定。如此一來，舉凡土地的栽培、航海、海外進口商品的運用、舒適的建築、移動與卸除需耗費巨大力量物體的工具、地貌的知識、時間的記載、藝術、文學與社會，都將不復存在。最糟糕的是，人們將長期處於暴力死亡的恐懼和危險之中，生活淪於孤獨、貧困、卑汙、殘忍而短壽。[21]

這就是為什麼霍布斯會認為，自然的狀態就是戰爭的狀態。避免戰爭之道則是「利維坦」，一個能夠抑制人們反社會行為的政府。霍布斯相信，人們如果合作運用理性，創造出一個「人造人」（artificial person）——也就是政府，將可以為人性帶來兩種人類自然狀態缺乏的美德：自制與合作。

盧梭則將霍布斯的理論反轉過來。儘管他和霍布斯一樣，都相信人類基本上具有反社會傾向；但他並不認為人類的欲求是無底洞。盧梭指出人們有可能感到「足夠」，滿足感可以經由學習獲致；人們一旦設法控制住本能與衝動，顧全自身與社會的最佳利益，就能夠獲得真正的自由。對盧梭而言，此一過程是自由的泉源，正好與葛林斯潘的持論相反。盧梭也進一步主張，「人造人」其實也具有霍布斯在人類自然狀態中看到的特質，企業與政府也會惡形惡狀、殘暴不仁。更糟的是，人造人不必吃飯睡覺，也不會死亡，因此他們永遠不會滿足，更令人擔心。

對永不滿足的非人類怪物感到憂心，盧梭並不是第一人。幾乎每一個文化傳統都會有警惕人心的故事，開端都是這類怪物如何貪得無厭，例如今日加拿大與美國西部原住民文化中的「瘟地苟」（Weendigo）傳說。[22]瘟地苟是一種飢腸轆轆的巨大妖怪，血盆大口，咬牙切齒，喝下的每一滴人血都令它更為飢渴。瘟地苟會同類相食，欲望是它的生活中心，為了求生存，連同類都不放過。原住民講述瘟地苟的故事是要提醒族人，如果在收穫季節大吃大喝不知節制，到歉收的季節時，大家就得勒緊褲帶。也就是說，在今日消耗過量的糧食，等於是在未來殘害自己的族人。研究奧吉布瓦人（Ojibwe）的學者強森（Basil Johnston）指出，瘟地苟不但確實存在，而且非常猖獗。北美洲沒有多少人看過這種巨大的怪物，但是許多人都見識過它在現代的化身，它們多半只關心如何滿足眼前的欲望，甚至不惜犧牲未來的需求。在強森眼中，跨國企業就是現代的瘟地苟。

其他文化也有這類永不滿足、永遠痛苦的怪物形象。泰國與日本的佛教徒都熟悉餓鬼的故事，他們生前貪得無厭，死後化為腹大如山、喉細如針的怪物，無時無刻都處於飢餓狀態。貪婪的人並不是看不見周遭的世界，而是完全從自身的欲望出發，完全不在乎自己造成的傷害。歐洲不讓亞洲與美洲專美於前，也有類似的怪物。馬克思討論資本主義的徒子徒孫時，也直接引用相關的意象。在他看來，資本主義會繁殖出吸血鬼。

盧梭幫助我們瞭解這些永不滿足的人造人，也就是經濟人、企業與政府。他認為市場社會中的人造人可能會形成問題，但他並不直接主張廢除政府或經濟組織。體制、組織與政府永遠存在，而且相當重要，因為它們會幫助我們社會化，集體合作達成單打獨鬥難以企及的目標。這些人造人的欲望如果無法節制，就可能造成威脅。如果它們被劫持，我們倚賴它們來觀照外在世界的部分也會被劫持。我們會成為哪一種公民決定於周遭的體制，反之亦然，人造人永遠不會是中立的。

這種情形讓我們無所依憑。這世界並沒有一種歷久彌新的政治形態，能夠讓我們從自然人性取材，營造一場反制運動來對付自我管制的市場；也沒有一處神聖的空間，可以讓我們發起政治的回應。我們必須從現狀出發，利用既有的政治形態。艾略特（T. S. Eliot）說得好：「成功是相對的：它決定於我們把事情搞砸之後，能夠收拾殘局到什麼地步。」[23]為了理解當前的亂局，我們必須思考市場屬於哪些領域、不屬於哪些領域，再次回溯現代市場社會的草創時期。市場與特定的政府形態有如雙胞胎，但是現代市場社會誕生五百年來，它的興盛已經扼殺了其他形態的經濟與政府。這是一場漫長的戰役，各方針對維持人類生存並讓生命得以興盛的基本物資，爭奪控制與決定價值的權力。

在我們所謂的「現代國家」（modern state）出現之前，曾經有過其他形態的組織；在現代國家消失之後，也會有新的組織取而代之。這些過去與未來的組織，有些將比現代國家更為民主。能夠壯大的組織都必須設法讓政府以永續且公平的方式，來管理「免費」的事物。未

來的政府若想成功，必須借重過去公共領域的政治形態，訴諸舊日決定事物價值並相互分享的方式，其名稱別有深意：「共有財」（the commons）。

共有財做為一種管理世界的方式，近年來再度風行，受到愈來愈廣泛的肯定。二〇〇九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歐玲（Elinor Ostrom）獲獎的部分原因，就在於她對於共有財的研究。[24]理解歐玲研究什麼最迫切的最佳方式，就是去看看那些急迫的、在照護今日共有財的價值政治。[25]我們將會發現一個弔詭的現象：當民主體制中的免費午餐減少，反而可以帶來更多真正的自由。

6. 人人都是共有財的共享者

依照常理，發明事物的人應該會從其中得到益處，而不是受到傷害。

——盧梭，《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礎》（*Discourse on Inequality*）

我最初三次聽到「commons」這個字眼的時候，根本摸不著邊際。第一回是媒體在報導英國國會時提到「House of Commons」（下議院），我以為「Commons」指的是一群有錢、酗酒的白種人。第二回是在一九七〇年代英國一部兒童電視劇《翁布爾家族》（*The Wombles*），劇中有一群毛茸茸的東西在「Wimbledon Common」（溫布頓公地）偷偷摸摸玩各種資源回收的把戲；於是我想像「common」是一個特別的地方，翁布爾搬來各種有趣的東西，放進洞穴，重新利用。第三回聽到時我正在紐約度假，家人說如果我們想體驗真正的美國生活，就一定要去紐約市郊占地廣大的「Woodbury Common」（伍百利特價商場），像真正的美國家庭一樣

購物消費（我買了一件印有美國國旗的運動衫），於是我以為「common」在美式英語中指的是購物商場。當時我完全沒有想到，「common」不僅可以是某個地點，更可以當做一個動詞，描述我們如何衡量事物的價值並相互分享。

雖然「commons」多半讓人聯想到英國及其殖民地，但是做為地點與過程的「commons」（共有財）也見於從中美洲到南亞的社會體系，最近更出現在網際網路。共有財是一種資源，最常見的形態是土地，包含土地本身，以及人們分配出自土地的財貨的方式。共有財為使用者提供食物、燃料、水與藥用植物，它是赤貧民眾的維生系統。共有財在英格蘭會成為「鉅變」的發源地，這正是主要原因。要衡量一項事物的價值，首先要界定這項事物，並且制定社會使用它的原則。共有財的使用原則在本質上與資本主義格格不入。人們將公有土地轉化為私有財產之後，不僅土地變成一種商品，鄉村貧民也失去唯一的生存憑藉，於是被迫出賣自己僅存的資源：勞力。共有財的圈占催生出兩種支付方式：租金與工資。

然而今日世人對於共有財的普遍理解，卻與這段歷史南轅北轍。例如打開《牛津英語大辭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common」的定義是：「屬於當地社會全體成員、所有權尚未分割的土地，因此通常也是未被圈占或者『荒廢』的土地。」[1]整個鄉村土地被圈占與剝奪的歷史，被字典編纂者以「因此」（hence）一語帶過。然而這部字典只是反映當代的思維，這種思維衍生出晚近人們對於共有財變成荒地過程的詮釋。今日的共有財理念多半涉及它的荒

廢，它的「悲劇」。

「共有財的悲劇」（tragedy of the commons）一詞來自微生物學家哈定（Garrett Hardin）一九六八年發表於《科學》（*Science*）期刊的一篇論文，文中探討當人們爭取稀有的資源時會發生什麼情況。[2]這場悲劇的主要角色，其實也是唯一角色——經濟人——我們之前已經見過。哈定認為當人們面對共享的資源，自私自利的欲望將使他們拚命消耗資源，儘管知道這麼做會摧毀資源。因此在資源貧乏的世界，人們受到自我滿足的動物性驅使，將會毀滅生存的憑藉。霍布斯對此早有先見之明。然而哈定並沒有舉出任何足以佐證其見解的實驗或觀察，也無視於共有財被圈占的歷史背景。只是儘管如此與歷史割裂，這篇文章仍然成為二十世紀最常被引用的思想作品之一。

哈定勾勒的世界在許多方面很像今日的世界，經濟衰退讓我們摧毀世界的步調快馬加鞭。如果你想知道什麼叫做悲劇，可以看看剛果人民如何爭先恐後開採鈷鉭鐵礦；或者世界各地農民在土壤肥沃度被單一作物栽培（monoculture）耗竭之後，如何拚命使用非有機肥料。哈定的觀點也得到一批環保人士的共鳴，「地球之友」（Friends of the Earth）就認為他的文章反映了他們的憂心，並於一九七二年將他送入「環境名人堂」。[3]

然而我們更深入探討就會發現，哈定的理論是將責任推到受害者頭上。問題並不在於人類是否已陷入環境嚴重破壞的困境——我們已經闖下大禍，無庸置疑。一項由世界各

國一千三百六十位科學家參與、歷時五年的「千禧生態體系評估」(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全面評估人類對自然界的影響,結果每一項評估指標都顯示,我們正在摧毀地球。真正重要的問題在於動機。共有財悲劇的邏輯架構是基於一種世界基礎模型,認為人們會讓自私自利的本性壓制較為理性的判斷。這個世界與職業經濟學家鼻祖馬爾薩斯(Thomas Malthus)《人口論》(*Essay on the Principle of Population*)的描述相去不遠。馬爾薩斯認為人口的悲劇在於,無論在什麼地方,人口一定會超出資源能夠養活的範圍。我們不難看出如何以共有財的悲劇來解釋人口問題:窮人在欲望驅使之下繁殖後代(就算知道後果不堪也無法克制),導致糧食供應不敷所需,這正是饑荒發生的原因。

不難想見,哈定是人口控制政策的堅定支持者。他和許多人一樣,相信要解決環境惡化、饑荒、氣候變遷這些問題的不二法門,就是要阻止窮人繁殖後代。然而這種觀念其實是誤解了問題本質。今日世上饑荒現象的成因,絕對不是糧食產量養不活所有人口。當前全球生產的糧食可以餵飽一點五個地球的人口,之所以還會發生饑荒,問題出在我們將糧食視為私人財產,透過市場進行分配,讓負擔不起的窮人淪為饑民。就算全球人口減少,但只要我們分配糧食的方式不改變,窮人還是會繼續挨餓。這並不是說女性不應享有生育自主權,正好相反,開發中國家降低生育率最好的方法,就是讓年輕女性接受教育;而且自費(fee-for-service)教育模式的受害者之一,也正是被擋在學校大門之外的女性。[4]

哈定的悲劇之所以是誤解誤導,與這種現象有密切關係。對於當代和古典的馬爾薩斯信徒,人類是如此貪婪、冥頑不靈、熱情如火、容易衝動,因此終將走向毀滅。然而我們也看到,這種行為模式的忠實信徒不是一般人,而是企業,它們要滿足獲利動機。兩者的差異有助於我們瞭解更深一層的共有財悲劇。

漁業可能是最常被提及的共有財悲劇案例。[5]相關論述認為,小規模作業的漁民總是想盡辦法捕撈到最多的魚貨,儘管知道這麼做是竭澤而漁,會讓他的生計崩潰。目前世界各地有多處漁場正急遽枯竭,《科學》曾刊出一篇論文,預測全球漁業在二〇四八年崩潰。[6]然而將漁場枯竭視為共有財悲劇,其實是一種誤解。人類從事漁業已有幾千年歷史,各地漁村的溫和發展無法解釋漁場為何走向毀滅。在許多地方,漁業的共有財並不是被過度開發,而是被強行接管。國際開發非政府組織「行動援助」(ActionAid)的一份報告提供了鮮明的例證。

巴基斯坦約一千公里長的海岸魚產豐富,魷魚、鯖魚、蝦子、鮪魚和幾十種魚類,數百年來養活了無數小規模作業的漁民,莫塔尼(Abdul Majeed Morani)就是其中之一。巴基斯坦像莫塔尼這樣的漁民大約有十八萬人,然而過去十年來,莫塔尼和村民眼睜睜看著漁獲量直線滑落。當地漁民組織「巴基斯坦漁民論壇」(Pakistani Fisherfolk Forum)發現,漁獲減產幅度高達七〇%到八〇%,導致阿拉伯海沿岸漁村饑荒、負債、貧窮的情況日趨嚴重。[7]為什麼?為什麼當地漁民以永續方式捕撈了數百年,漁場仍然會枯竭到這種地步?

根據當地人所說，漁場枯竭的始作俑者是多年前的巴基斯坦軍政府。當時軍政府急於擴大出口，放寬對於外國大型拖網漁船的限制。巴基斯坦最早是在一九八二年開放外國漁船進入本國海域作業，二〇〇一年修改規定，准許部分外國漁船進入離岸三十五海浬的海域。現在只有最大型的外國拖網漁船被擋在三十五海浬之外，小一號的拖網漁船可以在十三海浬到三十五海浬之間作業，十二海浬之內的海域理論上保留給當地漁民。官方資料顯示，政府在二〇〇七年分別發給跨國公司二十一艘大型與二十三艘中型拖網漁船，[8]然而據當地漁民觀察，每年有一百多艘外國漁船在沿岸海域捕撈，其中許多來自外國與本國合資的公司，打著「本國」漁船的旗號，大剌剌進入十二海浬海域作業。當地漁民指責政府怠忽職守，官商勾結，對違規業者視若無睹。

大型拖網漁船和當地漁船不同，它們可以全天候作業，漁網拖曳長達三公里，一路搜刮無遺。巴基斯坦漁民論壇指出，這些拖網漁船的漁獲僅有一〇%具有銷售到國際市場的價值，其他九〇%都丟棄了事，比例高得嚇人。而且縱觀國際漁業情況，雖然有些漁場管制嚴格，但是混獲（bycatch）占全球漁獲約四〇%。[9]

巴基斯坦漁村的漁獲銳減，讓女性受到不成比例的衝擊。漁網和魚簍的編織以及魚乾的製作與銷售，傳統上都是女性的工作，如今生意冷清。根據行動援助組織的報告，許多漁村婦女因此被迫轉業，到當地的紡織工廠或者大型蝦子加工廠謀生，忍受危險的工作環境。

巴基斯坦有句諺語：「當你走投無路，大海總有生路。」目前看來還算部分正確。漁獲儘管銳減，仍然持續供應，只是供應的對象改變。[10]巴基斯坦的海洋共有財並不是被貪婪的當地漁民耗竭，而是遭到跨國企業利益集團圈占，政府則是助紂為虐。這些利益集團不必擔心自家財源沒有著落，因為國際漁業市場已經自由化，一旦巴基斯坦漁場枯竭，它們的拖網漁船就會轉進產量更豐富、更有利可圖的海域。然而巴基斯坦從事傳統漁業的家庭並沒有這種自由，只能繼續守著愈來愈匱乏的漁場。

巴基斯坦漁村的故事代表一種更廣泛的現象，一段更長遠的歷史。縱觀二十世紀幾場重大的環境災難，我們看到的並不是一般人的胡作非為。從美國的乾旱塵暴區（Dust Bowl）到雨林與海洋生物的大規模滅絕，這些環境悲劇的禍首都是企業，以及資本主義化的農業、林業和漁業。塵暴區之所以會出現，是因為人們雖然非常清楚土壤表層的重要性，然而資本主義農業引進之後，他們開始剝削自己賴以為生的土地，以短視近利的心態與周遭世界連結。

共享共有財（commoning）涉及建立社會關係網絡，其宗旨是抑制我們較低層的欲望，並且孕育出衡量事物價值、建立人際關係的不同方法。圈占帶來的毀滅性後果，不僅見諸自然環境的累累傷痕，也影響了最私密的性別社會關係。當社會衡量工作價值的方式有所改變，男性和女性的社會角色將隨之變化。在世上某些地區，不願屈服於新秩序的人正遭到迫害，這種迫害有個古老的名稱：「獵巫運動」。

排斥共有財

二〇〇九年，天主教教宗本篤十六世訪問非洲，惹出不少爭議。首先他宣稱保險套只會讓愛滋病疫情更加惡化，後來又說非洲人「生活中充滿了對於妖魔鬼怪、邪惡力量的恐懼。他們滿懷疑惑，甚至將街頭流浪的兒童與老人視為巫師」。[11]這種醜化手法將非洲描述為一個野蠻迷信、等待救贖的地方，救贖方式則視醜化者的信仰而定，可以是耶穌基督的諄諄教誨，也可以是自由化企業大肆擴張帶來的全面開發。當然，兩者之間有某種程度的關聯。非洲和美洲一樣，亞洲也類似但程度較輕：基督教傳播的一大助力，正是追求財富的殖民武力。

歷史學家與社會科學家費黛瑞琪（Silvia Federici）寫過一系列鞭辟入裡、發人深省的文章，指出巫術在非洲的興盛正逢土地掠奪與私有化大行其道，而且其間的關係並非巧合，[12]十五世紀到十七世紀歐洲獵巫運動猖獗時期，也曾出現類似的關聯性。歐洲的巫術審判到底殺害了多少人，確實數字不得而知。在獵巫重鎮沙弗伊（Savoy）地區，審判文件會掛在被定罪女性的脖子上，一齊焚燒。保守的估計顯示，歐洲各地大約有四萬人到六萬人死於巫術審判，[13]大部分都是女性。費黛瑞琪認為，這種現象與女性社會地位的急遽改變息息相關。

費黛瑞琪指出，獵巫運動背後的政治是一種新的世界觀，排除了那些堅持自己有權決定土地價值、有權分享共有財的女性。[14]許多女性是因為捍衛共有財免於圈占，才被誣指為女巫而遭處決。圈占並不只是占有一塊一塊的土地，它還涉及「扣押」一整套政治程序，以新的程序取而代之，以新的方式排除女性的參與。雖然獵巫行動並不全然是要打壓捍衛共有財的行動，但是都與更深層的政治鬥爭相關。今日我們談到使人們忽略更重大政治陰謀的集體歇斯底里時，仍會使用「獵巫行動」這個比喻，絕非偶然。[15]

想要瞭解今日的共有財，不妨先從現代資本主義的搖籃——封建時期的英國——開始，探討《大憲章》（Magna Carta）的姊妹作《森林令》（Charter of the Forest）。《森林令》在今日罕為人知，但是它確保共有財的共享者擁有放牧牲畜、耕耘土地、取得木材、採集蜂蜜、使用藥草、搜尋食物等權利。當代研究《森林令》首屈一指的歷史學家藍保（Peter Linebaugh）在《大憲章宣言》（*The Magna Carta Manifesto*）一書中指出，共有財權利確保了每一個人永遠都有使用地方資源的自由。[16]但這並不意謂每個人都可以予取予求，哈定的想法是錯誤的，也不符合歷史事實。共有財運用的確切方式，是在特定地點、時間透過商議而成形，決定於當地自然生態與社會情況。人們共享的權利會與時俱進，因應商議者的力量變化與共有財的地理變化。換言之，共有財既是一個地方，也是一個「自由的過程」，人們在其中爭取如何分享共有財的決定權。

要注意的是，我們不應將相關的理念浪漫化。共有財的運作並不是發生在某個原始民主的伊甸園，讓每個成員享有一視同仁的發言權。共有財是貴族與農奴長期鬥爭的戰場，窮人

曾經打贏幾場勝仗，反抗壓迫者並爭取到公共空間的使用權。《大憲章》本身代表一道楚河漢界，遏阻了英王約翰的貪婪行徑；他為了支應十字軍東征與法國戰爭的軍費而橫徵暴斂，無惡不作。他向貴族收重稅、竊占森林、扣押兒童當人質，甚至將第一任妻子「格洛斯特的伊莎貝拉」（Isabella of Gloucester）以兩萬馬克（mark）賣給艾塞克斯伯爵（Earl of Essex）。[17]貴族發動叛變，一二一五年進軍倫敦，兵臨城下時城門大開，顯示市民對他們的支持。他們向約翰王攤牌，並以強硬姿態展開談判。《大憲章》固然代表貴族、商賈與倫敦富人的要求，但也為平民權利建立強而有力的保障，讓平民得以獲取糧食、燃料、自由與森林物產，將約翰王竊占的自然資源歸還大眾。歷史學家以這樣的共有財來駁斥哈定的論點。和哈定的預言正好相反，人們面對稀少的資源時，會想出辦法來管理與維持，王公貴族則是設法將資源納為己有。如果一定要將「共有財」與「悲劇」連結起來，那麼噩夢的起點不是共有財的誕生，而是它遭到摧毀、被化為私有財產的過程。

圈占行為讓英國平民再一次失去土地，有時蠶食，有時鯨吞（例如一五三六年英王亨利八世解散寺院）。土地測量人使用名為「魔鬼之腸」（devil's guts）的鏈條圍繞公有地，將所有權歸入個人名下。除了農地之外，森林和水域也難逃被圈占的命運，貴族禁止平民進入漁產豐盈的池塘溪流和獵物眾多的森林，窮人的肉食來源因此斷絕。到一五〇〇年時，圈占行為囊括了英國四五%的可耕地，而且有了新的說詞：不僅要為地主提供私有土地，還要幫他們

提高土地的租金。[18]

無庸贅言，這種竊占資源的行為讓人民怨聲載道，引發許多反抗事件，有小規模的拒絕服從（阿倫戴爾勳爵〔Lord of Arundel〕一夜之間損失一百隻天鵝，殺戮者的目的是要警告富人），也有大規模的叛亂，例如一三八一年的農民暴動（Peasants' Revolt）、十七世紀中葉的耕地人（Diggers）。這些行動全都遭到鎮壓，而且由於圈占奪走了農民唯一的謀生之道，他們只剩兩種選擇：為新地主賣命，或者到城市裡試試運氣。到了亞當斯密著書立說的年代，圈占過程已經告一段落，但他仍悲嘆私有財產的擴張導致平民遭受暴力對待：「當土地屬於公眾所有時，對於森林的木材、田野的牧草，以及大地自然生成的各種果實，勞動者只需花費時間力氣就可以採集……但是現在他必須付錢才能得到許可，還得將採集或生產成果的一部分交給地主。」[19]這些生計沒有著落的農民，在短短一個世代之內淪為無產階級，充當英國工業革命的骨幹。

當然，圈占絕不是英國特有的現象。當資本主義在歐洲站穩腳跟，殖民者也在海外大開殺戒、推動商品化。「野蠻」是殖民主義的通關咒語，不僅打開了從愛爾蘭到澳洲有如阿拉丁寶藏的土地資源，更將人類身體轉化為可以買賣的物品——超過一千萬非洲人被送上「中央航道」（Middle Passage），淪為奴隸。美洲殖民活動開始一百年後，七千五百萬人死於非命。[20]殖民者圈占時除了直接殺戮之外，也營造出一套論點與理由，辯稱自身的行為合乎

文明規範。為圈占提供理論依據的不是別人，就是今日被公認為自由主義宗師的洛克（John Locke）。洛克對於人類擁有生命權、自由權、財產權等三種自然權利的主張，[21]後來也見於美國《獨立宣言》，只是將財產權改成「追求幸福之權」。

洛克曾經先後擔任英國貿易與開墾委員會（Board of Trade and Plantations）、卡羅萊納貴族與特許地主會議（Lords and Proprietors of the Carolinas）的祕書，因此在思想層面與財務關係上，都有必要為自家組織擴張土地面積找尋藉口。洛克從兩個層面申論為何「無人擁有」的土地應該轉化為私人產業。首先，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勞力，因此只要是付出勞力來耕耘開墾的人，就可以擁有土地；沒有妥善利用的土地，理所當然會成為被圈占的對象。其次，只要每個人都能得到「足夠的好處」，就可以將公地變成私地。

儘管英國人在美洲搜刮各種財產，動機完全出於自私自利，然而財產與所有權的理論依據卻是一條重要線索，讓我們看到不同的市場體系如何運作。私有財產存在的前提是，社會必須同意這些財產從公眾轉移到私人名下。換言之，財產是一種社會產物。以土地為例，有些人可以禁止別人使用土地，這種做法絕對不是天經地義。事實上，分享共有資源的權利遭到廢除，曾經讓一位年輕的德國思想家走向極端；當時他剛離開學術崗位，從事新聞記者的工作。他的政治理念原本接近樂觀派的自由主義，我們不妨把他想像成一個十九世紀的《連線》雜誌讀者：相信只要有自由運作的新聞業與功能正常的國會，人類前途將一片光明。然

而兩件事改變了他的觀點。首先是他親眼看到地方議會如何辯論萊茵蘭（Rhineland）農民到森林收集木柴的傳統權利。第二件事則是普魯士新聞檢查當局，不費吹灰之力就關閉了他的報社。這些事件促使馬克思開始思考財產在政治與社會的核心地位。

一個人不必是馬克思主義者，也可以看出財產的社會性。政府處理廣電頻道的方式就是一個例子，頻道掌握在政府手中，媒體業者向政府購買在特定頻道播出節目的權利，並且必須符合特定的社會目的。如果業者播出的節目有猥褻之嫌或不恰當，就會遭到罰款處分。如果它們屢勸不聽，甚至會被吊銷使用權。規範人類對待動物方式的法律，則是另一個例子。[22]大部分國家的法律都允許人民將動物當成財產，不過仍有一些限制，例如不得以殘酷行為虐待貓狗。拿破崙法典對其他私人財產也有類似規範。例如土地可以為私人擁有，但前提是擁有者要善加利用。一旦土地荒蕪，或者地主只想投機炒作，其所有權就會被收回，移交給能夠善用的人。換言之，財產權可以更有彈性，遠超過我們今日的認知。

然而看看北美洲的狀況，當土地的社會角色決定於英國殖民者的標準，原住民的日子就難過了。儘管原住民的狩獵技巧與自然環境水乳交融，而且經常能夠提升環境的品質，但是他們無法向土地掠奪者證明這一點。白種人看到肥美的土地每年只有一小段時間被原住民利用，不瞭解這代表一個更廣大的永續放牧體系。某些部落確實有永久農業（permanent agriculture），使用先進的生態農業方法來開墾大片土地，維持土壤肥沃度與生態完整性，玉

米、菜豆、南瓜（又稱「美洲原住民農業的三姊妹」）的間作（intercropping）就是一個例子。這些部落和今日全球南方許多地區一樣，女性種植養活一家人的糧食作物，男人出外狩獵。英國人無法理解這種完全由女性主導的農業，因為英國女性的工作局限於非商業性的家務事。因此殖民者認定原住民女性的種植不是農業而是園藝，然後霸占她們的土地。

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原住民經濟體系，遭到各種形式的攻擊。當地許多原住民文化有一個核心體制「誇富宴」（potlatch），用以歡迎賓客或者慶賀特殊事件，每一個社會各有一套明確的規則與習俗。誇富宴有一項共同要素最讓白人政府感到困擾，就是大規模的財富重分配，參與者以贈予禮物來表現自己的社會地位。在美國與加拿大政府看來，美洲原住民如果不能力行節儉謹慎的美德，將會永遠處於落後狀態。誇富宴被形容為「引發多種腐蝕人心的惡行……印第安人在這種瘋狂行為的影響之下，不可能積聚財產，也無法憑藉勞力得到美好成果」。[23]因此從一八八五年到一九五一年間，加拿大政府認定誇富宴為非法行為，違法者處以二到六個月拘役。

歷史上的惡行劣跡在現代以不同面貌出現：政府與企業繼續圈占森林、漁場與農地，理由可能是原住民無法善用資源來創造公共利益，也可能是原住民根本無足輕重。洛克的觀點影響深遠，可見於國際法對於「無主地」（terra nullius）的認定標準。過去從美國到澳洲，這套標準被用來否定原住民的權利。時至今日，從約旦河西岸（West Bank）到南中國海，還有

無數不顧社會邊緣群體反對而轉移「邊際土地」（marginal land）使用權的案例，相關爭議持續延燒。[24]討論到這裡，我們要回來看近年非洲獵巫運動的勃興。

非洲許多國家的疆界看起來就像用直尺畫的，而且的確是這樣畫出來的，過程發生在一八八四年的柏林會議。與會的歐洲列強當時正為如何割據非洲而爭執不休，引發一連串災難性的事件，導致非洲至今仍深陷於貧窮、戰爭與落後之中。來到二十一世紀初期，非洲再度成為強權的爭奪目標。這一回雖然沒有坐地分贓的正式會議，然而美國、歐洲、中東、中國、印度與其他亞洲國家，仍然透過各種方式來達成目的，例如民營企業合約、傭兵、軍事基地（美國軍方最近成立非洲指揮部〔AFRICOM〕，但是因為不受非洲人民歡迎，因此總部設於德國法蘭克福）、開發協議與所謂的「援助」，來掌控與獲取資源財富、生物多樣性、食物供應與土地。

歐洲的圈占歷史在非洲重演，市場社會的深化徹底改變了性別角色，傳統的資源管理方式被連根拔起。精確統計數字還沒有出爐，但是根據一項保守的估計，從各項已發表數據來看，獵巫運動已經奪走二萬二千條人命。[25]以獵巫為名而對女性施加暴力的現象，在資源遭到旅遊業侵占的地區特別猖獗，兩種現象有因果關係。以尚比亞為例，「女巫」出沒的地方往往是即將被開發為動物保護區（game reserve）的土地，或者被規畫為「籬內狩獵」（canned hunt）的動物繁殖地，讓有錢的觀光客好好欣賞「非洲五霸」（Africa's Big Five）——獅子、大

象、水牛、犀牛與花豹，方式是各宰殺一頭。[26]在奈及利亞的伊果巴祖瓦（Iguobazuwa）森林保護區，女性被迫離開自家的土地，因為政府把森林賣給法國的米其林（Michelin）輪胎公司，米其林再將森林變成橡膠園，摧毀當地女性賴以養活一家人的自給式農業（subsistence farming）。[27]受害者烏芭拉（Mabel Ubara）說：「丈夫死了兩年之後，我開始下田耕種……米其林帶來邪惡的推土機，毀掉我種的所有東西，我哭了……我試圖阻止他們，但是他們威脅如果我不屈服，就要用履帶車把我輾過去。」[28]

攫取土地的新聞不會和非洲獵巫運動的報導出現在同一個版面，因此也難怪在外界看來，非洲女性遇害的事件既神祕、又野蠻。一旦遠離非洲，我們傾向於將這類事件視為「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難以解釋的病徵。其實它代表的是一種社會形態被另外一種社會形態活活扼殺。這並不是說非洲尚未出現肆虐其他地區的生態危機，或者非洲傳統的社會形態絕對公正可行。問題在於當傳統社會轉型為現代化的市場社會，非洲人民的聲音卻默默無聞。

除了人命的損失，摧毀行動也導致文化的損失，當地人民永續管理自然資源的知識從此消失。能否保存這種衡量自然資源價值的知識，可能決定人類的命運是永續生存還是走向滅絕。我們回來看看最具代表性的「共有財悲劇」：漁業。漁業枯竭危機並沒有萬靈丹，尤其是近海的家庭漁業。然而巴基斯坦漁民團體在伸張集體政治與經濟權利的同時，可能也掌

握了保護自家生計的關鍵。一項針對智利傳統漁業的個案研究顯示，如果能夠恢復共有財的本來面目，給予當地人民使用權，將可以獲得卓越的成效。智利在一九六〇年代禁絕大型拖網漁船作業，保護家庭漁業不必面對跨國漁業公司的毀滅性競爭。智利政府一度推行配額計畫，失敗之後轉而和沿海各地的漁民組織合作。政府與民間共同建立「海域漁業使用權」（territorial use rights in fisheries），漁村和漁民組織得到集體權利，可以在他們世世代代作業的傳統漁場捕撈，執法工作交由地方基層漁會負責。結果成效斐然，智利漁業開始復甦。海域漁業使用權以當地漁民的傳統漁場為基礎，等於是將過去幾個世紀原本就屬於當地漁民的權利，以集體化的方式物歸原主。[29]

然而智利的經驗卻是一個例外。大體而言，共有財體系在二十一世紀知音難覓，經常遭到揚棄。隨著共有財的消失，我們也喪失了累積數千年的知識；這些知識讓人類能夠以永續方式管理稀有資源，包括維持資源不虞匱乏的採集技術，以及確保每個人各取所需的社會體制。唯利是圖的市場另有一套動機，顛覆了這些知識體系。舊有的體系並不完美，但似乎確實能夠讓社會繁榮興盛，因為它們衡量資源價值的方式，不同於只知追逐利潤的市場。英國社會運動人士與作家蒙比爾特（George Monbiot）指出，歐盟的「可轉讓配額」（transferable quota）漁場使用權制度，導致數百萬條魚遭到丟棄，八八%的漁場遭到過度捕撈，公眾付出的代價遠高於漁獲的價值。[30]

圈占共有財摧毀了豐富的知識網絡，這些網絡曾經幫助我們衡量事物的價值。然而博蘭尼的鉅變不可能造成百分之百的改變，總是有一些做法、理念與經驗能夠屹立不搖，化身為工具，讓我們超越追逐利潤的市場，思考衡量價值的新方法。就博蘭尼論述的雙重運動而言，第一運動已經造成急迫的生態與經濟危機，因此我們應該要問：第二運動何處尋？為什麼飽受追逐利潤市場暴力的社會，還沒有開始進行神奇的自我療癒？左派陣營最常提出的答案是，事態尚未惡化到無法收拾，必須要發生極嚴重的悲劇，才有可能刺激人們推動政治變革。

這種論點的問題在於，事態其實已經非常糟糕。例如在二〇〇九年，全球挨餓的人口超過十億人，創下歷來最高紀錄。對於博蘭尼雙重運動尚未實現還有第二種解釋，認為當初反制運動的主要推手已不復見。史賓翰連法立法運動的先鋒是一小撮失意的貴族地主，今日這類人物少之又少。不過最符合真實狀況的的解釋應該是，其實反制運動已經發生，而且是多管齊下，既進步又反動，既廣泛又獨特。

只是這些反制運動並沒有得到大幅報導，尤其是進步的反制運動，其領導人是貧民、被剝奪的人、被邊緣化的人、承擔富人外部成本的人、世上最不自由的人，他們發現自己才是「他們一直等待的變革」。本書第二部將探討這些人如何努力嘗試，調整市場社會的平衡，改變價值的衡量方式。他們並沒有回歸舊有的共有財理念，而是重新界定了共有財的意義。

第二部

光是讓每個人都能上餐桌還不夠，真正的問題在於：如何讓每個人都吃得起這頓飯？

——歐巴馬，二〇〇五年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為自由奮鬥募款晚宴」演講

The Value of Nothing

How to Reshape Market Society and Redefine Democracy

7. 反制運動與擁有權利的權利

自由則生，不自由則死！

不自由，毋寧死！

——派翠克・亨利（Patrick Henry），主張反抗英國統治的演說

——美國新罕布夏州的座右銘

從古至今，美國歷代的政治論述帶有一種關於抉擇、自由與死亡的詩意。那是一種邊疆與革命的語言，但是語法符合資本主義設定的價值規範。其核心理念主張，私有財產與追逐利潤的市場能夠提供一種其他體系無能為力的事物：自由。在共有財體系之下，其他人可以限制你能取用多少資源、積聚多少資源、如何彼此分享；但是自由市場沒有這些限制。自由市場讓你隨心所欲地購買、販賣、消費或生產。只要一疊鈔票在手，再發揮一點企業家精神，你就可以征服整個世界。沒有一種體系的資本主義更符合這種自由精神。市場的柔性力量，以及能把自由視為交易的一部分，是它最具吸引力的要素。

當歐巴馬政府金融紓困計畫對於接受公家資金的業者，訂定其高階主管的薪酬上限，美國企業界怨聲載道，從「長字輩」主管到野心勃勃的較低階員工，都發出不平之鳴。他們說如果不能自由發揮企業家精神，賺取適當的薪酬，那麼金融業的「人才」將會流失。其實近來的經濟危機正是這些「人才」發揮所長的結果，因此除了金融圈內人之外，沒有什麼人會為他們的喪失自由一掬同情之淚。但是他們的說法會不會也有其道理，至少在理論上是正確的？資本主義真的能夠提供最大的自由嗎？

已故牛津大學哲學家柯亨（Jerry Cohen）曾設計一個思想實驗，有助於我們理解金錢的運作，以及金錢如何與自由市場提供的自由交互作用。柯亨指出，當市場以金錢為基礎來定量供應商品，我們就有理由去質疑市場是否能提供自由。想像在我們生活的世界，每個人會隨機得到一些票券，一張票券代表一種權利，例如探訪生病母親的權利、過馬路的權利、選擇居住地的權利、吃牛排的權利、生病接受治療的權利等等。你不一定要做票券上標明的事情，它們只是限制你的自由。如果你想做某件事卻沒有票，那麼司法當局就會介入。這些票券呈現了你自由（或者不自由）的程度，票券愈多，你愈自由。

關鍵就在這裡：金錢就像這些票券。畢竟在市場社會中，金錢提供的正是讓人們能夠購買自由，負擔得起醫療、食物、住家、退休後不必繼續工作，遭遇意外或失業時能有所保障。沒有錢的人跟拿不到票券的人一樣不自由。在市場社會中，沒有錢的人什麼事都不能做，只能擁有很少的事物，而且注定要英年早逝。換言之，在資本主義體制中，金錢就是「擁有權利的權利」（the right to have rights）。

最深刻的諷刺在於，許多人聲稱價格帝國的擴張與自由相得益彰。其實自由市場提供的自由只是夢幻泡影。對於窮人而言，充足糧食、醫療照護、社會安全、居住環境的價格，都遠超出他們的負擔範圍。收入與自由代價之間的差距，意味著有愈來愈多美國人已經體認到，自由只是另一件他們負擔不起的事物。在當前的全球經濟衰退中，這種緊張關係將會日益尖銳。加州首府沙加緬度（Sacramento）無家可歸者聚居的帳篷城（tent city）有如雨後春筍，動輒擠進數百人，每天大約新增五十人。開發中國家的情況向來艱苦，全球經濟衰退更將數百萬人推入貧窮深淵。然而無論是美國加州還是開發中國家，都有一個因素讓貧窮問題雪上加霜：一個體系號稱為赤貧民眾帶來進步、繁榮與發展，然而所作所為卻完全相反，導致不平等現象日益嚴重、幸福感不進反退、許多惡疾已有解藥卻持續肆虐。

在如此「自由」的國度，市場對負擔不起的人們只提供很有限的選擇。以美國的醫療保險體系為例，生命的價值正是由市場決定。麥克．摩爾（Michael Moore）的紀錄片《健保真要命》（*Sicko*）揭露美國醫療業利潤導向的最醜陋面目。保險公司會問手指斷裂的病人要保留哪根指頭，一根中指要價六萬美元，食指的價格合理得多——只需一萬二千美元。此外還有較不為人知的問題，也就是醫療業造成的嚴重不平等現象；以及那些最無法自由選擇的個人因素如種族、性別、家庭財富，如何影響我們的命運。如果從數字來看美國社會的自由不平等現象，產婦死亡率格外怵目驚心。美國的數字是每十萬次生產會造成十一位產婦死亡，相較之下，英國是八位，中歐的斯洛伐克（Slovakia）是六位。[1]然而美國的人均醫療支出是六千美元，遠高於斯洛伐克的五百六十五美元。[2]

更糟糕的是，從一九九五年開始，美國每一個少數族群的產婦死亡率都節節攀升。儘管美國醫療科技日新月異、平均收入增加、億萬富豪愈來愈多，但是死於生產的美國婦女卻有增無減，黑人女性的比例更高出白人女性五倍。如果將美國黑人視同一個獨立國家的人口，其產婦死亡率將高達每十萬次生產死亡二十四人，人均年收入則只有八百四十美元。由此可見，在美國，自由市場的結果之一是害人英年早逝。

探討美國的問題，不能不歸咎於各種文化、政治與經濟壓力，導致單一保險人制健保（single-payer health care）難以實行。然而美國女性醫療照護的失敗，也是全球普遍現象的一部分。二〇〇〇年世界各國領袖曾集會討論如何改進其社會政策，並推出「千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希望解決最嚴重的社會不公不義問題。這些目標能夠在

二〇一五年之前達成的少之又少，降低產婦死亡率的目標顯然就難以達成。一九九〇年，全球約有五十七萬六千名婦女死於懷孕或分娩的併發症，「千禧年發展目標」希望在二〇一五年之前降低七五%，也就是十四萬四千人。然而二〇〇五年的數字是五十三萬六千人，只減少了七%。[3]

「千禧年發展目標」本身也頗具爭議性，批評者認為這些目標是《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的灌水版本。[4]《世界人權宣言》的本意是要做為一份新的社會契約，要求每一個國家的政府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就業、教育等權利與自由。「千禧年發展目標」的辯護者訴諸現實層面，認為各國政府過去做過的承諾都無法實現，因此不如改訂一套要求較低、但每個政府都能夠履行的目標。宣言上白紙黑字的權利固然全是非常好的論點，但是政府能達成才是其次最了不起的事情。

依照這種思維模式，權利來自政府的授予，不是公民的爭取，而政府似乎也非常慷慨大方。《世界人權宣言》是歷來翻譯最廣的文獻，今日看來應該仍是卓越成就。很難想像二十一世紀的政府會像當年那樣，認真承諾在國內推動維護人權不可或缺的財富重新分配與進步政策。然而回到博蘭尼完成《鉅變》一書、《世界人權宣言》開始醞釀的一九四〇年代初期，人們心頭想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如火如荼的恐怖經驗、引發大戰的一九三〇年代經濟大蕭條、大蕭條為歐洲帶來的嚴重政治後果。當時人們也普遍能夠接受主動出擊、重新分配財富的

政府，主要原因之一是世界各地勞工運動的力量與戰鬥精神。一九四二年，美國總統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呼籲要對十一萬美元（相當於二〇〇七年的一百四十萬美元）以上的所得開徵稅率一〇〇%的「超額累進附加稅」（supertax），後來國會的折衷辦法是所有二十萬美元（相當於今日的二百五十萬美元）以上採九四%稅率，而且輿論也都能接受。[5]受政治活動影響的權利，從言論自由、政治組織、衣食溫飽到有薪假，無所不包。

不難想見，在人權的熱潮（以及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主席羅斯福夫人〔Eleanor Roosevelt〕等人的推動）過後，美國、英國與蘇聯政府開始踩煞車，它們擔心國內權利遭剝奪的群體會因此受到鼓動。一九四七年美國政府就嘗到厲害，杜博斯（W. E. B. Du Bois）代表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向聯合國提出請願案《向世界請願：陳述美國黑人公民人權遭侵犯狀況並請求聯合國處理》（*An Appeal to the World: A Statement on the Denial of Human Rights to Minorities in the Case of Citizens of Negro Desc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an Appeal to the United Nations for Redress*）。民權運動在政府的防線上找到一處缺口。

大戰末期，各國政府已經預見到這種狀況。一九四四年十月，英國、美國、中國與蘇聯草擬一份文件，劃分戰後勢力範圍，其中沒有片言隻字提到人權。[6]然而退卻的政府遭遇強烈的抗議聲浪，從英國殖民地到美國國內輿論，都要求政府做出更明確的人權承諾。羅

斯福本人的作為就與抗議蜂起大有關係。他會見一批要求他支持人權的人士時說：「好吧，各位已經說服了我。現在請各位到外面去，對我施加壓力！」[7]最後各方達成協議，個別權利的條文規定可以盡量嚴格，落實機制則交由各國自行決定。因此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世界人權宣言》在巴黎簽署。又過了幾個年頭、無數次談判協商之後，國際社會總算再推出兩項條約，要求簽署國政府必須給予人民權利，而不僅是宣示權利存在。《大憲章》保障公民權利，《森林令》保障某些基本的社會與經濟共同權利，《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與《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venant on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則猶如前兩者的翻版。人權宣言加上兩項公約構成《國際人權法典》（International Bill of Human Rights），一九六六年正式生效時，各方期待它們能夠畫出一條明確界線，無論政府或是企業都不得逾越。

然而後來的發展卻不是皆大歡喜。尤其是在全球南方，政府勸誘人民等待它們將權利送上門，它們會逐一處理每一位人民的問題。[8]耐心等待的要求是在暗示我們，總有一天，我們全都會進入應許之地。然而從歷史看來，政府要求人民耐心等待，其實另有一個完全不同的目的：化解人民主張要求的動力，讓政府從承諾脫身，什麼都不必兌現；讓人民知道自身最重要的職責，就是伸手等待賜予。換言之，權利有如床邊故事，未來一定會有個快樂結局，前提是我們讓追逐利潤的市場繼續主宰一切，並且認同最基本的權利就是個人的財產權。

然而杜博斯與民權運動告訴我們，讓政府送出權利的方法不是消極等待，而是積極要求。如此理解權利可以破除一種伎倆：權利是以眼前的耐心換取未來的利益。今日的權利論述已經由被壓迫者與邊緣群體重新定義，他們試圖收回某些被市場社會剝奪的權利。從女性運動到原住民訴求，權利論述已經顯露成功跡象，無數人正以權利之名推動民主社會變革；儘管政府呼籲他們保持耐心，等待政府累積足夠的政治意志來推動變革。

論「政治意志」

如果「野蠻」是殖民者的通關密語，那麼「政治意志」就是今日民主政治的仙丹妙藥。每當變革無法實現，理由一律是欠缺「政治意志」，一種可以促使掌權者採取行動（就算所謂的行動只是照本宣科）的神奇事物。其實當代「政治意志」理念真正透露出的重要訊息，是我們對於政府模稜曖昧的態度。整體而言，公眾對醫療、教育、削減武器採購經費、環境等議題都具有強烈的政治意志，然而問題在於，政府官員的意志並不是決定於人民的心聲，而是企業的要求。義大利近年出了一本政治暢銷書《種姓制度》（*La Casta*），兩位資深記者瑞佐（Sergio Rizzo）與史泰拉（Gian Antonio Stella）將政治既得利益階層描繪成一群用心有好有壞的竊國者（kleptocrat）。從歷史來看，如果政府已經自成一個種姓，那麼唯一能夠讓它回到

正軌的方法，就是大規模的公民參與。耐人尋味的是，依據普特南（Robert Putnam）關於官僚體系如何為人民服務的重要著作《讓民主動起來》（*Making Democracy Work*），義大利民主政治運作的關鍵之一是共產黨的存在。

雖然義大利共產黨不太可能提供變革的希望，但是一九七〇年代它的中堅分子掌握了一個西方民主國家幾乎完全遺忘的要素：掌權者之所以能夠統治國家，是因為多數人都抱持消極心態。這個觀點可以為博蘭尼的雙重運動提供動力。在雙重運動的第二部分，社會從市場收回權力，其方式是主動要求而非等候賜予。歐巴馬的競選承諾也可以如此理解，他「揚棄因循苟且的政治」（No more politics as usual）的口號撼動了權利被剝奪的人們，而且迴響遍及世界各地。

然而競選造勢鼓動群眾，畢竟不同於大範圍的民主運作。歐巴馬政府利用當初將他送進白宮的選舉機器，來推動他的教育、醫療與氣候變遷政綱。只是這些行動的共同特色之一，就是缺乏實質政策的討論，行動之中只有一個敵人：「因循苟且的政治」；也只有一個解決方案：總統的新政治。我們只能稱之為民粹主義（populism）。可是領導人與被領導者之間的狂熱崇拜關係，代表的不是民主運作恢復活力，而是退而求其次的困獸之鬥。若要民主蓬勃發展，我們首先必須承認現行的經濟體制令人失望。就像葛林斯潘對經濟組織原則失去信心，我們不僅要仔細檢視自由市場，也要深入探討維繫自由市場的政治體制。唯有在理念上肯定

我們能夠為自己思考，積極準備採取政治行動，而不是讓政治像其他事物一樣任由別人處置，我們才也有可能重新收回民主政治與經濟的主權。這個目標聽起來像空中樓閣，然而有一個組織已經做到，我先前也討論過，[9]它充分掌握了權利、民主與行動之間的關係：國際農民運動「農民之路」（La Via Campesina）。一九九三年，幾個美洲與歐洲的農民團體創立農民之路，目前活動遍及六十九個國家，成員超過一億五千萬人，清一色都是小農、農場主、農場工人，或者想要種植作物但沒有土地的民眾。農民之路草創初期的一位核心人物已經當上國家元首，也就是玻利維亞總統莫拉雷斯（Evo Morales）。儘管農民之路在一九九〇年代初期才成形，其會員組織的運作歷史要長得多。農民之路的創立經過可以做為民主運作、爭取權利的範例。說起來有點諷刺：「農民」（peasant）在英文中有很深貶意，但是這群最沒有辦法衡量土地價值的人，卻可以透過他們的政治行動，告訴世人如何拯救地球。

農民之路的活動重心是雙管齊下，同時在公部門與私部門推行民主化，變革目標則是市場社會。他們自認為已經獲致成功，因為從馬利（Mali）、尼泊爾到玻利維亞，許多國家的政府都響應他們推動的變革。農民之路積極遊說各國地方與中央政府，近來在美國也有長足進展。

農民之路的政治成就並不是神奇的一揮而就，而是與政府以及企業衝撞的結果。他們的經驗可說是具體而微的雙重運動。整個一九八〇年代，世界銀行汲汲營營將市場機制引進全

球南方，遵奉芝加哥學派金科玉律的經濟學家懷著救世主的熱忱，千方百計散播完全自由市場的福音。[10]他們運用自家的圈占策略，除了攫取公地的老派做法，還有新形態的文化與知識商品化，種子智慧財產權的「生物剽竊」(biopiracy)就是一個例子。[11]相關人士大筆一揮，農民代代培育種子的遺傳學資訊，就成為跨國種子公司的新寶藏，成為任它們需索的智慧財產權。「鉅變」再度展開，由一批不必為其後果負責的專家推動，他們摧毀在地的知識與治理形態，好讓自己的一套東西取而代之。結果是一場災難，農業方面尤其嚴重。世界銀行自家的「獨立評估小組」(Independent Evaluation Group)在二〇〇七年的報告指出，大體而言，世界銀行在非洲的工作績效是一蹋糊塗。「看不見的手」原本應該比政府更能夠分配資源，但是當政府被排擠架空時，這隻手卻根本縮手消失。[12]

當然，過程之中一定有抗爭，而且不必等到二〇〇七年。強制推行自由市場的國家紛紛爆發暴動與抗議，從一九七六年到一九八二年間至少發生一百四十六起大規模事件。受到衝擊的人民非常清楚，從糧食與燃料價格上漲到社會福利縮減，都是這些政策帶來的改變，他們也明確表達抗議。這是雙重運動第一部分造成的後果。國際批評家指控世界銀行未能體察貧窮人口的需要，它推行的政策如縮減政府角色、浮動匯率與促進市場化，都與窮人的需求南轅北轍。世界銀行也回應了這些批評，但做法只限於在它運作的國家與公民社會進行「諮詢」，僱用一個功能不彰的「人類發展小組」(Human Development Unit)，藉由某些社會支出

來彌補它造成的傷害。

世界銀行的做法必須和民眾進行「諮詢」，然而問題在於，大部分受到影響的人只希望它趕快離開。因此世界銀行招徠與鄉村地區有關聯的組織，促成雙方以和諧、低調的方式溝通互動。於是一批願意與世界銀行「諮詢」的非政府組織一一成立，運作方式模仿世界銀行，讓那些第三世界的掮客得以提供名正言順的服務，換取不必扣稅的經費、飛往華盛頓的機票、到大型顧問公司工作的機會。世界銀行玩出一場民主的傀儡戲。[13]

在這樣的背景態勢之下，受到世界銀行政策衝擊最嚴重的農民，在一些非政府組織與基金會的協助之下，成立以會員制為基礎的農民運動團體。這些團體集思廣益，共同討論應該採取什麼樣的行動。他們對於扮演被動接受指示的角色記憶猶新，因此建立了一個聯合會(federation)，徹底避免這種宰制模式。聯合會中的運動團體有的擁有數千萬會員，有些只有數百人，但是小團體也能爭取到極大的自主權。依照農民之路的內部架構設計，沒有任何一個團體可以對其他團體發號施令，所有決議都經過廣泛、漫長的地方基層諮詢過程。這種一絲不苟的民主程序，背後是一種懷疑精神，懷疑過去一直指示他們該如何過日子的政府與發展專家。

農民之路積極反抗摧毀共有財、製造假民主的行為，因此也和當代市場社會的挑戰正面對決。他們不僅在體制上反抗，也在理念上對決。他們擘畫的反制運動願景名為「糧食主權」

（food sovereignty），在其多重定義中最基本的一個就是：糧食主權是人民、國家或邦聯制定其農業與糧食政策的權利。

這個定義聽起來並不怎麼冠冕堂皇，其實卻具有炸藥般的威力。雖然糧食主權還附帶其他的權利，例如女權和免於歐盟與美國干預的自由；但是爭取糧食主權的訴求本身，就已經指出我們應走的道路。與其說訴求目標是特定的幾項權利，不如說是要伸張人民界定價值的能力，人民要求對生存必需的事物行使權利：土地、水、種子與耕種方式。這種主張是不是讓人有點耳熟？

擁有權利的權利

「擁有權利的權利」並不是農民之路成員的獨創，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用這個概念來描述沒有國家的人如何遭遇苦難：兩次大戰之間的猶太難民。《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一書有這樣的觀察：「人權遭到剝奪的人……失去的不是自由的權利，而是行動的權利；不是自由思考的權利，而是選擇的權利……我們之所以會覺察到這種『擁有權利的權利』……是因為有數百萬人在新的國際政治情勢之下，失去而且無法爭取這些權利。」[14]我們或許會認為，這些權利頂多只是某種道德力量，唯有其他方法都失敗之後才會動用。但是對農民之路的成員而言，這些權利會帶來非常具體的結果，只不過他們會先進行許多場會議和辯論。「擁有權利的權利」並不是某種行動計畫，而是人民做出具體要求之前的先決條件，是一種意志的宣示。[15]

農民之路藉由一連串會議來討論「糧食主權」的定義，明確表示他們的目標並不是完全廢除市場或世界貿易，而是消除其中的宰制關係。他們希望市場由社會來控制，並重建某些被自由市場摧毀的價值。只是反覆討論定義的過程也會造成困擾：以帳篷來比方，愈來愈多人想進入帳篷，帳篷因此愈做愈大，最後會支撐不住而垮下來。從二〇〇七年的定義來看，農民之路「全體參與，解決問題」的理念似乎有點走火入魔，這個定義主張糧食的「生產者、銷售者與消費者」共聚一堂，等於是要求彼此衝突的人坐在同一張談判桌前。

情勢看來似乎不妙，不過唯有反覆討論定義再加上其他做法，才能夠釐清農民之路運動的真正目的。英國小說家佛斯特（E. M. Forster）曾問道：「話還沒說出口之前，我怎麼會知道自己在想什麼？」[16]農民之路只是將這個問題集體化呈現。每個人都有過類似的經驗：最原始的說法未必最有道理，理念必須公之於世才能夠發揮效用。社會運動爭取的是從自身所犯錯誤中學習的權利，而不是只能承擔別人犯錯的後果。農民之路的做法已經奏效，較新的糧食主權定義果然就比較合情合理。

二〇〇八年農民之路在非洲莫三比克首都馬布多（Maputo）集會，針對糧食主權提出新

口號和一系列策略，目標鎖定跨國企業，希望讓組織各部門的焦點更為明確、行動更為一致。新口號最是發人深省，因為它將人類社會最普遍的不公平現象推上火線：「糧食主權要終結女性遭受的各種形式暴力。」

這個宣示來自全世界最窮困的人，他們的主要身分——農民——幾乎是文盲、無知的同義詞。然而這個宣示卻顯示他們瞭解到，飢餓是人類社會長期剝削最新近的表現方式，也凸顯出環繞著價值確立過程的各種關係如何遭到扭曲。在他們看來，飢餓與貧窮問題的癥結並不是糧食的短缺，而是權力的匱乏，也因此瞭解女性遭受的各種形式暴力會成為一種根本。除了毆打、強暴與攻擊這類每三位女性就有一人受害的身體暴力，[17]飢餓也是一種暴力，而且女性受害的比例特別高。今日全球的饑民有六〇%是女性，窮國如此，富國也不能倖免，許多母親自己勒緊褲帶，把食物留給兒女。當一位女性種植的糧食賣不出去，因為市場充斥著美國或歐盟政府補貼的便宜產品，這就是一種暴力。當一個家庭無法送女兒上學，因為她們必須留在家裡勞動，這就是一種暴力。全球氣候變遷引發的遷徙潮，也是一種暴力。[18]

農民之路指出一條可行之道。推動政治賦權（enfranchisement）必須讓每個人都能夠界定自己的權利。然而要達到這個目的，並沒有顯而易見或者順理成章的做法可循，因此糧食主權才會有那麼多的定義、那麼多的伸張方式。雖然幾乎每個國家都有類似的故事，但接下來我們要把目光移向美國。故事發生在佛羅里達州南端的伊莫卡利（Immokalee），農民之路的

成員在這裡發起一場運動，反制資本主義的擴張；這種資本主義不但將土地與工作商品化，也將勞工降格為私有財產。

美國的種族隔離制度

嚮導帶我遊歷伊莫卡利的時候，我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伊莫卡利」這個地名出自原住民塞米諾爾人（Seminole），意思是「我家」。當地的摘番茄工人住在拖車裡，讓我想到南非的黑人城鎮。當初白人政府為低收入黑人勞工建立密集的住宅區，讓城市可以就近得到需要的勞動力，但是又能保持安全距離。不過我在美國南部看到的勞工住宅，似乎比南非種族隔離（apartheid）年代的黑人城鎮更糟。

伊莫卡利的低收入住宅區破舊骯髒，由幾個當地的角頭老大掌控。我造訪過一間拖車住宅，裡面住了八個貧民，早上用廁所要排隊，晚上用爐子也要排隊。這樣的居住環境，每個人每星期要繳四十美元；如果想裝冷氣機，每星期還得多繳二十美元。工人收工回來後，如果想用室外水管洗掉皮膚上累積一整天的殺蟲劑，先繳五美元再說。有些工人發現，用漂白水洗手既便宜又有效。除了非人道的居住環境類似南非的種族隔離，更諷刺的是，伊莫卡利所在的柯利爾郡（Collier County）的最大城市那不勒斯（Naples），許多大人物在當地購置別

墅，例如比爾蓋茲（Bill Gates）、史蒂芬史匹柏（Steven Spielberg）、川普（Donald Trump）。那不勒斯市民的年平均收入超過十萬美元，住宅高牆環繞，高爾夫球場綠草如茵，社區治安良好，警察競競業業驅離破壞市容的貧民。伊莫卡利位在柯利爾郡的另一端，是佛羅里達州最重要的商業利益來源之一。

美國冬季的番茄產量有九〇%由佛羅里達州供應，而且種植番茄有厚利可圖。這一行的利潤到底有多豐厚，很難舉出明確數字，因為像太平洋番茄農場公司（Pacific Tomato Growers）、六L包裝公司（Six L's Packing Company）、迪梅爾新鮮番茄公司（DiMare Fresh）這幾家主力業者都是家族經營，並不是股票上市公司。當它們旗下番茄農場的工人組成「伊莫卡利工人聯盟」（Coalition of Immokalee Workers）以追求改變現狀時，這種所有權的架構可是事關重大。家族企業不必對股東負責，因此不會在乎公眾形象掃地。於是伊莫卡利工人聯盟將矛頭對準麥當勞、塔可鐘（Taco Bell）這些大量採購番茄，而且在乎品牌形象的公司。

番茄採摘工人的工作並不穩定，看天吃飯，境遇相當嚴酷。熟練的工人如果運氣不錯，來到一座尚未採摘的番茄園（每一座番茄園要採摘四回，到第四回時，所剩番茄已經少得可憐），一天下來可以採到一百五十簍。伊莫卡利的工人平均每天採摘二千四百公斤番茄，市場價格約五千美元，但業者只需從其中扣除六十七美元當作工資，也就是工人幹活十二個小時的代價。換算一下，採摘一簍重十四．五公斤的番茄，工資只有四十五美分，而且過去

三十年來只增加了五美分。就算只和通貨膨脹同步調升，今日一簍工錢也應該要一．〇二美元。至於實際增加的那五美分工資，還是六位伊莫卡利工人聯盟成員靠絕食抗議一個月爭取來的。[19]

女性工人的負擔尤其沉重，當地工人運動組織者羅德麗格絲（Nely Rodriguez）描述：「女性在番茄園工作和男性一樣認真，然而收入卻遠低於男性。因為我們的速度不夠快，也不是每天都有機會上工。我們收入微薄，只能住在擁擠的拖車，忍受惡劣的環境，還得養活一家老小。我們必須犧牲和孩子相處的時間，只為了設法給他們好一點的物質生活。」

生活條件與收入已經夠糟了，更惡劣的是，許多番茄工人根本就是現代的奴隸。從一九九七年開始，在伊莫卡利工人聯盟的協助之下，佛羅里達州執法人員救出一千多名遭到奴役的工人，並起訴奴役他們的勞工掮客，引用的正是美國廢奴初期制定的法條。[20]在最近一樁案例中，十二名奴隸是從一輛貨車中逃出。[21]

南非種族隔離時期的白人營造出一種特別的自欺心態，他們相信世界可以一分為二，隔離對大家都有好處，兩個世界可以老死不相往來。隔離的高牆也具有心理功用，強化了由距離造成的拒絕面對現實與無知。然而在掌權者有需要的時候，兩個世界仍然可以掛鉤，形成一種寄生關係。南非的白人社會利用黑人勞工提供的工業、農業與家庭勞動力來創造財富，佛羅里達州的情況未嘗不是如此。

一般而言，番茄公司不會特別注意自己是如何對待工人，無視於他們的存在，就好像他們是藏在地下室、見不得人的螟蛉子。然而他們遭遇的不公不義，偶爾還是會浮現在公眾視野。二〇〇八年美國國會耶誕節休會期間，佛羅里達州番茄公司交易所（Florida Tomato Growers Exchange）向政府伸手，要求一千億美元的紓困貸款，聲稱這麼做似乎符合公眾利益。交易所主席李普曼（Larry Lipman）與海勒二世（Billy Heller, Jr.）分別來自六L與太平洋番茄農場公司。

然而民主社會主義者參議員桑德斯（Bernie Sanders）半路殺出，擋下這樁紓困案。根據《國家》（*The Nation*）雜誌總編輯霍薇爾（Katrina vanden Heuvel）的報導，桑德斯的新聞祕書透露，這位佛蒙特州的參議員雖然沒有直接點名任何一家公司，但是「無法同意政府紓困的對象竟然是容許奴隸狀況的業者，而且無法要求業者為工作沉重的採摘工人調整工資，連一磅番茄多一分錢都做不到」。[22]桑德斯的立場之所以如此堅決，要歸功於伊莫卡利工人聯盟，他們與學生、教會組織通力合作，對國會發動強力遊說；在佛羅里達州首府塔拉赫西（Tallahassee）的州議會大樓前，戴上手銬模仿在田裡工作的農奴；抵制那些與剝削番茄工的業者有來往的品牌。伊莫卡利工人聯盟創立於一九九三年，已經成為強而有力的勞工代言人，與全球四大連鎖餐廳業者麥當勞、百勝（Yum! Brands）、漢堡王、賽百味（Subway）交手都占得上風。二〇〇三年，伊莫卡利工人聯盟獲得羅伯．甘迺迪人權獎（Robert F. Kennedy Human Rights Award），聯盟主要幹部之一班尼泰茲（Lucas Benitez）解釋為什麼權利的論述對他們如此重要：

> 我們對權利並不陌生；並不是才剛下船，發現自己踏上一個權利的國度。我們在自己的祖國像墨西哥、海地與瓜地馬拉，進行抗爭時都曾運用權利的語言。來到美國，我們要求的事物已經全都被視為權利。今日在美國發生的奴隸問題，受害者並不只是沒有身分證明的移民。二〇〇一年有個案例，番茄公司到遊民收容中心與勒戒中心召募黑人，然後透過「公司福利社」賣古柯鹼與快克（crack）給他們，讓他們永遠負債累累，這些黑人都是美國公民。我們要求的是合理的工資、做多少工作拿多少錢、不要遭到剝削、有權利建立組織。這些不都是基本民權嗎？遺憾的是，美國大眾總以為這些權利會受到尊重，因此他們從來不知道該如何爭取。

班尼泰茲也告訴我聯盟如何透過組織動員，來落實這些權利，他引述廢奴運動者、本身也當過黑奴的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並進一步說明：「不做要求，掌權者就不會讓步。我們被禁止建立組織，但這是我們的權利，因此我們必須抗爭。我們要求的並不是執行長等級的薪水，而是自身的尊嚴。」伊莫卡利工人聯盟是一個非暴力組織，但班尼泰茲指出，

衝突在所難免。「衝突無所不在，婚姻中的衝突是家常便飯。衝突不是壞事，自然而然就會發生。」重點在於如何控制衝突，使它成為建設性的過程。因此商議（deliberation）的做法必須精益求精，擬定策略的權利是民主組織運動最基本的權利。班尼泰茲說：「我們不是三歲小孩，我們是群眾，我們是勞工，我們知道如何思考，如何展望規畫未來的發展，我們不需要大學教授為我們做這些事。」

伊莫卡利工人聯盟最成功的策略都來自公共商議（public deliberation）。抵制塔可鐘的決策就是來自十位聯盟成員一場例行性的集會，當時有人建議既然太平洋或六L都沒什麼知名度，聯盟應該將目標鎖定位於食物鏈更上層的企業。抵制行動宣布之後，聯盟舉辦一場勞工會議，一位卡車司機上前對班尼泰茲說：「你們瘋了。」又過了四年，伊莫卡利工人聯盟拿下第一場勝利，塔可鐘同意聯盟的要求，每一磅番茄工錢提高一分錢，賽百味、漢堡王與麥當勞後來也跟進。

伊莫卡利的番茄公司代表一種傳統，聯盟另一位幹部瑞耶斯（Gerardo Reyes）告訴我：「有一家公司曾說，它們當年用的是黑奴，黑奴解放後變成佃農，現在則是墨西哥佬……我們就像當年的黑奴，用完就丟。正因如此，我們有一個口號：『我們不是牽引機。』我們與業者抗爭時，最重要的武器就是自身的真實狀況。」另一位幹部裴瑞茲（Silvia Perez）也有同感：「改變的第一步，就是把我們當人看。」聯盟只要求工人與其工作的價值得到正確的衡量，工

人被視為一群能夠進行政治活動的人。為了達到目標，他們必須對抗幾股力量，這些力量把他們當成勞動的工具，只需要微薄的工資，因此可以用過就丟，就像丟棄去年的舊款手機一樣。於是工人組織起來，發起反制運動。番茄公司的因應之道是推出不具強制性的規範「農場僱主社會責任」（Socially Accountable Farm Employers），這是一套鬆散的建議事項，制定過程完全不讓工人參與。新規範要求僱主遵守既有法律，其中也包括禁止工人組織工會、要求加班費的法律。六L與太平洋兩家公司都符合新規範的要求，儘管它們僱用的勞工捐客因為將工人視為奴隸，遭到聯邦政府起訴。這種非強制性規範的主要目的是阻止聯盟爭取真正重要、而且有權要求的事物，工資就是其中之一。

番茄工人拒絕接受「農場僱主社會責任」，既然他們根本沒有參與制定，又何來義務接受？他們全體動員，從地方到全國，推展他們要求的變革。他們雖然向聯邦與地方政府遊說，但角色並不是等待政府賜予權利的陳情者。聯盟挑戰市場社會中政府與企業勾結的複雜網絡，對抗個別的勞工捐客與跨國企業，傳揚尊重權利的文化。一樁事件足以顯示他們已經成功：歐巴馬政府新任勞工部長索莉絲（Hilda Solis）在上任後的第一場演講中，就表明支持伊莫卡利工人聯盟。聯盟的反制運動並不是以聯邦政府為中心，他們的範圍要廣闊得多，聯邦政府則是被迫跟上腳步。

要徹底改變市場社會，一磅番茄一分錢的訴求看似微不足道，然而工人在過程中嘗試決

定自身工作的價值，聯盟創造的工具、政治行動與社會連結，提供了一個推動變革的平臺，變革不僅出現在佛羅里達州，也發生在幾個全球最大的城市，人們藉由「擁有權利的權利」的理念來改造城市空間，收回我們衡量生活、工作、存在等價值的場域。

8. 城市民主

社會運動的主要職責，就是要確保有錢人安分守己。

——娜杜（Shamita Naidoo），南非「棚戶居民」運動領導人

從二〇〇七年開始，全球許多大城市爆發抗議飢餓問題的有組織示威行動，媒體報導稱之為「糧食暴動」（food riot）。遺憾的是，這些報導見樹不見林。二〇〇八年上半年，從海地、埃及、馬達加斯加到義大利，數十個國家的記者報導糧食暴動，內容不外是馬路上有輪胎燃燒，濃煙密布；飢餓的暴民沿街打劫，砸毀商店櫥窗。換句話說，暴動的原因只是飢餓導致怒火中燒。這種呈現方式非常負面，但卻廣泛流傳。聯合國世界糧食計畫署署長薛蘭（Josette Sheeran）描述糧食危機是「一場無聲的海嘯，無遠弗屆，橫掃全球」。然而這場危機顯然並非「無聲」，民眾大聲說出自己的訴求；他們之所以要示威抗議，是因為其他表達心聲的嘗試都

無人聞問。

海地先前接受世界銀行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一連串的經濟結構轉型貸款（structural-adjustment loan），條件之一是當地農民被迫要和美國的稻農競爭，結果則是海地稻米產業崩潰，從此完全倚賴進口。米價曾在一天之內暴漲三〇%，愈來愈多人陷入饑餓。抗議者不僅要求供應糧食，也提出政治主張：二〇〇四年被美國總統布希推翻的前總統亞里斯提德（Jean-Bertrand Aristide）必須復位。義大利的麵食抗議（pasta protest）不僅要求平抑小麥價格，也控訴普洛迪（Romano Prodi）總理的政府治國無方。還有許多案例也都是如此，民眾藉由抗議表達更深層的憤怒，因為與糧食有關的政治問題導致物價攀升、所得低落。[1]

引發反抗運動的契機，往往是民眾瞭解到自己的社會處境有多惡劣，而且沒有其他方法可以表達心聲。歷來最成功的糧食反抗運動發生在美國，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將近尾聲，糧食價格開始暴漲，嚴重情況不下於今日，負責養活一家人的婦女大受衝擊。一九一七年的美國雖然號稱是機會與自由的國度，但美國女性既無機會也乏自由。她們買不起食物，尚未得到投票權，沒有任何方法可以要求政府負責，因此只能走上街頭。在紐約、費城、波士頓示威抗議的婦女並不是暴民，她們組織良好，多半是移民出身，曾經參與女性社會主義組織，很清楚如何運用政治力量。

以紐約麥迪遜花園廣場的一場示威活動為例，參與者主要是女性移民，主講人鼓動大家跟著她進軍華爾道夫飯店（Waldorf Astoria），因為聽說州長正在那裡享用大餐。一千位貧窮女性衝進飯店，要求政治人物拿出實際做法抑制物價。糧食抗議行動終於獲得成功，政府被迫採取行動，紓解饑荒危機。更重要的是，這一連串抗議行動也爭取政治權利。美國勞動婦女為投票權奮鬥，拜抗議行動之賜，憲法第十九修正案終於在一九二〇年正式生效。

二十世紀的都市糧食反抗運動，預示了「擁有權利的權利」在二十一世紀的都市將以何種形態呈現。紐約的抗議者挑戰既有的政治秩序，重新掌控供應日常生活必需品的市場。法國思想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在一九六八年出版的《城市權》（*The Right to the City*）一書中探討相關理念，主張人們應該針對城市如何運作、為誰運作的問題，從政治角度進行廣泛、徹底的重新構思。近年則有一群非政府組織、國會議員、社會運動人士與市民，以更為落實的方式詮釋他的願景，甚至超出他的本意，在二〇〇二年提出一套城市權利的憲章，城市中任何一個角落的任何人都應該享有。從工作權、使用自來水的權利到使用廁所的權利，城市權憲章的內容無所不包。[2]然而正如同我們在人權議題領域看到的情形，提出憲章其實還算容易，但是如果市民充耳不聞，那麼憲章和衛生紙沒什麼兩樣。另一方面，正如鄉村地區的農民、農場工人、無土地者能夠動員起來，爭取實實在在的權利，城市中要求權利的聲浪來自低收入住宅區、棚戶、寄居者、貧民窟與人行道的居民。只要是在城市中生活的人都一視

同仁，都可以要求權利，這種堅持代表我們追求平等，而且就算我們並不擁有一座城市，還是可以共同掌控它。

先前我曾經將美國的伊莫卡利與南非的種族隔離相提並論，不過我第一次到南非是二〇〇四年，曼德拉（Nelson Mandela）出獄十四年之後。後種族隔離時代的南非政府雖然終結了殘酷的種族剝削體制，免除了班圖斯坦（Bantustan）黑人半自治區的屈辱，提升平民應得的權利；然而從種族隔離經濟到現代新自由派經濟的轉變，並沒有帶來它所承諾的自由。儘管南非政府以一套全世界最具包容性、最進步的憲法，取代種族隔離的剝削掠奪，可是新自由派資本主義卻扼殺了平民的權利。從綜合考量財富、健康、教育等要素的人類發展指數（Human Development Index）來看，南非的成績從一九九五年開始節節下滑；一九九〇年排在第五十八名，到二〇〇五年已跌到一二一名，甚至於還低於巴勒斯坦。

在南非的自由市場中，土地所有權從白人轉移到黑人的比例不到五%。政府推行「提升黑人經濟力」經濟模式，訂定合約優先考慮黑人擁有或經營的企業；然而只有少數關係良好、富甲一方的黑人企業家才拿得到政府合約，新創造的財富並沒有澤被最底層的貧民。聖公會大主教屠圖（Desmond Tutu）指出：

> 如果提升黑人經濟力的受惠者，只是一小撮彼此輪替的菁英分子，而不是廣大的群眾，那還有何意義？我們是不是正在累積民怨，留待他日後悔莫及？有人說當初白人獨占經濟特權時，並沒有傳出類似的抱怨；這種說詞沒有道理，我們什麼時候拿舊政權當成標準了？而且不要忘記我們曾提出最具影響力的價值觀：「人民必須彼此分享。」我們投入抗爭行動，是因為相信可以營造出一種新形態的社會，一個關懷、同情的社會。然而放眼今日，有太多、太多民眾生活在痛苦、貶抑、非人的貧窮之中。[3]

屠圖這番話引來當時南非總統姆貝基（Thabo Mbeki）的一番斥責，然而他並不是唯一注意到這種矛盾現象的人。在一個如今已經自由化（至少法典上是如此）的國家，自由的承諾每天都遭到背棄。隨著南非開始籌備全球規模最大的體育賽事——二〇一〇年的世界盃足球賽，政府也開始驅逐城市中的貧民，做法一如種族隔離年代。種族隔離將城市貧民遷往黑人城鎮，一戶給一間五十四平方公尺的房子；今日南非的城市貧民被驅逐之後，能找到一間三十六平方公尺的房間就算走運，而且上工、上學、回老家都得走上好幾英里路。德爾班（Durban）一場抗議當地議員失職的活動，後來蓬勃發展，成為涵蓋三萬名棚戶居民的全國性運動，其組織以祖魯語（Zulu）命名，就叫「棚戶居民」（Abahlali baseMjondolo），它一直極力爭取城市權的第一要項：定居權。[4]

縱觀全球，大約十億人口居住在棚戶與非正式居所，也就是居住在自身不具所有權的土

地上。[5]要改善他們的貧窮境遇，有人提出一個簡單的方法：賦予土地所有權。這個方法出自祕魯經濟學家德索托（Hernando de Soto），他著有《資本的祕密》（*The Mystery of Capital*）一書，創辦自由與民主學會（Institute for Liberty and Democracy），受到一些既得利益階層領袖人物如葛林斯潘、布希、柯林頓等人的讚許。德索托所謂的「祕密」就是：開發中國家民眾雖然和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民眾一樣擁有住宅，但是無法將住宅轉變為資源並進行投資。德索托估計前者寄居的土地價值大約十兆美元，因此問題關鍵在於如何將這種「死資本」活化為「活資本」。在富裕國家，土地的「活資本」讓財產權得以蓬勃發展，帶來繁榮。這種方法可以稱之為「科學怪人經濟學」（Frankenstein's economics）。

讓貧民擁有寄居之地的所有權似乎無可質疑。德索托聲稱它可以激發個人的創業家精神。有一些模稜兩可的證據也顯示，土地所有權可以營造出市場社會的創業期望。阿根廷的研究人員在都市地區進行調查，比較得到和沒有得到土地所有權的棚戶居民，結果發現得到土地所有權的「幸運兒」要比沒有所有權的另一組人更容易信賴別人。[6]耐人尋味的是，這些「幸運兒」棚戶居民也比較容易相信「人可以自立自強」，比例比另一組高出三〇%；雖然他們的土地來自授予，並不是自己掙來的。得到土地的人還會產生比較強烈的個人主義與物質主義信念，儘管他們的收入並不會高於沒有土地的人。德索托將這種現象視為授予土地的教化益處，他說：「擁有財產讓人們在心態上更容易接受資本。」

真正重要的問題在於，土地所有權是不是真的能夠協助人們擺脫貧窮；德索托的構想在這個問題上站不住腳。他一直沒有拿出相關的證據資料，因此他的構想至今仍是迷思。幾篇針對他的構想、經過同儕審查的研究顯示，埃及、尼加拉瓜，甚至德索托的祖國祕魯[7]反覆出現一個模式：貧民得到土地之後，情況反而愈來愈糟。土地所有權確實能將死資本變成活資本，然而土地管理規則是由掌權者制定，貧民很快就會發現自己只是過路財神，轉眼間兩手空空。德索托推動的市場化符合美國經濟學家貝克的觀念，對掌權者最為有利。改變土地性質並不能為貧民帶來更大的財富和自由，只會讓他們拿土地賤價典當，讓土地更加集中到富人手上，貧民反而因此付出更高的租金。德索托相信土地所有權可以激發創業精神，這一點倒是說對了，只不過受惠者未必是貧民，因為除非先解決根本的權力不平等問題，否則以嘉惠貧民為名的土地改革，終究是口惠而實不至。

德索托辯稱，授予土地所有權只是要營造一個能夠推動其他變革的平臺，尤其是政府的變革：削弱官僚體制的角色，讓商業活動欣欣向榮。然而實際事證似乎顯示，財產權發揮作用的前提是政府運作符合民主精神，並且抑制財產不公平集中的現象；反其道而行是走不通的。「財產權先行，其他問題將迎刃而解」的口號不僅倒果為因，而且是在掩護大規模的偷竊行為。南非的棚戶居民就有過艱辛的親身經驗。

德爾班幾個棚戶區的居民曾向一名市議員陳情，要求在公有地合法定居的權利。這名市

議員是個政治機器，出身種族隔離時期執政的南非國民黨（National Party），後來見風轉舵加入非洲民族議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他承諾會幫棚戶居民爭取土地，結果卻將土地使用權賣給德爾班一家地產開發商。棚戶居民先向地方官員申訴，徒勞無功；再向省級政府申訴，還是一樣；最後告上中央政府，仍然得不到任何回應。

德爾班的棚戶居民不屈不撓，而且開創出新方式來提出訴求，堅持他們有能力解決自己的問題。[8]運動成員賀隆格瓦（Mdu Hlongwa）形容他們是「專攻自家苦難的教授」（professors of their own suffering），拒絕讓自身的權利淪為發展專家的口沫橫飛，因為那些專家「只會從旁觀者角度談論我們的問題」。這場運動草創時期的一幅旗幟，就是伸張棚戶居民的人性與才智，上面寫著：「棚戶居民大學」。

棚戶居民的政治活動是在一系列定期會議中打造成形。下頁的照片攝自其中一場會議，運動成員孟克旺哥（Moses Mncwango）在燭光下研究一份與棚戶有關的市議會報告。政府在這類報告中評估棚戶居民的人數、就業狀況和發展前景。但是「專攻自家苦難的教授」仔細看過之後只覺得不過爾爾，他們在會議中討論伸張自身城市權、伸張自身人性價值的策略，實際做法除了示威抗議之外，還有一系列「無自由日」（Un-Freedom Day）活動，和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南非後種族隔離時代第一次選舉的官方活動打對臺。棚戶居民運動引來政府嚴厲的反應，成員遭到囚禁與毆打，示威抗議遭到警方非法鎮壓，但是這場運動也嚐到勝利

孟克旺哥在燭光下研究市議會報告，2005年11月23日，南非德爾班。9

的滋味。我在德爾班居留時期，警察一直是棚戶居民運動的困擾。他們騷擾運動成員，迫害棚戶居民，拒絕接受申訴，非法阻擋示威；總而言之，警察把棚戶居民當成次等人。但是後來警察逐漸改變，對棚戶居民的恐嚇愈來愈少，甚至偶爾會捍衛他們對抗剝削者的權利。藉由示威抗議、反省檢討與集體行動，棚戶居民提升了自己在警察眼中的地位。

齊考德（S'bu Zikode）本來是加油站員工，因為投入運動而丟掉工作，並當過棚戶居民運動的主席，他很清楚這場運動得到哪些重要勝利：「我看重的不只是法庭上的勝利、被成功擋下的驅逐行動、新增的水電供應服務。我還看到戰友愈來愈有自信，滿懷喜悅地知道自己的能耐，知道自己應有的權利。我也看到戰友得到更多的尊重，看到過去被視為無足輕重的人民參與抗爭。現在年輕一代的戰友甚至上廣播與電視節目，和政府官員辯論！」[10]

運動的會議發揮強大力量，促進人性與平等，重新喚起當年反種族隔離抗爭最重要的目標。二〇〇八年六月的情況就是明顯例證，當時南非正值寒冬，燃料價格節節上漲，許多窮困社區發生暴亂，仇外攻擊事件頻傳，[11]數十名本國人與外國人遇害，數千人流離失所。大部分西方媒體認為，這是一場由資源稀少引發的馬爾薩斯式動亂。然而在棚戶居民運動管理的地區，沒有發生任何一場暴力事件。無論你是本國人還是外國人，只要住在棚戶，你就是棚戶居民：[12]這才是真正兼容並蓄的公民概念。棚戶居民運動營造出一種「生活政治」（living politics），無論家境貧富、無論是否受過教育，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齊考德對此侃侃而談：

> 生活政治並不需要正規教育，它源自人們的日常生活與挑戰，因此簡單明瞭，每一個普通人都可以理解。我們沒有水可用，但是應該要有；沒有抽水馬桶可用，但是應該要有。每一個人都應該享有電力，因為電力是生活必需品。這樣的理解就是生活政治，一點也不複雜，不必翻閱大部頭書籍，也沒有祕而不宣的企圖。生活政治的基礎就是生活的本質，每一個人都可以理解這些需求，也必須肯定它們都是名正言順的需求。

棚戶居民運動成員要求參與城市政治，正如同他們**已經是**城市社會、城市經濟的一部分。無論是哪一座城市，對於貧苦民眾而言，城市權中最優先的要項就是定居權。今日許多城市驅離居民、法拍房屋的情況，都變本加厲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因此定居權更是貧民迫在眉睫的問題。許多團體已經體認到，對定居權的爭取本身也是一種策略。以美國費城為例，立即改革社區組織協會（Association of Community Organizations for Reform Now）[13]之類的團體全力對抗房屋法拍程序，徵召「家園捍衛者」，也就是房屋面臨法拍命運的社區成員。這些捍衛者無懼強制驅離的威脅，繼續和家人住在即將被法拍的房子裡，以和平手段抗拒警察的驅離行動。他們的要求與策略和農民之路組織異曲同工，後者的成員是在農村生活中抗拒驅離，堅守自身參與社區、營造社區的權利，儘管這種做法在經濟效益上看似毫無道理。為了伸張「擁有權利的權利」，人們首先必須留在原地。

機會成本與城市形態

參與權得以確保之後，接下來就要營造地方的價值政治。為了更清楚說明，我們不妨先探討當代經濟學最基本的概念之一：機會成本（opportunity cost）。舉例來說，當我們考慮要花十塊美元去看場電影，還是用同樣價錢去吃一頓晚餐，或者省下這十塊錢留待他日更大的花費，我們就是在計算機會成本。老實說，機會成本向來是經濟學家的頭痛問題。解釋這個觀念到底如何運作之前，我們先來看看兩位大學教授在二〇〇五年的社會科學聯合學會（Allied Social Sciences Association）會議上考驗同行的一個問題：

> 你贏得一張艾瑞克萊普頓（Eric Clapton）演唱會的免費門票（不能轉賣），同一天晚上巴布迪倫（Bob Dylan）也要舉行演唱會，是你的次佳選擇。迪倫那場演唱會一張門票要價四十美元，平常你願意花五十美元聽他的演唱會。假設出席任何一場演唱會都不會涉及其他成本，那麼出席克萊普頓演唱會的機會成本是多少錢？
>
> A：〇元　B：四十美元　C：十美元　D：五十美元

近三分之二的回答者曾教授過入門的經濟學，但是只有二一%答對，比隨機選擇的比例還糟。正確答案是十美元，因為如果你出席克萊普頓的演唱會，就不能聽迪倫的演唱會，那麼迪倫對你的價值、能為你帶來的利益相當於多少錢？五十美元。聽迪倫演唱會的成本是多少錢？四十美元。兩者相減得到的淨利益是十美元，也就是正確答案。你可能以為還需要一個條件——你願意為克萊普頓的演唱會付多少錢，其實不必。更容易理解的表述方法是「成本效益」（cost-benefit），因此兩位研究者將問題改成這樣：「根據這項資訊，對於克萊普頓演唱會的價值，你最少要評估為相當於多少錢，才會讓你選擇他的演唱會？」答案同樣是十美元，而且這回答對的人就多了，因為問題是以日常語言來表述。

經濟學博士班學生答對的比例只有二〇%，和從未修過經濟學課程的大學生差不多。[14] 不過我們的重點在於以下兩者的差別：迪倫演唱會門票的市場價格，以及這張門票對你的價值。如果你並不特別欣賞迪倫，說什麼也不會去聽他的演唱會，那麼成本效益分析的結果將截然不同。演唱會門票之外，其他事物也是如此。

當人們選擇更大範圍的資源，機會成本就沒有那麼一目瞭然。以有毒廢棄物為例，其製程通常不必全額支付汙染成本，否則業者就會大幅減少汙染。可是既然廢棄物已經出現，該怎麼辦？歐巴馬政府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桑默斯回答這個問題時，曾經從市場角度推出一個必然的結論。桑默斯任職世界銀行期間的一份備忘錄外流了出來，他在其中問道：「這項討

論不要讓外人知道：世界銀行是不是應該鼓勵更多高汙染產業轉移到低度開發國家？」他的邏輯從經濟學標準來看無懈可擊：窮人對環境汙染的重視程度低於富人，因此有毒廢棄物送到非洲處理可以提升效益。桑默斯果然見解獨到，後來被擢升為柯林頓政府的財政部長，如今則是美國經濟政策的總工程師。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評論這起備忘錄事件時說：「就算以內部備忘錄的標準來看，桑默斯的說法也是非常粗率……然而就經濟學而言，他的論點很難反駁。」[15]雖然誰都不想被汙染物害死，但非洲人願意付出的金錢比北美洲人少，所以高汙染產業應該移到非洲，貝克的觀念原來可以這樣落實。

我們要更深入討論把有毒廢棄物送到非洲的例子，因為它並不是抽象的案例，而是已經進行了數十年。企業在歐洲處理一噸有毒廢棄物的成本是一千美元，在索馬利亞只需二．五美元。二〇〇五年的印度洋大海嘯，將過去丟棄在索馬利亞外海的有毒廢棄物一桶一桶沖上海岸，導致當地居民出現類似放射線中毒的症狀，然而國際社會對他們的苦難視而不見。現在索馬利亞海盜劫持船隻的理由之一，就是有毒廢棄物造成居民罹患慢性病。[16]

當年的桑默斯並無法預見這一連串後果，因此他的算計或許沒有那麼面目猙獰，不過整個事件顯示機會成本的概念大有用處。選擇如何運用資源會影響我們的生活，而且沒有一個人例外。雖然學校課堂教授的案例假定金錢可以透過共通的經濟語彙來表達，但是**單一**的機會成本並不存在。對於有毒廢棄物應該如何處理，桑默斯的看法和索馬利亞漁村一位必須承

受後果的婦女，一定截然不同。這位婦女珍愛自己子女的程度，絕不下於一位德國或美國的婦女，兩者同樣希望子女能夠健健康康地長大成人；然而只因為她比較貧窮，因此傾倒廢棄物的公司（以及支持它們的決策人士）在計算成本與效益時，她的母愛的價值低於德國或美國的婦女。涉及公共政策的機會成本必須透過集體運作的方式來界定、辯論。當機會成本辯論的一方是傾倒有毒廢棄物的歐洲企業，另一方是承受後果的索馬利亞村民，那麼相關的評估計算將不再是技術問題，而是政治問題；需要的是民主過程，不是專業人士。

經濟學的核心是選擇，但是它從不討論由誰來做選擇。市場是一種「對選擇做選擇」的方式：如果我們選擇透過市場來衡量事物價值，我們也就選擇了「錢愈多，得到的愈多」原則，然而這種分配公眾資金的方式實在不怎麼民主。儘管現代政治看似遵循「一元一票」（one dollar, one vote）原則，但有些地方行政體系已經發現，其實還有別的方法可以分配人們共有的資源。

巴西南部城市阿雷格港（Porto Alegre）近年大力推動「參與式預算」，讓市民以論壇方式集結，決定自家的社區如何運用政府經費，包括哪些工作應該優先推動進行，哪些團體可以優先得到經費。印度克拉拉（Kerala）也有類似的實驗，而且成績斐然，不僅公民積極參與，而且民眾對政府服務與回應的滿意度也直線上升。這是因為人們不再充當市場中的消費者，而是為自己的生活當家作主，化身為主導資源運用、透過民主方式分享資源的政治主體。

參與式預算

阿雷格港人口約三百萬人，一九八八年勞工黨（Partido dos Trabalhadores，巴西目前中央政府的執政黨）上臺掌權之後，在社區協會的壓力之下，從一九九〇年代晚期開始推行參與式預算；如今全球有三百多個城市推行類似政策。[17]參與式預算大幅提升市民對市政府運作的發言權，透過社區會議來探討城市的機會成本。這是一種最典型的非市場機制，用以決定事物的價值，具體傳達參與者的城市權。

阿雷格港又劃分為十六個區，參與式預算透過在每個區舉行的一連串會議，結合代議式民主與直接民主。市民在各種場合討論預算如何支出，有非正式的小型社區會議，也有一年一度的全區大會。討論焦點是如何分配地方政府預算資源，例如住宅、衛生設施、道路、醫療與教育。[18]年度全區大會每年三月登場，審核檢討前一年執行的計畫。社區與組織團體會推選代表，進行後續的工作，參與其他會議，研究各項城市計畫的執行標準與成本。社區內部的資源則是透過投票與辯論來分配。阿雷格港的市民藉由這種方式，掌管每年超過二億美元的建設與服務預算。

參與式預算的成功關鍵在於公民參與的程度。阿雷格港第一年只有九百人參與，到二〇〇〇年代初期已超過三萬人。[19]其成果相當豐碩：到二〇〇四年時，全市九九．五%的民

眾有自來水可用，八三%有下水道，公立學校學童人數增加兩倍。參與式預算另一個優點在於，政治層面的參與可以得到實質成果，讓民眾眼見為憑，因此吸引不同政治立場的人。世界銀行稱許參與式預算要比傳統方式更加透明，營造出更有效率的投資環境。市民團體則肯定它能夠重新分配資源，建立直接民主體制。

參與式預算的支持者也得到制度經濟學（institutional economics）與行為經濟學（behavioral economics）研究者的背書。實驗證明人們在自身可以適應與改變遊戲規則的環境中，能夠得到最好的合作成效。[20]市民討論各項議題的過程，對於優先推動建設的項目、地點與對象的選擇，激發出連大部分民主體制都罕見的熱忱參與。

參與式預算體系也將誤差範圍納入考量。今日做成的決定會影響未來，因此參與式預算對預算周期設下一些限制，以確保未來的世代不會受到今日錯誤的嚴重衝擊。償付債務、退休年金之類的固定支出，不會納入參與式預算，而是另外編列經費，以避免造成債留子孫的問題。

參與式預算的成敗決定於公民參與，缺乏參與等於宣告此路不通。因為它建立的政府形態不是給予，而是掌握。一位推動者說：

> 參與式預算的源頭並不全然是市政府出於善意的推動，在意識形態上追求全民參與，

> 參與式預算也是一種獨立的民眾運動。以葛洛利亞區（Gloria）為例，早在參與式預算施行之前，當地就設有獨立的人民委員會（People's Council），因此我們推行參與式預算，是從人民委員會的小組委員會開始。這種自動自發的人民運動帶起參與式預算的風潮，也讓勞工黨連續贏得四屆選舉。[21]

不過參與式預算並不是特定政黨的專利。目前巴西採行參與式預算的城市中，大約半數的市長並不屬於勞工黨，連阿雷格港也是如此。巴西民眾透過主動參與的地方政治，進入判定事物價值的決策程序，因此改變了城市的地緣政治。社區的決策者不再局限於最有錢或者最有野心的人，也不只是不必承受決策後果的技術官僚。這正是種族隔離的反面：大家合作擺脫市場束縛，收回某些自主權；以民主方式設定價值，漸進推展反制運動。我們可以把它看作現代的共有財共享。

當然，問題在所難免。這些做法雖然有助於社區營造，但同時也仰賴社區，而且沒有一個社區是完美的。如果你和街坊鄰居是死對頭，或者根本不把她當成社區的一分子，那麼參與式預算就會遭遇困難。此外還有人批評參與式預算排斥最貧困的民眾，會吸引參與的往往只有特定議題，導致一些民眾不再出席會議。對於真正民主的組織和預算規畫，這些問題相當重要，但是都可以解決。在連結遭排斥群體的時候，組織工作需要個人權利與集體權利體

系的支持，以避免流於所謂的「民主暴政」。除了改進程序之外，還有一些更深刻的方法來化解排斥問題：從物質層面來對治社區內部的不平等現象。無論你參考的指標是平均壽命、女性社會參與、國民幸福感還是其他指標，最成功的國家民主體制往往平等程度也較高。國家層級如此，地方層級也不例外。不過弔詭的是，想要營造出全體民眾都能參與的民主體制，最好是從平等與民主程度相對較高的社會著手。就像一個笑話所說：一位長途跋涉的旅人問傻瓜，到城裡路怎麼走最快，傻瓜回答：「如果我是你，我才不會從這裡出發。」

然而我們只能從此時此地出發，因此還是得奮力前行。倚賴地方民主運作的一個好處就是，它有一套內建的機制來達成上升的學習曲線。學習肇始於犯錯，美國一個城市權組織就深深體會到這一點。美國有愈來愈多的組織致力於結合一般市民與移民，「房客與勞工聯盟」（Tenants and Workers United）是先驅之一，總部位於距離白宮不遠的維吉尼亞州大城亞歷山卓（Alexandria）。一九八六年，當地的黑人和一個以薩爾瓦多裔為主的移民社區合作，對抗亞歷山卓貧民窟地頭蛇發出的一千張居民驅逐令。房客與勞工聯盟創立時以黑人為主，如今是全美國最活躍的社區權利運動團體之一。

聯盟執行長李斯（Jon Liss）說，聯盟從一開始就在多方學習，「每一天都會犯錯」。他們學到的教訓五花八門，例如「你若是贊成開闢都市農園，最好先弄清楚毒漆樹長什麼樣子」、「要提防律師不先告知你就向對方讓步」。聯盟成員曾經設計、發展、爭取並贏得最低工資法

(living-wage ordinance)的立法工作，鐵工廠工會工人在過程中學習到挨家挨戶宣傳動員的做法與策略，這是大多數工會前所未有的經驗。另一個類似精神的案例則是未取得法定身分移民(undocumented people)成功爭取到學區委員會委員選舉的投票權，他們學習到如何參與政府運作，不再只是被政府窮追猛打。房客與勞工聯盟幹部、喬治華盛頓大學英語教授莫先伯格(Dan Moshenberg)描述：「城市的地理特質在爭取權利的過程中展開。」

這樣的過程雖然並不完美，但確實能夠運作。根據多項指標，參與式政府能夠營造出更為優質的社區。[22]儘管一路走來必然會犯錯，直接受影響的往往就是犯錯者本人，然而與發展機構、政府與企業目前的做法相比，參與式政府還是更勝一籌。犯錯的官僚很容易就可以擺脫責任，就算因此被選民唾棄，也可以轉進他們原本要保護民眾免於其侵害的私人企業，占得肥缺。布希、錢尼(Dick Cheney)、倫斯斐(Donald Rumsfeld)、伍夫維茲(Paul Wolfowitz)的退休生活都過得無比愜意。

每一種社會行動都要歷經一段學習曲線，在奮鬥過程中從社會科學角度來觀照這個世界。從彈丸之地的棚戶，到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中國，我探討過的每一個案例都是如此。對於中國，儘管在官方鋪陳的表象之外，外界至今難以拼湊出完整確切的理解，不過還是可以退而求其次。中國一九八二年修憲時取消了工人的罷工權，理由是既然工人擁有生產工具，就沒有必要進行罷工。不過根據不同的消息來源，二〇〇六年還是發生了五萬到十萬起「群眾事件」，這個官方委婉用語代表超過一百人的勞工騷動事件。還有一個消息來源指出，二〇〇九年光是一月到三月之間，中國就爆發了五萬八千起群眾事件。[23]

中國勞工運動一個重要的訊息來源是韓東方，他曾在北京創立「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後來被政府逮捕，遭受嚴酷偵訊，而且被獄友傳染肺結核，因此切除一片肺葉。目前韓東方流亡香港，主持一家廣播電臺與網站，報導勞工權益問題。他描述自己如何在天安門事件時期創建全中國第一個獨立工會：

> 當時工人走上街頭，為的是要以道德支持來鼓舞學生，有如學生的老大哥，本身沒有什麼特定的訴求。我們問過一些工廠工人，他們只說希望政府對學生好一點，這樣而已。就連後來我們組織工會、擬定章程的時候，也是寫得很空泛，完全沒有提到福利、工資、工時或團體協商(collective bargaining)之類的具體條件，但是有提到工廠民主，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在政治層面和社會層面，我們的個人身分或勞動階級身分一直遭到壓抑，也無法以自身的需求為基礎來思考。我們試圖大躍進，但那是我們的第一步，其實並不知道該怎麼做。[24]

中國工人成立的工會都必須聽命於中華全國總工會，否則免談。到二〇〇八年底時，總

工會的確為工人做出一些成績，例如要求沃爾瑪讓工人組織工會，後來沃爾瑪的工人加薪八%。[25]相較之下，美國的沃爾瑪工人到現在還不能組織工會。

全球經濟衰退降低了中國政府維護勞工權利的熱忱，然而中國勞工——尤其是新近失業的勞工——愈來愈能夠表達意見。近來工人抗爭（worker militancy）風潮高漲，幾個倡導勞工權利的非政府組織也有推波助瀾之功，例如北京益仁平中心，協助因感染B型肝炎而遭解僱的勞工（全中國約有一億三千萬B型肝炎帶原者）爭取權益，對抗的大企業包括諾基亞與可口可樂。雖然諾基亞與可口可樂都否認指控，然而有幾份報告指出，八〇%的跨國企業會以感染B型肝炎為由而歧視勞工。[26]除了勞工組織的法律支援之外，新通訊科技也讓勞工更容易將自身遭受的惡劣待遇公之於世，手機簡訊則讓他們得以避開官方檢查傳播訊息。

這些中國勞工爭取的目標和伊莫卡利的同儕非常類似：居有定所的權利、受到公平待遇的權利、發表意見的權利、掌控非自身擁有事物的權利；簡而言之，就是爭取一種被中國共產黨政府禁絕的政治權利，一如南非棚戶居民爭取被資本主義禁絕的政治權利。[27]這種政治必然會挑戰權力的不公平性，方式除了直接衝突之外，還包括真正符合社會科學的建設性計畫，讓尋常百姓也能嘗試以新方法來組織、想像與建構社會關係。

如果上面的說法太抽象或者不合時宜，那麼一個現象可以廓清疑慮：全球現在有數百萬名參與者、運動人士經常舉行線上會議，討論如何解決這些問題，而且已經達成非常具體的

結果。自由軟體運動（free software movement）有一個廣為人知的口號：「是言論的自由，不是啤酒的免費。」（Free as in speech, not as in beer.）換句話說，雖然自由軟體通常是免費奉送，但它的「自由」在於接受者可以改寫修訂、與人分享，沒有任何限制。這和一般的免費軟體大相逕庭，拿到蘋果或微軟免費軟體的人受到法律限制，不能將軟體拆解開來，進行解讀與學習。現在全球有數百萬人藉助於自由軟體的企業模式和分權模式，分享彼此的經驗與見解，研發出來的產品從瀏覽器到醫學資訊系統無所不包。

開放著作權組織「創用CC」（Creative Commons）副總裁林克思維耶（Mike Linksvayer）告訴我：「我們自動自發地創造出一種知識的共有財，試圖收回過去百年來被圈占的無形資產。」林克思維耶是經濟學科班出身，因此能夠深入比較共同所有權與私人所有權的效益。但是他也指出，更具說服力的論點其實不是效益。私有領域雖然能以最具效益的方式製作軟體，然而自由軟體創作過程會帶來更多的自由，讓創作者擁有更大的自主權，原因在於取消了私有財產權，或者更恰當地說，「駭」掉了私有財產權。[28]

分享能夠免費複製、散播的資源，在虛擬世界是一回事，在真實世界又是另一回事。不過真實世界與網路空間的差異，反而是一個可以利用的優點。真實世界中光是討論誰來洗碗的時間，就足夠讓數位世界發展出幾種治理方式的原型，並且實際施行、調整修正。林克思維耶說：「這在人類社會要好幾個時代才做得到。」自由軟體運動只花了近二十年的時間，就

發展出多種民主、分權的政府形態，並且造成廣泛影響。相關的技巧不是由他人傳授，而是得自實踐和探問。

最著名的例子大概就是維基百科（Wikipedia），它因為運作上軌道，參與者也愈來愈多。維基百科並不十全十美，它成功的一部分原因在於針對條目新增或編輯的同儕審查流程，以及集體訂定規則的機制。除了提供無所不包的網路知識，維基百科和自由軟體運動一樣，還營造出更為微妙的經驗：社群互動、共聚一堂、鼓勵分享。這也是一種教育的經驗，應該能夠在真實世界發揮效用；我想盧梭如果知道，一定會成為熱忱的支持者。

我們相信維基百科的共有財精神能夠影響真實世界，還有幾個理由。電腦世界也會製造外部成本，資訊科技排放的溫室氣體約占全球排放量二%，與航空業不相上下。英國報紙曾經報導，兩次Google搜尋排放的溫室氣體相當於煮一壺咖啡；換算一下，全球一整天的Google搜尋量排放的溫室氣體，相當於搭乘飛機繞行全球九十一圈。Google公司對這些報導很不服氣，聲稱自己估計的數字要低得多。由於Google對其資訊科技基礎設施保密到家，我們只能姑且相信它的說法。自由軟體運動的主張則是，相關議題必須更為透明、公開。如果網路搜尋的運作原則能夠更為開放，就可以鼓勵人們貢獻更具環保效益的程式碼。至於現在，我們只能呼籲Google減少消耗能源。

藉由自由軟體運動提出的問題，我們可以回來探討私有財產的核心，以及財產能夠扮

演某種社會角色的觀念。所有權並不是天經地義，而是一種各方協商角力的結果，當代社會變遷一直在對公眾所有權與私人所有權的界線提出質疑。洛克認為勞動可以創造所有權的概念，其實只不過是一種社會期待，而且這種期待具有很高的可塑性。就一項集體計畫而言，沒有人會期待擁有計畫的所有權，私人財產的概念將因此消失，被更為開放的概念取代，其存續決定於創造者的自制與合作。從糧食反抗運動到自由軟體運動，社會運動一直走在政治與經濟實務的尖端，試圖開創新的做法來掌控這個世界，但是不必擁有世界。

這些社會運動的成敗關係重大。如果想知道原因，我們就必須回到糧食主權與氣候變遷的議題。全球現在有超過十億人正在挨餓，科學研究顯示氣候變遷的速率遠比先前的預測來得快；因此探討如何衡量事物的價值，並且避免貼上價格標籤，可能是決定人類這個物種能否繼續生存的關鍵，只希望現在努力還不算為時已晚。

9. 重探糧食主權

我對大自然玩兩面手法。

——伍迪艾倫（Woody Allen）

擁有空氣

南非棚戶居民運動、參與式預算會議與自由軟體運動，都可以視為博蘭尼「雙重運動」的一部分，它們要回應世界被轉化為財產的鉅變，以及共享資源管理方式的遭到摧毀。

然而有個問題，博蘭尼雖然曾經設想社會如何透過特定機制，保護自身免於市場傷害，可是地球本身並沒有這樣的機制，正如一句著名的口號：「大自然沒有紓困方案。」從許多指標都可以看出，人類這個物種對地球幹了什麼好事；而大部分的傷害是由富裕國家的民眾造成，我也是其中之一。目前最可靠的科學研究資料顯示，如果人類想繼續生存，就得將大氣層的二氧化碳濃度降低到三五〇ppm；現在的數值是三九〇ppm，而且每年持續上升二ppm。

世界各國政府逐漸瞭解溫室氣體汙染必須管制，然而覺悟時機實在太晚。現在地球顯然需要兩種做法雙管齊下：全球北方必須推動大手筆的結構性投資，減少民眾耗費的資源（如果全球每個人都像美國人或加拿大人那樣製造汙染，我們需要九個地球才能吸收人類排放的溫室氣體）；全球南方也必須進行巨額投資，讓貧窮民眾也可以使用非化石燃料的能源。關鍵問題在於主導這些管制的規則應該如何制定、必須照顧哪些人的利益。當前政府決策階層處理氣候變遷的思維，仍然是倚賴市場的運作。換句話說，各國政府在體認地球大氣層是一種公共財之後，現在正準備將它私有化，建立一套「總量管制與交易」體系，對溫室氣體汙染訂出上限（「總量管制」），但某些汙染者可以向其他方購買「汙染排放權」（pollution permit），減輕轉型適應低碳經濟形態過程的負擔（「交易」）。只要為二氧化碳訂出價格，甚至是很高的價格，市場應該就會解決所有問題；至少這是許多人的希望。任何像「總量管制與交易」一樣受到大力吹捧的政策，我們都應該三思而後行；更何況和它系出同門、同樣受惠於解除管制的金融工具，曾經製造出二十一世紀許多新奇（如今則是劣質）的金融產品。

全球金融災難尚未結束，再犯同樣錯誤將是愚不可及，然而人類處理氣候變遷議題似乎就是要重蹈覆轍。

在討論總量管制與交易機制之前，我們首先要指出這種做法的道德疑慮：透過市場機制，讓人們只要付費就可以糟蹋大氣層。正如電影導演伍迪艾倫所云，這是人類「對大自然玩兩面手法」，一方面倚賴它，一方面又要摧毀它。舉例而言，在汙染轉化為交易之後，美國可以一方面協助印度與中國的工廠改善汙染，一方面繼續欲罷不能地消耗石油。一些運動人士注意到這種做法是為美國開一道方便之門，讓它不必改變違反永續發展原則的行為，於是他們模仿總量管制與交易機制，設立一個諷刺網站「偷情中和」（CheatNeutral.com），會員分成兩種，對另一半保持忠誠的會員，可以抵消婚外情偷腥會員的罪惡。

儘管問題重重，汙染者為自身造成傷害付費的構想，還是有其吸引力，但問題是該怎麼付費？有鑑於氣候變遷也是一種汙染，為它加上成本似乎也是合情合理，汙染交易則是要創造一個決定成本價格的機制。既然如此，還有什麼問題？

氣候變遷議題權威、英國環境與社會組織「角樓」（The Corner House）研究員羅曼（Larry Lohmann）給了我一個可以拆解這個問題的答案：「汙染者付費原則在某些情況中適用，前提是價格訂定方式必須慎思明辨、民主運作，而且價格能夠對解決問題有所幫助。」問題在於，如果想讓價格機制對氣候變遷產生作用，我們必須先做好許多準備工作：替代性能源的研發

需要資金、管制法規需要修訂與執行、富國對窮國的援助必須明確承諾且具約束力；此外，民主運作機制當然也必須就定位。羅曼說：「這些工作都必須先完成，然後才能為二氧化碳訂出價格。否則相關討論雖然有趣，但終究不是當務之急。」

以價格機制來促成變化也是事倍功半。如果二氧化碳價格是控制氣候變遷的唯一方法，那麼這個機制的運作事關重大。可是認為光憑提高二氧化碳價格就足以解決氣候變遷危機，這種想法根本站不住腳。一九七〇年代雖然發生石油危機，但世人並沒有因此減少使用化石燃料。就連二〇〇八年的油價飆漲到天文數字，對於建立永續經濟也沒有什麼幫助。總量管制與交易的支持者聲稱，這套做法過去績效卓越，曾在一九九〇年代有效降低美國的硫排放量。然而羅曼指出，我們深入探討就會發現，當時真正發揮作用的不是「交易」，而是「總量管制」；不是市場，而是管制。[1]

如果總量管制才是關鍵，那麼我們就應該檢討今日總量管制與交易的「交易」部分，到底有哪些成效。一家旗下有多座燃煤發電廠的電力公司，其執行長不太可能樂意為排放的二氧化碳付費，當政府要施行任何可能帶來衝擊的新法規，他一定會極力向政府爭取豁免空間，要求給予不必付費的汙染額度，否則新增的成本會讓他的生意做不下去。在五個歐洲國家，由這類豁免額度帶來的豐厚利潤，到二〇一二年時將高達一千一百二十億美元。汙染者向能夠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公司或機構購買額度，「抵消」自家製造的汙染，省去解決自家汙

染問題的麻煩工作。然而問題在於，二氧化碳排放減量工作很容易上下其手，抵消額度中比例最高的是三氟甲烷（trifluoromethane〔HFC-23〕）減量，約占三〇%，這種化學物質是製造冷媒的副產品。事實上，冷媒製造商靠減量額度賺到的利潤比本業還高。這種現象會讓全球南方得到更好的科技與發展嗎？結果適得其反，它反而會鼓勵全球南方繼續使用老舊的技術。就十七家排放三氟甲烷的公司而言，幫它們更新老舊設備只需一億歐元，但是它們藉由排放交易可以賺到四十七億歐元。尼龍業與肥料業的溫室氣體排放也有類似現象。簡而言之，「汙染者付費」其實是「汙染者賺錢」。

總量管制與交易的贏家不僅出現在烏煙瘴氣的亞洲。羅曼引述花旗集團（Citigroup）歐洲電力事業研究中心（European Utility Research）負責人艾瑟頓（Peter Atherton）談到歐洲排放交易機制的獲利贏家：「各種形態的發電：贏家。燃煤發電與核能發電：大贏家。對沖基金與能源交易商：更大的贏家。輸家呢？嗯……消費者！……政策目標是否達成？價格上漲，排放增加，利潤攀升……可見並未達成。」艾瑟頓說得對，儘管高汙染工業在歐洲這套機制下的表現可圈可點，但是與金融機構相比還是自嘆弗如。這也是為什麼根據作家泰比的報導，高盛集團會興致勃勃企圖馬上進場，因為總量管制與交易等於是將徵收汙染稅的權利，從政府轉移到私人企業手中。[2]

二氧化碳價格理念背後有一個假定：市場能夠訂出適當的價格。其實儘管市場已經證明，對於可能性低但後果嚴重的事件，它非常不善於評估其風險。還記得「效率市場假說」嗎？支撐二氧化碳排放交易的正是同樣的信念。我們已經看到企業如何拉攏政府成為同路人，歐巴馬政府的總量管制與交易計畫是下一個目標，企業正試圖說服政府免費釋出八五%的排放額度。氣候變遷的嚴重性遠遠高於蒸發數兆美元的金融風暴，如今我們利用導致全球經濟衰退的同一套金融工具，來解決地球面臨的最迫切問題，恐怕不是明智之舉。然而我們對於其他衡量事物價值的方式根本視而不見，於是以市場為名的竊盜行為，就變成我們回應氣候變遷的唯一對策。

普林斯（Gwyn Prins）與瑞納（Steve Rayner）在《自然》期刊發表一篇頗具影響力的論文，指出：

> 氣候變遷並不適合細緻的解決方式，因為它並不是個別性的問題。我們應該將氣候變遷視為一種症狀，病因是特定的一種發展模式，以及全球相互連結的化石燃料能源供應體系。兩者形成複雜的架構，各種人類行為模式、實體物質與相應技術相互強化、相互糾結。只專注於其中一項因素，並無法改變如此複雜的體系。[3]

今日我們需要的是一系列政策，其目的並非訂定二氧化碳價格，而是將溫室氣體濃度保

持在三五〇ppm以下。我們對於人類動物本性的瞭解，點點滴滴都有助於我們探究解決方法。我們知道人類雖然會自私自利，但也嚮往公平公正；我們可以相互合作，發揮利他精神，追求社會正義與民主。

另一方面，富國必須開始償還積欠窮國的生態債務。全球北方與全球南方的政府必須盡快減少對石油的倚賴，而且不要指望市場能幫上什麼忙。共有財的運作需要規則與管制，最具效益的做法則是讓大多數人參與設計。共有財的理念，以及運用管制、懲罰、羞辱、正義和金錢的構想，有助於瞭解如何為氣候變遷訂出價格。羅曼指出：「氣候問題並不是新來乍到，它是許多老問題的延續。」為富裕階層打造浪費能源的基礎設施，已經讓窮人付出極為高昂的代價，衝擊原本就負擔沉重的社群。因此羅曼建議：「如果你想建構一個衡量氣候價值的體系，首先應該看看我們已經擁有的條件。例如人們能夠評估土地的價值，以及土地遭到摧毀的代價。第一步做法就是，連結氣候變遷與人們已經知道如何衡量其價值的事物。」

跨出第一步之後，還有漫漫長路，而且沒有捷徑可走。對於氣候變遷，我們如果找到致勝之道，也仍然需要進行長期抗戰。戰鬥要從各個領域發動，並且由追求公眾利益的堅實科學帶領。過程涉及法規管制、改變對於使用化石燃料的文化態度、克制個人習性、政府為潔淨科技與綠能工作提供經費。談到這裡，我們要回歸另一個領域，也就是我們先前的出發點：糧食。

糧食革命

探究糧食問題會觸及許多問題：土地與水的價值、能夠回應民眾要求的體制、個人權利、真正民主化的政治。去年有一份報告是由四百多位頂尖科學家撰寫，世界銀行首席科學家華特森（Robert Watson）領銜，探討二〇五〇年全球九十億人口要如何養活。根據《面臨十字路口的農業》（*Agriculture at a Crossroads*）這份報告的結論是，我們必須改變目前的工業化農業體系，因為它無法恰當衡量自然資源的價值。放眼未來，資本主義工業化農業需要的大量水資源與肥料將難以為繼，而氣候變化將更為劇烈。在這方面，小農既是受害者，也是拯救者。他們經濟狀況比較差，因此特別容易受到氣候變遷的衝擊；不過從生態學來看，小規模農業反而比較能夠承受氣候變遷。此外根據一項針對農業規模的長期研究，永續性的有機農業能夠封存現今二氧化碳排放量達四〇%。[4]

如果我們要遵循這份報告的建議，避免日後爆發資源爭奪戰，我們需要新的分權式規畫方法，以及根據地方特質設計的將資源轉化為共有財的方式。就實務層面而言，這意味我們要從幾個不同的體制面推動民主。共享水資源的決策必須依據分水嶺的地理形勢；關於糧食種植與分配的決策，可能要考慮地方行政體系。這些決策與氣候變遷的互動，必須從全球觀點進行協調。當頂尖科學家設法解決全球饑荒問題，他們提出的對策與最貧窮的人所見略

同：因應地方特質，關心生態環境，尊重在地人的知識、民主與自主。

要養活全人類，刻意淡化未來挑戰將是愚不可及，個人層面或政治層面都是如此。一旦全球人口來到九十億，肉類消耗必須減少。如果人類還要繼續吃肉（我對此存疑），屆時平均每人每年只能消耗二十五公斤肉品與五十公斤乳品，超過這個額度就會讓氣候問題惡化。糧食氣候研究網絡（Food Climate Research Network）的嘉娜特（Tara Garnett）估算，這樣的額度意味每人每星期最多只能吃兩條香腸、一小塊雞肉、一小塊豬排，外加泡早餐穀物與茶的牛奶。要抑制西方人對肉類的強烈喜好相當困難，必須全面對抗食品加工業與零售業的利益，並調整改變自身的習慣。不過我們必須習慣一客漢堡兩百美元的價錢；我們也要盡可能讓大家做類似的消費選擇。我們還必須挪出時間來從事政治活動，也就是必須改變許多做法，小至減少看電視，大至縮短我們習以為常的長工時。

雖然舊日的期待有一部分會消失，但是新生的期待要補償綽綽有餘。在一個積極開發綠能工作的經濟體之中，生態農業的糧食生產會比傳統農業創造更多就業機會，減少耕地面積但提升產量。一項研究估計，只要將英國二〇%農地轉化為有機耕種（還不算完全做到生態農業化），就可以增加七萬三千二百個工作機會。另一方面，在地糧食消費對氣候和經濟都有助益。美國愛荷華州一項研究指出，在地糧食消費若增加一〇%，全州溫室氣體排放量每年可減少三千五百噸。日本一項類似的研究發現，在地糧食消費可以為每一戶人家節省二

〇%的能源開支；減輕低收入地區的營養不良問題，每年因此省下數百萬美元的社會與醫療成本。[5]這就是希望所在。

對於糧食主權和氣候變遷議題，雖然各國政府的因應一直過於消極，然而許多地方的民眾已經掌握主控權，推動變革。從加拿大的多倫多、智利的曼札諾（El Manzano）到日本的藤野町（Fujino），都設立了監督地方政府全面解決飢餓問題的糧食委員會，以及為後化石燃料時代都市生活做準備的「轉型城鎮」（transition town）。[6]

這些案例透顯出一個更深刻的原則：為了推動永續發展的政策，過去在我們放任之下主宰世界的「人造人」，無論是公部門還是私部門，都必須改頭換面；而我們對於財產的概念也必須全盤調整。這樣的過程正在發生，南美洲厄瓜多的新憲法賦予大自然「生存的權利，永存的權利，在演化中維繫與更新各方面重要循環、結構、功能與過程的權利」。當然，白紙黑字的權利未必能夠落實在現實世界，不過厄瓜多政府已經槓上石油業鉅子雪佛龍（Chevron），因為它摧毀了一片面積相當於美國德拉瓦州的森林；而且據《華爾街日報》報導，雪佛龍「恐怕會輸掉這場官司」。[7]厄瓜多的運作模式仍是中央政府大權在握，持續發展其他採掘工業（extractive industry），而國營事業也繼續汙染環境，侵害大自然的權利。透過政府的運作機制來對抗企業，讓人造人彼此相互抗衡，以爭取界定何謂財產的主導權，從來就不是簡單的工作；然而這場鬥爭已經發動，就連當代資本主義大本營美國都不例外。

推翻經濟人

美國賓州律師林濟（Thomas Linzey）是厄瓜多新憲法的推手之一，在美國也相當活躍，擔任社區環保法律捍衛基金（Community Environmental Legal Defense Fund）執行長。這個組織創立之初是要協助解決特定的環保問題，後來戰線愈拉愈長，主要敵人是阻撓社區保護自身免於環境傷害的州法規。有一個案例是社區對抗大型養豬場，業者拿到廢棄物排放許可，得以豁免嚴格的法規管制，州政府只需每三個月抽查一次廢水中有無大腸桿菌和重金屬。然而這些廢水有可能置人於死，一九九五年，悲劇發生，兩名年輕人潘諾克（Daniel Pennock）與貝胡恩（Tony Behun）接觸養豬場廢水之後發病身亡。社區環保法律捍衛基金設有一所民主學校，傳授學生直接對抗企業的組織技巧，名稱就叫「丹尼爾潘諾克民主學校」（Daniel Pennock Democracy School），其中一項課程是透過實例介紹企業如何以各種方式，壓制社區創造民主機制的權利。

一個案例發生在一九九四年，佛蒙特州的選民要求知道，他們喝的牛奶是否含有重組牛用生長激素（recombinant bovine growth hormone）。加拿大、澳洲、紐西蘭與歐盟部分國家禁用這種激素，但是美國廣泛使用。聯邦法院判決佛蒙特州的乳品標示法違法，理由是它侵犯了乳品公司的「緘默權」。食品業有無數類似的法規，其源頭都是企業被視為「法人」，因

此擁有某些權利。林濟在二〇〇三年接受訪問時指出，其結果就是「環境法規能管得到的，就只剩環保人士」。[8]這也是他在賓州克拉利恩郡（Clarion County）推動廢除企業法人資格的原因。社區環保法律捍衛基金最近還參與一場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民主運動，起因是雀巢公司試圖汲取緬因州一座小鎮的地下水，來供應「波蘭泉」（Poland Spring）品牌瓶裝水，於是小鎮居民利用該基金提供的工具，發起保護水源的抗爭行動，伸張他們對資源的主權。地方運動並不容易推動，地方力量也未必會比中央政府更開明進步、追求永續、用心良善。然而這些小規模的運動就像一種由社區主導的脫逃術，讓我們一步一步解除市場為民主社會加上的手銬腳鐐。

這一點也告訴我們，追求糧食主權的最大收穫是：它帶來的自由。在印度安得拉邦（Andhra Pradesh）的美達克（Medak），赤貧的達利人（Dalit，通常被稱為賤民，其實原意是「被壓迫之人」）處境苦不堪言。在將近三百萬人口中，每一百人就有一人因為積欠債務，被迫當奴工，淪為債主的私產。這些奴工幾乎都來自「特定的部落或種姓」，近七〇%是兒童。印度過去六十年來都是個獨立民主的國家，然而民主必須在數百年的封建體制與宗教教條上扎根。[9]達利人社區的婦女特別容易遭到剝削，然而她們也催生出一個蓬勃發展的社區組織實驗。

「德干發展協會」（Deccan Development Society）創立於一九七九年，迅速發展出七十五

個「商堪」(sangham)，也就是由貧窮婦女組成的村落會議，她們大部分都是達利人。[10]研究德干發展協會的學者艾嘉娃(Bina Agarwal)指出，隨著印度社會日益都市化，對於種植糧食以養活都市居民，女性的角色愈來愈吃重：從事農業工作的印度男性只占五八%，女性卻占七八%。[11]十多年來，德干發展協會的五千位娘子軍針對糧食種植與分配，實驗過各種新舊不一的方法。她們經營管理自家的市集，在其中買賣自家生產與消費的商品。由於沒有兩頭剝削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中間人，德干發展協會得以大幅降低糧食價格，而且由於生產過程有機化，因此吸引了許多都市中產階級消費者。

協會也嘗試推動土地租用計畫。商堪的女性通常受僱於非常辛苦的除草工作，現在她們集體合作，向地主租用土地。地主也樂意出租肥沃度低落的土地，因為他們知道商堪使用生態農業方法耕種，出租四年之後，土地的狀況將大為改善。

土地租用或許不算多具革命性的做法，然而整個計畫的關鍵不在於每個月繳納的租金，而在婦女組織動員的過程。一位成員說：「我們以前連話都不敢說，如今在商堪的協助之下，我們發現自己的力量、找到自己的聲音，我們覺得力量大增，有信心能夠因應各種挑戰。」後來當地主堅持要改用「老辦法」，這股新增的力量就發揮重大作用。一個佃農商堪原本與地主平分收成，後來地主反悔，拒絕給予商堪婦女五〇%收成，於是她們展開反擊，駕牛車到田裡把灌溉設備偷走。地主一狀告到村里大會「潘查亞特」(Panchayat)，大會裁定地主可

以拿回設備，但是必須把婦女應得的收成還給她們。雖然這還不算非常徹底的公平分配或革命，然而已經是邁向改變的重要步驟。商堪的婦女試探私有財產的界線，從而收回自己的權力；她們不僅偷走地主的灌溉設備，也堅持自己有使用土地的權力，因此才有機會從事農耕。梅儂(Gayatri Menon)在一篇開創性的分析研究中，引述德干發展協會成員拉奧(Rukmini Rao)的話說：「婦女如果單打獨鬥從事農耕，會遇到很大的困難。但是將她們集結起來之後，情況對她們比較有利，因為這麼做可以整合不同的技巧、構想、經驗與資源。」[12]

協會婦女管理的資源，有文化資源也有生物多樣性資源。她們爭取尊嚴的過程，也包括對於「現代農業」來到之後被捨棄的許多農作物種子，進行儲藏與培養。[13]商堪身為生物多樣性的維護者，它推動糧食主權的工作建立了社區的基因庫，許多不同品種傳統農作物的種子都可以免費外借。這些品種遠比其他地區商業種植的稻、麥健壯，需要的水與化石燃料也比較少。氣候變遷將嚴重衝擊印度，導致氣溫上升攝氏三到五度；而印度最重要的水源——灌溉亞洲稻米產區的喜馬拉雅山冰川，預計在二〇三五年就會消失。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所主任薩克斯(Jeffrey Sachs)最近召開一場會議，主張利用基因轉殖技術，培養能夠適應氣候變遷的農作物。然而讓他意想不到的是：沒有哪一種基因可以對付氣候變遷。有些基因或許可以預防特定的疾病，但是對於人類製造溫室氣體導致的六種農作物問題，**沒有**任何基因可以全面對抗。夠專業的農業學家或遺傳學家都知道，「一個基因對付一種性狀」(one-

gene-one-trait）的理念雖然一度風行，但時至今日已難以為繼。藉由提高土壤的肥沃度來捕集二氧化碳，選擇數百年來在特定地區欣欣向榮的多種品種來分散風險，這樣的農業體系可以做為一種模式，協助我們開發因應氣候變遷的農業體系。德干發展協會的作為正是如此，印度一家全國性報紙甚至以頭條宣稱，這些女農人可望擊敗氣候變遷。[14]

德干發展協會的婦女知道，推動永續變革需要的知識，不能局限於單一來源，而是多多益善。正因如此，商堪產生的知識也不會局限於單一的農作物種子、單一的專利申請、單一的農業經濟體系。這些知識涵蓋社區基因庫中的多種農業技術。農業永續發展不必倚賴農業科技，人們不相信這個理念的原因在於，對「agriculture」（農業）的理解有所偏差。「agriculture」是「agri」（農耕）加上「culture」（文化），但永續發展最重要的憑藉不是農耕，而是文化。正因如此，商堪的婦女能夠運用二十一世紀的媒體，創造不一樣的文化與知識。

德干發展協會的會議召集人莎提許（P. V. Satheesh）相信，影片可以做為一種教育工具。協會婦女製作的影片內容豐富、技巧先進，會讓好萊塢相形見絀。她們喜歡使用低角度鏡頭，由下向上觀照自己的工作。她們不喜歡「帕特爾角度」（Patelangle），也就是地主高高在上俯視她們的角度。（「帕特爾」在英國只是一個普通的印度裔姓氏，在印度安得拉邦卻是指擁有大片土地的地主，會讓人聯想到美國金融騙徒馬多夫〔Bernard Madoff〕、電影《華爾街》（*Wall Street*）男主角蓋葛〔Gordon Gekko〕或者蘇聯獨裁者史達林〔Joseph Stalin〕。）我研究過世界各

地許多社會運動都是如此，它們維繫、照顧、發展、頌揚的目標除了實體資源之外，還包括自家的文化；它們瞭解物質與文化的世界猶如軀體，要讓每一個人都能夠站上兩者的肩膀，都能夠使用、分享與營造。

這種共有財的無限可能，將帶來真正的解放。

價格與價值格格不入導致的問題，並不是出自缺少技術熟練的執行者，而是市場衡量事物價值的能力徹底失敗。管理顧問公司麥肯錫（McKinsey）給新進員工訓練員的座右銘是「萬事萬物都可以衡量，可以衡量的事物就可以管理」。[15]當事物價值決定於利潤導向的市場，地球資源必然會承受日益嚴重的不良管理。我們可以量化價格背後一部分的隱藏成本，也應該這麼做；然而要全面解決社會資源分配不當的問題，對每一件事物貼上價格標籤是行不通的。有些事物不能以數字來概括，但它們仍然需要管理，而唯一公平的方式就是民主政治。市場無法衡量事物的價值，我們的因應之道並不是由專家主導的民主政治，而是專業與資源的民主化。

10. 安氏盲

什麼都不說就一無可得：再說一次。

——莎士比亞，《李爾王》

有兩部小說可以改變一個十四歲書呆子的一生：《魔戒》（*The Lord of the Rings*）與《阿特拉斯聳聳肩》。一本講的是兒童的白日夢，可能導致成年之後出現情緒失調與社交障礙，一天到晚想讓現實生活過得像奇幻小說。另一本講的是半獸人（orc）。

問題在於數十年來，《阿特拉斯聳聳肩》的信徒一直是政府的掌舵者。到二〇〇八年為止，他們將全世界變成一個價格與自我中心幻想樂園的嘗試，已經成為夢幻泡影。數百萬人在他們嘗試的過程中遭殃倒楣，還有數百萬人在他們嘗試失敗之後淪為受害者；如果我們處理這場經濟、社會與環境危機的方式重蹈覆轍，未來恐怕還會有數十億人受苦受難。

過去三十年來，圈占行動的效率愈來愈高，偷竊財富的規模愈做愈大，已經將地球帶向毀滅的邊緣。在國際舞臺上，富國將破壞環境的成本轉嫁到窮國，全球暖化是最明顯但非唯一的例證。最近一份報告雖然以非常保守的方式估計，仍指出氣候變遷每年將衝擊三億二千五百萬人，導致的死亡人數也高達每年五十萬人（相當於每年死於乳癌的女性人數），而且這些死者絕大部分都不必為全球暖化負責；當初將他們的國家變為殖民地的強權，才是這場災難的元兇。[1]這並不是主張因為缺乏適當的定價方式，所以汙染者不應付費，二氧化碳排放不能有價格。然而將定價的工作交給資本主義，就好像要冰山來修復遇難的鐵達尼號。從本書前半對於「免費」商品的兩度探討，就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我們檢視企業如何提供免費商品，還有政府依樣畫葫蘆的後果。僵化強硬的財產機制與利潤導向的市場及企業，在我們縱容之下蓬勃發展，創造出一個缺陷嚴重的體系，來衡量事物的價值。

我們應該從什麼地方著手，才能夠重新平衡市場社會？一旦我們決定交易由市場規則主導，想把精靈關回瓶中將是無比困難。神經經濟學與社會學研究金錢交易關係的不可逆性時發現，市場可以變成一種社會毒素：如果哪天一個人和愛人做愛之後居然付錢給對方，這段感情同時也將畫下句點。我們的任務更為艱鉅，不僅要使特定交易免於金錢染指，使政府沒有企業的貪婪搶奪，也要使我們的政治想像脫離單調、沉重的消費主義。

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爆發之後，布希總統要療傷止痛，但他能想到的辦法只有鼓勵民

眾以購物消費來對抗恐怖主義，好像只要花的錢夠多，損害與創傷就可以平復。幸好布希的哲學並不是唯一的選擇，有些哲學與宗教努力嘗試化解貪欲腐蝕人心的危險，其中最先進的可能是佛教，原因或許是它的思想以消除欲望為宗旨。佛教經濟學的旗手修馬克（E. F. Schumacher）是凱因斯的同事，他在深刻省思自己過去奉行的理論之後，寫了一部膾炙人口的論文集《小即是美》（*Small Is Beautiful*），詮釋更具永續精神的經濟學。[2]佛教經濟學的核心是一套關於需求和欲望的理論，但是內涵與古典經濟學截然不同。佛教對人之所以為人有一番特殊的觀照：人很容易被欲望支配，煩惱起於執著。佛陀本人是王子出身，發現財富並不會為他帶來幸福快樂，於是放棄一切財產，進入森林，貧窮度日。然而貧窮之中也沒有幸福快樂可言，他這才領悟到貧窮與財富之間的「中道」：不必全然排斥身體感官的愉悅，只需體認渴求這種愉悅會帶來煩惱。[3]

我們可以進一步引申出一套佛教的價值理論。事物的真正價值不是它滿足渴求、欲望或虛榮的能力，而是它是否能夠為人們帶來幸福感。有了這番體認之後，從豪華轎車、新款手機到鞋子，那些由廣告商大力促銷、聲稱可以讓人快樂的五花八門商品，全都會黯然失色。

如果這就是佛陀思想的全貌，那麼唯一的結論將只是某種帶有狂熱信仰的生活方式，奉行者每天修練如何清心寡欲。清心寡欲當然有其益處（古老的斯多噶學派〔Stoicism〕也是如此奉行，以現代術語來說，它們都是一種「自我技術」〔technology of the self〕），[4]不過佛教

對於推動更廣泛改變的必要性，另有一套更宏觀的見解。

幸福美好的生活有其社會脈絡，我們必須先處理這種脈絡，才能將金錢價值的精靈關回瓶中，並根據一種特別的人性觀點，發展出一套價值的政治。泰國的佛教僧侶積極投入保護環境的抗爭活動（泰國的森林是全球砍伐最嚴重的森林之一）。[5]當年佛陀是在菩提樹下覺悟，因此泰國僧人在抗爭中為一棵菩提樹「剃度」。這棵樹所屬的森林飽受蹂躪，雖然是當地民眾的生存憑藉，但在水壩工程的威脅下岌岌可危。僧人在剃度儀式中為這棵樹裹上橙色僧袍，凸顯它的神聖特質，並表達他們對商品化的批判：市場存在於自然之中，社會與自然能夠也必須畫定市場的界線。許多文明在很久以前就體認到的一個觀念，近來又被生態學家重新發現：我們並不擁有自然，而是屬於自然。[6]

我們體認到市場內嵌於社會、市場社會內嵌於生態之後，當然會質疑當代的價值機制。或許正因如此，達賴喇嘛曾經表明他對經濟體系的偏好，在印度管理學院（Indian Institute of Management）的一場演講中，他故做驚人之語：「我是一個馬克思主義僧人，一個佛教馬克思主義者。我屬於馬克思主義陣營，因為馬克思主義比較合於倫理，不像資本主義。做為一種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重視工人的福祉，主張國家的財富應該分配給人民。」[7]

達賴喇嘛的經濟公義觀點，在全球北方並沒有得到廣泛的報導，因為他在這個地區被視為一個和藹可親、不問政治的智者，關心來生來世，對今生今世輕描淡寫。其實他的經濟

學立場完全符合佛教教義（與表面上標舉馬克思主義的中國政府卻格格不入）。這個事實可能會在歐洲造成認知錯亂，在美國問題更為嚴重，因為這兩個地方有一個根深柢固的觀念：馬克思主義者就是中共或蘇聯政權的同路人。達賴喇嘛雖然受到馬克思主義政權的迫害，但卻能夠發現這套思想體系的價值，這一點可以讓我們更深入認識達賴喇嘛本人，以及馬克思主義遭受的誤解。佛教的經濟與政治模式涉及一種價值取向，與道德消費運動（ethical consumerism）截然不同，甚至與四年一次的選舉體制也大異其趣。這種取向的政府透過日常的政治運作，掌控價值、資源與分配。

讓民主運轉起來

這麼做實在不容易，任何人都不應該小覷。重新建立對付市場社會的能力、收回擁有權利的權利，都是相當困難的工作。首先，人們要為衝突做好心理準備，認清民間部門的某些實體是問題的結構性成分，不能做為解決問題的方法，必須挑戰質疑。每一種社會變革思想都會勾勒自己的敵人。有人把甘地（Mohandas Gandhi）的思想改頭換面，有如一座到處都是念珠與香爐的大帳篷。其實不然，甘地思想雖然絕不訴諸暴力，但還是會發動抗爭與衝突，溫和的抗爭仍然是抗爭。世界各地的運動已經發展出各種面對衝突的心理工具，依循的原則

一方面是眾人平等，一方面是要求掌控接納包容的原則。

這類運動當然會對現況形成威脅，也因此在我討論過的案例中，許多運動的成員都被貼上不法之徒的標籤，從農民到棚戶居民都不例外。將異議人士變成罪犯，靠的不是魔法，而是今日市場社會的意識形態：儘管人們對市場應扮演角色的共識相當薄弱，但是這個共識絕對不容挑戰。美國社會運動人士霍夫曼（Abbie Hoffman）曾說：「衡量民主體制的指標是它給予異議人士的自由，而不是給予隨波逐流者的自由。」如此說來，全世界實在沒有幾個國家稱得上是民主國家。

以「金斯諾斯六人幫」（Kingsnorth Six）事件為例，二〇〇七年十月，六位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成員迫使英格蘭東南部一家燃煤發電廠暫時關閉，要求政府停止研發新一代的燃煤發電廠。他們企圖在煙囪漆上幾個大字，呼籲首相布朗（Gordon Brown）懸崖勒馬，但只來得及漆上布朗的名字。抹除這個字眼得花三萬英鎊，六位成員也被法庭依刑事罪名起訴。六人幫在法庭上辯稱，雖然他們的確是在發電廠搞破壞，然而目的是為了避免更嚴重的破壞，而且有法律依據。一幢房子著火時，如果你破門而入救人，你的破壞就是為了避免更大的傷害。他們向陪審團說明當前氣候變遷造成的傷害，指出讓發電廠關門一天可以為全人類減少一百五十萬美元損失。結果陪審團接受他們的理念，六人幫無罪開釋，英國政府被迫讓步。這項判決甚至被《紐約時報》譽為二〇〇八年最具影響力的理念。為了追求更公正、更永續

的世界，以維護全球正義為名而採取直接行動，挑戰私有財產的界線，這種做法無疑有其必要性，不過還算不上激進。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高爾（Al Gore）認為：「事態演變至今，我們可以發起公民不服從（civil disobedience）行動來阻止興建新的燃煤發電廠。」[8]金斯諾斯六人幫審判展現了直接行動的力量，猶如全世界最優質的一座政治劇場，兼顧教育、召募、娛樂的功能，讓其他人也能夠以新穎、大膽的方式來發起行動。只談論金斯諾斯六人幫的成員，不免會忽略審判中其他人的貢獻，律師、活動人士和支持者都發揮了作用，扮演關鍵角色的則是十二位男女：陪審團。

一個造成重大改變的法律判決，主導者不是政府官員或發電廠會計，而是十二位身分普通、默默無聞的男男女女；這一點非比尋常。這十二位陪審員藉由他們的商議和集會，發揮理性與自由，顯示真正的民主應該如何運作：衡量價值的法則要由人民來決定。

雅典做為民主政治的樣本，已經是老生常談，然而大家可能仍然會感到訝異，今日以民主為名的鬧劇和雅典人的民主運作其實沒有多大關聯。[9]雅典並沒有我們今日熟知的選舉，政治主導者並不是一群私相授受的權力追逐者，而是每一位市民，運作方式則是以抽籤代替選舉。首先抽籤選出十二個市民團體，各由五百人組成，全體六千人負責治理雅典，每一個市民團體都要審判案件，專家和律師只扮演顧問的角色。

抽籤選擇背後的理念在於，任何一位市民都不能被剝奪參與商議性公義（deliberative

justice）的機會與責任。商議的過程也不僅止於法院——法院以十二名陪審員審判案件保留了這種體制的遺風——它可以，也應該再延伸到其他地方。歷史學家詹姆士（C. L. R. James）一九五六年在一篇精湛的文章〈人人都可治國〉（Every Cook Can Govern）中指出，這個體系可以、也應該發揚光大。[10]今日的民主政治被降格為每四年一次的例行事務，但雅典人不一樣，他們對政治相當認真。對他們而言，「民主」與「平等」（isonomia）是同義詞，不想參與的人被視為「自私自利者」（idiote）。[11]「idiote」在今日的英語中演變為「笨蛋」的意思，其實它原本的含義更是強而有力。伯里克利（Pericles）對雅典民主的讚頌，有如今日社會運動爭取某些主權的宣言：

> 整體來看，我認為我們的城市是全希臘的典範。每一位市民在生活的每一個層面，都能夠顯示他理所當然是自己的主人，並且以無比的風範與豐富的技能展現這種自主性。[12]

民主不是雅典人的專利。德國烏帕塔大學（University of Wuppertal）的一個計畫團隊，以及美國明尼亞波利（Minneapolis）傑佛遜中心（Jefferson Center）的「政策陪審團」（policy jury），都曾以隨機方式選出公民，讓他們聽取專家的證詞並進行商議，然後做出民主的決策，

結果顯示這些決策具有「相當高的一致性」。[13]對於建立一個能夠運作的民主機制，沒有哪一種社會運動有十足的把握。莫先伯格「城市在抗爭中開展」的理念，韓東方不知如何邁出第一步的迷惑，墨西哥恰帕斯州（Chiapas）拉坎敦叢林（Lacandon jungle）的男男女女都心有戚戚焉，因為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Zapatista）正在當地打造一種新的民主機制。他們一路犯下的錯誤也是民主過程的一部分，這個過程甚至有個特別的名稱：「邊走邊問」（Preguntando caminamos）。為了實地觀察，我搭機飛往墨西哥。

結果我看到許多口罩。來到墨西哥市的機場，每個人都戴上藍色的外科口罩。我的口罩得自一名士兵，他揮一揮手中的槍，要我最好戴上。人們彼此防備，H1N1新型流感不久前爆發，與你同行的人都可能是帶原者。這些口罩顯示墨西哥正在付出龐大的外部成本，問題根源與糧食關係密切，而且很快就會擴散到墨西哥之外的地區。

儘管主流英語媒體一直沒有報導，[14]但是墨西哥本國媒體長期關注卡羅爾農場公司（Granjas Carroll）養豬場惡劣的衛生狀況，它是美國肉品業者史密斯菲德（Smithfield）的分公司。[15]養豬場位於維拉克路茲州（Veracruz）的格羅利亞（La Gloria），每年要宰殺近一百萬頭豬。[16]二〇〇九年三月三十日，[17]疫情延燒到墨西哥市一個月之前，公衛官員在當地發現第一個新型流感案例，病毒是由豬跨越物種界線傳染給人。

史密斯菲德公司堅稱它曾經反覆檢查豬隻，並沒有發現任何新型流感病毒。然而《紐約時報》指出，多位獸醫學專家質疑這些檢查未必有意義。史密斯菲德的養豬場與流感疫情的關聯仍有待科學驗證，有些美國政府官員認為疫情發源地是亞洲，不是墨西哥。無論如何，圈飼動物（confined animal）作業很有可能就是元兇。[18]

疫情期間出入公共場所的墨西哥民眾，都必須戴上藍色口罩，因為病從口入。[19]不過我的目的地不是墨西哥市，而是最南端的恰帕斯州。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一九九四年在當地向墨西哥政府宣戰，當我會見運動成員時，看到另一種作用完全不同的口罩。解放運動以宣言為過去五百年的歷史定位：

> 我們是五百年奮鬥抗爭的產物：首先是反抗奴隸制度，接下來是發動獨立戰爭對抗西班牙、反抗北美洲帝國主義的兼併、落實我們的憲法並驅逐法國帝國主義者。後來迪亞斯（Porfirio Diaz）的獨裁政權拒絕給予我們改革法（Reform laws）承諾的公義，我們再度大舉反抗，比利亞（Pancho Villa）、薩帕塔（Emiliano Zapata）等領袖先後崛起，和我們一樣是出身貧窮。我們一直欠缺準備，因此敵人把我們當成炮灰、劫掠我們國家的財富。我們完完全全一無所有，沒有房子、沒有土地、沒有工作、沒有醫療、沒有糧食、沒有教育，但是敵人一點也不關心。另一方面，我們無法以自由民主的方式選舉政治代表、無法擺脫外國勢力、無法確保自己與後代子孫的和平與公義。[20]

這份宣言公之於世十五年來，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已經爭取超過五百萬英畝的土地、興建許多基層醫療設施、為「解放區」無數民眾提供學校教育。然而他們最大的勝利不是這些成就，而是一場極為成功的民主與公義實驗。我來到恰帕斯州，會見解放運動「好政府委員會」（Juntas de Buen Gobierno）的代表，當時他們都戴著運動成員的標準配備：滑雪面罩。[21]

戴面罩的理由之一當然是擔心墨西哥政府的迫害，尤其近來軍方頻頻增兵恰帕斯州，解放運動成員的風險愈來愈高。不過戴面罩還有另一個理由。解放運動民主體制的基礎是村莊，每個村莊的人家少則十五戶，多則一百戶，他們定期集會，每個人都可以參加，都可以發言。村莊透過會議任命兩位或四位「負責人」，男女各半，既是村莊的領導人，也是地區（十五個到一百個村莊）代表大會的代表。這些地區再從每一個村莊遴選代表，組成自己的好政府委員會；解放運動控制地區設有五個好政府委員會。委員會成員每六個星期要抽出一個星期，到委員會總部所在地任職，三年任期結束後不得再擔任委員。委員會的成員經常變化，但是功能運作如常。

滿室的滑雪面罩讓我瞭解到，當地民眾雖然參與民主，但是沒有染上民主最具傳染性的併發症：選舉。這些民主官員並不是坐在配備冷氣、掛著個人大幅肖像的辦公室裡，而是以無名氏身分來為自己的社區服務，遮掩臉孔的面罩就代表他們的職權。面罩還有另一個政治目的，提醒拜訪委員會的人，你看到的不是特定的個人，而是「人民」；會議室裡最重要的臉孔是你的臉孔。不過委員還是有個人責任。委員會有時會發布譴責信，公開譴責違反人權的行為，例如最近墨西哥軍方以「毒品戰爭」為名，把加路恰（La Garrucha）一處集體耕作的玉米田當成大麻園，加以摧毀。委員在譴責信上會簽署真名，除此之外，他們唯一的職權標幟就是面罩。

在進入解放運動控制地區的關卡上，都會懸吊一塊告示牌：「你已進入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地區，在這裡人民當家作主，政府奉命行事。」這一點與墨西哥以貪汙腐敗出名的執政黨革命建制黨（Institutional Revolutionary Party）正好相反（這個黨雖以革命為名，其實在架構上比較接近美國共和黨或英國保守黨）。好政府委員會一位成員解釋：「在墨西哥，聯邦政府會試圖收買你的選票，革命建制黨則是分送汽水來收買你的良心。然而在這裡，我們不拿錢，完全是因為自己被選上，才會擔任公職。」他們特別強調擔任公職實在是情非得已，因為到委員會總部任職期間，他們必須另外請人照顧農地或孩子；不過他們也都知道參與委員會工作的重要性。

委員會成員很少接受訪問，訪問者不能觸及他們的姓名、年齡、職業、個人意見，因為正如前面指出的，這些資訊都不重要。委員會要我事先提出一份問題清單，讓他們帶回去研究，討論出大家都同意的答案，然後再請我到場，聽他們逐一回答問題。五個委員會的總部名稱都叫「蝸牛」（Caracol），頗有深意。我問一位委員為什麼取這個名字，他說：「三個理由。

首先，蝸牛行動雖慢，但是腳踏實地；其次，我們的祖先吹海螺來召集會議；第三，蝸牛殼的形狀象徵訊息的進出，正如委員會的運作方式：傾聽與對話。」

熟悉慢食運動（Slow Food movement）的讀者應該看得出兩者的相似之處。慢食運動的理念是要抗拒資本主義對食物帶來的加速度，堅持食物生產過程要與環境協調，與生產相關的勞動必須得到尊重。不要速食，只要慢食。嚐過慢食的人都知道，那是一種發人深省的經驗。雖然慢食運動帶有中產階級生活情調的色彩，但它的理念相當激進，可以呼應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兩者都強調每個人都有權利參與、享受周遭的世界，真正的民主需要長時間經營。解放運動有一個笑話：

問：換一個燈泡需要幾個解放運動成員？

答：過兩個禮拜再給你答案。

解放運動的所作所為是一種「慢政治」（slow politics）。訪客以及與解放運動合作的非政府組織，對於反覆諮詢、討論與商議的過程可能會感到不耐。解放運動的做法看似欠缺效率，被迫等候的非政府組織也常覺得很難受，然而這反而代表它們錯估了時間的價值。解放運動的政府不是不能快速反應，你不想要商議緊急事務，解放運動也有兩部救護車和一間診所，隨時可以提供各種醫療服務。然而公義與政治的決策需要時間，人們不會要求重大刑案必須速審速結，或者縮短舉證時間以便盡快做出判決；政治也是如此。緊急狀況需要快速反應，反抗運動則是細水長流。

解放運動對這一點講得很清楚。一位戴面罩的成員告訴我：「大家都知道我們在十五年前向政府宣戰。但大家也都也知道，槍戰只持續了十二天。真正重要的是政治作戰。以教育來比方，興辦一所中學很費工夫，因為你要先把小學辦好。這些工作不是一兩天就可以完成，我們要花很多時間來摸索方法。」

方法有時隱而不顯，剛開始甚至毫無頭緒。一位女性成員說：「當初我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她的眼睛透露出來的年齡是三十多歲，「我們甚至沒有把握自己的政府形態能不能運作下去，然而我們終究做到了。」心理學家與行為經濟學家最近也發現，就特定的做事程序而言，人們花的時間愈多，成效也會愈好。一位研究人員引述福特（Henry Ford）的自傳說：「浪費掉的時間和浪費掉的物資，差別在於前者無法廢物利用。」[22]經濟學家的發現和解放運動的實踐都指出，只要建立一個架構健全的系統，讓參與者花時間相處共事，就可以培養出深厚的相互信賴。

好政府委員會推行的商議式民主極為成功，連不是由解放運動掌控的地區也要向他們請益。解放運動來者不拒，建立起公正不阿的名聲。墨西哥民眾與地方政府會請委員會

協助解決各種問題，從離婚到嚴重竊盜罪無所不包。解放區當地人民也比較信賴委員會的商議式司法，而不是法官依據賄賂多寡來判案的聯邦法院。[23]解放運動施行的是轉型正義（transformative justice）而不是懲罰正義（punitive justice），一座監獄主要用來拘留酒醉鬧事者，除此之外，他們很少用囚禁來解決問題。委員會建議的懲罰包括申誡、注意義務（duties of care）與社區服務。有一回當地發生運鈔車搶案，支付地方政府人員薪水的四萬美元被劫走，委員會逮捕搶匪，命令他們歸還贓款，然後商議他們的刑罰。委員會認為把搶匪送進監獄只會傷害他們的家人，因為這樣一來他們就沒辦法下田工作，家人得另外請人代勞。於是委員會判處他們一整年社區服務，一半時間到自家的田地工作，另一半時間為公眾服務。這種做法和美國的監獄體系有天壤之別，後者以「公共安全」為名，打造出全球最龐大的監獄國度。

委員會也推動共有財共享，從大地主手中拿回土地之後，讓民眾分享土地的資源。在社區經濟需求與生態永續發展之間求取平衡，是一門細緻的藝術。一個委員會限制砍伐沒有生病的樹木，如果非砍不可，必須砍一棵種一棵，收益由委員會與社區均分。[24]另一個委員會被墨西哥政府趕到一塊土地上耕種，但收成每況愈下。提高土壤肥沃度的傳統方法是休耕多年，然而由於政府縮減農地規模，因此耕種方式愈來愈密集。其他地區的農人採用倚賴種子與肥料的綠色革命技術，結果在短短幾年內，土壤肥沃度便嚴重流失。委員會知道他們必須發展出一種不會傷害土地的密集農業，於是進行研究，建立推廣服務，指導成員如何以能與環境和資源配合無間的方式來耕作。一位委員會成員說：「我們來自大自然，一離開它就活不下去。」

環境生態的限制、墨西哥軍方的步步進逼，都讓解放運動的處境日益艱難。一位年長的委員會成員說：「現在經濟狀況不好，很多年輕人離開，回來後變了個人，不懂得敬老尊賢。政府知道我們的組織愈健全，對他們的威脅也就愈大。他們希望我們的年輕人迷失方向。」委員會認為，對抗這種迷失現象最有效的武器，就是讓人們參與政府，而不只是反對政府，或者把治理工作交給別人。也就是說，人們必須實際掌控資源，並且不斷進行對話，討論社區應該如何管理資源。

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也知道，一個人身上最危險的地方就是嘴巴。

克服安氏盲

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的民主體制，讓我們的體制相形見絀，顯得既薄弱又空洞。我們的體制與雅典南轅北轍，與其說是民主政治，不如說是「抱怨政治」（complainocracy）——等到對在位者忍無可忍時，再換人做做看。現代民主政治的空洞本質解釋了許多現象，從墨西哥

市的空白廢票（nulo）運動，到南非的「沒有土地，沒有房子，就沒有選票」運動，人們藉由「以上皆非」的選擇來回應選舉制度。大部分人都不知道什麼才是真正的掌控權力，我們陷入盲目，以為自己實行的這一套東西，和我們得到的承諾完全一致。

我們必須壓制政府和企業，才能夠讓市場受到控制。有幾種方法可行，但前提都是我們不僅要克服經濟盲目，也要克服政治盲目。如此一來，我們才能夠欣欣向榮，解救地球免於被人類釋放的力量摧毀。

在帕拉尼克（Chuck Palahniuk）的小說《鬥陣俱樂部》（*Fight Club*）中，俱樂部的第一條和第二條守則就是成員不可以談論俱樂部。然而在真正的民主體制中，最重要的守則卻是你必須談論體制。民主需要集會，讓人們得以決定衡量事物價值的原則。參與這些集會的方式在學校裡學不到，中國勞工、貧民窟居民和電腦駭客都發現，成為民主公民的必備技巧只能邊做邊學。這些技巧並不是不能傳授，然而市場社會認定它們無足輕重。人們在學校裡學到的是如何發揮生產力、遵循指示、接受控制。今日學校標準化測驗最不願鼓勵的行為，就是以健全的心態探索如何做自己的主人。歐巴馬政府的教育部長鄧肯（Arne Duncan）很清楚自己的職責：「經濟無比重要。我們必須透過教育來促進經濟發展。」[25]然而主權政治（politics of sovereignty）告訴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當老師，都可以成為變革的推動者，而且擺脫只知追求利潤的心態。[26]

真正民主的集會未必都令人興致勃勃。以「自由」（Free）為筆名的霍夫曼（Abbie Hoffman）經驗豐富，他描述這類集會時用的字眼是：資訊、思考、經驗、樂趣、信賴、排練、戲劇，但也提到集會有時可能是「亂七八糟……煩不勝煩」。然而無論如何，集會讓人們決定遊戲規則，因此當供應和需求的問題出現時，後果不至於一發不可收拾。[27]

共有財的社會學告訴我們，真正的民主會改變我們與周遭世界的關係，將擁有權先轉化為管理權，再轉化為共有財。我們並不主張全面揚棄財產，個人財產相當重要，在合理範圍之內都不應否定。我們也不認為市場必須消失，市場是推動分權式決策的適當管道，而且很難想像在一個運作正常的民主體制中，人們享有自由但卻沒有市場。英國經濟學家艾爾森（Diane Elson）指出，就連烏托邦式的社群團體，也會創造出某種市場與某些交易工具，純粹的以物易物體系難以運作，以民主方式控制的市場會讓交易更為簡易，並且保留制定與調整價格所需的空間。市場必須根絕的弊端，是它不斷追求擴張與利潤的飢渴心態，將人類帶向生態災難的邊緣。而人類本身的問題則在於，我們相信市場是衡量事物價值的唯一方式。

如果我們想發展出能夠尊重周遭世界價值的新做法，我們就必須認清，天下沒有完美的事物，社區可能弊病叢生，民主需要一套安全網。人權無比重要，儘管它傳布的方式出現一些問題，但是理念本身的民主特質已經生根。相關的要求會使國家內部的運作環境日益公平，在國際舞臺也會產生類似效應——富國必須償還積欠窮國的生態負債（當然也要勾消窮

國積欠富國的金融債務）。這些做法並不等於市場社會主義，艾爾森稱之為「社會化的市場」（socialized market）。如果你不喜歡她的用詞，或許博蘭尼的說法更適合我們這個時代：「再嵌入的市場」（re-embedded market），其動力來自需求而非利潤。[28]

邁向更為公平、更具同情心的社會，許多障礙有待克服。資源與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經濟實體成為民主的絆腳石。我們需要更具可塑性的財產概念，確保財產與市場永遠從屬於民主考量的平等與永續。自由軟體運動的作為正是如此：駭入（hacking）市場社會，將權力放進每一個人手中。這個運動也告訴我們，直接追求民主反而是緣木求魚。「民主」的闕如導致許多反民主的政治現象，從伊拉克到阿富汗都是如此。然而自由軟體、糧食主權與棚戶居民政治有一個共同的理念：主動運作且參與廣泛的民主體制，真正目的不在其自身的發展，而在追求共享全世界資源的最佳方式。

人類追求更為平等與永續的經濟體制，基礎已經成形，出現在全球南方的田地與貧民窟，也出現在全世界最資本主義化的國家。美國的工會運動儘管遭受暴力對待（有時候是咎由自取），有些工人已經接管自己的工作場所。一家公司如果是由工人擁有和經營，其表現將優於不是由工人擁有和經營的公司。[29]儲蓄互助社（credit union）就是如此，每個存款人都是互助社的所有權人，大家互蒙其利。互助社的存款利率高於借款利率，更能夠因應社區的需求，也比較不受近年金融危機的衝擊。

此外還有許多規模較小的日常生活例證，顯示人們如何為了共同的福祉，匯聚和合作，分享和給予。以自由軟體運動為例，它的「自由」要比其他商品的「免費」更具意義，它的開放模式在真實世界中照樣能夠運作。回到先前討論過的另一個主題，愈來愈多社區再也看不到地方報紙。科羅拉多州卡本達（Carbondale）的週報《山谷週報》（*The Valley Journal*）二〇〇九年二月停刊之後，一小群當地民眾決定讓它後繼有人，正如其中一位民眾所說：「與其抱怨為什麼沒有本地報紙，不如採取實際行動。」[30]不難想見，這種自發性的行動會遇上財務困難，新報紙的股東得尋找各式各樣的贊助支持。當地商會的一位會員說：「每個城鎮都應該擁有一座公園、一間圖書館、一家報紙。」這番話也點出可能的財源。公園與圖書館通常不是由基金會或個人贊助者維持，而是倚賴公共經費；像報紙這麼重要的社區互動樞紐，沒有理由不能以公帑維持，美國經濟大蕭條年代就曾經這麼做。

不過在推行這類做法之前，我們必須先發揮想像力，重新掌握我們對民主與經濟的主導權，而且必須體認將這兩者切割的基本缺陷。換句話說，我們要以不一樣的理論理念來取代自由市場的幻想。回來看安氏盲的比喻，首先我得承認，這並不是第一個用在經濟上的醫學比喻。以疾病與治療來形容更廣大的世界，這種修辭手法源遠流長，尤其是當世界似乎真的生病時。[31]歐洲兩位貨幣學始祖都用過「瘋狂」這個概念。洛克不僅是當代自由派資本主義的教父，也是一位著名的醫師。他對瘋狂提出一項頗具爭議性的理論，同時適用於醫學和經濟

學領域。洛克與當時的醫學界同儕見解不同，他認為瘋狂代表的不是無法理性思考，而是理性被「不良的輸入資料」（bad input）欺瞞。他也主張治療瘋狂的方法是將出問題的心靈「捆綁」起來，有時候是真的捆綁，以便抑制這些心靈的活動。洛克對出問題的經濟也開出類似的處方，在他那個年代，價值的嚴重危機在於貨幣貶值，錢幣切削者（coin clipper）、偽幣製造者與五花八門的詐欺犯，導致銀幣面額比實際價值高出五〇％以上。洛克說：「這也難怪，如果事物的價格與價值產生混淆，難以確定，衡量的標準也將蕩然無存。現在我們沒有銀幣流通的法定標準，無法根據我們現有的、不確定的、切削過的貨幣，來談論或評斷事物的價值與價格。」[32]他的解決方案是由政府出面收回銀幣再重新發行，例如將號稱十盎斯的銀幣以較準確的七盎斯重新發行。洛克將銀幣變成獨立運作的教育工具，用以矯治失控的經濟，等於是同時解決瘋狂與貨幣兩種亂象。

凱因斯也將經濟學家看成特殊的醫療專業人員，他們治療經濟的病症，並以預防措施來確保經濟健康。凱因斯說：「如果經濟學家能夠獲致像牙醫那樣謙卑、幹練的形象，那是美事一樁。」[33]這種模式將經濟問題的根源，視為金融領域在社會心理學層面無可避免的起伏變化，解決之道則交給少數資格優異的社會醫師。

娜歐蜜．克萊恩的《震撼主義》告訴我們自由市場基本教義派如何發揚這個理念，靈感則是來自治療精神疾病的電擊療法。從電擊療法到自由市場的震撼療法，這個漫長過程至今

尚未結束，而且讓我們苦不堪言。

以安氏盲來做比喻，並不是要延請神經科學家來對症下藥。當你相信自己看得見根本不存在的事物，你已經無藥可救。這類病患必須學習不再相信自以為是的視覺印象，培養不靠視覺的生活能力，轉而倚賴其他感官與其他人的協助，過完整的生活。我們與其希望有方法可以矯治價格的錯亂現象，不如體認價格的限制所在：對於事物的優先性與可能性，價格頂多只能提供模糊的認識。我們永遠無法透過市場來清楚觀照這個世界，而且這並不是壞事。有了這番體認之後，我們就可以訓練自己運用其他觀點，從不同角度來理解這個世界。對於我們的經濟與社會也是如此，社會化使我們只能從事物的金錢價值來思考，因此愈來愈狹隘短視。我們必須承認價格並不代表我們的信念，唯有停止談論價格，我們才能夠走上復甦之路。

討論、管制、信賴、慷慨與寬容，這些方法都可以在心理層面彌補市場對我們的剝奪。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桑德爾（Michael Sandel）指出，一旦我們開始落實這些方法，它們會愈來愈強而有力。這就必須進一步探討如何強化我們的政治人格。本書提及的每一位運動人士都認為，並沒有十拿九穩的做法可言，我們必須邊做邊學。這就是我們要走的道路，我們要正面挑戰權力的不平等，尤其是那些由人造人、企業、政府造成，就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不平等。因此毫無疑問，我們必須採取直接行動，讓世界變得更為公平。這樣的願景看似艱鉅難

行，其實的確如此；對於我們在政治上長期被灌輸的耐性與被動心態，它也是針鋒相對。打破幻想向來不是簡單的工作，為了讓視野超越市場的局限，我們必須實驗各種分享的方法，並且設想如何匯聚各種資源。因此國有化勢在必行，例如醫療業或金融業。[34]換言之，我們要發展出新的分享與節制方式。在任何一個領域，我們都要建立尊重人權的集合體，幫助我們以不同方式來衡量事物的價值。

培養我們被鈍化的感官與能力，聽起來有點像科幻小說，或者《星際大戰》系列電影中的「運用原力」情節。美國少數黑人女性科幻小說家之一的巴特勒（Octavia Butler），捍衛自身專業的方式讓我們深有同感，她回應「科幻小說對黑人有什麼意義？」這個問題時寫道：

> 科幻小說探索現在、未來與過去有何意義？科幻小說的警世取向、對於另類思考與做法的嘗試有何意義？科幻小說討論科學與技術、社會組織、政治方向的可能後果有何意義？科幻小說最卓越的特質就是刺激想像力與創造力，促使讀者與作者另闢蹊徑，擺脫「每個人」言語、行事、思考的窠臼，無論今年的「每個人」是由誰扮演。
>
> 這一切對黑人有何意義，還用問嗎？[35]

為了收回政治的主導權，我們也需要更豐富的想像力、創造力與勇氣。我們必須謹記，民主的勝利不是來自投票箱，而是透顯在能夠實現民主的環境：平等、負責、政治的可能性。我們必須瞭解，淪為葛林斯潘的怪物只會斲喪群體與個人的福祉；然而大部分人從出生之後，就被一路培養成這種怪物，浸淫在消費文化之中，滿載著物質欲望，至死方休。永續發展的未來需要市場，然而市場必須謹守本分，不能讓少數人從它取得動機、熱情與資源，用以戕害其他人與地球。我們必須以更民主的方式來觀照這個世界，衡量其價值，管理其資源，體認財產與政府其實比我們的想像更具有可塑性。終極而言，這是一樁集體推展的事業，創業維艱，但是它的回報遠遠高於今日的市場社會。另一方面，吾人福祉的泉源並不是單一理想的追求，而是在民主政治中共同生活、積極參與的自由，這份自由將幫助我們為人類共享的未來衡量價值。

致謝

一本倡導集體價值衡量的書，本來就應該以群策群力的方式來完成。在本書構思過程中，許多大學對我敞開大門，我要特別感謝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社會理論與比較歷史中心（Center for Social Theory and Comparative History）、非洲研究中心（Center for African Studies）、約翰卡羅爾大學（John Carroll University）、薩克其萬大學（University of Saskatchewan）、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新聞學與南亞研究中心（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South Asia Institute）、波爾森全球發展中心（Polson Institute for Global Development）、康乃爾大學發展社會學系（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 Sociology）、挪威生命科學大學（Norwegian University of Life Sciences）提供的對話、佳餚以及分享理念的機會。

集體價值衡量並不代表個人必須隱姓埋名，因此我也要列舉惠我良多的研究團隊、朋友、同志、嚮導、支持者與同伴。在靈感啟發、錯誤糾正、外文翻譯、辛勞奔波上，我要感謝棚戶居民組織、Adam Shapiro、Alex Peake-Tomkinson、Alice Waters、Andrea Ismert、Anna Zalik、Annie Shattuck、Bob Jensen、Carol Park、Chad Futrell、伊莫卡利勞工聯盟、Damara Luce、Dan Lowenstein、Dan Moshenberg、David Lindsay、Debby Krant、Diane Elson、Elisa Oceguera、Eric Holt-Gimenez、Eric Vanhaute、Gavin McCormick、Gayatri Menon、George Caffentzis、Gerardo Reyes、Greg Asbed、Hannah Wittman、Haroon Akram-Lodi、Hilary Klein、Iain Boal、Jacques Depelchin、Jamie Johnston、Jamie McCallum、Jim Gifford、Jim Rigby、Joe Quirk、John Wildman、Jonathan Brumberg-Kraus、Josephine Crawley、Julia Flynn Syler、Jun Borras、Kamala Visverswaran、Kara Holmstrom、Karalei Nunn、Kemble Scott、Kerry Chance、Kevin Smith、Kolya Abramsky、Kris Dahl、Kristin Becker、Larry Lohmann、Laura Barber、Laura Neely、Lucas Benitez、Marcia Ishii-Eiteman、Marco Flavio Marinucci、Maria Elena Martinez、Mariana Mora、Mark Fowler、Martha Saavedra、Matt Birkinshaw、Medha Chandra、Michael Kamerick、Michael Lyon、Michael Pollan、Mike Linksvayer、Mindy Peden、Nely Rodriguez、Nigel Gibson、Pat Youngblood、Pauline Wynter、Peter Rosset、Philip Gwyn-Jones、Phil McMichael、Radhika Balakrishnan、Riaz Ansary、Richard Bensel、Richard Pithouse、Rob Firing、Robin Chang、Ryan Hagen、Ryan Ismert、Sabina Alkire、Sally Smyth、Sam Grey、Sanjay Reddy、Sasha Abramsky、S'bu Zikode、墨西哥恰

帕斯州幾位戴著面罩的男士女士、Shae Davidson、Shalmali Guttal、Sharad Chari、Silvia Federici、Staughton Lynd、Summer Brenner、Sunita Narain、Susie Lyon、Tamim Ansary、Ted Vallance、Tim Lang、Vashna Jagarnath、Will Jones、Will Kopp與Yasser Toor。

舊金山兩家機構毫無保留地提供我寶貴建議，首先是桑奇士工作坊（Sanchez Grotto），感謝幾位成員：Sean Beaudoin、Alison Bing、Michael Chorost、Joshua Citrak、Michelle Gagnon、Scott James、Ammi Keller、Jeff Kirschner、Paul Linde、Shana Mahaffey、Eric Tipler、Diane Weipert與Doug Wilkins。第二家機構則是舊金山公立圖書館（San Francisco Public Library）、Mission Bay分館尤其讓我賓至如歸。在美國的另一岸，紐約的Picador出版公司的團隊給我有如魔術般的神奇支持，感謝Danielle Schlang、Darin Keesler、David Logsdon、Heather Kirkpatrick、James Meader、Kelsey Smith、Tanya Farrell與Sara Sarver。

最後要感謝三位對本書做出無比珍貴貢獻的人士，包括全力支持我而且才智過人的寫作夥伴Chris Brooke，幫助我瞭解出版業的導師Karolina Sutton，兼具耐心與寬容、將我糾結的文字潤飾得有如絲綢般順暢的主編Frances Coady。當然，在我成為一位作家之前，我必須先學習寫作，這要歸功於我散居在全球各大洲的家人；尤其是Mini Kahlon，我的一切都要感謝她。

29. 一份研究摘要可以在National Center for Employee Ownership的網站上看到：http://www.nceo.org/library/corpperf.html
30. DeeDee Correll, "Fine, They'll Just Publish the Newspaper Themselves," *Los Angeles Times*, March 23, 2009.
31. See the excellent George Caffentzis, "Medical Metaphors and Monetary Strategies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ocke and Berkeley,"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5, no.2 (2003), for instance.
32. Constantine George Caffentzis, *Clipped Coins, Abused Words, and Civil Government: John Locke's Philosophy of Money* (Brooklyn, NY: Autonomedia, 1989), 28.
33. John Maynard Keynes, *Essays in Persuasion* (London: Macmillan, 1931), 373.
34. 多位金融界人士曾在不列入紀錄的談話中表示，他們對政府遲遲未將銀行收歸國有感到驚訝，因為這麼做顯然是正確之舉。克魯曼（Paul Krugman）最近對醫療保險的國有化也做了一番強而有力的論述，見Paul Krugman, "Health Care Realities," *New York Times*, July 30, 2009.
35. Octavia E. Butler, "Positive Obsession," in *Bloodchild and Other Stories*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1996), 134–35.

instance.

16. 豬隻只是這家養豬場一部分的利潤來源，它也因為減少排放甲烷，賣了不少溫室氣體額度。
17. Diego Cevallos, "New Influenza Strain Has Led to the Closure of Schools," *IPS (Latin America)*, April 28, 2009.
18. Donald G. McNeil Jr., "In New Theory, Swine Flu Started in Asia, Not Mexico," *New York Times*, June 23, 2009.
19. 死亡人數已超過一百人。對企業而言，疫情就是商機。據路透通訊社報導，有一家創投基金公司從疫情爆發開始就財源滾滾：「新型流感在墨西哥造成六十人死亡，疫情並擴散到美國，消息傳出之後，該基金旗下的八家時疫與生化防禦公司中，BioCryst Pharmaceuticals（BCRX.O）與Novavax（NVAX.O）這兩家股票公開上市的公司，股價也應聲上漲。」死亡也是一門生意，而且新型流感病毒帶來的是好生意。見Alexander Haislip, "Venture Capital Firm Set to Reap
20. Tom Hayden, ed., *The Zapatista Reader* (New York: Nation Books, 2001) 218.
21. Kristen Bricker, "In Defense of Land and Territory: Zapatistas Take on Paramilitaries," *Left Turn*, June 1, 2008.
22. Bergstrom et al., "Building Trust by Wasting Time."
23. See the excellent Mariana Mora, "Decolonizing Politics: Zapatista Indigenous Autonomy in an Era of Neoliberal Governance and Low Intensity Warfare" (Ph.D. diss.,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2008) for more.
24. 儘管委員會的成員都不支薪，不過委員會還是會提供餐飲、交通、住宿的費用。住宿力求簡單樸素，餐飲也是粗茶淡飯，避免讓外界產生「錢多事少」的印象。委員會成員在家裡吃得要比上班時好多了。
25. Dana Goldstein, "The Selling of School Reform," *Nation*, May 27, 2009.
26. See, for instance, Ivan Illich, *Deschooling Society*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Education, 1973).
27. 邱吉爾的說法更為簡單扼要：除了其他的政府形態之外，民主是最糟的一種。不過邱吉爾的民主經驗，和公民控制政府的民主截然不同。
28. Diane Elson, "Socializing Markets, Not Market Socialism," *Socialist Register*, 2000.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offers more.

5. Susan M. Darlington, "The Ordination of a Tree: The Buddhist Ecology Movement in Thailand," *Ethnology* 37, no.1 (1998).
6. 這並不是捍衛「鮮血與祖國」（blood and soil）的信念或者民族主義，而是強調人類這個物種與其他物種的關係。
7. Express News Service, "'I Am a Marxist Monk,' Says Dalai Lama," *Indian Express*, January 19, 2008.
8. 對於不想參與直接行動的人，表演藝術兼社會運動團體「沒問題俠客」（The Yes Men）設計了一套「行動抵銷」系統，讓你可以支持衝鋒陷陣的人。見www.beyondtalk.net.
9. 雅典人蓄奴的問題，經常使關於雅典民主模式的討論難以為繼，不過Ellen Meiksins Wood指出，正是由於雅典農民的民主參與，才讓奴隸制不至於擴大。雅典民主為後世提供的範例，在一個沒有底層階級的社會也能夠運作，而且運作良好。見Ellen Meiksins Wood, "Demos Versus 'We the People': Freedom and 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 in *Demokratia: A Conversation on Democracies, Ancient and Modern*, eds. Josiah Ober and Charles W. Hedrick, 121–3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Ellen Meiksins Wood, *Peasant-Citizen and Slave: The Foundations of Athenian Democracy* (London: Verso, 1988.)
10. C. L. R. James, "Every Cook Can Govern: A Study of Democracy in Ancient Greece: Its Meaning for Today," *Correspondence* 2, no.12 (1956). See also Josiah Ober and Charles W. Hedrick, eds., *Demokratia: A Conversation on Democracies, Ancient and Modern* (Prince ton, NJ: Prince 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especially the essays by Sheldon S. Wolin, "Transgression, Equality and Voice" and Wood, "Demos Versus 'We the People': Freedom and 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 in *Demokratia*.
11. Robert Milton Everton, "'This Is What Democracy Looks Like!' Democracy in Action: Communicative Action" (Ph.D. diss.,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2003).
12. Thucydides and Henry Dale,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London: H. G. Bohn, 1848), cited by James, "Every Cook Can Govern."
13. 感謝Mindy Peden指引我注意到這些例子。
14. *Grist*雜誌的Tom Philpott是個例外。
15. Andres Timoteo Morales, "En Veracruz, Oponerse a Operacion de Granjas Carroll Se Castiga Con Carcel," *La Jornada*, April 12, 2009, for

yirenping.org/english/eng.htm, including documentation of its legal filings (see 2007 Annual Report for more); *China Pharmaceuticals & Health Technologies Weekly*, "About 80 Pct of Multinationals Discriminate against Chinese Hep B," July 4, 2007, reports the broader trends in hepatitis B discrimination.

27. Jacques Ranciere的著作對這個理念有更全面的探討：Jacques Ranciere, *Disagreement: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28. 我們在這裡以更具彈性、可塑性的知識擁有權理念，取代了財產權，而且有明確內涵，因此締造了一種共有財。

9. 重探糧食主權

1. Larry Lohmann, *Financialization, Quantism and Carbon Markets: Variations on Polanyian Themes* (Sturminster Newton, Dorset: The Corner House, 2009), 19.
2. Taibbi, "The Great American Bubble Machine."
3. Gwyn Prins and Steve Rayner, "Time to Ditch Kyoto," *Nature* 449, no.7165 (2007).
4. 由Robert Watson主持的報告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Agricultural Knowledg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 (IAASTD)由Island Press出版，原始的報告可以在http://agassessment.org看到。關於有機農業具有碳封存潛力的討論，見Tim J. LaSalle and Paul Hepperly, *Regenerative Organic Farming: A Solution to Global Warming* (Kutztown, PA: Rodale Institute, 2008).
5. Daniel Maxwell et al., "Does Urban Agriculture Help Prevent Malnutrition? Evidence from Kampala," *Food Policy* 23, no.5 (1998).
6. Rob Hopkins, *The Transition Handbook: From Oil Dependency to Local Resilience* (Totnes: Green, 2008) is the bible of the transition town movement. See also TRAPESE Collective, "The Rocky Road to a Real Transition: The Transition Towns Movement and What It Means for Social Change," *The Commoner* 13 (2009), http://www.commoner.org.uk/N13/11-Trapese.pdf (accessed August 17, 2009).
7. Juan Forero, "In Ecuador, High Stakes in Case against Chevron," *Washington Post*, April 28, 2009. Ben Casselman, "Chevron Expects to Fight Ecuador Lawsuit in U.S.,"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0, 2009.

8. Jeffrey Kaplan,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The Reign of Corporations and the Fight for Democracy," *Orion Magazine*, November/December 2003.
9. 印度獨立運動最被忽略的關鍵人物B. R. Ambedkar（他對印度憲法的影響相當於傑佛遜對美國憲法的影響）就是一位達利人領袖，他也對印度佛教的復興貢獻良多。
10. 感謝P. V. Satheesh、Gayatri Menon、Bina Agarwal、Katharine Ainger等人的作品，讓我對德干發展協會有更深入的瞭解。
11. 女性參與的統計數字向來都是低估，不過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資料庫，一九六一年時，女性在農業領域扮演「積極的經濟角色」的比例是男性的六六%，如今則是接近八〇%。
12. Gayatri A. Menon, "Re-Negotiating Gender: Enabling Women to Claim Their Right to Land Resourc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anel on Best Practices on Gender and Land/Property Rights, NGO Forum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Human Settlements—Habitat II, Istanbul, June 1996).
13. 我曾經撰文指出，綠色革命技術讓地主得以繼續把持土地，提高生產力，讓政府的土地改革無用武之地。而土地改革卻是提升農業生產力最有效的方法之一。見Patel, *Stuffed and Starved*.
14. 這些農耕系統在小型集約式農業體系中蓬勃發展，因此對抗氣候變遷的艱鉅任務應該納入土地改革，將土地所有權化整為零。見Annie Shattuck即將出版的著作。
15. 當然，需要管理的事務就需要管理顧問公司。

10. 安氏盲

1. Global Humanitarian Forum, *Anatomy of a Silent Crisis* (Geneva: Global Humanitarian Foundation, 2009).
2. Though see Phra (Prayut) Thepwethi et al., *Buddhist Economics: A Middle Way for the Market Place* (Bangkok: Buddhadhamma Foundation, 1994) for more.
3. 我知道我在這方面與某些佛學理論有所衝突，佛經中曾說進食的唯一目的是吸收營養，不是滿足食欲。果真如此，為什麼中國、日本與泰國的佛教飲食會那麼美味？只要不至於放縱自己的欲望，我認為享受飲食樂趣無傷大雅。
4. William Braxton Irvine, *A Guide to the Good Life: The Ancient Art of Stoic Joy*

15. *Economist*, "Let Them Eat Pollution," February 8, 1992.
16. Najad Abdullahi, "'Toxic Waste' Behind Somali Piracy," *Al Jazeera in English*, October 11, 2008.
17. Janaina Rochido, "Brazilian Cities Pioneer Democratic Budgeting," *City Mayors*, November 18, 2006.
18. Iain Bruce, *The Porto Alegre Alternative: Direct Democracy in Action*, IIRE, Notebook for Study and Research, no.35–36 (London: Pluto Pres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IRE], 2004), 6; see also the introduction to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Democratizing Democracy: Beyond the Liberal Democratic Canon*. Reinventing Social Emancipation, vol. 1 (London: Verso, 2005).
19. Bruce, *The Porto Alegre Alternative*, 45.
20. Carl Bergstrom, Ben Kerr and Michael Lachmann, "Building Trust by Wasting Time," in *Moral Markets*, ed. Paul Zak.
21. Bruce, *The Porto Alegre Alternative*, 10.
22. For more on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see Gianpaolo Baiocchi, *Radicals in Power: The Workers' Party (Pt) and Experiments in Urban Democracy in Brazil* (London: Zed Books, 2003). Rebecca Abers, "Learning Democratic Practice: Distributing Government Resources through Popular Participation in Porto Alegre, Brazil," in *The Challenge of Urban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Practices*, eds. Maria Emilia Freire and Richard Stren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1); Patrick Heller, "Moving the State: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c Decentralization in Kerala, South Africa, and Porto Alegre," *Politics Society* 29, no.1 (2001); Archon Fung and Erik Olin Wright, "Deepening Democracy: Innovations in Empowere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Politics Society* 29, no.1 (2001).
23. Sharon K. Hom and Stacy Mosher, *Challenging China: Struggle and Hope in an Era of Change* (New York: New Press, 2007). See also http://chinaworker.info/en/content/news/722/.
24. Han Dongfang, "Chinese Labour Struggles," *New Left Review* 34 (2005).
25. China Labour Bulletin, "The Case of China: The Challenge of Labour Unrest in a Communist-Run Capitalist Econom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Paris, December 4, 2008).
26. More on the Yirenping Center's work is available at http://www.

cation of Land Titles to Squatter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 no.1 (2007).
7. Rikke B. Broegaard, "Land Access and Titling in Nicaragua," *Development and Change* 40, no.1 (2009); Christopher Woodruff, "Review of De Soto's 'The Mystery of Capital,'"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9, no.4 (2001); and Timothy Mitchell, "The Properties of Markets," in the enjoyable collection *Do Economists Make Markets? On the Performativity of Economics*, eds. Donald Mackenzie, Fabian Muniesa and Lucia Siu (Princeton: Prince 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8. To watch some of this thinking, see the forthcoming film *Dear Mandela*, directed by Dara Kell and Christopher Nizza, produced by Sleeping Giant Films.
9. For more about where this photo was taken,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meeting, see Raj Patel, "A Short Course in Poli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Abahlali BaseMjondolo,"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43, no.1 (2008): 95–112.
10. 感謝Richard Pithouse讓我引用他對棚戶居民代表的訪談內容。
11. Kerry Chance, "'Broke-on-Broke Violence': What the U.S. Press Got Wrong About South Africa's Xenophobic Riots," *Slate.com*, June 20, 2008, http://www.slate.com/id/2193949/(accessed January 1, 2009); and, more recently, see Richard Pithouse, "Burning Message to the State in the Fire of Poor's Rebellion," *Business Day*, July 23, 2009.
12. 盧梭一定會很開心。亦見Alain Badiou與Jacques Ranciere的著作：Alain Badiou, *Ethics: An Essay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Evil*, trans. Peter Hallward (London: Verso, 2001); Alain Badiou, *Metapolitics*, trans. Jason Barker (London: Verso, 2005); Jacques Ranciere, *On the Shores of Politics*, Radical Thinkers 21 (London: Verso, 2007); Jacques Ranciere and Steve Corcoran, *Hatred of Democracy* (London: Verso, 2006).
13. 這個團體在上屆美國總統大選前，協助數千名投票權遭剝奪的選民恢復投票權。它的成員有時不是那麼循規蹈矩，不過對於支援美國窮困家庭有重大貢獻。
14. 上過經濟學課程的大學生更只有七%答對。見Paul J. Ferraro and Laura O. Taylor, "Do Economists Recognize an Opportunity Cost When They See One? A Dismal Performance from the Dismal Science,"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4, no.1, Article 7 (2005).

20. Bill Maxwell, "Eating That Tomato Can Put You in Moral Peril," *St. Petersburg (FL) Times,* July 13, 2008.
21. Jane Black, "A Squeeze for Tomato Growers; Boycott vs. Higher Wages," *Washington Post*, April 29, 2009.
22. Katrina vanden Heuvel, "In the Trenches and Fighting Slavery," *The-Nation.com*, December 28, 2008, http://www.thenation.com/blogs/edcut/391546/in the trenches and fighting slavery (accessed March 14, 2009).

8. 城市民主

1. 關於糧食叛變的更多詳情，見Eric Holt-Gimenez and Raj Patel, *Food Rebellions! Crisis and the Hunger for Justice* (Oxford: Fahamu, 2009).
2. 幾個主要來自巴西與其他拉丁美洲國家的非政府組織與都市社會運動團體，以一九九二年巴西里約熱內盧地球高峰會議通過的《民主、公平、永續城鎮村莊條約》(Treaty for Democratic, Equitable and Sustainable Cities, Towns and Villages)，以及二〇〇一年巴西「城市法」(City Statute)對於「城市權」的認可為基礎，提出《世界城市人權憲章》(World Charter on the Human Right to the City)草案。二〇〇四年七月在厄瓜多首都基多(Quito)舉行的美洲社會論壇(Social Forum of the Americas)與九月在西班牙巴塞隆納(Barcelona)登場的世界都市論壇(World Urban Forum)會議，將這部草案擴充(但是拿掉名稱中的「人權」)。見Edesio Fernandes, "Constructing the 'Right to the City' in Brazil," *Social Legal Studies* 16, no.2 (2007). The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hosts a copy of the document at http://portal.unesco.org/shs/en/ev.php-URL ID = 8218 & URL DO = DO TOPIC & URL SECTION = 201.html.
3. Desmond Tutu, "The Second 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 Lecture"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November 23, 2004); http://www.nelsonmandela.org/index.php/news/article/look to the rock from which you were hewn/ (accessed November 20, 2005).
4. 特此聲明：我為這個組織管理網站。
5. Mike Davis, "Planet of Slums: Urban Involution and the Informal Proletariat," *New Left Review* 26 (2004); Robert Neuwirth, *Shadow Cities: A Billion Squatters, a New Urban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6. Rafael Di Tella et al., "The Formation of Beliefs: Evidence from the Allo-

Poor, California Series in Public Anthropology 1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9. See Patel, *Stuffed and Starved.*
10. See John Perkins,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London: Ebury Press, 2005), for the "crook" part.
11. See Vandana Shiva, *Biopiracy: The Plunder of Nature and Knowledge* (Dartington: Green Book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Gaia Foundation, 1998) and Richard Stallman's short and pointed think piece about biopiracy," Biopiracy or Bioprivateering," available at http://stallman.org/articles/biopiracy.html.
12. World Bank, *World Bank Assistance to Agriculture in Sub Saharan Africa: An Independent Evaluation Group Review*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7).
13. Lyla Mehta, "The World Bank and Its Emerging Knowledge Empire," *Human Organization* 60, no.2 (2001); Pauline E. Peters, *Development Encounters: Sites of Participation and Knowledge*, Harvard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0).
14. 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3rd ed. (London: Allen & Unwin, 1967), 177.
15. For more on popular will, see the excellent essay by Peter Hallward: Peter Hallward, "The Will of the People: Notes Towards a Dialectical Voluntarism," *Radical Philosophy* 155 (May/June 2009).
16. 雖然這句話被當成是佛斯特說的，但這似乎是他無意中聽到的。W. H. Auden, *The Dyer's Hand,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22.
17. Gloria Jacobs, *Not a Minute More: End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New York: UNIFEM, 2003). 有證據顯示，近來的經濟衰退助長了家庭暴力的歪風。
18. 更多關於「暴力」的這種用法，請見Slavoj Žižek, *Violence: Six Sideways Reflections, Big Ideas* (London: Profile, 2008); and Frantz Fanon,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trans. Constance Farrington (London: Penguin, 1965).
19. Eric Schlosser, "A Side Order of Human Rights," *New York Times*, April 6, 2005.

27. Environmental Rights Action, "Field Report #172: Michelin Converts Prime Forest to Plantation" (Environmental Rights Action/Friends of the Earth, Lagos, Nigeria, 2008).
28. World Rainforest Movement, *Women Raise Their Voices Against Tree Plantations: The Role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 Disempowering Women in the South* (Montevideo: World Rainforest Movement, 2009).
29. J. M. Lobo Orensanz et al., "What Are the Key Elements for the Sustainability of 'S-Fisheries'? Insights from South America," *Bulletin of Marine Science* 76, no.2 (2005).
30. George Monbiot, "These Are Not the Mariners of Old but Pirates Who Make Bureaucrats Blanch," *Guardian*, June 1, 2009.

7. 反制運動與擁有權利的權利

1.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System," WHO, 2009, http://www.who.int/whosis (accessed July 19, 2009); (all figures refer to 2005).
2.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7).
3. Charlotte Cooper, "Online Chat Spotlights Most-Ailing Millennium Goal," *Women's eNews*, March 29, 2009.
4. 宣言全文見聯合國網站：http://www.un.org/en/documents/udhr/.
5. 更多詳情，請見Sam Pizzigati, *Greed and Good: Understanding and Overcoming the Inequality That Limits Our Lives* (New York: Apex Press, 2004).
6. 更多詳情，包括針對權利（就某些方面而言）只是回歸到維多利亞時代的國際關係策略的討論，參見Mark Mazower, "The Strange Triumph of Human Rights, 1933–1950," *The Historical Journal* 47, no.2 (2004).
7. Saul David Alinsky, *Rules for Radicals: A Practical Primer for Realistic Radical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 xxiii.
8. See Michael Neocosmos, "Development, Social Citizenship and Human Rights: Re-Thinking the Political Core of an Emancipatory Project in Africa," *Africa Development* 32, no.4 (2007), for a thoughtful treatment of this in the African context. 許多案例顯示，要求民眾保持耐性的呼籲是來自菁英化的非政府組織，結果反而延遲了立即、集體與民主的行動。見Harri Englund, *Prisoners of Freedom: Human Rights and the Afric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See also Massimo De Angelis, *The Beginning of History: Value Struggles and Global Capital* (London: Pluto, 2007).
17. Linebaugh, *Magna Carta Manifesto*, 27.
18. I am grateful for Edward Vallance's excellent *Radical History of Britain* for this background: Edward Vallance, *A Radical History of Britain: Visionaries,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the Men and Women Who Fought for Our Freedoms* (London: Little, Brown, 2009).
19.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bk. 1, p. 8.
20. David E. Stannard, *American Holocaust: The Conquest of the New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quoted in Federici, *Caliban and the Witch*, 85.
21. John Locke,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London: Whitmore and Fenn, 1821), 259.
22. 關於資本主義、動物與財產的運作關係的討論，見Bob Torres, *Making a Kill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nimal Rights* (Edinburgh: AK Press, 2007).
23. Gilbert Malcolm Sproat to the Superintendent-General of Indian Affairs, October 27, 1879, RG 10, vol. 3669, f. 10961; quoted in Tina Loo, "Dan Cranmer's Potlach: Law as Coercion, Symbol, and Rhetoric in British Columbia, 1884–1951,"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73, no.2 (1992).
24. 擴張種植生質燃料所需的土地，也是一個相當不堪的例證。見Gaia Foundation et al., *Agrofuels and the Myth of the Marginal Lands* (London: Gaia Foundation, 2008).
25. One source is Richard Petratis, "The Witch Killers of Africa" (2003?), http://www.infidels.org/library/modern/richardpetraitis/witch killers.shtml. (accessed March 1, 2009), whose well-referenced sources include a report from Tanzania claiming five thousand deaths alone between 1994 and 1998.
26. 國際遊獵俱樂部（Safari Club International）的正式名稱是「五大滿貫」（Big Five Grand Slam）。當然，動物商品化的歷史比人類商品化更為悠久，然而令人訝異的是，這個過程一直到近年才完成。見Giorgio Agamben, *The Open: Man and Animal*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是他們已經將決策過程分權化。

4. 不過哈定至少言行一致，他和妻子都是死亡選擇權組織「毒芹協會」（Hemlock Society）的成員，並且在結婚六十二週年紀念日之後不久，雙雙自殺。我很希望看到人口控制政策支持者都變成女性主義支持者，只不過從他們的出身背景來看，促進女性權益恐怕不會是他們的當務之急。
5. David Feeny et al., "Questioning the Assumptions of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Model of Fisheries," *Land Economics* 72, no.2 (1996).
6. Boris Worm et al., "Impacts of Biodiversity Loss on Ocean Ecosystem Services," *Science* 314, no.5800 (2006).
7. Alex Wijeratna, *Taking the Fish—Fishing Communities Lose Out to Big Trawlers in Pakistan* (Johannesburg: ActionAid International, 2007).
8. Ann Kelley, "Net Losses," *Guardian*, April 11, 2007.
9. R. W. D. Davies et al., "Defining and Estimating Global Marine Fisheries Bycatch," *Marine Policy* 33 (2009).
10.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Pakistan. Fishery and Aquaculture Country Profile,"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Department, 2009, http://www.fao.org/fishery/countrysector/FI-CP PK/en (accessed April 21, 2009).
11. Henry Makori, "Why Belief in Witchcraft Remains Strong among Africans," *Catholic Information Service for Africa*, April 6, 2009.
12. See, for example, Silvia Federici, *Caliban and the Witch* (New York: Autonomedia, 2004).
13. Robin Briggs, *Witches and Neighbours: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European Witchcraft*, 2nd e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2); Brian P. Levack, *The Witch-Hun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3rd ed. (Harlow: Pearson Longman, 2006).
14. 這並不是說全球各地的女性都在抗拒圈占，或者抗拒圈占是獵巫運動的唯一原因。果真如此，我們就會看到圈占與獵巫的直接關聯；然而歷史現實並沒有那麼單純。不過我們還是可以認定，有些女性的確是為了捍衛自身控制資源的權利，不惜違反市場準則，因此犧牲性命。
15. 同樣的道理，亞瑟．米勒（Arthur Miller）的《熔爐》（*The Crucible*）也是對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強而有力的控訴。
16. Peter Linebaugh, *The Magna Carta Manifesto: Liberties and Commons for All*

17. Fernand Braudel, *The Wheels of Commerce* (London: Collins, 1992), 229–30. For a general discussion of this, see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For a fine discussion of how this relates to the food system, see Michael S. Carolan, "Disciplining Nature: The Homogenising and Constraining Forces of Anti-Markets on the Food System," *Environmental Values* 14 (2005).
18. Except, curiously, Jordan—see WorldPublicOpinion.org et al., *World Public Opinion on Governance and Democracy* (Washington, D.C.: WorldPublicOpinion.org, 2008).
19. GlobeScan for the BBC, "Economic System Needs 'Major Changes': Global Poll," GlobeScan/BBC, 2009.
20. Jesse Washington, "Some Say Holocaust Memorial Shooting Signals a Broader War," *The Philadelphia Inquirer*, June 14, 2009.
21. Thomas Hobbes and Richard Tuck, *Leviathan*, rev.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89.
22. Basil H. Johnston, *The Manitous: The Spiritual World of the Ojibway* (New York: HarperPerennial, 1996), 221–37.
23. T. S. Eliot, *The Complete Poems and Plays, 1909–1950*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60), 283.
24. 諾貝爾本人並沒有要頒獎表揚經濟學家。第一屆經濟學獎是在一九六九年由瑞典中央銀行頒發，目的是讓這門學科能夠和分享一些醫學、物理、化學、文學與和平的諾貝爾獎光環。
25. See Elinor 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But also see Peter Linebaugh's work and George Caffentzis's predictably thoughtful and challenging 2004 essay, "A Tale of Two Conferences: Globalization, the Crisis of Neoliberalism and Question of the Commons," http://www.globaljusticecenter.org/papers/caffentzis.htm.

6. 人人都是共有財的共享者

1.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nd ed., 1992, s.v. "common," http://dictionary.oed.com /cgi/entry/50045107 (accessed June 1, 2009).
2. Garrett Hardin,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62, no.3859 (1968).
3. 令我感到慶幸的是，今日的地球之友遠比過去明智，重要原因之一

人應該有決定工時長短的權利。

12. See volume 2 of 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1978), for more on his thought here.
13.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5: Gender and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4. Jean Gardiner, "Women's Domestic Labour," *New Left Review* I/89 (1975).
15.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Global Wage Report 2008/09: Minimum Wages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Towards Policy Coherence.*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2008). 另一個考量因素有待更深入的探討：能源與無酬勞動的關聯。隨著能源價格上漲，調降工資的壓力越來越大，導致越來越多工作變成無酬工作，學者兼運動人士Kolya Abramsky長期關注這個問題，讀者可以參看他的作品。
16. 參見注10關於馬克思利潤遞減理念的解釋。馬克思對金融資本主義的內在矛盾有深入見解。見《資本論》第二卷。
17. See the recent pamphlet from the Midnight Notes collective for more: Midnight Notes Collective and Friends, *Promissory Notes: From Crisis to Commons* (New York: Autonomedia, 2009).
18. John Maynard Keynes, *A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36), 383.
19. Ibid., 9.
20. Ibid., 161–62.
21. Ibid., 202.
22. Ibid., 156.
23. Ibid., 158–59.
24. Mark Zandi, "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Small Business Hearing on 'Economic Stimulus for Small Business: A Look Back and Assessing Need for Additional Relief,'" http://www.house.gov/smbiz/hearings/hearing-07-24-08-stimulus/Zandi.pdf (accessed December 18, 2008).

5. 反經濟人

1. WorldPublicOpinion.org, *World Public Opinion and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Washington, D.C.: WorldPublicOpinion.org, 2008).
2.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ree Education Mean a Future for Rwanda's Children," October 15, 2007, http://www.dfid.gov.uk/Media-Room/Case-Studies/2007/Free-education-means-a-future-for-Rwandas-children/(accessed July 12, 2009). 不過請注意這裡也有一些模糊地帶，延長義務教育是盧安達國家重建政治工程的一部分，這個複雜的過程深受種族屠殺政治後遺症的影響。
3. Ibid.
4. 用經濟學的語言來說，這是在講競爭性和排他性物品。
5. Jeremy Scahill, *Blackwater: The Ris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ercenary Army* (London: Serpent's Tail, 2007).
6. Jenny Tomkins, "Xe Is the Problem," *In These Times*, May 20, 2009.
7.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Yearbook 2009: 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chap. 5.
8. Nick Turse, *The Complex: How the Military Invades Our Everyday Lives*, 1st ed.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8).
9. Travis Sharp, *U.S. Defense Spending vs. Global Defense Spending*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rms Control and Non-Proliferation, 2009).
10.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bk. 5, p. 7.
11. Ibid., bk. 1, p. 264.
12.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London: Penguin, 2002), 202.
13. Alexander Hamilton, John Jay and James Madison, *The Federal Convention*, ed. Henry Cabot Lodge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The Knickerbocker Press, 1902), 204.
14. TRAC IRS, "IRS Audit Rate for Millionaires Plummets," Transactional Records Access Clearing house, 2009, http://trac.syr.edu/tracirs/latest/204/(accessed July 20, 2009). For more, see Radhika Balakrishnan et al., *Rethinking Macro Economic Strategies from a Human Rights Perspective (Why MES with Human Rights II)* (Atlanta: US Human Rights Network, 2009).
15. Ben Stein, "In Class Warfare, Guess Which Class Is Winning,"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6, 2006.
16. Andrew Cockburn, "The Wall Street White House," *CounterPunch*, July 2, 2009.

4. 鑽石與水

1. As quoted in Michael Albert, *Moving Forward: Programme for a Participatory Economy* (Edinburgh: AK, 2000), 128.
2. 《國富論》分析「看不見的手」最具代表性的是這一段：「人類幾乎隨時隨地都需要同胞的協助，要想僅僅依賴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行不通的。一個人如果能夠刺激其他人的利己心，來讓自己得利，並告訴對方，幫他做事對他們自己有利，如此要達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任何人只要是與他人做買賣，首先就要這樣提議。給予我所要的東西，你也可以獲得你所要的東西：這番話是交易的通義。我們所需要的相互幫忙，大部分是依照這個方法取得。我們每天所需的食物不是出自屠戶、釀酒商或烘焙師的恩惠，而是出於他們自利的打算。我們不說會喚起他們良心的話，而是說喚起他們利己心的話。我們不說自己有需要，而說對他們有利。」見 Adam Smith,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5th ed. (1776; rep., London: Methuen, 1904), 44.。
3. 順便一提，亞當斯密這段文字出現在《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緊接在該書唯一提及「看不見的手」的文字之後。
4.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bk. 1, p. 13.
5. Paul Anthony Samuelson, *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New York: McGraw-Hill, 1948).
6. Adam Smith, *Glasgow Edition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Vol. 5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1762; repr.,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2), Monday, March 28, 1763.
7. Smith, *Wealth of Nations*, bk. 1, p. 2.
8. Ibid., bk. 1, p. 7.
9. 這種說法有點像是送出一道理論的免死金牌，帶有循環論證的風險：到底多長的勞動時間算是「社會必要」？不過，生產力本來就沒有一個上帝給定的標準，以製造汽車為例，今日需要的工時和一百年前大不相同。這也就是為什麼生產力是一種「社會」現象。
10. 剩餘價值也解釋了為什麼長遠來看，資本主義是死路一條。資本家藉由降低勞動成本來增加利潤，主要做法是採用功能更好的機器。然而長期而言，這種做法會降低利潤，原因在於剩餘價值來自剝削勞工，如今資本家會用較少的勞工來達成同樣的產量。
11. 這種利潤之所以產生，是因為工人工作達到工資的要求之後，還是得繼續工作。工時的控制非常重要。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派認為，工

30. 對於我們為何或是否會被$1與$0.99這類價格差異欺騙，相關研究非常多。相信人類還是有理性可言的人認為，$1與$0.99的差異之所以在感覺上大於$1.01與$1的差異，原因是我們通常會忽略最後一位數字，這樣可以節約大腦珍貴的運算能力，用在更重要的事物上。見Dan Ariely, *Predictably Irrational: The Hidden Forces That Shape Our Decision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8), for instance.。
31. 讀者可以藉此瞭解丹尼餐廳平常的利潤有多豐厚，如果以平日定價來收費，丹尼餐廳可以賺進一千二百萬美元。
32. Bruce Horovitz, "2 Million Enjoy Free Breakfast at Denny's," *USA Today*, February 3, 2009.
33. Rudyard Kipling, *American Notes* (Boston: Brown and Company, 1899), 18. I'm very happy to acknowledge that Wikipedia pointed me toward this source.
34. Richard B. McKenzie, *Why Popcorn Costs So Much at the Movies: And Other Pricing Puzzles* (New York: Copernicus Books, 2008).
35. Dominique Soguel, "Mining Interests Tied to Rape Impunity in Congo," *Women's eNews*, June 3, 2009.
36. Raj Patel, *Stuffed and Starved: Markets, Power and the Hidden Battle for the World Food System* (London: Portobello Books, 2007), 280.
37. Shin-Yi Chou et al., "Fast Food Restaurant Advertising on Television and Its Influence on Childhood Obesity,"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51, no.4 (2008).
38. Steve Stecklow, "Microsoft Battles Low-Cost Rival for Africa,"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28, 2008.
39. Annelies Allain and Yeong Joo Kean, "The Youngest Market: Baby Food Peddlers Undermine Breastfeeding," *Multinational Monitor* 30, no.1 (2008). The figure for infant mortality estimates from infant formula relates to 2004, and comes from http://www.unicef.org/nutrition/index 22657.html, cited in George Kent, "WIC's Promotion of Infant Formula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Breastfeeding Journal* 1, no.8 (2006), doi:10.1186/1746 4358-1-8.
40. Allain and Kean, "The Youngest Market."
41. Michael Sandel, *Reith Lectures: A New Citizenship*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2009) http://www.bbc.co.uk/programmes/b00kt7rg (accessed August 10, 2009).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t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on November 8, 2006; available from www.econ.cam.ac.uk/faculty/dasgupta/STERN.pdf.)
16. Erin M. Tegtmeier and Michael D. Duffy, "External Cost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2 (2004).
17. J. N. Pretty et al., "An Assessment of the Total External Costs of UK Agriculture," *Agricultural Systems* 65, no.2 (2000).
18. *Economist*, "A Survey of China's Quest for Resources: Negative Externalities," *Economist Special Reports*, March 13, 2008.
19. *People's Daily Online*, "Desertification Causes Yearly Loss of 54 Billion Yuan in China," November 26, 2008.
20. Ibid.
21. Pacific Institute, "Reign of Sand: Inner Mongolia. A Vast Chinese Grassland, a Way of Life Turns to Dust," *Circle of Blue*, 2008, http://www.circleofblue.org/reign/articlemain2.php (accessed March 15, 2008).
22. Peter Ford, "Drought Threatens China's Wheat Crop,"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ruary 11, 2009.
23. Ibid.
24. Scott M. Swinton et al., "Ecosystem Services and Agriculture: Cultivating Agricultural Ecosystems for Diverse Benefits," *Ecological Economics* 64, no.2 (2007).
25. Harpinder S. Sandhu et al., "The Future of Farming: The Value of Ecosystem Services in Conventional and Organic Arable Land: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Ecological Economics* 64, no.4 (2008).
26. Leo Horrigan et al., "How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Can Address the Environmental and Human Health Harms of Industrial Agriculture,"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110, no.5 (2002).
27. Juan Martinez-Alier,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 A Study of Ecological Conflicts and Valuation*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2002).
28. U. Thara Srinivasan et al., "The Debt of Nation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 Impacts from Human Activiti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5, no.5 (2008).
29. Lawrence Mishel and Jared Bernstein, *Economy's Gains Fail to Reach Most Workers' Paychecks* (Washington, D.C.: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2007)

sidies to Corn Sweeteners and the U.S. Obesity Epidemic," in *Policy Brief 09-01,* Glob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Institute, Tufts University, 2009.
6. 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 "Corn Subsi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s Farm Subsidies Database*, 2009, http://farm.ewg.org/farm/progdetail.php?fips=00000&progcode=corn (accessed March 4, 2009).
7.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Combined Food Preparation and Serving Workers, Including Fast Food," *Occupational Employment and Wages*, May 2007, http://www.bls.gov/oes/2007/may/oes353021.htm (accessed March 14, 2009).
8. SEIU, "SEIU Beyond the Bonuses: Tarp," 2009, http://www.seiu.org/a/change-that-works/bank-of-america/beyond-the-bonuses-tarp.php (accessed March 4, 2009); Piet Van Lier, *Public Benefits Subsidize Major Ohio Employers: A 2008 Update* (Cleveland, OH: Policy Matters Ohio, 2008).
9. See Tom Lotshaw, "Working for Welfare," *Marietta Register*, January 6, 2009.
10. D. Barnard et al., "The Medical Costs Attributable to Meat Consumption," *Preventive Medicine* 24, no.6 (1995).
11. Barry M. Popkin, "The Nutrition Transition and Its Health Implications in Lower-Income Countries," *Public Health Nutrition* 1, no.1 (1998).
12. SEI, "Price Per Ton of Carbon Offset: Voluntary Carbon Offset Information Portal,"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and the Tufts University Climate Initiative, 2009, http://www.tufts.edu/tie/carbonoffsets/price.htm (accessed March 5, 2009).
13. Weiqi Chen et al., "Estimation of Environmental Cost Incurred by Pesticide Application in Coastal Agricultural Region and Management Measures," *Environmental Informatics Archives* 4 (2006).
14. Jules N. Pretty et al.,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Costs of the Eutrophication of Fresh Waters in En gland and Wales" (paper, Centre for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and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Essex, Colchester, UK, 2002).
15. See Partha Dasgupta, "Comments on the Stern Review's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comments were prepared for a seminar on the Stern Review's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organized by the Foundation

equality Predicament: Report on the World Social Situation 2005* [a/60/117/Rev.1 St/Esa/299] (New York: UNDESA, 2005).
32. William Langley, "Profile: The King of Bhutan," *The Sunday Telegraph*, November 9, 2008.
33. 而且這種衡量方式是假設各國的國內生產毛額可以一視同仁地比較，其實不然。見 Pogge and Reddy, "How Not to Count the Poor"。
34. Juliet Michaelson et al., *National Accounts of Well-Being: Bringing Real Wealth onto the Balance Sheet* (London: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2009).
35. James Konow and Joseph Earley, "The Hedonistic Paradox: Is Homo Economicus Happier?,"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2, no.1–2 (2008).
36. John Stuart Mill, *The Autobiography of John Stuart Mill* (Sioux Falls, SD: NuVision Publications, 1997), 73.
37. Michel Foucault and Michel Senellar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8–79*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38. Datamonitor, *Life Insurance: Global Industry Guide* (London: Datamonitor: An Informa Business, 2009).
39. Viviana A. Rotman Zelizer, *Morals and Markets: The Development of Life Insur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83); Viviana A. Rotman Zelizer, *Pricing the Priceless Child: The Changing Social Value of Children* (New York: Basic, 1985).

3. 企業

1. Joel Bakan, *The Corporation: The Pathological Pursuit of Profit and Power*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4). 學者 Lynn Stout 運用同樣的概念與類似的思考模式，來處理經濟人的問題，並且得到同樣的結論。見 Lynn A. Stout, "Taking Conscience Seriously," in *Moral Markets*, ed. Paul Zak.
2. Michael Grunwald, "Monsanto Hid De cades of Pollution; PCBs Drenched Ala. Town, but No One Was Ever Told,"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 2002.
3. *Wired*, "The Future of Food: How Science Will Solve the Next Global Crises," October 28, 2008.
4. Nancy Dunne, "Why a Hamburger Should Cost 200 Dollars—The Call for Prices to Reflect Ecological Factors,"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2, 1994.
5. Alicia Harvie and Timothy A. Wise, "Sweetening the Pot: Implicit Sub-

26. Ibid.
27. Abhishek Srivastava et al., "Money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It's Not the Money, It's the Motiv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0, no.6 (2001).
28. 有一點很重要的是，幸福感與金錢之間的隔絕，而且由此可知，市場並不是讓幸福最大化的最佳管道。這裡有一個由 Gavin McCormick 提供的例子，雖然用到一點數學，但是耐人尋味。假設拉蒂卡太太和 Apple-mart 水果行都在賣蘋果，拉蒂卡只有十塊錢和一個蘋果，Apple-mart 的老闆比爾．貝茲有千萬美元家產和無數蘋果。這時有一萬塊錢但沒有蘋果的瓊斯先生，願意最多付五毛錢買蘋果。如果拉蒂卡打算賣二毛錢，但是 Apple-mart 因為擁有規模經濟，可以把價錢殺到一毛錢，那麼瓊斯先生會向 Apple-mart 買，這樣會產生四毛錢的最高剩餘價值。然而金錢只是價值的替代品，如果以價值來衡量，情況會很不一樣。二毛錢對拉蒂卡的價值（log $10.20—log $10），遠高於一毛錢對 Apple-mart 老闆的價值（log $10 million and $0.10—log $10 million）以及對瓊斯先生的價值（log $9,999.90—log $9,999.80）。同樣的道理，人們願意支付的金額也很難呈現價值的真貌。我們再做一個很殘酷無情的假設：拉蒂卡和 Apple-mart 老闆都陷身在沙漠中，瀕臨死亡，兩人生命的價值只相當於他們的金錢能夠帶來的幸福，因此 Apple-mart 老闆的生命值 log(10 million) = 七單位效用（util），拉蒂卡只值 log(10) = 一單位效用，而瓊斯先生只需花費相當於〇．一單位效用的努力就可以搭救兩人。如果市場只考慮單位效用，那麼瓊斯先生顯然兩個人都應該搭救，訂出一個在〇．一單位效用到一．〇單位效用之間的價碼。然而由於實際上市場交易考慮的是金錢，因此這筆救人的交易無法完成：以瓊斯先生的收入而言，〇．一單位效用相當於大約二〇五五元，但拉蒂卡只有區區十塊錢可用來交易，而不是她更有價值的一單位效用，因此她請不起瓊斯先生來救她。
29. Arloc Sherman and Aviva Aron-Dine, *New CBO Data Show Income Inequality Continues to Widen* (Washington, D.C.: 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2007).
30. Robert H. Frank, *Falling Behind: How Rising Inequality Harms the Middle Class*, The Aaron Wildavsky Forum for Public Policy 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31.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The In-*

科學家，雖然經驗顯示我應該多聽從她的想法，但是她也懷疑同行研究者與那些大型機器運用的技術以及藉此獲致的結論。功能性磁振造影的解析度很低，要用它來判別大腦內部的活動狀況，就像從一英里外欣賞達文西的《蒙娜麗莎》。

17. Jorge Moll et al., "Human Fronto-Mesolimbic Networks Guide Decisions About Charitable Don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3 (2006).
18. M. Bekoff, "Wild Justice and Fair Play: Cooperation, Forgiveness, and Morality in Animals," *Biology and Philosophy* 19, no.4 (2004).
19. Frans B. M. de Waal, "How Selfish an Animal? The Case of Primate Cooperation," in *Moral Markets: The Critical Role of Values in the Economy*, ed. Paul Zak (Prince ton: Prince 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69.
20. See Sarah F. Brosnan, "Fairness and Other-Regarding Preferences in Nonhuman Primates," in *Moral Markets*, ed. Paul Zak.
21. 研究人員訓練狗以伸出爪子來換取點心，然而牠們如果看到其他的狗伸出爪子卻沒有得到點心，接受指令的意願就會大幅降低。見Friederike Range et al., "The Absence of Reward Induces Inequity Aversion in Dog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6, no.1 (2009).
22. See Ernst Fehr and Bettina Rockenbach, "Detrimental Effects of Sanctions on Human Altruism," *Nature* 422, no.6928 (2003), cited in Samuel Bowles, "Policies Designed for Self-Interested Citizens May Undermine 'The Moral Sentiments': Evidence from Economic Experiments," *Science* 320, no.5883 (2008).
23. Becker,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132.
24. 亞當斯密認為不能：「當上帝將土地分配給少數幾個地主時，祂並沒有遺忘或遺棄那些沒有分到的人，他們也可以享受大地的生產成果。就人類生活真正的幸福而言，他們絕對不遜於那些看似高高在上的人。對於身體的舒適與心靈的平靜，不同階層的人其實處於同一水平。一個在路邊曬太陽的乞丐擁有的安全感，國王必須努力爭取才能夠得到。」見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1759; repr., Oxford: Clarendon, 1976), part 4, chap. 1.
25. Carol Nickerson et al., "Zeroing in on the Dark Side of the American Dream: A Closer Look at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the Goal for Financial Succes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4, no.6 (2003).

und das Andere Hegemonie, Identitat und Emanzipation, Feminist and 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1 (Baden-Baden, Germany: Nomos 2008); Colin Danby,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Closet: Heteronormativity in *Feminist Economics*" 13 no.2 (2007), 29–53。

8. Ibid., 822.
9. Gary S. Becker,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enl. 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117.
10. See Barbara R. Bergmann, "Becker's Theory of the Family: Preposterous Conclusions," *Feminist Economics* 1, no.1 (1995), for more.
11. Ibid., 145.
12. Martin Brokenleg, "Native American Perspectives on Generosity," *Reclaiming Children and Youth* 8, no.2 (1999).
13. Gerald Marwell and Ruth E. Ames, "Economists Free Ride, Does Anyone Else?: Experiments on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IV,"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5, no.3 (1981). 對於經濟學系學生是否會變成比較差的公民，經濟學家辯論不休，目前最具說服力的論證顯示，答案似乎是肯定的。這不是一個好兆頭，因為全球經濟策略的制定者都是出身經濟學系。見Robert H. Frank et al., "Do Economists Make Bad Citizen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86–1998)* 10, no.1 (1996).
14. Joseph Henrich et al., "'Economic Man'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Behavioral Experiments in 15 Small-Scale Societie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8, no.6 (2005).
15. 雖然這個結果還是遠優於學者對「經濟人」的預測，但它也可以用來矯正人們對於原住民慷慨大方本性的空泛觀念；這些觀念表面上過度感性，其實帶有種族歧視心態，在「另類」的西方文化中廣為傳播。
16. Edward Vul et al., "Puzzlingly High Correlations in fMRI Studies of Emo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Cognition,"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forthcoming). 我在這裡要提出一個重要的免責聲明：最近一項在耶魯大學進行的實驗發現，人們很容易被言之鑿鑿的科學論述影響。研究人員在正確與錯誤的解釋之中加入一段話「大腦掃描的結果顯示……由於前額葉的迴路與自我知識相關」，結果發現不加入這段話時，人們很容易就能分辨正確與錯誤的解釋。一旦加入這段話，人們就會對神經科學家的話照單全收。我太太也是一位神經

Population: The Economics and Ideology of World Population Control.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1988。

19. Herman E. Daly, "In Defense of a Steady-State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54, no.5 (1972): 950–51.
20. Luke D. Kartsounis, Merle James-Galton and Gordon T. Plant, "Anton Syndrome, with Vivid Visual Hallucinations, Associated with Radiation Induced Leucoencephalopathy," *Journal of Neurology, Neurosurgery, and Psychiatry* (2009), http://jnnp.bmj.com/cgi/content/short/jnnp.2008.151118v1.
21. V. S. Ramachandran and Diane Rogers-Ramachandran, "Denial of Disabilities in Anosognosia," *Nature* 382 (1996).
22. Albert O. Hirschman,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23. 事實上，當代經濟學理論的意識形態功能之一，就是將這種差異模糊化，將需求與利潤結合，營造一個任何事物都可以販賣的世界。

2. 成為經濟人

1. John Stuart Mill, *Essays on Some Unsettled Questions of Political Economy*, 2nd ed. ([S.l.]: Longmans, Green, Reader, and Dyer, 1874), 144.
2. Ibid., 145 (italics added).
3. Gary S. Becker,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14 (italics in original).
4. Tore Frangsmyr, ed., *Les Prix Nobel. The Nobel Prizes 1992* (Stockholm: Nobel Foundation, 1993).
5. 特別見Alexander Rosenberg, "Review Symposium: Can Economic Theory Explain Everything?,"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9, no.4 (1979)，有細緻的討論。
6. Gary S. Becker, "Competition and Democracy,"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 (1958): 106.
7. Gary S. Becker, "A Theory of Marriage: Part I,"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81 (1973): 819。一些評論家指出，貝克具有明顯的異性戀正統觀（heteronormative），既然婚姻的超歷史（transhistorical）目標之一，就是與異性伴侶一起養育兒女，因此他的家庭只容得下異性戀者。關於貝克論點的批判，請見Friederike Haberman, *Der homo oeconomicus*

6, 2009; Matt Taibbi, "The Great American Bubble Machine," *Rolling Stone*, July 2009.

11. Nassim Nicholas Taleb, "Ten Principles for a Black Swan-Proof World," *Financial Times*, April 8, 2009.
12. 最具有先見之明的人是社會學家Giovanni Arrighi，本書付梓時他已經過世。Arrighi在《漫長的二十世紀》（*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一書中指出，資本主義在金融危機時期反而會暴衝，政府與金融資本的結合前仆後繼：熱那亞（1340年代至1630年代）、荷蘭（1560年代至1780年代）、英國（1740年代至1930年代）、美國（1870年代迄今）。《漫長的二十世紀》成於一九九四年，當時Arrighi認為美國體系崩潰的後繼者應該是日本。不過現在看來，中國與印度崛起為國際金融重鎮，數十億元規模的主權財富基金比比皆是，國家與金融的結合似乎出現新的模式。多極化的金融世界已經成型，然而還是很容易受到金融情勢突變的影響，上兆美元的金額只是一個電子交易的數字，卻能夠影響一整個國家。見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1994).
13. 大蕭條衝擊歐洲與北美洲，無庸置疑。然而與八十年前相比，今日的「全球」範圍更大，經濟整合更為緊密，牽涉的人更多，因此當前經濟危機的規模也更為廣泛。
14. Cited in Mark P. Mostert, "Useless Eaters: Disability as Genocidal Marker in Nazi Germany," *The Journal of Special Education* 36, no.3 (2002).
15. Joseph E. Stiglitz and Linda Bilmes, *The Three Trillion Dollar War: The True Cost of the Iraq Conflict,* 1st ed. (New York: W. W. Norton, 2008), 138. To see why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of this sort are fraught, see Thomas Pogge and Sanjay G. Reddy, "How Not to Count the Po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October 29, 2005, http://ssrn.com/abstract = 893159 (accessed December 6, 2007).
16.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Ecosystems and Human Well-Being: Synthesis*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05).
17. 為什麼必須把二氧化碳減到350ppm以下，見George Monbiot, "If We Behave as If It's Too Late, Then Our Prophecy Is Bound to Come True," *Guardian*, March 17, 2009.
18. 戴利的人口觀點令人感到憂慮，例如他主張的「生育執照」。關於人口控制的政治爭議，請見Jacqueline Rorabeck Kasun, *The War Against*

World Public Opinion on Governance and Democracy. Washington, D.C.: WorldPublicOpinion.org, 2008.

World Rainforest Movement. *Women Raise Their Voices Against Tree Plantations: The Role of the European Union in Disempowering Women in the South*. Montevideo: World Rainforest Movement, 2009.

Worm, Boris, Edward B. Barbier, Nicola Beaumont, J. Emmett Duffy, Carl Folke, Benjamin S. Halpern, Jeremy B. C. Jackson, Heike K. Lotze, Fiorenza Micheli, Stephen R. Palumbi, Enric Sala, Kimberley A. Selkoe, John J. Stachowicz, and Reg Watson. "Impacts of Biodiversity Loss on Ocean Ecosystem Services." *Science* 314, no. 5800 (2006): 787.

Zandi, Mark. "Testimony before the House Committee on Small Business Hearing on 'Economic Stimulus for Small Business: A Look Back and Assessing Need for Additional Relief.' " July 24, 2008. http://www.house.gov/smbiz/hearings/hearing-07-24-08-stimulus/Zandi.pdf (accessed December 18, 2008).

Zelizer, Viviana, and A. Rotman. *Morals and Markets: The Development of Life Insur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1983.

———. *Pricing the Priceless Child: The Changing Social Value of Children*. New York: Basic, 1985.

Žižek, Slavoj. *Violence: Six Sideways Reflections, Big Ideas*. London: Profile, 2008.

注釋

1. 缺陷

1. Alan Greenspan, "Testimony of Dr. Alan Greenspan to the Committee of Government Oversight and Reform, October 23, 2008," http://oversight.house.gov/documents/20081023100438.pdf.
2. Edward Luce and Chrystia Freeland, "Summers Calls for Boost to Demand," *Financial Times*, March 9, 2009.
3. *Time*, "10 Questions for Jim Cramer," May 14, 2009.
4. 讀者或許記得，《蛻變》的開場寫道薩姆沙變成一隻「甲蟲」。卡夫卡德文原文用的是「Ungeziefer」，英文翻譯為「vermin」，翻譯者詮釋為某種六隻腳的昆蟲。小說家納博可夫（Vladimir Nabokov）在一篇著名的文章中提到，薩姆沙的甲殼下方藏有翅膀，只是自己渾然不覺：「這是一個讓我很得意的觀察，各位一輩子都可以好好思索，芸芸眾生之中，有些人就是不知道自己有翅膀。」見 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 and Fredson Bowers, *Vladimir Nabokov: Lectures on Literatur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0), 259.
5. 可笑的是，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施行這種會計手法的理由是「保護投資人」。安隆（Enron）詐欺案與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風暴事件，都大量使用這種會計手法。
6. Sanford J. Grossman and Joseph E. Stiglitz, "On the Impossibility of Informationally Efficient Market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0, no.3 (1980).
7. 行為經濟學家試圖彌縫這些模式，引入非理性投資人的因素。這是經濟學這門學科的典型反應，當金融模式出了問題，經濟學家會認定模式本身沒有問題，有問題的是這個世界：必須納入模式的現實世界變化因素叫做「不完整」（imperfection）。經濟學如今要面對的是不理性的人，他們只有不完整的資訊，在不完整的市場中運作。
8. See Justin Fox, *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Market: A History of Risk, Reward, and Delusion on Wall Street* (New York: HarperBusiness, 2009), for more.
9. Greg Farrell and Sarah O'Connor, "Goldman Sachs Staff Set for Record Pay," *FT.Com*, July 15, 2009.
10. Andrew Clark, "Indiana Tries to Halt Chrysler Deal," *Guardian*, April

Gender and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Vallance, Edward. *A Radical History of Britain: Visionaries, Rebels and Revolutionaries—the Men and Women Who Fought for Our Freedoms*. London: Little, Brown, 2009.
Vanden Heuvel, Katrina. "In the Trenches and Fighting Slavery." *The Nation.com,* December 28, 2008. http://www.thenation.com/blogs/edcut/391546/in_the_trenches_and_fighting_slavery (accessed March 14, 2009).
Van Lier, Piet. *Public Benefi ts Subsidize Major Ohio Employers: A 2008 Update.* Cleveland, OH: Policy Matters Ohio, 2008.
Vul, Edward, Christine Harris, Piotr Winkielman and Harold Pashler. "Puzzlingly High Correlations in fMRI Studies of Emo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Cognition."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forthcoming).
Washington, Jesse. "Some Say Holocaust Memorial Shooting Signals a Broader War." *Philadelphia Inquirer*, June 14, 2009.
Wijeratna, Alex. *Taking the Fish—Fishing Communities Lose Out to Big Trawlers in Pakistan.* Johannesburg: ActionAid International, 2007.
Wired. "The Future of Food: How Science Will Solve the Next Global Crises." October 20, 2008.
Wolin, Sheldon S. "Transgression, Equality and Voice." In *Demokratia: A Conversation on Democracies, Ancient and Modern*, edited by Josiah Ober and Charles W. Hedrick, 63–9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Wood, Ellen Meiksins. "Demos Versus 'We the People': Freedom and 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 In *Demokratia: A Conversation on Democracies, Ancient and Modern*, edited by Josiah Ober and Charles W. Hedrick, 121–38.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 *Peasant-Citizen and Slave: The Foundations of Athenian Democracy*. London: Verso, 1988.
Woodruff, Christopher. "Review of De Soto's 'The Mystery of Capital.' "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39, no. 4 (2001): 1215–23.
World Bank. *World Bank Assistance to Agriculture in Sub Saharan Africa: An Independent Evaluation Group Review.*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7.
———.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7.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Statistical Information System. "WHO, 2009. http://www.who.int/whosis/" (accessed July 19, 2009).
WorldPublicOpinion.org. *World Public Opinion and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Washington, D.C.: WorldPublicOpinion.org, 2008.
WorldPublicOpinion.org, Steven Kull, Clay Ramsay, Stephen Weber, Evan Lewis, Melinda Brouwer, Melanie Ciolek and Abe Medoff.

Stout, Lynn A. "Taking Conscience Seriously." In *Moral Markets: The Critical Role of Values in the Economy*, edited by Paul Zak, 157–72. Princeton: Prince 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Swinton, Scott M., G. Frank Lupi, Philip Robertson and Stephen K. Hamilton. "Ecosystem Ser vices and Agriculture: Cultivating Agricultural Ecosystems for Diverse Benefi ts." *Ecological Economics* 64, no. 2 (2007): 245–52.
Taibbi, Matt. "The Great American Bubble Machine." *Rolling Stone*, July 2009: 52– 101.
Taleb, Nassim Nicholas. "Ten Principles for a Black Swan–Proof World." *Financial Times*, April 8, 2009.
Tegtmeier, Erin M., and Michael D. Duffy. "External Cost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Sustainability* 2 (2004): 1– 20.
Thepwethi, Phra (Prayut), Bruce Evans, Dhammavijaya, Jourdan Arenson and Mu¯nnithi Phutthatham. *Buddhist Economics: A Middle Way for the Market Place.* Bangkok: Buddhadhamma Foundation, 1994.
Thucydides, and Henry Dale.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London: H. G. Bohn, 1848.
Time magazine. "10 Questions for Jim Cramer." May 14, 2009.
Tomkins, Jenny. "Xe Is the Problem." *In These Times*, May 20, 2009.
Torres, Bob. *Making a Kill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Animal Rights*. Edinburgh: AK Press, 2007.
TRAC IRS. "IRS Audit Rate for Millionaires Plummets." Transactional Records Access Clearing house, 2009. http://trac.syr.edu/tracirs/latest/204/ (accessed July 20, 2009).
TRAPESE Collective. "The Rocky Road to a Real Transition: The Transition Towns Movement and What It Means for Social Change." *The Commoner* 13 (2009). http://www.commoner.org.uk/N13/11Trapese.pdf (accessed August 17, 2009).
Turse, Nick. *The Complex: How the Military Invades Our Everyday Lives*. 1st ed. 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8.
Tutu, Desmond. 2004. "The Second 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 Lecture. "Given in Johannesburg, South Africa, November 23, 2004. http://www.nelsonmandela.org/index.php/news/article/look_to_the_rock_from_which_you_were_hewn/ (accessed November 20, 2005).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The Inequality Predicament: Report on the World Social Situation 2005* [a/60/117/Rev.1 St/Esa/299]. New York: UNDESA, 2005.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5:*

Portal." 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 and the Tufts University Climate Initiative, 2009. http://www.tufts.edu/tie/carbonoffsets/price.htm (accessed March 5, 2009).

SEIU. "SEIU Beyond the Bonuses: Tarp." 2009. http://www.seiu.org/a/change-that-works/bank-of-america/beyond-the-bonuses-tarp.php (accessed March 4, 2009).

Sharp, Travis. *U.S. Defense Spending vs. Global Defense Spending.*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Arms Control and Non-Proliferation, 2009.

Sherman, Arloc, and Aviva Aron- Dine. *New CBO Data Show Income In equality Continues to Widen.* Washington, D.C.: Center on Bud 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 2007.

Shiva, Vandana. *Biopiracy: The Plunder of Nature and Knowledge.* Dartington: Green Books, in association with The Gaia Foundation, 1998.

Smith, Adam. *Glasgow Edition of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Vol. 5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1762. Reprint.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1982.

———.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5th ed. 1776. Reprint, London: Methuen, 1904.

———.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1759. Reprint. Oxford: Clarendon, 1976.

Soguel, Dominique. "Mining Interests Tied to Rape Impunity in Congo." *Women's eNews,* June 3, 2009.

Srinivasan, U. Thara, Susan P. Carey, Eric Hallstein, Paul A. T. Higgins, Amber C. Kerr, Laura E. Koteen, Adam B. Smith, Reg Watson, John Harte and Richard B. Norgaard. "The Debt of Nations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Ecological Impacts from Human Activitie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5, no. 5 (2008): 1768– 73.

Srivastava, Abhishek, Edwin A. Locke and Kathryn M. Bartol. "Money and Subjective Well- Being: It's Not the Money, It's the Motiv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0, no. 6 (2001): 959– 71.

Stannard, David E. *American Holocaust: The Conquest of the New Worl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Stecklow, Steve. "Microsoft Battles Low-Cost Rival for Africa." *Wall Street Journal,* October 28, 2008.

Stein, Ben. "In Class Warfare, Guess Which Class Is Winning."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6, 2006.

Stiglitz, Joseph E., and Linda Bilmes. *The Three Trillion Dollar War: The True Cost of the Iraq Conflict.* 1st ed. New York: W. W. Norton, 2008.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SIPRI Yearbook 2009: Armaments, Disarmament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13–36.

Pretty, Jules N., C. F. Mason, D. B. Nedwell and R. E. Hine.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the Environmental Costs of the Eutrophication of Fresh Waters in En gland and Wales." Paper, Centre for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and Department of Biological Sciences, University of Essex, Colchester, UK, 2002.

Prins, Gwyn, and Steve Rayner. "Time to Ditch Kyoto." *Nature* 449, no.7165 (2007): 973–75.

Ramachandran, V. S., and Diane Rogers- Ramachandran. "Denial of Disabilities in Anosognosia." *Nature* 382 (1996): 501.

Ranciere, Jacques. *Disagreement: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 *On the Shores of Politics.* Radical Thinkers 21. London: Verso, 2007.

Ranciere, Jacques, and Steve Corcoran. *Hatred of Democracy.* London: Verso, 2006.

Range, Friederike, Lisa Horn, Zsofi a Viranyi and Ludwig Huber. "The Absence of Reward Induces Inequity Aversion in Dog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6, no. 1 (2009): 340– 45.

Rochido, Janaina. "Brazilian Cities Pioneer Demo cratic Bud geting." *City Mayors,* November 18, 2006.

Rosenberg, Alexander. "Review Symposium: Can Economic Theory Explain Everything?"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9, no. 4 (1979): 509–29.

Samuelson, Paul Anthony. *Economics: An Introductory Analysis.* New York: McGraw- Hill, 1948.

Sandel, Michael. *Reith Lectures: A New Citizenship.* 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2009. http://www.bbc.co.uk/programmes/b00kt7rg (accessed August 10, 2009).

Sandhu, Harpinder S., Stephen D. Wratten, Ross Cullen and Brad Case. "The Future of Farming: The Value of Ecosystem Ser vices in Conventional and Organic Arable Land: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Ecological Economics* 64, no. 4 (2008): 835– 48.

Santos, Boaventura de Sousa. *Demo cratizing Democracy: Beyond the Liberal Democratic Canon.* Reinventing Social Emancipation, vol. 1. London: Verso, 2005.

Scahill, Jeremy. *Blackwater: The Ris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ercenary Army.* London: Serpent's Tail, 2007.

Schlosser, Eric. "A Side Order of Human Rights." *New York Times,* April 6, 2005.

SEI. "Price Per Ton of Carbon Offset: Voluntary Carbon Offset Information

Ancient and Modern. Prince ton, NJ: Chichest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6.

Orensanz, J. M. Lobo, Ana M. Parma, Gabriel Jerez, Nancy Barahona, Mario Montecinos and Ines Elias. "What Are the Key Elements for the Sustainability of 'S-Fisheries'? Insights from South America." *Bulletin of Marine Science* 76, no. 2 (2005): 527-56.

Ostrom, Elinor.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New York: Car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2nd ed. 1992. S.v. "common." http://dictionary.oed.com/cgi/entry/50045107 (accessed June 1, 2009).

Pacific Institute. "Reign of Sand: Inner Mongolia. A Vast Chinese Grassland, a Way of Life Turns to Dust." *Circle of Blue*, 2008. http://www.circleofblue.org/reign/articlemain 2.php (accessed March 15, 2009).

Patel, Raj. "A Short Course in Politics at the University of Abahlali Base-Mjondolo." *Journal of 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 43, no. 1 (2008): 95–112.

———. *Stuffed and Starved: Markets, Power and the Hidden Battle for the World Food System*. London: Portobello Books, 2007.

People's Daily Online. "Desertifi cation Causes Yearly Loss of 54 Billion Yuan in China." November 26, 2008.

Perkins, John. *Confessions of an Economic Hit Man*. London: Ebury Press, 2005.

Peters, Pauline E. *Development Encounters: Sites of Participation and Knowledge*, Harvard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000. 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etratis, Richard. "The Witch Killers of Africa." [2003?] http://www.infidels.org/library/ modern/ richard petraitis/ witch killers .shtml (accessed March 1, 2009).

Pithouse, Richard. "Burning Message to the State in the Fire of Poor's Rebellion."*Business Day*, July 23, 2009.

Pizzigati, Sam. *Greed and Good: Understanding and Overcoming the Inequality That Limits Our Lives*. New York: Apex Press, 2004.

Pogge, Thomas, and Sanjay G. Reddy. "How Not to Count the Poor."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October 29, 2005. http://ssrn.com/abstract=893159 (accessed December 6, 2007).

Popkin, Barry M. "The Nutrition Transition and Its Health Implications in Lower-Income Countries." *Public Health Nutrition* 1, no. 1 (1998): 5–21.

Pretty, J. N., C. Brett, D. Gee, R. E. Hine, C. F. Mason, J. I. L. Morison, H. Raven, M. D. Rayment and G. van der Bij. "An Assessment of the Total External Costs of UK Agriculture." *Agricultural Systems* 65, no. 2 (2000):

Mill, John Stuart. *The Autobiography of John Stuart Mill*. Sioux Falls, SD: NuVision Publications, 1997.

———. *Essays on Some Unsettled Questions of Po liti cal Economy*, 2nd ed. [S.l.]: Longmans, Green, Reader, and Dyer, 1874.

Millennium Ecosystem Assessment. *Ecosystems and Human Well-Being: Synthesis*.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05.

Mishel, Lawrence, and Jared Bernstein. *Economy's Gains Fail to Reach Most Workers' Paychecks*. Washington, D.C.: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2007.

Mitchell, Timothy. "The Properties of Markets." In *Do Economists Make Markets? On the Performativity of Economics*, edited by Donald Mackenzie,

Fabian Muniesa and Lucia Siu, 244–75. Prince ton: Prince 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Moll, Jorge, Frank Krueger, Roland Zahn, Matteo Pardini, Ricardo de Oliveira-Souza and Jordan Grafman. "Human Fronto–Mesolimbic Networks

Guide Decisions About Charitable Don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3 (2006): 15623–28.

Monbiot, George. "If We Behave as If It's Too Late, Then Our Prophecy Is Bound to Come True." *Guardian*, March 17, 2009.

———. "These Are Not the Mariners of Old but Pirates Who Make Bureaucrats Blanch." *Guardian*, June 1, 2009.

Mora, Mariana. "Decolonizing Politics: Zapatista Indigenous Autonomy in an Era of Neoliberal Governance and Low Intensity Warfare."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2008.

Morales, Andres Timoteo. "En Veracruz, Oponerse a Operacion de Granjas Carroll Se Castiga Con Carcel." *La Jornada*, April 12, 2009.

Mostert, Mark P. "Useless Eaters: Disability as Genocidal Marker in Nazi Germany." *The Journal of Special Education* 36, no. 3 (2002): 155–68.

Nabokov, Vladimir Vladimirovich, and Fredson Bowers. *Vladimir Nabokov: Lectures on Literatur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1980.

Neocosmos, Michael. "Development, Social Citizenship and Human Rights: Re-Thinking the Po liti cal Core of an Emancipatory Project in Africa." *Africa Development* 32, no. 4 (2007): 35-70.

Neuwirth, Robert. *Shadow Cities: A Billion Squatters, a New Urban Worl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Nickerson, Carol, Norbert Schwarz, Ed Diener and Daniel Kahneman. "Zeroing in on the Dark Side of the American Dream: A Closer Look at the Negative Consequences of the Goal for Financial Success." *Psychological Science* 14, no. 6 (2003): 531–36.

Ober, Josiah, and Charles W. Hedrick. *Demokratia: A Conversation on Democracies,*

Lotshaw, Tom. "Working for Welfare." *Marietta Register*, January 6, 2009.
Luce, Edward, and Chrystia Freeland. "Summers Calls for Boost to Demand." *Financial Times*, March 9, 2009.
MacKenzie, Donald A., Fabian Muniesa and Lucia Siu. *Do Economists Make Markets?: On the Performativity of Economics*. Prince 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Makori, Henry. "Why Belief in Witchcraft Remains Strong among Africans." *Catholic Information Service for Africa*, April 6, 2009.
Martinez-Alier, Juan.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 A Study of Ecological Conflicts and Valuation*.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2002.
Marwell, Gerald, and Ruth E. Ames. "Economists Free Ride, Does Anyone Else?: Experiments on the Provision of Public Goods, IV."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5, no. 3 (1981): 295–310.
Marx, Karl.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Harmondsworth: Penguin; London: New Left Review, 1978.
Marx, Karl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Edited by Gareth Stedman Jones. London: Penguin, 2002.
Maxwell, Bill. "Eating That Tomato Can Put You in Moral Peril." *St. Petersburg (FL) Times*, July 13, 2008.
Maxwell, Daniel, Carol Levin and Joanne Csete. "Does Urban Agriculture Help Prevent Malnutrition? Evidence from Kampala." *Food Policy* 23, no. 5 (1998): 411–24.
Mazower, Mark. "The Strange Triumph of Human Rights, 1933–1950." *The Historical Journal* 47, no. 2 (2004): 379–78.
McKenzie, Richard B. *Why Popcorn Costs So Much at the Movies: And Other Pricing Puzzles*. New York: Copernicus Books, 2008.
McNeil Jr., Donald G. "In New Theory, Swine Flu Started in Asia, Not Mexico." *New York Times*, June 23, 2009.
Mehta, Lyla. "The World Bank and Its Emerging Knowledge Empire." *Human Organization* 60, no. 2 (2001): 189.
Menon, Gayatri A. "Re- Negotiating Gender: Enabling Women to Claim Their Right to Land Resources." Paper presented at Panel on Best Practices on Gender and Land/Property Rights, NGO Forum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Human Settlements— Habitat II, Istanbul, June 1996.
Michaelson, Juliet, Saamah Abdallah, Nicola Steuer, Sam Thompson and Nic Marks. *National Accounts of Well- Being: Bringing Real Wealth onto the Balance Sheet*. London: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2009.
Midnight Notes Collective and Friends. *Promissory Notes: From Crisis to Commons*. New York: Autonomedia, 2009.

Jacobs, Gloria. *Not a Minute More: Ending Violence Against Women*. New York: UNIFEM, 2003.
James, C. L. R. "Every Cook Can Govern: A Study of Democracy in Ancient Greece: Its Meaning for Today." *Correspondence* 2, no. 12 (1956).
Johnston, Basil H. *The Manitous: The Spiritual World of the Ojibway*. New York: HarperPerennial, 1996.
Kaplan, Jeffrey. "Consent of the Governed: The Reign of Corporations and the Fight for Democracy." *Orion Magazine*, November/December 2003.
Kartsounis, Luke D., Merle James- Galton and Gordon T. Plant. "Anton Syndrome, with Vivid Visual Hallucinations, Associated with Radiation Induced Leucoencephalopathy." *Jounral of Neurology, Neurosurgery, and Psychiatry* (2009): http://jnnp.bmj.com/cgi/content/short/jnnp.2008.151118v1.
Kasun, Jacqueline Rorabeck. *The War Against Population: The Economics and Ideology of World Population Control*.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1988.
Kelley, Ann. "Net Losses." *Guardian*, April 11, 2007.
Kent, George. "WIC's Promotion of Infant Formula in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Breastfeeding Journal* 1, no. 8 (2006).
Keynes, John Maynard. *A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36.
Kipling, Rudyard. *American Notes*. Boston: Brown and Company, 1899.
Kofman, Eleonore, and Elizabeth Lebas. *Writings on Citie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Konow, James, and Joseph Earley. "The Hedonistic Paradox: Is Homo Economicus Happier?"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2, no. 1–2 (2008): 1–33.
Krugman, Paul. "Health Care Realities." *New York Times*, July 30, 2009.
Langley, William "Profi le: The King of Bhutan." *Sunday Telegraph*, November 9, 2008.
LaSalle, Tim J., and Paul Hepperly. *Regenerative Organic Farming: A Solution to Global Warming*. Kutztown, PA: Rodale Institute, 2008.
Levack, Brian P. *The Witch-Hunt in Early Modern Europe*, 3rd ed. Harlow: Pearson Longman, 2006.
Linebaugh, Peter. *The Magna Carta Manifesto: Liberties and Commons for Al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Locke, John. *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 London: Whitmore and Fenn, 1821.
Lohmann, Larry. *Financialization, Quantism and Carbon Markets: Variations on Polanyian Themes*. Sturminster Newton, Dorset: The Corner House, 2009.
Loo, Tina. "Dan Cranmer's Potlach: Law as Coercion, Symbol, and Rhetoric in British Columbia, 1884–1951." *Canadian Historical Review* 73, no. 2 (1992): 125–65.

Hardin, Garrett.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Science* 162, no. 3859 (1968): 1243–48.

Harvey, David.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Harvie, Alicia, and Timothy A. Wise. "Sweetening the Pot: Implicit Subsidies to Corn Sweeteners and the U.S. Obesity Epidemic." In *Policy Brief 09- 01*, Glob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 Institute, Tufts University, 2009.

Hayden, Tom, ed. *The Zapatista Reader*. New York: Nation Books, 2001.

Heller, Patrick. "Moving the State: The Politics of Democratic Decentralization in Kerala, South Africa, and Porto Alegre." *Politics & Society* 29, no. 1 (2001): 131–63.

Henrich, Joseph, Robert Boyd, Samuel Bowles, Colin Camerer, Ernst Fehr, Herbert Gintis, Richard McElreath, Michael Alvard, Abigail Barr, Jean Ensminger, Natalie Smith Henrich, Kim Hill, Francisco Gil- White, Michael Gurven, Frank W. Marlowe, John Q. Patton and David Tracer. " 'Economic Man' in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Behavioral Experiments in 15 Small-Scale Societie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8, no. 6 (2005): 795–815.

Hirschman, Albert O. *Exit, Voice, and Loyalty: Responses to Decline in Firms, Organizations, and Stat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Hobbes, Thomas, and Richard Tuck. *Leviathan*, rev.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Holt-Gimenez, Eric, and Raj Patel. *Food Rebellions!: Crisis and the Hunger for Justice*. Oxford: Fahamu, 2009.

Hom, Sharon K., and Stacy Mosher. *Challenging China: Struggle and Hope in an Era of Change*. New York: New Press, 2007.

Hopkins, Rob. *The Transition Handbook: From Oil Dependency to Local Resilience*. Totnes: Green, 2008.

Horovitz, Bruce. "2 Million Enjoy Free Breakfast at Denny's." *USA Today*, February 3, 2009.

Horrigan, Leo, Robert S. Lawrence and Polly Walker. "How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Can Address the Environmental and Human Health Harms of Industrial Agriculture." *Environmental Health Perspectives* 110, no. 5 (2002): 445–56.

Illich, Ivan. *Deschooling Society*. Harmondsworth, UK: Penguin Education, 1973.

International Labour Or ga ni za tion. *Global Wage Report 2008/09: Minimum Wages and Collective Bargaining; Towards Policy Coherence*.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 ce, 2008.

Irvine, William Braxton. *A Guide to the Good Life: The Ancient Art of Stoic Jo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Frangsmyr, Tore, ed. *Les Prix Nobel. The Nobel Prizes 1992*. Stockholm: Nobel Foundation, 1993.

Frank, Robert H. *Falling Behind: How Rising Inequality Harms the Middle Class*. The Aaron Wildavsky Forum for Public Policy 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Frank, Robert H., Thomas D. Gilovich and Dennis T. Regan. "Do Economists Make Bad Citizens?" *Th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86–1998)* 10, no. 1 (1996): 187–92.

Fung, Archon, and Erik Olin Wright. "Deepening Democracy: Innovations in Empowered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 *Politics & Society* 29, no. 1 (2001): 5–41.

Gaia Foundation, BiofuelWatch, African Biodiversity Network, Salva La Selva, Watch Indonesia, and EcoNexus. *Agrofuels and the Myth of the Marginal Lands*. London: Gaia Foundation, 2008.

Gardiner, Jean. "Women's Domestic Labour." *New Left Review* I/89 (1975).

Global Humanitarian Forum. *Anatomy of a Silent Crisis*. Geneva: Global Humanitarian Foundation, 2009.

GlobeScan for the BBC. "Economic System Needs 'Major Changes': Global Poll." GlobeScan/BBC, 2009.

Goldstein, Dana. "The Selling of School Reform." *Nation,* May 27, 2009.

Greenspan, Alan. "Testimony of Dr. Alan Greenspan to the Committee of Government Oversight and Reform, October 23, 2008." http://oversight.house.gov/documents/20081023100438.pdf (accessed February 12, 2009).

Grossman, Sanford J., and Joseph E. Stiglitz. "On the Impossibility of Informationally Efficient Market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0, no. 3 (1980): 393–408.

Grunwald, Michael. "Monsanto Hid De cades of Pollution; PCBs Drenched Ala. Town, but No One Was Ever Told." *Washington Post*, January 1, 2002.

Habermann, Friederike. *Der homo oeconomicus und das Andere. Hegemonie, Identitat und Emanzipation*. Feminist and 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y 1. Baden- Baden, Germany: Nomos, 2008.

Haislip, Alexander. "Venture Capital Firm Set to Reap Rewards on Swine Flu." Reuters, April 24, 2009.

Hallward, Peter. "The Will of the People: Notes Towards a Dialectical Voluntarism." *Radical Philosophy* 155 (May/June 2009): 17–29.

Hamilton, Alexander, John Jay and James Madison. *The Federal Convention*. Edited by Henry Cabot Lodge.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The Knickerbocker Press, 1902.

Han, Dongfang. "Chinese Labour Struggles." *New Left Review* 34 (2005).

Forest to Plantation." Environmental Rights Action/Friends of the Earth, Lagos, Nigeria, 2008.

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 "Corn Subsi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s Farm Subsidies Database.* http://farm.ewg.org/farm/progdetail.php?fips= 00000&progcode=corn (accessed March 4, 2009).

Express News Service. " 'I Am a Marxist Monk,' Says Dalai Lama." *Indian Express*, January 19, 2008.

Everton, Robert Milton. " 'This Is What Democracy Looks Like!' Democracy in Action: Communicative Action." Ph.D diss.,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2003.

Fanon, Frantz.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Translated by Constance Farrington. London: Penguin, 1965.

Farrell, Greg , and Sarah O'Connor. "Goldman Sachs Staff Set for Record Pay." *FT.Com*, July 15, 2009.

Federici, Silvia. *Caliban and the Witch*. New York: Autonomedia, 2004.

Feeny, David, Susan Hanna and Arthur F. McEvoy. "Questioning the Assumptions of 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 Model of Fisheries." *Land Economics* 72, no. 2 (1996): 187–205.

Fehr, Ernst, and Bettina Rockenbach. "Detrimental Effects of Sanctions on Human Altruism." *Nature* 422, no. 6928 (2003): 137–40. Quoted in Samuel Bowles, "Policies Designed for Self- Interested Citizens May Undermine 'The Moral Sentiments': Evidence from Economic Experiments,"*Science* 320, no. 5883 (2008).

Fernandes, Edesio. "Constructing the 'Right to the City' in Brazil." *Social Legal Studies* 16, no. 2 (2007): 201–19.

Ferraro, Paul J., and Laura O. Taylor. "Do Economists Recognize an Opportunity Cost When They See One? A Dismal Performance from the Dismal Science." *Contributions to Economic Analysis & Policy* 4, no. 1 (2005).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Pakistan. Fishery and Aquaculture Country Profile."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 Department, 2009. http://www.fao.org/fishery/countrysector/FI-CPPK/en (accessed April 21, 2009).

Ford, Peter. "Drought Threatens China's Wheat Crop."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February 11, 2009.

Forero, Juan. "In Ecuador, High Stakes in Case Against Chevron." *Washington Post,* Tuesday, April 28, 2009.

Foucault, Michel, and Michel Senellar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8–79*.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Fox, Justin. *The Myth of the Rational Market: A History of Risk, Reward, and Delusion on Wall Street*. New York: HarperBusiness, 2009.

Movement in Thailand." *Ethnology* 37, no. 1 (1998): 1–15.

Dasgupta, Partha. 2006. "Comments on the Stern Review's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Comments were prepared for a seminar on the Stern Review's Economics of Climate Change, or ga nized by the Found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t the Royal Society, London, on November 8, 2006. www.econ.cam.ac.uk/faculty/dasgupta/STERN.pdf (accessed March 20, 2009).

Datamonitor. *Life Insurance: Global Industry Guide.* London: Datamonitor: An Informa Business, 2009.

Davies, R. W. D., S. J. Cripps, A. Nickson and G. Porter. "Defi ning and Estimating Global Marine Fisheries Bycatch." *Marine Policy* 33 (2009): 661–72.

Davis, Mike. "Planet of Slums: Urban Involution and the Informal Proletariat." *New Left Review* 26 (2004): 5–34.

De Angelis, Massimo. *The Beginning of History: Value Struggles and Global Capital.* London: Pluto, 2007.

de Waal, Frans B. M. "How Selfish an Animal? The Case of Primate Cooperation." In *Moral Markets: The Critical Role of Values in the Economy*, edited by Paul Zak, 63–76.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Free Education Means a Future for Rwanda's Children." October 15, 2007. http://www.dfid.gov.uk/Media-Room/Case-Studies/2007/Free-education-means-a-future-for-Rwandas-children/ (accessed July 12, 2009).

Di Tella, Rafael, Sebastian Galiani and Ernesto Schargrodsky. "The Formation of Beliefs: Evidence from the Allocation of Land Titles to Squatter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2, no. 1 (2007): 209– 41.

Dunne, Nancy. "Why a Hamburger Should Cost 200 Dollars— The Call for Prices to Reflect Ecological Factors." *Financial Times,* January 12, 1994.

Economist. "Let Them Eat Pollution," February 8, 1992.

———. "A Survey of China's Quest for Resources: Negative Externalities." *Economist Special Reports*, March 13, 2008.

Eliot, T. S. *The Complete Poems and Plays, 1909–1950*.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Co., 1960.

Elson, Diane. "Socializing Markets, Not Market Socialism." *Socialist Register* (2000): 67–86.

Englund, Harri. *Prisoners of Freedom: Human Rights and the African Poor.* California Series in Public Anthropology 14.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Environmental Rights Action. "Field Report #172: Michelin Converts Prime

———.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6.

Becker, Gary S. "A Theory of Marriage: Part I." *Journal of Po liti cal Economy* 81 (1973): 813–46.

———. *A Treatise on the Family*. Enl. 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Bekoff, M. "Wild Justice and Fair Play: Cooperation, Forgiveness, and Morality in Animals." *Biology and Philosophy* 19, no. 4 (2004): 489–520.

Bergmann, Barbara R. "Becker's Theory of the Family: Preposterous Conclusions." *Feminist Economics* 1, no. 1 (1995): 141–50.

Bergstrom, Carl, Ben Kerr and Michael Lachmann. "Building Trust by Wasting Time." In *Moral Markets: The Critical Role of Values in the Economy*, edited by Paul Zak, 142–56. Princeton, NJ: Prince 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Black, Jane. "A Squeeze for Tomato Growers; Boycott vs. Higher Wages."*Washington Post*, April 29, 2009.

Bowles, Samuel. "Policies Designed for Self-Interested Citizens May Undermine 'The Moral Sentiments': Evidence from Economic Experiments."*Science* 320, no. 5883 (2008): 1605–1609.

Braudel, Fernand. *The Wheels of Commerce*. London: Collins, 1982.

Bricker, Kristen. "In Defense of Land and Territory: Zapatistas Take on Paramilitaries." *Left Turn*, June 1, 2008.

Briggs, Robin. *Witches and Neighbours: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Context of Europe an Witchcraft*, 2nd e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2002.

Broegaard, Rikke B. "Land Access and Titling in Nicaragua." *Development and Change* 40, no. 1 (2009): 149–69.

Brokenleg, Martin. "Native American Perspectives on Generosity." *Reclaiming Children and Youth* 8, no. 2 (1999): 66–68.

Brosnan, Sarah F. "Fairness and Other-Regarding Preferences in Nonhuman Primates." In *Moral Markets: The Critical Role of Values in the Economy*, edited by Paul Zak, 77–104.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Bruce, Iain. *The Porto Alegre Alternative: Direct Democracy in Action*, IIRE Notebook for Study and Research, no. 35-36. London: Pluto Pres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and Education (IIRE), 2004.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Combined Food Preparation and Serving Workers, Including Fast Food." *Occupational Employment and Wages*,

May 2007. http://www.bls.gov/oes/2007/may/oes353021.htm (accessed March 14, 2009).

Caffentzis, Constantine George. *Clipped Coins, Abused Words, and Civil Government: John Locke's Philosophy of Money*. Brooklyn, NY: Autonomedia, 1989.

Caffentzis, George. "Medical Meta phors and Monetary Strategies in the Po liti cal Economy of Locke and Berkeley."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5, no. 2 (2003): 204–33.

———. "A Tale of Two Conferences: Globalization, the Crisis of Neoliberalism and Question of the Commons." Presented at Alternatives to Globalisation conference, hosted by the Center for Global Justice, 2004. http://www.globaljusticecenter.org/papers/caffentzis.htm (accessed August 1, 2009).

Carolan, Michael S. "Disciplining Nature: The Homogenising and Constraining Forces of Anti- Markets on the Food System." *Environmental Values* 14 (2005): 363–87.

Casselman, Ben. "Chevron Expects to Fight Ecuador Lawsuit in U.S." *Wall Street Journal*, July 20, 2009.

Cevallos, Diego. "New Infl uenza Strain Has Led to the Closure of Schools." *IPS (Latin America)*, April 28, 2009.

Chance, Kerry. " 'Broke- on- Broke Violence': What the U.S. Press Got Wrong About South Africa's Xenophobic Riots." *Slate.com*, June 20, 2008. http://www.slate.com/id/2193949/ (accessed January 1, 2009).

Chen, Weiqi, Luoping Zhang and Xiaofeng Hou. "Estimation of Environmental Cost Incurred by Pesticide Application in Coastal Agricultural Region and Management Mea sures." *Environmental Informatics Archives* 4 (2006): 490–501.

China Labour Bulletin. "The Case of China: The Challenge of Labour Unrest in a Communist-Run Capitalist Econom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Business and Human Rights, Paris, December 4, 2008.

China Pharmaceuticals & Health Technologies Weekly. "About 80 Pct of Multinationals Discriminate against Chinese Hep B," July 4, 2007.

Chou, Shin- Yi, Inas Rashad and Michael Grossman. "Fast Food Restaurant Advertising on Tele vi sion and Its Infl uence on Childhood Obesity." *The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51, no. 4 (2008): 599–618.

Clark, Andrew. "Indiana Tries to Halt Chrysler Deal." *Guardian*, April 6, 2009.

Cockburn, Andrew. "The Wall Street White House." *CounterPunch*, July 2, 2009.

Cooper, Charlotte. "Online Chat Spotlights Most- Ailing Millennium Goal." *Women's eNews*, March 29, 2009.

Daly, Herman E. "In Defense of a Steady-State Economy."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54, no. 5 (1972): 945–54.

Danby, Colin.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closet: heteronormativity in feminist economics." *Feminist Economics* 13, no. 2 (2007): 29–53.

Darlington, Susan M. "The Ordination of a Tree: The Buddhist Ecology

書目

Abdullahi, Najad " 'Toxic Waste' Behind Somali Piracy." *Al Jazeera in English*, October 11, 2008.

Abers, Rebecca. "Learning Demo cratic Practice: Distributing Government Resources Through Popular Participation in Porto Alegre, Brazil." In *The Challenge of Urban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Practices*, edited by Maria Emilia Freire and Richard Stren, 129– 44.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1.

Agamben, Giorgio. *The Open: Man and Animal*.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Albert, Michael. *Moving Forward: Programme for a Participatory Economy*. Edinburgh: AK, 2000.

Alinsky, Saul David. *Rules for Radicals: A Practical Primer for Realistic Radical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1.

Allain, Annelies, and Yeong Joo Kean. "The Youn gest Market: Baby Food Peddlers Undermine Breastfeeding." *Multinational Monitor* 30, no. 1 (2008).

Arendt, Hannah.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3rd ed. London: Allen & Unwin, 1967.

Ariely, Dan. *Predictably Irrational: The Hidden Forces That Shape Our Decisions*. 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8.

Arrighi, Giovann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1994.

Auden, W. H. *The Dyer's Hand,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Badiou, Alain. *Ethics: An Essay on the Understanding of Evil*. Translated and introduced by Peter Hallward. London: Verso, 2001.

———. *Metapolitics*. Translated by Jason Barker. London: Verso, 2005.

Baiocchi, Gianpaolo. *Radicals in Power: The Workers' Party (Pt) and Experiments in Urban Democracy in Brazil*. London: Zed Books, 2003.

Bakan, Joel. *The Corporation: The Pathological Pursuit of Profit and Power*.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04.

Balakrishnan, Radhika, Diane Elson and Raj Patel. *Rethinking Macro Economic Strategies from a Human Rights Perspective (Why MES with Human Rights II)*. Atlanta: US Human Rights Network, 2009.

Barnard, D, A. Nicholson and J. L. Howard. "The Medical Costs Attributable to Meat Consumption." *Preventive Medicine* 24, no. 6 (1995): 646–55.

———. "Competition and Democracy."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1 (1958): 105– 109.

Earth 004

價格戰爭——評估地球價值的新方式

The Value of Nothing: How to Reshape Market Society and Redefine Democracy

作　　者—拉吉・帕特爾（Raj Patel）
譯　　者—閻紀宇
主　　編—莊瑞琳
責任編輯—吳崢鴻
美術設計—王璽安
校　　對—莊瑞琳、吳崢鴻
執行企劃—沈小西
董 事 長—孫思照
發 行 人—莫昭平
總 經 理—林馨琴
總 編 輯—林馨琴
出 版 者—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03臺北市和平西路三段二四〇號三樓
發行專線—（〇二）二三〇六六八四二
讀者服務專線—〇八〇〇二三一七〇五
（〇二）二三〇四七一〇三
讀者服務傳真—（〇二）二三〇四六八五八
郵撥—一九三四四七二四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信箱—臺北郵政七九～九九信箱
時報悅讀網—http://www.readingtimes.com.tw
電子郵箱—history@readingtimes.com.tw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李念祖律師
印　　刷—盈昌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二〇一〇年七月十九日
定價—新臺幣二六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北市業字第八〇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價格戰爭：評估地球價值的新方式／拉吉・帕特爾(Raj Patel)著；閻紀宇譯. 初版. --臺北市：時報文化, 2010.07
面；公分. --(Earth；4)
參考書目：面
譯自：The value of nothing：how to reshape market society and redefine democracy
ISBN 978-957-13-5236-7(平裝)
1. 個體經濟學
551.19　99012316

THE VALUE OF NOTHING by Raj Patel
Copyright © 2009 by Raj Patel
Chinese (Complex Characters) copyright © 2010 by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mpany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Curtis Brown Group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57-13-5236-7
Printed in Taiwan